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和党外朋友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朱学范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为人类的崇高理想——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了毕生奋斗，建立了卓著赫世的功勋。人民发自由衷的感情深深怀念他，用各种形式纪念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由邵廉同志选编、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就是出于这种初衷。该书是许多当事人有关毛泽东生活的真实记录，当你认真地读读它，你能触摸到人民对于领袖炙手可热、永生不息的深情。

诚然，该书所记述的不是毛泽东同志叱咤风云，“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英雄史诗般的伟大业绩，也不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开创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事业，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白纸上构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豪迈壮举，而是他和他的党外朋友的友好往来的一些真实的记录。但是，正是从这些平常的交往中，折射出一个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熠熠光辉，展示出人民和领袖在一起水乳交融的真情实景。它对于我们每一个后来人，尤其是年轻人的事业和生活所有的启悟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种纪念了。

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祖国统一的一大法宝。毛泽东同志不但是这一方针的积极制订者，也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他重视和各界党外人士的友好往来。这其中包括各个民主党派的人士、许多国民党人士、文化界人士，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爱国侨胞、清朝遗族、老师和同学等。他不但善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交朋友，而且也善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交往；他不但善于听取党外朋友的意见，只要说得对的就积极照办，而且对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总是开诚布公，又注意让对方放下思想包袱；他不但乐于团结一切爱国进步的志士仁人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同一些国民党右派人士接触，不记前嫌，化敌为友。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毛泽东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热忱，和党外人士广泛往来，真诚相处，体现出坦荡胸怀和凛然正气；他和民主人士交朋友，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努力实现国家的和平、民主、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树立了光辉榜样。

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与党外人士的交往常常体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和战斗的关系，同时也富于浓厚的人情色彩。他做事论理、论法，私交又注重论情、论礼；待人接物，他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很讲人情味。比如，他仰敬师长，和年长者相见总要起身迎送，上下车亲自搀扶；他尊重民主人士，到重庆谈判和初进北京时，对一些党外知名人士总要一一登门拜访；他也很念旧情，解放后有什么活动，总不忘邀他的师长、同学和其他一些故旧来北京相聚；每去外地视察，也总不忘邀请当地一些科学界、文化界朋友一起叙叙旧。在私交中，他很重情义，即便是对一个曾经要开除自己学籍的老师，他也时刻把其冷暖放在心上，多次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稿费接济其困难；也乐于平等待人，即便平常一些细微的交往礼节，比如和友人一起散步，也要注意并肩而行，甚至携手搭背，表现得极其亲近和友好。还有朋友之间借东西讲究有借有还，赠送礼品也总是有来有往……

一个站在时代峰巅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同时又是那么充满人情味的普通人。这并非什么值得奇怪。因为我们的事业就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其本身就是最真实、最富人道的事。正是这种体现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人情味，使得毛泽东同志能够真实地代表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开创前所未有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是伟大的，又是平凡的；他是那么充满魅力，又是那么可亲可近；他既像一座丰碑耸立在祖国的大地上，他又确是活生生的人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并且将永远地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中，激励着我们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

我初次见到毛泽东同志是 1945 年 9 月 10 日在重庆，他对我的亲切、诚恳、坦率的教导，47 年来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上，以后我多次聆受他的面嘱，成为鼓舞我不断进步的动力。出版《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纪念。是为序。

1993 年 2 月

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

情谊和合作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与宋庆龄

吴传煌 王保清

毛泽东与宋庆龄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伟大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事业的艰难历程和辉煌胜利融合在一起的，也是同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尽管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通过各自的斗争实践，先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志同道合是他们友谊的纽带。

毛泽东与宋庆龄各自从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毛泽东在 1919 年底至 1920 年初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从 1927 年下半年开始了这个转变。宋庆龄与毛泽东在 1927 年下半年之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情谊；在这之后，形式上仍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情谊，实质上是党内外共产主义者的情谊，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里所说的“很早”，似应早到 1927 年下半年。

（一）

毛泽东与宋庆龄的情谊是从 1924 年 1 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他在大会上就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发表许多重要意见，为孙中山所采纳。大会期间，宋庆龄虽在上海，与毛泽东缘悭一面；但是，她与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大会开幕前，宋庆龄断然拒绝国民党右派企图利用她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支持和帮助孙中山以革命家的气魄在大会上制定三大政策，提出让大会举手通过的、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他们都把对方引为战友，已是神交了。

然而，国共合作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阻挠和反对。1925 后 11 月，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开除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为了反击他们的进攻，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广州，于 1926 年 1 月 8 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一起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宋庆龄与毛泽东在大会上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宋庆龄大声疾呼大家要加强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指出：“如果诸君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如其不能合作，则先生的主义决不能成功。所以我竭诚的希望诸位要大家合作。”毛泽东理直气壮声明，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努力下，迎头痛击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加紧了反革命活动。1927 年 3 月，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促成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全会决议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使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集中

于党，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挫败了他的阴谋。对此，蒋介石极端仇恨，于4月12日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22日，宋庆龄与毛泽东等39人联合发出讨蒋通电，愤怒谴责蒋介石是“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蠹贼”，指出，如不打倒蒋介石，“革命群众将无噍类”，在阶级搏斗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汪精卫等不顾宋庆龄等的抗议，于7月14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8月1日，宋庆龄领衔与毛泽东等22位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发表宣言，揭露“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表示“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宋庆龄与毛泽东团结一致，捍卫孙中山遗留的国共合作政策，而他们的革命情谊也升华到新的高度。

蒋汪合流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宋庆龄长途跋涉，访问了苏联，并把抗议传到国外。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宋庆龄与毛泽东虽然在不同地方，不同战线，各自在不同岗位，用不同的方式坚持革命斗争，他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9月19日，宋庆龄在莫斯科称赞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内发动的武装暴动，“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坚信“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还明确表示，“假如我回国的话”，将“参加工农斗争”，“战胜血腥的反动派”。1931年，她回国后，多次要求国民党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区域进攻，武装抵抗日本侵略。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在会上，她高度评价苏维埃区域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希望、诺言和保证”，热情赞颂它是任何强大的敌人不可战胜的，亢声呼吁“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宋庆龄向中国和世界发出保卫中华苏维埃，制止蒋介石反革命围剿的正义呐喊，对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是弥足珍贵的。在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拍来电报，坚决表示誓作大会有力后盾，并以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向大会献礼。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宋庆龄极其喜悦，与国际友人一起为长征胜利干杯。1936年春她写信给毛泽东等对红军东征表示祝贺。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宋庆龄“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给予的“热烈赞助”。宋庆龄和毛泽东在信函和谈话中互相倾注了信赖之情。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形势要求国共两党以全民族利益为重，化干戈为玉帛，团结御侮。宋庆龄与毛泽东深感历史赋予的使命，彼此建立直接的联系，共同推动国共再次合作。1936年1月，宋庆龄嘱托共产党员董健吾，将关于国共合作的重要信件送到陕北瓦窑堡，面呈毛泽东。正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将关于国共两党谈判五项原则的复函交董健吾带回，并让他传达其对宋庆龄的敬意。3月上旬，董健吾回到上海的当天，便向宋庆龄复命。宋庆龄接悉毛泽东的复信非常高兴。从此，中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关系，经过宋庆龄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信函往返终于接通。宋庆龄称道董健吾做了一件“益国非浅”的事，其实，是她和毛泽东为国家和民族成就了永远为子孙后代所铭记的勋业。4月，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派冯雪峰从陕北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并嘱他先会见宋庆龄，再联系党员。冯雪峰向宋

庆龄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受到她的赞赏。9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交潘汉年呈宋庆龄。信中对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希望她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敦促国民党中央枢诸负责人“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停止内战联合抗日”。22日，毛泽东给蔡元培信中，又特意向宋庆龄致讯。毛泽东把事关民族存亡的任务托付给宋庆龄，是对她的倚重。

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高瞻远瞩，制定和平解决的方针。宋庆龄以她的远见卓识，提出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她所以与毛泽东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因为她与毛泽东息息相通，深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去西安与张、杨一起在同宋子文谈判时，提出安排宋庆龄参加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是对她的最大信任。宋庆龄遵照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努力促成国共再度合作。自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她一直拒绝出席国民党的所有会议。1932年2月，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资格，毅然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与何香凝等14人向全会递交《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提案》，批评蒋介石反共政策，并针对汪精卫提出的“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发表著名的《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说。全会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未通过宋庆龄等14人提案，但不得不接受她提出的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联共抗日的主张，决定同共产党谈判。宋庆龄为实现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关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极其可贵的努力。8月，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热情接待同国民党商谈合作事宜的周恩来等，再次表示完全拥护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为宣布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

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共产党中央与毛泽东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全，电请她撤离上海。宋庆龄尊重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见，于12月23日离沪赴港。1938年，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委托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她约见邓颖超，倾听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主张。是年6月和翌年1月，宋庆龄发起组织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海内外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张，募集捐款、医药和物资，主要支援解放区抗战。她后来撰文指出：“我们的组织一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总是以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政策为指导。”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命令和谈话，领导全国人民展开英勇的反击和斗争。宋庆龄等在香港与毛泽东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两次致函、电蒋介石，痛斥他违背孙中山遗教，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倒行逆施政策，坚决要求国民党“恪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宋庆龄帮助共产党和毛泽东挫败了国民党阴谋。她指示《保卫中国同盟》又一次向新四军送去大批物资、医药和资金。当毛泽东听到她竭力支援新四军的事迹时，很是赞赏。1942年8月，宋庆龄在重庆重建《保卫中国同盟》，经常要求周恩来为她提供毛泽东的重要文章以及八路军、新四军战绩材料等，向海外宣传。

抗战宣告胜利，1945年8月，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飞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毛泽东抵渝即拜访宋庆龄，宋庆龄到桂园回访毛泽东并出席由他举行的招待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茶会，阔别18载的战友喜庆重逢，频频的叙谈，更增添同志和战友的情谊。宋庆龄后来回忆说：“国共谈判时期，在重庆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

毛泽东“思想锐敏，见识远大，令人钦佩”。

1946年6月，国民党破坏国共第二次合作，发动全面内战。7月20日，毛泽东号召：“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25日，宋庆龄热烈响应，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一个无法取得胜利的战争”，因为“农民将拥护共产党”。为了扑灭蒋介石燃起的战火，她“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它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12月17日，周恩来从南京返回延安不到一月，致函宋庆龄，转达毛泽东等延安朋友对她的惦念，感谢她“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称誉她是全国人民的骄傲，“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1949年春，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行将就木。毛泽东与周恩来对宋庆龄的安全极为关注，垂念至殷。1月29日，他们联名致电宋庆龄，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宋庆龄获悉电报后，当即亲笔用英文复信，对毛泽东与周恩来极友善的来信致以“深厚的感谢”，而对自己因染疾诊治，“不克即时成行”，表示“非常抱歉”。复信中热烈地表达自己崇高的愿望，指出：“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上海解放不久，毛泽东特派邓颖超携带给宋庆龄亲笔信函“趋前致候”，专程迎接她北上莅平。毛泽东在6月19日的信函中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建设大计，亟待筹商。”宋庆龄十分喜悦，惠然应诺，并于临行前对邓颖超说，不要开欢迎会，也不要到车站迎迓。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陪同下，乘专列抵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前往车站热烈欢迎。当时，毛泽东亲临车站迎接过两位朋友，其中一位是宋庆龄。晚，毛泽东宴请她，大家频频举杯，共庆人民解放，战友欢聚。9月21日，宋庆龄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歌颂共产党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指出：“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宋庆龄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宋庆龄偕同毛泽东等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庆典。当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按动电钮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宋庆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孙中山的遗愿，她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共产党与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一直担任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从事国务和社会活动，襄助毛泽东、周恩来等处理国家大事。毛泽东非常尊重和信任她。平时拜访晤谈，信札问讯，遇有重大问题同她一起商量。除了请她参加重要会议外，有重大事情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并征求她的意见。1956年9月，她应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邀请，列席共产党“八大”，认为这是她“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1957年11月，她随同毛泽东、邓小平等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说：“宋庆龄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把她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宋庆龄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中央和

毛泽东认为她暂时留在党外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她早已共产主义化了，在临终前被共产党中央批准，履行了组织上的入党手续，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中国当代历史上特殊的岁月，宋庆龄正视着“红色恐怖”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所带来的浩劫。由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她未受到过份的冲击。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批示，对民主人士“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亲自开列一份应予保护干部的名单，第一位是宋庆龄。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严峻地批评他们要到宋庆龄家贴大字报的错误，郑重指出：“我们应当尊重她。”当时，宋庆龄虽然十分孤独、苦闷和困惑，但是她并未动摇自己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信念。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宋庆龄极其悲痛，尽管她年事已高，仍然两次吊唁毛泽东，并参加追悼大会，敬献花圈。1977年，她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专门举办纪念毛泽东、周恩来的活动。1978年12月，宋庆龄撰文缅怀毛泽东。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内乱，她感到由衷的高兴，认为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她要求人民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的革命火炬，“接过来，传下去，并且让这革命的火炬照亮通往2000年的新的征途，照亮通往共产主义的前程。”

（二）

宋庆龄与毛泽东数十年如一日，为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呕心沥血，建立了不朽的业绩。

毛泽东高度评价宋庆龄和她为共产党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毛泽东指出：“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后，由于形势的不断演变、阶级阵线发生了变化。当国民党几乎整个倒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而背叛了革命的严峻时刻，只有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左派同共产党人真正坚持新三民主义革命，维护三大政策。周恩来说：“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了两个女人！”这两位杰出的妇女，是宋庆龄与何香凝。

国民党内是宋庆龄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救国精神，这是因为：

（1）孙中山制定的实行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顺应了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愿望，宋庆龄深得孙中山的真传，把继承孙中山遗志视为自己对国家、民族和革命事业的崇高职责。（2）孙中山一生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并由此获得人民的崇敬。宋庆龄也因忠贞不渝致力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事业，而赢得人民的敬重。她完全感受到人民对孙中山与自己这种真诚而强烈的感情。她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孙中山的威望，执行他留下的政策。她把这个当成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3）宋庆龄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的原则立场和高贵的革命气质，从不屈服于敌人施加的压力，不去说，更不去做她内心认为违背中国和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4）宋庆龄始终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周恩来说：“共产党是时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斗争，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宋庆龄说：“没有群众的支持，我是什么也做不到的。”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没有因为国民党的背叛而中绝、湮灭，是宋庆龄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它继承和发展下来。宋庆龄无愧于孙中山，

无愧于中国革命，是“国民党整个左派唯一的大丈夫”。

其次，毛泽东说，宋庆龄是与共产党人“一道工作的亲密朋友”。

自1921年12月，宋庆龄就与共产党建立、保持和发展合作关系，直到她1981年5月逝世，整整60个春秋。一个人与共产党同行一段路程并不难，难的是60年如一日地与共产党走到自己生命的终点。她把自己的一生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融为一体。当共产党发生困难、挫折甚至暂时失败的时候，她万分焦灼，给共产党分忧解愁，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而当共产党纠正自己错误，又重新发展并取得成功的时候，她欢欣鼓舞，与共产党同享胜利的喜悦。国民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危难之际，一些人离开了共产党，她却想共产党之所想，急共产党之所急，坚定地与共产党站在一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在风雨如磐的磨砺中，跟随历史脚步不断前进，与共产党的关系没有停留在民主主义门槛内，而是升堂入室，迈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她与共产党“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不愧是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同志和战友。

共产党在历史上先后三次倡导国共合作，两次反对国共分裂。无论国共两党或分或合，都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后果和影响。宋庆龄每当历史关键时刻总是支持共产党，她从道义上和物质上全面支持共产党，建立了独特的历史功绩。正如刘少奇所说：“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些负责同志。”

宋庆龄充分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

首先，宋庆龄对毛泽东一向怀着无限敬仰和信赖的感情。30年代，她说她相信两个人，除孙中山外，“对毛泽东还是信任的”。这是她在峥嵘岁月中经过冷静观察、思考得出的认识。她称颂毛泽东“思想锐敏、识见远大，令人钦佩”，“是得到中国人民完全信任和合作”。毛泽东无私地为人民利益奋斗，人民衷心地热爱毛泽东。这正是毛泽东伟大和取得成功的地方。

其次，宋庆龄极为推崇毛泽东和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建树的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领导人民共和国将近30年时间。他作为共产党和人民的主要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宋庆龄从共产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历来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无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她始终称颂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即使经过“文革”内乱之后不久，她仍然认为毛泽东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与导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她的设想。她说，她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孙中山的主张才能实现。还说，孙中山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并且远远超过了。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历尽艰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夺取了震撼世界的辉煌胜利。以他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还要走更为艰难曲折的斗争道路。她在为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70年奋斗中，对此是有深切的体会和正确的认识。她把人民的胜利和自己所做的工作，看成是共产党与毛泽东领导的结果，指出：“我们的成就应直接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这个领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紧密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使我国人民能够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惊天动地的胜利以及和平地过渡到

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与宋庆龄已经相继长辞，但他们的革命精神、深邃思想、不朽功绩和深厚情谊，却留在中国大地上，留在人民心中，激励着我们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息息相通的两位时代巨人

——毛泽东与鲁迅

毛代胜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时代的巨人。他们在漫长、曲折的革命斗争中，都为中国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虽然，他们生前没有见过面，也不曾有过个人的书信往来，但他们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1966年7月8日）。1975年10月28日，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同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在1971年听到传达您的这句话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我知道他和您的心是相通的。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伟大导师，父亲的后期也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忠诚战士。我听说他谈起您时，总是点燃一支烟，眼睛充满愉快的微笑，轻轻地说，他愿在您的指挥下，做一名小兵，用笔。”

在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中，鲁迅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名“小兵”自命，自觉地遵奉无产阶级的革命“将令”，以笔作刀枪，向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1927年至1937年，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和进步文化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共产党和革命者“剿尽杀绝”了，但结果却相反，“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作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英勇旗手和主将的鲁迅，身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深切地关怀着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当第五次反“围剿”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而遭到了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革命力量处在黑暗势力重重压迫之中时，鲁迅坚信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在坚持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的同时，鲁迅密切关注红军长征途中所发生的一切。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胜利到达陕北，给山河破碎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鲁迅听到这个消息，无限喜悦，于1936年2月，不顾重病缠身，热情洋溢地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封贺信是由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于同年4月传送到党中央的。尽管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还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漫漫黑夜中，但是他从长征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新局面，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无限光明的前途。这封贺信，表达了鲁迅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和崇敬，抒发了鲁迅誓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斗争“共同着生命”的战斗情怀。为了庆贺

工农红军长征胜利，鲁迅还特地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就是这样地与工农红军长征血肉相连，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1936年，当托洛茨基派分子挑拨鲁迅和党的关系，恶毒攻击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鲁迅不顾身患重病，奋起反击。他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直接提到毛泽东的光辉名字，怒斥托派的诬蔑：“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亲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鲁迅在这里用对比、反语和讽刺，一贬一褒，更加突出了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立足现实，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庄严宣告：“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这政策在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表示了自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革命路线一边的坚强决心！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鲁迅还以最崇敬的感情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对毛泽东的革命情感洋溢在字里行间。这种真挚的感情和鲜明的阶级立场，是同鲁迅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勇于解剖自己，刻苦改造世界观的进程相一致的。

鲁迅越到晚年，为什么越显出战斗的青春的活力呢？就是由于他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是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革命斗争，使鲁迅极其深刻地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衷心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甘愿做党的一名“小兵”。

由于积劳成疾，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卒于上海寓所。这噩耗传到延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悼念鲁迅逝世发出三封电报：一封是《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一封是《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还有一封是《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这些书电，“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情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表示了最深沉痛切的哀悼，并决定在全苏区内下半旗致哀，同时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为鲁迅遗体举行国葬。

鲁迅逝世后，当时冯雪峰和宋庆龄、蔡元培等商量，组织了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为治丧委员之一。在上海万国殡仪馆瞻仰遗容，举行追悼仪式后，鲁迅遗体于10月22日安葬于上海虹桥路万国公墓。1956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鲁迅墓由上海虹桥万国公墓隆重迁葬于虹口公园。毛泽东为墓碑题了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鲁迅先生之墓”。

为纪念鲁迅的革命文学上的贡献，使新一代赓续他的事业，毛泽东发起了建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并为“鲁迅艺术学院”亲笔题字。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创立缘起》一文中写道：“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称颂鲁迅是现代圣人。正如柳亚子1941年在他所赋一首纪念鲁迅的诗中所写的：“鲁迅先生今圣人，毛公颂语定千春。”1977年，毛泽东又讲到鲁迅，如果说中国有圣人，鲁迅是第一大圣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是何等的推崇！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还号召大家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夕，在40年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鲁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文章中多次提到鲁迅及其著作，对鲁迅的一生作了最正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评价。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情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赞扬鲁迅的“《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并奉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极力推崇鲁迅的杂文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1961年10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以黑田寿男为首的日中友协代表团时，亲笔把鲁迅先生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一诗题赠给他们，并指出：“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这对正在斗争的日本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1975年11月，毛泽东在接到周海婴同志的信后，就鲁迅著作的出版、研究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1976年3月，毛泽东“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系列的论述，说明了鲁迅在共产党人中的地位，说明了鲁迅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鲁迅，意在唤起全党全国人民对鲁迅的重视，意在把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交给全党和全国人民，使鲁迅的思想文化遗产能够在革命和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鲁迅和毛泽东虽然先后离开了人间，与世长辞了，但他们的思想、精神将像巍峨的丰碑，永远耸立在亿万人民的心头，激励人民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不断向前。

为了民主与科学 ——毛泽东与九三学社

许德珩

九三学社，它是在毛主席的启发、推动下成立的，也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才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当年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所掲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所以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因为参加座谈会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办了一个刊物，也叫“民主与科学”。社会上对这个刊物有些争议，为了避免外面的误会，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这一座谈会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

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们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是想到一年多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正在酝酿期间，毛主席来到了重庆。

毛主席到达重庆这一消息，像春风一样传遍了山城，给广大国统区的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听到毛主席要亲来重庆，我们兴奋异常。随后，我就向徐冰同志表示，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急于想同毛主席谈谈。不久就收到了毛主席的请帖，约我和君展于9月12日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吃午饭。是日上午8时，我和君展徒步前往红岩村。

一见面，毛主席一手拉着君展，一手拉着我说：“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了。”我们和毛主席阔别20多年，山城重聚，快何如之。毛主席和我畅谈了当年在北大时的情景，追述了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一些事情，君展回顾了周南女校读书时加入新民学会和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的往事，以及1921年君展赴法勤工俭学在上海候船时，毛主席约了许多新民学会的人在半淞园欢送并摄影留念的情景。故人叙旧，格外亲切。随后，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都会意地笑了起来。

话题转到了延安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毛主席告诉我们，经过大生产运动，现在陕北人民的生活显著好转，基本上达到了丰衣足食。回想初到陕北时，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在北平的教授先生知道我们物资缺乏，还给我们送来了火腿、怀表和布鞋，真是令人感动。这时君展才不得不把我们买东西给毛主席的经过谈出来。事情是这样：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那时我们都在北平，徐冰、张晓梅夫妇来我家说，现在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

困难，日用品和吃的都比较缺乏，尤其没有布鞋穿，大家都穿草鞋，也没有怀表。我和君展听了这些话，当即决定由我们拿钱去买些日用品和食品送给毛主席。徐冰同志还说，现在正有一辆卡车要去延安，要买东西最好赶快去买。于是君展与张晓梅同志两人就到东安市场（即现在的东风市场）买了一些火腿、怀表、布鞋等。东西买好拿走时，晓梅同志问：要不要毛主席的亲笔收条？我们说：这么一点东西还要毛主席亲自开收条？不要，不要。席间，经君展这么一谈，毛主席说：“啊！原来那些东西还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吃了，用了，我也吃了。”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来访，带来了当年毛主席收到我们赠品的回信复印件，信的内容热情洋溢，令人深受鼓舞。拜读之下，倍感亲切，更增加我们对毛主席的怀念。

我们当时还向毛主席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主席勉励我们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我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主席说，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些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主席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我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决心把座谈会改组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

这天，同桌午饭的有周恩来、华岗、熊子容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记不起是谁了。我们为这样的欢聚高兴，又为毛主席深入虎穴担心。所以当我们向毛主席告辞时，君展说，重庆气候不好，山城不可久留，早作归计为好。彼此心领神会，一笑而别。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全国各地庆祝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朋友们，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大家一致赞成，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并发表新闻于重庆《新华日报》上。九三学社筹备期间，为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反对蒋介石集团阴谋破坏旧政协，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46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这期间，“九三”密切联系一批进步和中间的教授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做了不少工作。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系，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运动等，做了很多工作，在民主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同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举行。我代表九三学社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毛主席授意周恩来同志，让九三学社向新政协筹备会写一报告，说明九三学社做了哪些工作。后来，由我和袁翰青、薛愚、黎锦熙、叶丁易等同志署名写了工作报告，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印刷厂排印数百份，送交新政协筹备会与会代表人手一份。从此，九三学社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正式成为我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了。

新中国成立后，九三学社成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九三学社已经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使命，提议可以解散。我们酝酿解散的时候，毛主席正

在苏联访问。先是沈钧儒先生领导的、我也参加的人民救国会也要解散。因为救国会的成员都在北京，大家同意解散，签名后就解散了。而九三学社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和重庆。当时重庆尚未解放，我们与重庆的社员一时联系不上，还作不出解散的决定。及至将要商讨作出决定时，亦即1950年2月间，毛主席回到了北京。当他听到救国会解散时，很为惋惜他说，救国会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又听说九三学社也要解散，当即表示不同意，并由中央领导同志传达了他的意见。中央领导同志向我们阐述了民主党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九三学社不但不能解散，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从此，九三学社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3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九三学社推动成员做好岗位工作，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到了党的助手作用，作出了贡献。

回顾九三学社发展的历史，使我们更加怀念毛主席，怀念他在革命的统一战线中的丰功伟绩。上述事实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九三学社的成立和发展是不可能的。回想当年“九三”成员不足百人，而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指引下，经过长期的努力，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1万多名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了。

哈达献九天 ——毛泽东与西藏上层人士

阿沛·阿旺晋美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1年。当时我作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和其他几位全权代表一起，正在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进行谈判，适逢“五一”，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们。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们来啊！你们从远道来，一定很辛苦了！”我们也按照藏族的风俗习惯，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看着千千万万游行群众欢呼雀跃，真诚热爱毛主席，看着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袖的毛主席，如此兄弟般地对待少数民族，我的心被深深地感动了。联想到在北京的所见所闻，我感到，那个民族压迫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一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已经开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就要来到了。

西藏从元代起就正式成为伟大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在伟大祖国的创造和发展中，尽了自己的光荣责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藏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近代，西藏人民和帝国主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在清政府时期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汉藏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拨，使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这些情况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从西藏的历史、民族、宗教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在排除了重重阻碍以后，我们在1951年4月下旬来到北京，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了谈判。谈判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根据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制定一系列合乎西藏实际的方针、政策的过程。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双方经过多次洽商，一致通过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并于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庄严的签字仪式。“十七条协议”完全符合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的一项光辉成就。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正式接见我们，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向我们介绍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一切工作的宗旨，就是为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谋利益。

当晚，为欢庆“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宴会开始前，毛主席又同我谈话。主席打开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地图册，对我说：“你看，国民党把西康和西藏的分界划到了工布江达一带，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我们今后还是以金沙江为界，金沙江以东为西康，以西为西藏。”昌都地区过去实际上是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毛主席的这个决定，是根据西藏的实际做出的正确决策。

在执行“十七条协议”中，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西藏的工作，并在许多方

针政策性的大问题上，给予了英明的指导。协议刚签订，主席就指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同志：“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从1952年初开始，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分裂分子组织了伪“人民会议”，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的活动，他们在拉萨策动武装骚乱，进行请愿、示威，包

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和我的住宅，妄图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之时，把解放军赶出西藏。当时，斗争出现非常复杂和严峻的局面。在这紧要关头，毛主席对当时西藏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对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挑衅，西藏工委要领导爱国僧俗人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中央代表张经武同志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写信，揭露伪“人民会议”的背景和险恶用心，迫使达赖喇嘛撤消了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曹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十七条协议”，扶持和发展上层中的爱国力量。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和稳定了大多数思想动荡、态度摇摆的上层人士，孤立和打击了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稳定了局势。

1954年9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起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以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身份随同前往，负责同中央联系，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务。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本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百般阻挠；而当时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业已撤消。毛主席根据这些情况，分别接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向他们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这样在毛主席的指导下，由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三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1955年3月9日，国务院举行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并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是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重大步骤，标志着西藏革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5年初，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即将离京前，毛主席再次接见了他们，当时我也在场。毛主席又一次说，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接着主席又说，今后西藏要重视发展经济文化，你们这次不能空着手回去。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央人民政府向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大批衣机具。1956年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时，毛主席、党中央派了以陈毅同志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进行祝贺和慰问，这在藏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表达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西藏人民的关怀，进一步密切了两藏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团结。

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主席、党中央及时作出了1962年前不进行民主改革的决策。毛主席

说：“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尽管我们在西藏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西藏反动派看到广大农奴群众日益觉醒，改革迟早终会发生，居然孤注一掷，在1959年3月策动了叛乱。4月间，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并向中央汇报工作。毛主席详细询问了西藏叛乱的情况，并教导我们，反动派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既然叛乱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主席还就今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政策，征求了我们的意见。并一再强调，虽然发生了叛乱，和平民主改革的方针仍要坚持，不管参叛的是什么人，我们仍旧是一个不杀。1959年国庆节，我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主席又专门找我们谈话，询问民主改革情况，并说，和平民主改革是“十七条协议”的一条原则，虽然“十七条协议”被西藏反动派撕毁了，但我们仍要沿着和平民主的道路走下去，仍要按协议执行。按照毛主席这些指示的精神，中央制定了民主改革的方法、步骤和许多具体政策。在西藏的平叛和民主改革中，也产生了某些“左”的缺点和错误，但总的来说，平叛和改革是顺利和成功的。除对叛乱的农奴主实行没收政策以外，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和其他上层人士，实行的是赎买政策，这也是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方面一项成功的创举。通过民主改革，推翻了罪恶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彻底翻身解放。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理和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策略相结合，创造性地为西藏民族的发展进步，为西藏人民的自由幸福，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史册上。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藏也未能幸免。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影响下，在西藏多年坚持，行之有效的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我作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也难以工作了。1966年9月29日，周总理亲自派飞机把我接回北京。“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毛主席得知我已回北京，当即就要见我。由于没有想到主席要在天安门上见我，所以当时我身边没有带翻译，我那时还不大能听懂汉语，所以未能和主席更多地交谈。1970年“五·一”，又是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受我国政府邀请刚刚来到北京不久。毛主席陪同西哈努克亲王一登上天安门，大家都热烈鼓掌欢迎。这时毛主席看见了我，就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说：“这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这么盛大的场合，我身旁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这么关心我，使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和西哈努克亲王已经成了老朋友，他每一次到北京，我一般都能见到他。见面时，我们还经常谈起毛主席介绍我们认识时的情景。

我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1972年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在这一二年间，主席显得苍老了许多，表情也十分沉重。他握着我的手，十分关怀地问我身体还好吗，是不是还住在北京。我一一作了回答，并目送着主席离去。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永诀。

毛主席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真诚地关怀各民族人民，真诚地帮助西藏民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带领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走向共产主义的幸福未来。他为各族人民的解放、

幸福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值得永远怀念的。从我个人来说，能在西藏和平解放及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为祖国为人民出力尽责，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位钦命大臣，走到了人民革命一边，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名国家工作人员，也是和毛主席所代表着的一个全新的时代的感召，和毛主席多年的教导分不开的。自 1980 年以来，中央召开了两次关于西藏工作的座谈会，确定了一系列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方针政策。经过几年的实践，使各项建设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西藏人民脸上露出了真诚的幸福的笑容。从他们的言谈中，时时表露出对党在西藏的新政策的满意和感激之情，我愿把这些幸福的微笑和由衷的感激，编织成一条洁白的哈达，敬献给九天之上的毛主席！

写不尽的深情厚爱 ——毛泽东的声音永远荡漾在我耳边

朱学范

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形象以及他对我的深情厚爱，亲切关怀，使我终生难忘，永远铭记在心。在纪念他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我愿将多年珍藏在心里的几件往事，写出来，以表达我对衷心爱戴和敬仰的毛泽东主席的不尽的思念。

在重庆的接见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 1945 年 9 月 10 日在重庆。

8 年抗战，终于赢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我国百年来在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的胜利，这胜利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英勇奋斗的结果。

8 月的重庆山城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浸沉在喜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但是，国共两党关系如何发展，国家前途命运如何，内战危机能否消除，和平建设能否实现，这些问题为人们十分关怀。8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应蒋介石三次电邀从延安乘飞机莅临重庆，举行国共两党会谈。这个消息顿时使山城人心沸腾起来，对毛泽东主席为谋求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不畏艰危的大智大勇的行为，产生了无限钦仰之情。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对他们进行了团结工作。9 月 10 日，我和易礼容受到约请，到上清寺桂园会见我久已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他身穿一身整洁的蓝布中山装，身材健硕魁伟，态度谦逊诚恳，谈话机智精辟，体现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风度。

当时，国共两党谈判正在进行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问题的商谈。毛泽东为什么在百忙中还要接见我和易礼容？因为当时迫切要解决解放区工会和中国劳动协会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出席 10 月初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的问题。9 月 8 日，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的开幕典礼。周恩来同我详细地谈了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工会的团结统一问题，他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出席即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要包括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董必武、邓发、章汉夫三人。我同意他的意见。9 月 9 日，周恩来给我送来了亲笔信，重申以董必武、邓发、章汉夫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的意见。当天，我去见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力争在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的成员中，必须要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的代表参加，否则，中国劳动协会也不去参加，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工会已不分社会制度和党派联合在一起，劳协如果单独去会不受欢迎。那时候，国际舆论对国民党政府也有压力。英国工会找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一再催问：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什么时候动身？顾维钧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打电报，反映国际舆论的要求。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同意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一人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

对解放区的封锁。所以，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安排了这次接见。他听到我坚持并争取到邓发参加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的新闻时，频频点头，用郑重的语气对我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他还向我们阐明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指出目前最迫切的是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分歧和问题，只有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求得合理的解决。他的谈话增强了我为全国工人争取和平民主，把工人运动与整个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决心和信心。

我会见毛泽东主席的第二天，就从重庆乘飞机前往巴黎。接着，邓发从延安来到重庆，取到出国护照，也乘飞机来到巴黎，同我一起出席了世界工会大会。

在哈尔滨收到的电报 1947 年 12 月，同我一起在欧洲开展国际活动的刘宁一（接替邓发的职务，为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世界工联候补执行委员、理事）在伦敦对我说：“党中央已经同意你取道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我陪你一同去。”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极了。解放区这个新天地，早就吸引着我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去竭尽全力。

我是在 1948 年 2 月 28 日到达哈尔滨的。29 日，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满腔激情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衷心表示竭诚拥护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实行土地改革，组织真正的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完成独立民族和平的革命事业的英明主张。所以决心到解放区参加这一历史的斗争。我非常荣幸地在 3 月 4 日接到了他们的复电：

朱学范先生：

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欣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致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三月四日

这份电报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我到了解放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同解放区人民一道为推翻蒋政权，解放全中国而奋斗。这使我走上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当时，我对访问我的《东北日报》记者说过：“以我近三年四度赴欧，又从蒋管区来到解放区的亲身经历，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必胜，世界民主国家反对美帝统一战线必胜，实毋庸置疑。这种胜利只有在先进政党领导之下，才能完成彻底解放自己的历史伟业。”我刚到解放区，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勇气，激励我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走自己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 年 2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陪同我们这批先后从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35 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从沈阳来到北平。一个令人欢跃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于 3 月 25 日从河北

省平山县西柏坡来到北平。我怀着崇敬和万分喜悦的心情同毛泽东主席重新会面，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到他的教导。仅举一例：

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关于工人运动的讲话，是1949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全国工会工作会议招待会上。这篇讲话还未曾收入《毛泽东选集》。这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弥足珍贵。毛主席讲话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请诸位吃饭，我敬大家一杯。这次会议在这个形势下开是很需要的、必要的。去年第六次劳动大会解决的问题是纲领性的，这次解决的是组织问题，工作的办法、方法、技术性的东西。六次劳大决议是正确的。六次劳大贯彻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是为了达到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这个是很好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苏联没有，在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没有，是我们独有的。”“这次我们实行劳大的方针，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贯彻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我参加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且在大会决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运方针的时候，我是举手赞成的。但是，对这个工运方针的深刻意义不完全认识。毛主席的这番话，对它作了透彻的解说。这就大大地提高了我的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会工作必须走自己的道路。40多年来，特别是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深刻总结历史的和当前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我高兴地看到，全国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工人阶级是发展生产力的主力军

在聆听毛泽东主席的教诲中，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1956年我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与我的谈话。当时，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国家经济建设的步伐，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全国总工会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决定在全国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从此，全国广大职工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不断地打破技术经济定额，推广先进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以全面地、均衡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为目标的先进生产者运动在全国兴起，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生产者。为了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表彰先进人物，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4月30日至5月1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此之前4月20日至26日，邮电部和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召开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25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我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到会议在五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玛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对我讲了一段话。他说：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

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我把毛泽东主席的教诲铭记在心上。5月10日，我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致闭幕词，其中就提出：只靠一个人达到先进的水平，终究是有限的。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使所有劳动者共同达到高度的先进水平。因此，科学工作者与生产工作者的合作，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合作，先进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学习，都是十分必要的。这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证明，工人阶级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拥护者，而且是改革开放最坚决的实践者和主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现代技术应用于生产，仍然必须由掌握相当技能的工人和直接参加生产的科学技术人员来实现，所以，工人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已历史地落在我们工人阶级的肩上。

在这纪念敬爱的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重温他老人家的教诲，他的声音，又荡漾在我的耳边；他的崇高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这将永远成为鼓励和引导我不断前进的力量。

一次难忘的幸福会见 ——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柏坡

雷洁琼

那是在 1948 年冬天，继辽沈、淮海战役之后，平津战役已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当时在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渴望北平早日解放。11 月中旬的一天，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像天兵一样降临北平西北部，出现在公路两旁的据点里。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颐和园、香山都解放了，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地庆祝胜利。清华和燕京两校师生纷纷走出校园去迎接和慰问解放军战士。当时，中共中央派张光年、张宗麟等同志来学校宣传党的政策，并作解放北平城里的准备。燕京和清华师生还邀请解放军四野先遣部队负责人刘道生同志来作形势报告，两校师生员工心情振奋，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反动派仍然想作垂死挣扎，派飞机来轰炸，在燕京大学操场上投下几个炸弹，这更引起两校师生的愤怒和痛恨。

在欢庆解放的气氛中，民进的马叙伦同志从哈尔滨给我们来信，请我的爱人严景耀代表民进去华北解放区出席中共中央召开有关民主党派的会议，并由我陪同去。后来接到刘道生同志的通知，邀我们去访问华北解放区。这本是我多年的愿望，一旦得到实现，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1949 年 1 月中旬，我们从北平西郊八大处出发，同行的还有费孝通和张东荪。我们都是清华、燕京的教授，费孝通、张东荪是民主同盟的成员。我们一行 4 人由 8 名解放军战士陪同，乘大卡车前往，沿途看到农民运粮支援前线，像一条长龙，甚为壮观。车上的解放军战士，向我们讲了许多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和军民一起打美蒋的故事，一路说说笑笑，忘却了旅途的疲劳。

第二天傍晚，我们到达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就设在这里。当地的领导同志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参观石家庄市容。吴晗夫妇迎接我们，我们还遇见了不少燕京、清华两校的同学和从平津来的朋友。在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解放区的新气象，感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反映出一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当我们得到去西柏坡的通知时，我的心情更加激动。我们乘着吉普车经过不少村庄田野和山坡，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平山县。这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同志从 1948 年 5 月到 1949 年 3 月，在西柏坡指挥了解放中国的最后决战，主持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宏图大略，胜利地领导全中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光辉著作。

我们下车后，警卫人员招待我们进入饭厅。饭厅里朴素整洁。一会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等同志都来到饭厅，周恩来同志将我们逐一介绍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才 50 几岁，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我能够在西柏坡见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也非常高兴。两年多以前，我在南京下关惨案中受伤住进医院时，周邓两位同志曾到医院慰问。周恩来同志当时对我们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当时他那洪亮的声音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今天来到解放区，我

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好些中共领导同志的接见，说明周恩来同志的预言应验了。

吃饭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颖超同志和我们分别坐在两张普通的方桌旁，共同进餐，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轻松愉快，把我们初次见到中共领导人的那种拘谨的心情也逐渐驱散了。

饭后，我们随着毛泽东同志走进他的办公室。这原是一间普通农民的住房，家具简单朴素，办公桌和桌椅都是木制的。桌上有笔筒、毛笔和方形铜墨盒，墙壁上挂着一张中国地图，屋里有电灯，也有备用的煤油灯。我们围绕着书桌坐下，亲切地交谈着。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记得毛泽东同志那天晚上谈话的范围很广，大致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对民主党派的要求。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正在玩弄反革命的两手。一手是继续组织残余的军事力量在长江以南负隅顽抗；另一手是策动中间力量在革命阵营内部组成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当时民主党派和知识界中，确有些人主张“和谈”、“划江而治”，造成“南北朝”的局面；针对这些走“中间路线”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摆在中国人民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他说，把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毫不动摇地坚持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使国民党反动派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又回到黑暗世界。他以蛇和农夫的寓言作比喻，告诉我们决不能怜悯恶人，要求民主党派必须选择自己应走哪条道路。毛泽东同志透彻他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指出革命胜利后就要召开新政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民主党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一致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泽东同志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我对革命必将迅速在全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也更坚定我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决心。

二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关心知识分子，详细询问了北平西北郊区解放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他特别关心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询问是否还有前清的翰林、进士，要我们推荐人才，还问起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情况。毛泽东同志非常仔细地听取我们的汇报，他自己谈话不多，有时在关键的地方插几句话，发表一些重要的意见。当我们告诉他在国民党腐败政治的统治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清华、燕京两校的教师生活困苦，仍然坚守岗位，等待解放。有的人在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去南京时拒绝离开，在解放前夕，清华、燕京两校学生组织了护校运动，毛泽东同志对这些情况听得认真，并且十分高兴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要革命的。

三是毛泽东同志同我们谈到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问题，讲了新社会的美好前景。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是，毛泽东同志强调发展交通铁路运输事业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认为我国幅员广大，

内地和边疆地区更是落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网。他还谈到学术思想的各种派别问题，主张通过自由讨论来统一思想，促进艺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当时还处于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深谋远虑，想到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想到改善人民的生活问题，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高瞻远瞩，确是令人钦佩不已。

四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把美国政府当权者同广大美国人民区别开来。指出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帮助国民党侵略中国，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要警惕美帝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我们要丢掉幻想。但是美国的广大人民是友好的，同中国人民有传统的友谊。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受过欧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意义特别深长。

这一席长谈，从晚饭后直到深夜才告辞，我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教导，都非常兴奋，感到这是受到一次毕生难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

离开西柏坡，我们又直奔李家庄，那里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在地。我们见到陆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负责同志，同从香港、上海和各地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沈兹九、田汉、翦伯赞等同志欢聚一堂，学习讨论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了民主党派的任務。同时讨论了战犯名单。我还参加了筹备第一次妇代大会的会议。我们又同当地农民一起欢度春节，扭秧歌，演节目，解放区的群众是快乐的，使我们感到年轻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喜讯传来，更是喜上加喜，人人兴高采烈。我们决定1月30日赶回北平，参加2月2日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典礼。那一天，前门大街两旁人山人海，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我们和胡愈之、沈兹九、田汉、安娥等几位民主人上一起，站在正阳门城楼上，看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步伐整齐地进入正阳门，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想到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

接受召见，如坐春风 ——毛泽东在重庆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负责人

屈武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从残酷的战争岁月中，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中国共产党和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日益壮大，解放区日益扩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已比抗战初期大大提高。国统区内民主力量也大大增强。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统治集团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为中国人民所不满。抗战胜利后，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力量，实现其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这是当时的大形势。

蒋介石如马上发动内战还有顾忌，因为当时国内国际舆论都反对中国内战。蒋的军队尚偏处在西北、西南，在政治宣传上和军事布置上，都未取得优势。中国共产党对其内战阴谋一再发出警告，国民党百孔千疮，内外矛盾重重，使他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欺骗人民，争取时间作军事部署，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大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到重庆。这不仅轰动了山城，也是举世震惊的大事。它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诚意，得到举世称颂。柳亚子赋诗称颂毛主席重庆之行是“弥天大勇”。

毛主席在重庆43天，真是日理万机，周旋不断。除了直接与蒋介石多次商谈外，为了使各方面了解中共争取和平的诚意和意见，争取各方面的同情支持，毛主席广泛地接触了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和各党派的各方面代表人物，以及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和国际友人、各国记者。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关系国家前途，举世仰望。

这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1945年8月31日下午3时，毛主席约见“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负责人。先是由王炳南通知我们，要我们近日不要离开重庆，周恩来同志已请示毛主席，将在近日接见我们。我们都非常兴奋，等待这个时刻到来。当日上午我们得到了通知。下午3时前我们相继到达化龙桥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先在客厅等候，由王若飞、王炳南、徐冰陪同接见，当时周恩来也在座，被邀的有王昆仑，许宝驹、侯外庐、曹孟君、谭惕吾、于振瀛、倪斐君和我8人。毛主席随即来到客厅，笑容满面，挥手致意，连说：欢迎！欢迎！”王炳南把我们给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以手示意说：“请坐！请坐！”

毛主席坐下以后，我们就围着毛主席成圆形坐下。我和王昆仑同志坐在主席左边，周总理坐在毛主席右边。坐定后，毛主席讲话，他说：“今天和大家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也可以说是老朋友相聚。虽然南北相隔几千里，我知道你们这个组织。你们提供的材料和反映的意见，供延安分析时局动向帮助很大，首先要感谢你们。我这次来重庆谈判，很希望听到你们的意见。重庆各界人士特别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对这次谈判有何反应，对谈判的前景如何估计，对我们中共、对我本人有什么希望，请大家随便谈。”

周总理要昆仑先发言。他大意说，毛主席来到重庆，举国欢腾。人民遭受了8年苦难，希望和平，毛主席来进行和平谈判，全国人民无不拥护。重庆市拥到新华书店瞻仰毛主席照片的人群，就表现他们的心愿。我们祝毛主席身体健康。雾重庆的气候，不知主席适应否？山城气候变化无常，尚请主席保重。毛主席环视大家说：“谢谢你们。我这个人，在哪里都能生活得好。”8个同志相继发言，主要是反映蒋介石政权假和谈、真备战的一些情况。

王昆仑谈了他出席当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王昆仑是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六大代表。蒋介石在这次会上对一部分中委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从这次代表会上蒋政权的一些言论措施，足见企图消灭共产党的野心。这是蒋介石的基本策略，和谈姿态，不过是掩人耳目，争取时间，企图集中军力进攻解放区。

不记得当时是哪位同志告诉毛主席，在国民党六代会上，由于王昆仑同志在会上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有人反映给蒋介石，蒋介石大发其怒，10日下午亲到大会大骂王昆仑说：“你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公然在国民党大会上替共产党说话，你还像国民党的代表吗？你王昆仑吃着国民党的饭，在家里却暗通共产党（指其夫人曹孟君）。全场大哗，反而引起大家对王昆仑讲话的注意。王昆仑从容退出会场，以示抗议。蒋介石的表演，说明他坚决反共的内心世界。事后，蒋知失态，曾在中央纪念周上承认语言不当，请同志们不要在意，并派黄少谷向王昆仑解释误会。这是一次难以粉饰的暴露。于右任先生很幽默地说：“王昆仑十年中委无人问，一骂成名天下知。”讲这场斗争的，许多同志作了补充。毛主席莞尔而言曰：“很妙！这也是一个战场嘛！”

王昆仑补充说：“这次我虽未遭杀身之祸，候补中委已被一笔勾销。从我的切身体会来看。蒋介石之为人极不可信，他三次电邀您来重庆谈判，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出自诚意。这个人只有个人独裁之念，而绝无为人民谋幸福之心。惯弄权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食言而肥，是他的习性。目前这样做，为了掩盖他的内战阴谋，欺骗全国人民，以应付中共和平建国，制止内战的倡议。如您不来，他就将破坏和平之责推到中共身上。他蒋介石没有想到您敢于冒险犯难大义凛然地来到重庆。打破了他的阴谋，已经取得一次胜利。您到重庆，使举世皆知中共谋求和平诚意，气势就压倒了反动派。毛主席今天和我们谈话，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大家见毛主席态度随和，无拘无束地谈着。有同志说：“蒋介石心狠手辣，还要请主席注意安全。”

侯外庐说：“这次和谈好像老头子和少女的联姻，恐怕好事难成。”

毛主席右手把下巴一抹，笑道：“老头子把胡子刮一刮不就行了吗！”他的话把大家逗笑了。

毛主席接着说：“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怀着真诚的愿望，对局势也有清醒的认识。中共中央认为，无论如何，现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完全必要的。不管困难多大，尽量争取和谈成功，苟能求全，不惜委曲。第一，由于和平、民主、团结是战后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第二，通过谈判，可以使全国人民看清楚国民党反动派究竟是真要和平民主，还是以和谈为幌子实际仍旧是

搞独裁内战。这可以用事实教育人民，提高人民觉悟。我们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尽力阻止内战。内战不仅会使中国人民遭受灾难，而且又危及世界和平。”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继续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振兴之路，就是和为贵，其他打算都是错的！至于说到我个人的安危，昨天下午我在‘特园’看望张澜、鲜特生二位先生时，作了长谈。二位老先生都不相信蒋有和平诚意。张先生指出蒋在表演‘鸿门宴’，是假戏。我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教育意义了。我谢谢大家关心。不过也请大家放心，对于蒋先生要贸然违反人民意志可能加害于我，我料想他还不敢，有国内国际的舆论压力，有强大的革命力量，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既来了，他不会那么做。”

说到此，毛主席掏出怀表看了看，几位同志都同时看了一下表，已是下午5点30分，毛主席望了一下王若飞同志说：“看来，我同民主革命同盟的朋友们有缘份。我们谈得很投机嘛！”

王若飞同志征询了毛主席意见后宣布，毛主席请大家共进晚餐。那是一顿很简单的晚餐。毛主席举杯向大家敬酒。吃不久毛主席因有别的事情要应付，说声“失陪”后先行退席。饭后，由王炳南告诉王昆仑、许宝驹和我留下，说毛主席还要和我们谈话。

到晚8点，毛主席处理好了别的事情，我们3人被召到另一间房里，周恩来、王若飞、王炳南在座。毛主席说：“对不起，劳你们等久了，请坐。”接着说：“我很想再听听你们的谈话。你们可畅所欲言。讲讲国民党元老的看法及其他方面的反映。”

在王昆仑和许宝驹向毛主席讲了各方反映之后，我说：“主席这次来重庆谈判，各方面反映都非常强烈，称赞主席的大智大勇，很得人心。国际反映也很强烈。昨天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彼德罗夫对我说：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是中国和平的曙光，将会轰动世界。在对日作战期间，国共两党的分歧，阻碍了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动员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和创造新的民主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中共的力量有很大增长。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有关中国前途。如果和平谈判成功，对于中国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将起推进作用。对亚洲和平、世界和平也将起重大作用。因此，他们也希望和谈成功。”

毛主席说：“屈武同志是于右任先生女婿，又是蒋经国好友，请谈谈他们的看法。”

我说：“主席这次谈判，出于国民党元老的意料之外，很多人都以为主席不会亲来，而是派人来谈。于右任先生对我说，蒋介石很可能是单相思，毛主席未必亲临重庆。主席抵达重庆后，于先生说：‘真没想到，毛先生如此顾全大局，可以舌战群儒，笔扫千军。’张治中也说，毛泽东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于右任对张治中说，你陪毛先生来重庆，将来史书上要记上‘秋八月，张治中陪毛公飞渝’。孙科和邵力子等人也都表示，毛先生能来，中国前途就大有希望。至于蒋经国他说：‘谈得好是好事。’但他这句话含义是怕难得谈好，这中间就有文章。总之举国上下，国民党的有识之士都极望和平。但一些掌实权的人，他们怕中共得势于他们不利，妄图消灭共产党，才能保持其既得利益，扩大他们的权势，使中国仍像抗战前一样，由他们统制。蒋介石是这些人的总代表。他们认为可以消灭共产党，

因为他们保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反共方针受到美国的支持；已取得全国胜利果实和美国军援。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外战外行，内战内行。这一股反动势力是蒋介石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想和平，对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他们不愿听。他们想的是内战独裁。”

毛主席说：“他们想在内战中捞得好处，但中国共产党也不是无还手之力，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要是那样好摆布，他也不会请我来谈判了。敢入虎穴，就不是畏虎之人。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这是战后人民的普遍愿望。即便前进道路会迂回曲折，斗争会十分复杂，有时要委曲求全，但仍然有利于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力争的。”

王昆仑同志说：“在民主人士中，大家企望和平，总希望共产党尽量让步。牺牲人民利益来求得和平。他们没想过，今天中国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如果没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军事力量，作为人民的后盾，蒋介石不会让民主人士说半句话的。这种想乞讨民主的想法，我看很天真。所以在民主队伍中，也还要进行宣传，使大家明白不能牺牲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凭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所以共产党的让步也应有限度的。”

我们3人又谈了国民党内部矛盾方面和国民党口蜜腹剑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说：“蒋介石内战之心不死，但他内战的部署一时难以完成。我们和全国人民有可能争取实现和平的局面。即使是暂时的和平，也应该积极争取。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想利用时间作内战部署。我们革命力量尽力争取和平，能争得和平是福。蒋介石发动内战，革命力量也有一个应变准备的时间。要尽量团结争取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使他们看清形势，为和平团结出力。”

毛主席也谈了于右任先生的诗词书法，他大意说，于先生书法、诗词功底都很深，他为新华日报题写刊头，听说写了十几张，可见他认真的态度。我告诉他，于右任先生几乎天天写字。他说，“可惜我没他那么多时间。”当毛主席再看表后说：“快天亮了，谢谢你们！”我们才告别毛主席。这次会见，虽是在秋天的山城，让我们都如坐春风。我们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回到延安后，在对干部讲话时提到重庆之行说，“小民革”的朋友对党的政策理解得深，周总理对“小民革”同志讲话时，也特别提到毛主席对“小民革”同志的赞许。可惜当时不能记录，时日久远，记忆不周，如有乖误，由笔者负责。

言犹在耳，难以忘怀
——毛泽东引导我增强对共产党的信念

董其武

(一)

1949年，我任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1月21日夜，我在归绥从广播里听到了傅作义先生与中共达成协议，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当时，我既兴奋又思虑重重，很想知道北平和平解放的详情。随即向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明天派飞机来接我去北平。22日到北平后，我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先生。他给我详细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郑重地嘱咐我：“走人民的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傅的一席话，使我开了窍，我急切地问：“既然如此，北平和平解放的条文怎么没提到绥远呢？”傅说：“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主席之后再定吧。”又对我说：“你回去告诉咱们的干部，别看现在解放的地方少，很快全国就要解放。只有走人民的道路才是生路。”我多年随傅作义先生做事，深信他选择的路是正确的。回到绥远后，我就秘密地为起义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2月22日，傅作义先生、邓宝珊先生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毛主席。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同傅先生进行了重要和恳切的谈话。当傅先生问毛主席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主席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主席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告诉董其武主席，先做好内部的工作，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又作了详细阐述。他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历史已经证明这种方式是英明、正确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3月间，经过双方数次开会商量，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4月份，傅派原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原傅的随从参谋刘庸笙携带草案和双方军队驻地临时分界图来绥，让我审查草案，并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以上指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我觉得共产党、毛主席对绥远能打而不打，能战而不战，这种伟大的政策实在感人至深。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之后，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周北峰、阎又文等人。毛主席说：“你们商定的绥远和平条款，我看了，就按那执行吧。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解放，才有留待绥远的起义。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毛主席

的接见，进一步鼓舞了我加快起义的步伐。随即，我采取了组织革新委员会、举办革新学院、多次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加强报纸的宣传等一系列措施，以统一绥远军政各界人民道路的思想认识，保证起义的顺利成功。

（二）

绥远起义的全过程，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突出地表现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所制造的种种障碍上。在这场斗争中，我每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都通过傅作义先生报告给毛主席。

我记得有一次，特务在归绥旧城，将进驻归绥的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杀害。案件发生之后，我感到事件很严重，对和平前途十分焦虑。当即打电报给傅先生转报党中央。同时，立即派一名军长、两名师长负责追查凶犯，并要从严惩处。毛主席接见傅作义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能没有牺牲。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不变。告诉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傅先生用电报向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我的焦虑才平息。

另一次是南京政府任命我为西北军政副长官，拨来黄金 1900 两。我对南京政府的这种用意心里非常清楚。封官一事，是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架空我，使我在绥远失去兵权；拨款是为了收买我。

因此，我当即电告傅作义先生，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毛主席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接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经济困难呢？应该再设法帮助董其武解决困难。”

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为使绥远起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 月开幕以前实现，8 月 20 日在中南海接见了傅先生。在听取了傅对绥远起义的情况的汇报之后，毛主席委托傅先生和邓宝珊先生等人，携带大批慰问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毛主席的这一决策，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了重大作用。

在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我们拟写了起义的通电稿。傅先生看后，当即通过电台呈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说：“要把蒋、李、阎的名字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修订了电稿，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名字。9 月 19 日我带领绥远军政各族各界代表 39 人，庄严地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华北军区聂司令员、薄政委发出起义通电。在电文中，我们尽情地向党和人民倾听了绥远军民坚决跟共产党、毛主席走的决心。

毛主席、朱总司令接到我们的通电后，于 20 日立即复电，高度赞扬绥远军政的革命行动。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同时，我们也接到了聂司令员、薄政委的复电。我把他们的电报，都转发给部队和各级政府，认真学习讨论，贯彻执行。

起义之后，毛主席对绥远的和平合作，部队的改编问题极为关心，做了一系列的指示。毛主席说：“绥远不搞军事管制，成立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政府领导。军政委员会要统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正规军、地方军

也包括在内。省政府与军区都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两条线一个头。”并在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7次会议上和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任命傅作义先生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任命我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省人民政府主席兼省军区副司令员。从此，我们根据毛主席对绥远和平合作的指示，团结一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了地方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的改革运动。

回忆往事，使我深深地感到：绥远起义的成功，主要是党英明政策的胜利，是毛主席指示的“绥远方式”这一伟大方针的胜利，是爱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三）

1950年初，我和高克林同志奉命到北京向党中央、政务院汇报工作，谒见毛主席。这次到京是绥远起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火车到北京站时，傅先生和华北局、华北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到车站迎接我们。傅先生安排我们住在北京西单小酱房胡同十九号他原来的住宅里。

在北京，我和高克林同志首先向华北局、华北军区的领导同志汇报了工作，他们还设宴招待我们。他们听了汇报之后，即要我们准备向政务院汇报。我和高克林同志商议了汇报内容，让随我到京的白震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崔载之二人起草报告材料。报告草拟好后，我和高克林同志又做了详细修改，并誊清送政务院请周总理审阅。4月13日夜11时30分，周总理将修改稿送回。

14日上午8时，傅先生作为政务院的委员，同我一起乘车到中南海参加政务院第二十八次会议。周总理主持了会议，并将我介绍给与会人员。我向会议汇报了从起义以来，绥远省半年来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工作情况，内容大致为：关于政权改造；部队整编、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生产工作；税收、公债及财经统一工作；民族政策等六个方面的工作。并对绥远省粮食外运、开采矿产等问题，向政务院提出把京绥铁路延长到西山嘴或陕坝、修理从包头到鄂托克旗公路等建议，以调节内地粮食不足和增加国家财富。在报告结束前，我十分激动他说了一段话，现抄录如下：

“绥远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农牧业、工矿业都有远大的发展前途。我们手里虽然抱个破碗，地下却埋藏着黄金。其次，和其它兄弟省份比较，绥远解放较晚，一切落后一步。但我们每个干部都抱着炽热的心情，向毛主席学习，向共产党学习，向兄弟省份学习，以迎接伟大的生产与建设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并超过这个任务。其武个人在旧社会工作较久，缺点甚多，今天得光荣地为人民服务，看见全国军事、政治、生产建设的突飞猛进，尤其感到无限的感激与兴奋。请多赐批评，策励我们的进步。”

我的汇报一结束，周总理、郭沫若等领导同志离开座位走到我面前握手，表示祝贺。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这个报告很好，《人民日报》要在第一版上全文发表。”4月17日，新华社将我的汇报全文向全国各新闻单位发了通稿。《人民日报》、《绥远日报》都在4月18日的第一版全文刊登。当时，我看到总理平易近人，辛勤操劳，心中十分激动，以至连问候总理好的话都忘记说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悔之莫及！

1950年4月8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了我。在座的有周总理、宋庆龄、张澜副主席、林伯渠秘书长、傅作义先生。下午6点钟，毛主席来了，他笑容满面地握住我的手说：“董其武将军好吗？”我答：“好！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宴会之后，毛主席和我们一起观看了怀仁堂的文艺演出。

4月27日下午，傅先生来到我的住处，一见我就笑着说：“其武要受到明师真传了！”我一听就猜到是毛主席召见我。傅先生又说：“今晚毛主席召见你和高克林书记。”当晚，我高兴地换了一身新的灰士林平面布中山装，带上自来水笔，和傅先生、高克林同志一起乘车去中南海见毛主席。7时，我们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主席已在此等候了。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总理、朱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薄一波政委等领导同志。我向毛主席恭敬地行了礼，走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他随即把我和高克林同志让到他附近的座位上。他询问了绥远的情况后对我称赞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蒋以钱以官来破坏你们，不得人心嘛！他们终于失败了。”他指着傅先生对我说：“他和我们打交道多了，你还没有和共产党共多少事。有人害怕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人嘛，有什么可怕呢？不过共产党有一个党小组，每周要过党日，对党员一周来的好事要表扬、巩固、提高；对做错的事要批评、教育他，不是搞别人的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毛主席这时问我：“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我答：“不是。”他又接着说：“共产党与人共事是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桌面上是什么，背地里也是什么，不和蒋一样。蒋和人共事是讲权术的，搞宗派的，搞码头的，不为无因，他是私。共产党没有私，共产党人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讲到这里，毛主席问我：“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说：“听懂了。”毛主席又重申他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恩，广众益，为的是把国家搞好。”他说：“咱们国家经过多年战乱，需要三年好好恢复生产，你回去争取把军队改造好，争取把地方各民族领袖团结好。香港有不少资本家想回来，我们欢迎他们回来。建国需要钱，为建设美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奋斗。”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我听着毛主席的话几乎入了迷，顾不上记笔记了。这时，傅先生对毛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时间宝贵，请休息吧！以后和他们谈话的机会还多嘛！”毛主席站起来风趣地说：“看，傅先生给我下命令了。那就谈到这里吧！”这时，毛主席又接着对我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是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只看将来。”

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直送到门口。我几次回头，望着还站在门口的毛主席，心中充满了幸福！回到小酱房十九号住处，已11点多了，我兴奋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几乎彻夜不眠，深感他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太感人了，听了他的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我在六十九军任军长的16年间，最荣幸的一件事就是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我被授予上将军衔。9月29日，国务院在北京举行隆重授衔、授勋典礼。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礼堂亲授我上将军衔。毛主席在怀仁堂授朱德等十人元帅军衔后，又亲手授我一级解放勋章。当我从毛主席、周总理手中接过勋章和军衔，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回到家里，我想了许久：旧社会，我为了

个人的生活出路，光耀门第，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国家的强盛，戎马生活几十年，在抗日战争中，从团长一步步晋升为中将军长，觉得心安理得。但在日本投降后，我竟执行了蒋介石的“勘乱”政策，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来，我同傅作义先生先后率部起义，党中央、毛主席不记旧过，只念新功，亲授我一级解放勋章、上将军衔，心中实在是又光荣又惭愧。

总之，从 1953 年底我任六十九军军长，到 1968 年我离开六十九军的 16 年间，我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只不过尽了微薄之力，虽有些成绩，但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诲，归功于全军官兵！

1956 年，我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这之前，因为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给我写信表示对起义有怀疑。5 月 13 日，我带着许多信到中南海见毛主席。我对主席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毛主席说：“有什么事哩！”我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我听了主席的话非常兴奋，带去的信，一封也没给他留下。

回顾我走上革命道路 34 年的历程，使我深深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襟怀伟大。不仅委我以重任，授予厚誉，而且共商国事。我能从一名在旧军队里工作多年的人，进入革命行列，尔后又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一名成员，我能在人民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都是党和毛泽东同志关怀和教导的结果。是“绥远方式”引导我踏上革命的道路；是毛泽东同志同我的谈话引起了我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信念和信心；是他的话成了我立身行事的准则：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联系群众，爱护人民，尊重人民，说老实话，做老实事，不贪污，不腐化。总之，我之所以有今天，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泽东同志！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为人民的四化建设，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贡献出自己余生的光和热。

“做个榜样很有必要” ——毛泽东与民主建国会的知名人士

孙晓村

50年代初，一天深夜接到通知要我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我去的特别早，会场在中南海勤政殿。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我说，主席您早。他笑笑说，我的公事刚办完，等和你们一起开完会，我再去休息。你是北京农大校长，我劝你们农业大学应该搬到郊外去，应把校址设在农村，或靠近农村，这样便于和农民接近。我说，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址是有历史根源的，清末就叫农科大学，但离城太近，附近搞不到大的农场，对教学和科研不利，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做，把农大迁移到郊外去。（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农业大学从公主坟迁到海淀区马连洼，周围都是农村。）毛主席还对我说，我不劝你真像农民那样参加劳动，但作为农大校长，拿个锄头耙耙地，做个榜样很有必要，这可以起带头作用。我听了很受教育。

1952年9月，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工商界人士情绪低落。毛主席劝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发表一次讲话，鼓舞工商界人士振作起来，搞好生产。黄任老决定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讲话，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然后将讲话稿印发全国各地民建组织。当9月4日将讲稿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对黄炎培的讲稿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1）他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2）他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毛主席修改后还写了封信给黄任老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讲话稿发给全国各地后，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情况很好，因此，工商界中流行一句话：“难忘的一九五三年。”（请参阅《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页、443页、444页。）

1956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同年11月间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民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中间，大家开展讨论，对有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会后，黄任老写了封信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在1956年12月4日回信。赞扬这次会“开得很好”，并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

是好消息。”这封信第一次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社会总充满着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毛主席还填写了《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词，书赠黄任老，以答谢他历次赠诗的雅意。（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5页。）

黄任老告诉我，他有时收到国内著名画家的作品，请他转呈毛主席。每次黄任老都转送上去。事过不久，毛主席交给黄任老几百元钱，请他代为转送给几位画家，以表示对他们赠画的感谢。

在回归祖国的日子里 ——毛泽东欢迎李宗仁

程思远

1965年7月17日晚上，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在“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安排下，毅然排除险阻，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远渡关山重洋，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飞回祖国。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先生一行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我们。

我们坐车从新华门入中南海，毛主席在一个游泳池的休息室里等候我们。李宗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主席便热情地迎上来，同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说：“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接着李宗仁先生谈到了海外的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随后毛主席邀彭真副委员长和我下水游泳。我们跟着毛主席在一池碧水中前进，他时而仰泳，时而侧泳，他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我游到主席的身边，他说：“你游得不错嘛！”我说：“跟不上主席啊。”

移时，毛主席上岸晒太阳，他让我坐到他的身边，问我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我说：“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听了笑着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的？”

我茫然不知所对。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主席盯着我说，但他目光并不严厉。“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继续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我们到了毛主席的丰泽园住所，在这里毛主席又同李宗仁谈了一会儿。李先生深以台湾问题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主席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后来，主席又问起我：“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我回答道：“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主席满意地笑了。他又问道：

“你有别号吗？”

“没有。”我说。

“那好，”毛主席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号。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我立刻表示感谢，说：“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下午3时，徐冰部长咬着我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于是我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急什么，少壮派！”主席用目光盯着我说，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革命的良师 ——毛泽东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

刘斐

与毛主席第一次会见

1949年4月，在黄绍竑还未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回南京之前，在和谈过程中，毛主席每天就分别邀约南京代表会谈。因为我和黄绍竑同属桂系，所以是同一天被邀见的。

那是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春日煦煦，令人怡然，但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心中是不无忐忑之感的。

我们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主席便迎上来和我们热情地握手。毛主席对我们诚挚热忱，以礼相待，这更使我愧悔不安，对毛主席也顿增敬意。

我们进房不久，朱德总司令来了，他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问长问短。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将军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我不由得暗暗点头赞赏。

毛主席询问我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其实，毛主席对我并不是不了解的，只是没有见过面。记得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毛主席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接受蒋介石的邀请，与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由赫尔利及张治中陪同，自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谈判。在此期间，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协同周恩来同志便曾作过不少有效的策应。因此，他们对于我的印象是颇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京多次接见我，还常谈及此事。此刻，毛主席与我见面了；我又回答毛主席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所以毛主席很高兴而又意味深长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

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我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主席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是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主席边谈边打手势，语气是那样亲切，使我们拘束顿消。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毛主席扳着指头对我们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说到这里，毛主席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我们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我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

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主席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

当我说到蒋介石这个人学无术时，毛主席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说完，毛主席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笑着点了点头。

“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些词，虽然在后来的协定最后修正案中没有写上，但毛主席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啊！

这次接见，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哩！

饭前，朱总司令走了，毛主席同我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我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主席，便问：“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主席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主席思想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我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毛主席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毛主席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人物，我深感耳闻不如一见。

回到宾馆，正巧周总理来看我们。我把这种心情告诉了他，并说，“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周总理听了，也哈哈大笑。

就在毛主席邀见我和黄绍竑之后几天，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破裂了。我深为愤慨，决心不再南返，并与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共同采取一致的行动——留在北平。在那中国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我毅然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这方面来了。

但李宗仁等不明底细，所以当于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到香港时，他仍派程思远和邱昌渭（总统府秘书长）由穗来港迎候，要我去广州。我在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四号寓所对他们条分缕析，力辟李宗仁贸然从桂林到广州撑持残局之非计等等。其后，我从邱的谈话中，知道李的打算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就没有去。李又几次打电话来催，我均以需要休息为词而推辞了。

毛主席的几次谈话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我应邀出席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被埋葬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毛主席）。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并从此在我的生命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

还在筹备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而作出过一定贡献的民主人士的安排就非常重视。一开始，我便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成立国防委员会，又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接着，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

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并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第五届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副主席等职。30多年来的耳闻目见和亲身感受，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总是不会忘记的。特别是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间，我去武汉供职之前，毛主席与我的几次谈话，更使自己感到党的亲切和伟大。这对我其后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有一次毛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字号，问我：“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

我是一个“行己而无私，直言而无讳”的人。毛主席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高度重视。我想了想，便毫无顾忌地回答道：

“100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

毛主席一字一句地听完以后，针对我的话，认真地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

我听到毛主席这样回答，更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和英明，于是十分兴奋地说道：

“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又有一次，那是194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着鹅毛大雪，毛主席打电话约我去他那里吃晚饭。我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人也到了。饭前，我们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我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主席听我们如此议论，有意地同我们谈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语重心长他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毛主席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思想变化，还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我等听了毛主席讲的这些极其深刻的革命道理，都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励，同时“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主席的学识和记忆力”，但毛主席却谦逊他说：“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毛主席为了启发和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新社会服务，对我们详细他讲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从十几岁讲起，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他的用意是很深的。我也深深感到，他对为人民做过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记在心的。这番话语，沁人肺腑，20多年来我一直

念念不忘。

还有一次，那是 1950 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找我到了他的住处。

我们谈起《共同纲领》，我说：“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主席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毛主席这句话发人深省。

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同志来了，原来主席叫我来是要我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我同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见面。毛主席指着邓子恢同志说：“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当时在场的还有准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等。大家无拘无束，谈得轻松愉快。

我向毛主席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主席鼓励我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饭后，主席送我出来时又谆谆叮嘱说：“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

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不仅使我增添了革命的勇气和信心，而且也为我指明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和道路，毛主席是我革命的良好良师。

不记前仇，化敌为友 ——在毛泽东的宴席上

郑洞国

大约是 1954 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我……。

我十分不安。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1948 年，我率部困守长春之际是何等迷惘！

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在东北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我突围，严词告诫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近郊飞机场已非我所有，长春周围全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兵猛将。我们插翅难逃呀！……危在旦夕矣。部属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连我亲自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都开不起来了。新七军军长李鸿称病不出席。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虽然到会，神态却异乎寻常，听我说了几句话，他就借故匆匆辞去。我预感到凶多吉少。果然，当晚有人多次密报说：“六十军决定今晚起义！”旋即接曾泽生电话——我本想借机劝他心回意转，谁知不等我开口，他在电话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人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是解放军代表的人通过电话对我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作不必要的牺牲！”瞧，解放军代表已经成了六十军的座上客了！但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当即答道：“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殊不知我越来越孤立。第二天一早，新七军参谋长来见我说，新七军也决定放下武器。劝我和他们一道行动。我仍不醒悟，严词拒绝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

此刻，我明知人民拥护共产党。解放军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许多方面都优于国民党，心中不能不佩服，可我囿于正统观念，硬是不愿和共产党和谈，误认为共产党不会容我。故我誓与孤城共存亡。

这时，社聿明急电告我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我脱险，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回电说：“来不及了。”同时电告蒋介石：“来生再见。”我坚持“宁可战死，决不投降”的顽固立场。

说实话，我已经顽而不固了。当晚，我的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异常激烈。我以为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并问左右军情。哪知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竟踞于我的司令部内外了。再看身边，副参谋长和卫兵等人团团围着我，似乎都用眼神向我示意：“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我只得勉强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才知道，那是由于共产党军威和政策的感召，我的一些高级幕僚和卫兵早已悄悄迎来解放军的代表及战士。他们计议，朝天放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堪，巧妙地从我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每忆及此事，我不能不感激解放军和我部属及卫兵们的安排。

虽然放下了武器，我思想仍甚顽固，心绪极为不佳。尤其是率部退出长

春之时，既惭愧又不服气。恰于此刻，解放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设便宴招待我。平素我就沉默寡言，何况“败军之将不言勇”，在小酌之中，我更少说话了。肖劲光和肖华二位将军见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给我斟酒夹菜，非常和气，并不视我为“败军之将”。饭后，他二位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生硬地说了两条：一不去广播，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两位将军爽然应之，只是又热情地希望我能为人民做点事。我断然拒绝说：“我只想当一个老百姓。”两位将军仍不介意，婉言提出：“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答道：“学习，让我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样，我住在军区招待所，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年半。

老实说，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我读不进去。翻阅注释和人名，却引起了兴趣。因为其中提及的一些人，我非常熟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不由地想到自己跟着蒋介石打了 20 多年仗，为什么越走越歪？为什么失败到如此地步？当时，我还看了不少解放区的报纸，看到共产党强调抓生产，做了许多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对比之下，蒋管区却民不聊生。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是进步的话，那么蒋介石实行的是什么主义？他领着我们干了些什么？真是救国救民吗？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人民群众不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却风起云涌地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呢？我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使我能够冷静下来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了。

越学我越感到毛泽东有学识，有理论，有思想，有办法，是真心实意运用马列主义来救中国的，再想想蒋介石。一比较，他在我心目中黯然失色，他没有头脑，没有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论，只会耍手腕，仰仗美国，以势压人，大失民心，结果一败涂地。1952 年，我去上海参观，发现上海这个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经共产党一整治，大变样！真是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什么恶霸、流氓、娼妓等等污垢几乎涤荡净尽。正气浩然，人心向着共产党。看到这种盛世，我不禁自责：“郑洞国啊郑洞国，你过去跟错了人啊！”我的思想变了。

说到思想转化，我想起自己从东北去上海，路过北京，周总理请我吃饭。当时，聂荣臻元帅在座。总理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洞国，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愕然了。总理说，那封信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写的。总理还讲了信的内容。我听了非常感动，无比后悔他说：“总理呀！如果当时能见到您的信，我转变得可能快一些，不会那样顽固了！”幸好，我终于转变了。

那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帅，还有鹿鍾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暄，让座。

我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我轻松多了。坐定之后，他一上来就问我抽不抽烟。我应声说：“抽。”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我点烟。他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讨厌的傲慢派头。在国民党阵营里 20 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我的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主席问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

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主席听了随即说道：“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啊！”我一惊，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好像毛主席也感到我问的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在那天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30多年业已过去，回首往事，我深感共产党确实不记前仇，化敌为友，说话算数，待人以诚！

老成谋国，乘虚御风
——毛泽东三访张澜

林淇

1945年8月28日中午，四川重庆嘉陵江南岸上清寺一幢典雅秀丽的建筑“特园”的餐厅里，主人鲜英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主席张澜正在共进午饭。

突然，中国共产党南方局统战工作负责人徐冰迈着快步走进餐厅来，他是中共与张澜的联络人，是特园的常客。

张澜、鲜英见徐冰气喘吁吁，微胖的异常红润的脸上渗着汗珠，赶紧递扇让座，吩咐送凉饮。

徐冰喘息未停，声音急促道：“表老，（张澜字表方，人们习惯尊称他表老）我是来奉告一个大喜讯的。”

“哦！什么消息？”张澜、鲜英忙问道。

徐冰双眸倏地一闪亮，神采焕发道：“毛泽东主席将于今天午后到重庆。”

原来，在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后两星期内，蒋介石一连三次电报到延安邀请毛泽东来重庆商谈国事，毛泽东为争取和平，毅然决然飞重庆进行谈判。

张澜、鲜英闻言，四目相向，愕然惊呆了！

可是惊喜之余，却又为毛泽东的居然深入这龙潭虎穴的浩然气魄和超乎常人之胆略而惊叹，为头上悬的莫不是达摩克利斯剑而担忧。

徐冰对张澜表示歉意道：“我因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可能随时会发生的变化，所以没有早些来告诉您。”

“这有啥，你做事慎重、仔细嘛。”张澜笑道。

徐冰一看手表：“表老、特生（鲜英字，“特园”名之由来）先生，你们用饭，我告辞了。”

张澜、鲜英不便坚留，过来要送，但让徐冰拦住了。两人目送徐冰结实的背影离去，便草草用过午餐，然后吩咐备车往迎。这时民盟领袖黄炎培、冷遹两位遽然联袂而至。张澜告以毛泽东午后到渝的消息。

黄炎培笑道：“表老，我们两人正为这事来的，我想约您同车前往机场迎接。”

“好，好。”张澜欣然。

“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人们习惯尊称他黄任老）是怎么得到消息的？”鲜英问道。

“有关方面透露的。”黄炎培故作神秘地答道，“你看，我这耳朵比你们的都要大而且长，消息当然灵通，北风惠我以佳音也。”他那大耳阔脸上漾着和善的笑容。

黄炎培一语风趣，引来哄堂大笑。

一会，汽车司机进来禀告主人车子已备好。于是四人出厅上车。小汽车开出大门径向九龙坡机场疾驶而去。转眼已到九龙坡机场，他们下车匆忙走进候机室。此时中共第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几位负责人过来招呼寒暄。隔了一会，民盟领袖沈钧儒、章伯钧和左舜生等先后来到了，大家谈笑甚欢。不多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也到了，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也

来了。接着，国民党名人陈铭枢、谭平山相继驾临。最后赶来机场迎客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除了上述各界领袖人物外，还有中外记者数十人也前来机场迎接。

（一）邂逅

是日，晴空朗朗，彩云栉栉，夏末秋初的天气，炎阳虽骄，却并不十分肆虐的人。

下午3时半，北边远处高空蓦地出现一个闪光的小点，随着引擎声渐响渐近，不多时，一架绿色军用飞机，便稳稳地停落在跑道上了。人们立即围了上去。

机舱开了，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他一边脱下拿破仑帽（考克帽），高举着，轻轻挥动着，向欢迎人群致意；一边满面笑容，频频颌首，徐徐走下舷梯。走在他身后的是第二个步出机舱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的后面依次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要人张治中等。五人下机站定，欢迎者紧步上前。中共工作人员时为《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的乔冠华走到毛泽东身边，介绍毛泽东与大家见面。

正当乔冠华逐一介绍时，毛泽东忽从人群里发现了张澜。他之所以会发现张澜，主要不是因张澜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而是由于张澜的那件麻灰色旧布长袍挤在华衣哀盛装中独显寒酸，一下子就辨认了出来。毛泽东不顾乔冠华在替他挨次介绍，却自管走到张澜跟前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笑容荡然：“您是张表老吧？您好！”神态自然，若见故人。

“不敢！不敢！”张澜只觉得眼前一亮，立即握住了毛泽东那壮实刚劲的手掌，满脸堆笑道，“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一双明眸亲切地凝视着这位魁梧奇伟、威重当代的重要人物。

“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亲热道，睿智的目光饱含敬意地望着这位眉宇清肃、气骨刚正的“川北圣人”。

“应该的嘛，您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哪里，哪里！”

两位虽然素未谋面，却是神交已久，就此寒暄开了。

乔冠华走了过来。毛泽东只得松开紧攥着的张澜的手说道：“改日长谈。”语气恳切而含深意。

乔冠华继续一一介绍。此刻，摄影记者早已蜂拥而上，忙着抢摄镜头了。

周恩来两条浓浓的钢眉舒展着，一双锐灵的目光照应着全场。一俟乔冠华介绍毕，他从毛泽东身边绕过去跟张澜握手，然后请张澜过来与毛泽东并立，又邀张治中、邵力子和郭沫若分站在毛、张两人旁边。摄影记者反应之快简直超过他们那咔嚓声，不用关照，早已纷纷上来抢去了这个历史性的镜头。

毛泽东一到重庆，即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宴会，不亦忙乎！

30日，即毛泽东飞渝的第3天上午，周恩来特到特园，张澜在大客厅里接见了周恩来。鲜英陪坐。

“表老，毛泽东主席要我来告诉您，他今天下午3时亲临特园拜望。”

周恩来直道来意。

张澜闻言，脑海里立即闪现出机场握别时毛泽东的“改日长谈”这句话，不禁大喜。但一转念，恳辞道：“润之先生操心国事，备极辛劳，应该在他方便的时候，我去拜望他才是，不当劳他过访。”

“他的意思是要亲自来，特地关照我当面转达，您就不用客气了。”

张澜面露歉意，笑道：“既然如此，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鲜英听说毛泽东主席要来，早已喜出望外，当即表示竭诚欢迎，并热情道：“你们这次来和国民党谈判是很辛苦的，你们都到舍下来休息，住到这里来吧。”

周恩来含笑谢了鲜英的美意。接着，他下意识地左顾右盼了一下，说道：“表老、特生先生，为安全起见，我想提个小小要求：我想请两位等会不在大门外迎候，如何？”

“那好，那好。”张澜、鲜英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个万恶的特务的影子来了。

“还有，到时我们不坐这里，我们在表老卧室内谈话，如何？”周恩来另又提议道。

“周先生真是想事细到，但这小地方怎能见客？”鲜英不肯。

“这又有什么！何必拘泥。”周恩来随口道。

鲜英两眼看着张澜，等他的表示。张澜却对鲜英莞尔一笑，说道：“我看这未必不可。”

鲜英不再坚持，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原来，这里特园早为国民党特务所忌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监视了。先是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50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相距近，不过公共汽车一站路之遥）。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坐镇那里督促特务们日夜窃听特园电话，记录出入特园人士的姓名，写匿名信给鲜英及其子女进行恫吓。特园常客中更多有收到这类黑信，恐吓不准去特园，否则将喂以“毒果”的。

送走周恩来后，张澜欣喜地对鲜英道：“特生，你现在就关照下去，叫上下准备迎客吧！但为安全计，告诫他们切勿外传！”

鲜英点头称是。于是在他的一声命令下，全家忙碌开了。兴奋而紧张、喜悦而神秘的气氛，充溢着整个特园。

（二）一访

下午，钟打了3下，门铃响了。张澜和鲜英几乎同时离座，疾步走出大客厅，径向大门口走去。

此时，毛泽东、周恩来的小汽车正开进大门来。张澜、鲜英迎了上去。几名警卫人员先下车，随后周恩来、毛泽东跨步出来。张澜、鲜英紧步上前。4人热烈握手，言笑甚欢。毛泽东环顾四周，观赏特园芳容，赞道：“这宅子坐落在山弯弯里，碧山、翠林、绿水萦绕，楼房庭院错落有致，真是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特园，园名来自鲜英字特生，建于1931年，位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20余亩，住宅面积7亩半左右，正房是三层楼房，大小20余间，主楼名

“达观楼”（鲜英书斋名，以此命名，可想见其性格），前后是花园。此宅倚山傍水，结构谨严，布局典雅，居室宽敞，庭院深静，景色秀丽宜人。

张澜、鲜英随即迎客人步入花园，4人边走边谈，穿过葡萄架，来到花园台阶前，这儿一家人都正站在台阶上候迎客人。鲜英的小辈们，一边亲昵地向周恩来这位特园常客齐声叫道：“周伯伯！周伯伯！”一边屏息静气，怯生生地却又饥渴地争睹毛泽东的丰仪神采。周恩来向他们点头微笑；毛泽东满面含笑，举起厚实的大手，伸向前方，频频挥动着、招呼着。

这当口，全宅仆佣等闻讯也争欲一睹这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风姿。他们放下手里活计，纷纷前来瞻仰。毛泽东走到他们面前，一一握手问好。他神态自然随俗，风度平易近人。张澜见到这一情景，一个念头却在脑际翻滚：“这才是真正的老百姓的领袖啊！我自己出身农家，至今恐怕脚上还闻得出泥巴的宿气，可多年来弃农、读书、从政、奔走国事，沾染上了士大夫习气了啊！比之于润之先生，能无赧乎！”

4人来到二门口，毛泽东忽然站定身躯，仰首观看门额上一块匾，（此匾现存红岩革命纪念馆）只见上书“民主之家”四个大字，不禁对着它口中喃喃：“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又觉得这一笔隶书，清劲秀逸，再看落款处，霍然入目者，是冯玉祥的大名，笑对张澜道：“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一旁替“民主之家”作了注释：“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听到这名称后，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泽东笑道：“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他的话引得彼此相视大笑。

这“民主之家”有段前史。1938年年底，周恩来、董必武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便请董老去特园当面同鲜英商量，中共为同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倘能提供这样的方便，当是最理想之处。鲜英爱国情殷，立即答应了。次日，周恩来由董老陪同亲赴特园，感谢鲜英的支持，并问道：“在蒋介石的高压下，这可能给特园带来麻烦，请问您怕不怕？”鲜英回答得干脆、坚定：“为共赴国难，我一愿意，二不怕！”这句话一出口，周恩来感动不已，过去紧紧握住鲜英双手。接着，向鲜英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述了党在抗日时期的地位、任务和统战政策，谈得十分投机。

从此，中共方面的重要人士在重庆或偶来重庆工作的都到过特园，都曾经是特园嘉宾。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王若飞和邓颖超等中共代表团成员更是这里的常客。周恩来的次数尤其多，有一个时期，几乎天天都来。除此，国民党的元老、大员和地方势力人士也都曾作过特园座上客。至于社会上，则政治、工商、学术、文艺、妇女乃至华侨等各界各行的知名人士，都曾名列特园客单。上述所有人中有不少还寄寓于特园。

由于中共南方局借重特园广泛开展活动，广大进步人士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纷纷团结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致使特园形成胜友如云的热烈场面。加之鲜英待人接物优厚多礼，有孟尝君之风，于是宾

至如归，出现了“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盛况，从而誉满山城，特园乃俨然成为一座民主运动的大本营，“民主之家”之徽号由此而来！

这时，毛泽东的视线移到了两旁的一副楹联，对上联轻声念道：“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读毕，侧首问鲜英：“谁的手笔？”

鲜英笑答道：“表老所作。”

“意义好，词好。”毛泽东赞道。

“哪里，哪里！”张澜谦虚道。

毛泽东又笑对鲜英：“你不仅古道热肠，任侠好义，还如此雅达，数风流人物，还看我鲜特生啊！”

“毛先生打趣了。”鲜英谦逊道。

“哪里的话，这是表老对你的评价嘛，你这位儒将文武全才，又如此潇洒，如此慷慨大度，还不配称风流？”毛泽东侧首含笑，打量着鲜英的上下周身道。

张澜乘此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鲜英。

原来，鲜英乃四川西充县人。幼年读私塾，熟谙经史。早岁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军事。33年前，即1912年，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使署配备了一个支队（相当于团）的武力，张澜委鲜英为支队长，时杨森、刘湘均是他的部下。此后被选送北京陆军大学深造并毕业于该校。1925年任四川陆军第10师师长。1939年之后，鉴于国事日非，谢绝仕途。他参加过同盟会，参加过讨袁的“护国之役”，1935年开始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后始终跟随张澜共同为抗日民主事业，殚精竭虑，奔走不暇。

鲜英对旧营垒和而不流，有时甚至能反戈相击；对新时代心向往之，有进取心，自强不息。他爱国，富于正义感，聚志士仁人共尽瘁于国事，终至以国为家。

接着，毛泽东念下联：“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读罢，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句，赞道：“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就在这赞美声和笑声中，张澜、鲜英引领客人过二门继续朝里走，转弯抹角，进入张澜卧室。

这是一仅14平方米的小房间，张澜到重庆，应鲜英邀，住此，但张澜素来简朴，不喜奢华，鲜英曲承其意，不事铺张，只一床一桌几把椅子点缀其中而已。

张澜笑谓毛泽东道：“斯是陋室。”

毛泽东随口答道：“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4人在笑声中坐定。女仆送上香茗后退去。鲜英打开上等听装香烟，敬向毛泽东，并替他点燃了。

周恩来抬腕看了一下手表，即站起对张澜道：“表老，下午我还要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继续会谈，先行告辞了。”

张澜见不能留，只得说道：“公事要紧，公事要紧。”

送走周恩来，室内的谈话又开始了。

“表老，首先请让我向您转达朱德同志对老师的问候。”毛泽东神态恭敬地说。

约在三十七八年前，张澜担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监督（校长）并兼

任修身课讲授时，朱德是该校学生，曾受他的影响和教诲。之后几十年中，朱德对他一直以老师相待，半年多前，还特地托人带给他一封信，敬称“表方吾师”，署名“学生朱德”。信中大意是说“您的事业我们支持”等等。随信并送上延安搞大生产时生产的一床绿色大方格毛毯。

“谢谢他！回延安后，请代我向他问好。”

毛泽东点了一下头。又道：“其次，您的老朋友吴玉章同志托我向您问侯。”

“岂敢，岂敢！烦请代致谢忱，并颂安康。我们一别多时，彼此南北相乖，无缘会面，时在念中，时在念中。”

毛泽东点头道：“一定都替您转达到。”

张澜谢过，言路一转，感佩道：“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我们这些人都在为您的安全担心啊！”鲜英蹙额道。

毛泽东神情坦荡，悠然一笑，感激道：“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说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毛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处危若安、宁静致远的胆魄，但仍有所不安道：“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必大放其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接着，郑重道：“润之先生，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

‘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哼，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明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毛泽东笑道。

张澜咀嚼着毛泽东的话，稍顷，肃然问道：“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将如何？”

毛泽东一皱眉头，眉尖起了个疙瘩。他接上一支烟，深深吞吐了一大口，说道：“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已经有80万。”

“哦？”张澜露出惊讶和愤慨的脸色。

“所以说蒋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足见此入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毛泽东赞同道：“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本来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张澜忧心忡忡道，“内战危机重重啊！”

“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毛泽东停了停又道：“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三大顾虑：（1）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1万万、军队100万、民兵200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2）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民主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和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3）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三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谈判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但我们不先动手，后发制人，还要怎样呢？”

张澜点头赞赏、钦佩毛泽东的透彻精辟的剖析。他想了一想，郑重道：“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毛泽东摇了一下头：“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稍歇，说道：“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情况，如何？”

“那也好。”

话正谈到这里，忽然咿呀一声，门开了。一位雍容端庄的夫人出现在门口。夫人向毛泽东、张澜莞尔一笑，托着满盛糕点的红漆盘，轻挪小步，走到书桌旁，放下漆盘，将糕点分摆到三人跟前，笑道：“粗点心，请随意用一点。”

张澜忙介绍：“润之先生，这位就是鲜夫人。”

毛泽东笑容漾溢，和鲜英夫人握了一下手，以示对这位“民主之家”的主妇的谢意。

“不敢当，不敢当！”鲜英夫人忙答礼后退去。

毛泽东有鉴于张澜对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的殷切期望，于是就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概括加以说明，主要是提出六项紧急措施：大意是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以及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等等。接着并对此作了详尽的解释。

张澜认真仔细地听完解释，连声称赞：“很公道，很公道！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六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说到这里，似有所悟，忽捋须一笑：“您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鲜英都笑了。

接着，毛泽东又给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等情况。张澜为之兴奋、激动不已，说道：“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几位参政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正当此时，忽一名警卫人员敲门进来向毛泽东报告：“主席，今晚宴会

的时间快到了。”

毛泽东一看手表，笑对张澜、鲜英：“我们谈话忘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他也邀了我。”张澜接口道。

“那好极了，我们晚上再见。”毛泽东欣然离去。

（三）二访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有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再度驾临特园。张澜、鲜英等7位一起出迎。毛泽东一进特园，兴冲冲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众人闻言大笑，一句话生出满园春色。于是大家将3位贵宾迎入大客厅坐定。不一会儿，一桌丰盛酒席摆了上来。张澜、鲜英等起身请客人入席。毛泽东被邀，推让不过只得坐了首位。他拉请张澜坐在他右边。鲜英是宅主，陪侍在左侧。其他人等随意落座。

鲜英霍地站起，手执大酒壶，先给毛泽东、张澜各满斟一杯，然后出座逐个满了。他回到座上，指着毛泽东杯里的酒，笑谓道：“这是家酿的枣子酒，请毛先生一尝。”

周恩来马上给毛泽东介绍道：“我在特园宴请客人常用此酒，这枣子酒浓度不高，味道却香而醇厚。”

“特生先生献家福喽！我不胜此物，但今天定要领这个情，一醉方休！”毛泽东的话引来满堂笑声。

毛泽东不善饮酒，呷一杯葡萄酒也会满脸通红，所以平时极少喝。他只在两种情况下用酒：一为睡觉，他一杯就会头晕，三盅必然倒下，因此，有时为了入睡得快，就来上一杯；二为打仗或写作，他作战作文常连续几天不睡觉，此时也需要酒，掌握用量，间时进一点，以刺激、兴奋神经。

张澜站起来，举着酒杯，热情激动的目光透映出心底的兴奋，目光在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人的脸上抚拂过，说：“今天承蒙三位不弃，辱驾特园，我代表民盟中央全体委员表示热烈欢迎和谢忱，干杯！”

全体起立，10只酒杯在桌子中央的上空碰撞出和谐清脆悦耳的声响，顷间，满盛在酒杯里的酒同时被仰脖而尽。于是大家重又归座。

张澜替毛泽东又斟满一杯，自己的也满了，然后举杯敬向毛泽东：“会须一饮三百杯！”这是唐李白《将进酒》中的诗句。

“且共欢此饮！”毛泽东举起杯来脱口而出。这是东晋陶潜《饮酒》诗中的句子。

两人碰杯，一饮而尽。于是宾主之间相互频频祝酒。

此时，毛泽东两杯下肚，脸上早已红到脖子根上了，所以他放下酒杯停了饮，主人们知其情，也就不再劝敬了。

酒宴在热情洋溢、亲切无间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接着，他反复强调“和为贵”，恳切表达了对和谈的冀望。他的话令人激奋。他又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同黄炎培话

职业教育，同张申府说五四运动往事等等。当然，席间宾主之间谈得最多的还是这个大主题：当今时局。一时觥动觞举，酒酣耳热，神采飞扬，言笑欢畅，不知日晷之方斜。

宴饮过半，上来一道甜菜，另外端来一大碗白开水。鲜英举起汤匙，凑到大碗边，笑对毛泽东：“请洗一洗。”毛泽东说道：“不必洗了，甜咸一样吃，这些菜就够好了，老百姓哪里吃得到。”他不洗，主人也只能不洗了，于是大家跟着都不洗了。

宴毕，大家散坐在客厅里饮茶谈话。忽然，边门那厢走出来一位年幼的姑娘。她手里拿了一本纪念册，神情羞怯，先是步履踌躇轻缓，似进欲退的样子，终于一鼓勇气，大步走到毛泽东身边，毕恭毕敬行了个九十度鞠躬礼，将纪念册递到毛泽东手里，脸涨得通红：“毛伯伯，请您在这上面题词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只觉得眼前突然一晃闪，瞧是位眉清目秀的小姑娘，忙接过纪念册，温和地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鲜继根。”姑娘低着头怯生生地轻声答道。紧接着又重复了一遍要求。

姓鲜，不问可知是鲜英的女儿了。毛泽东点头笑道：“好，好。”

鲜英正在招呼客人抽烟用茶，听到声音回过头去，见是女儿继根，忙走过来挥手叫去：“大人在这里说话，你来做什么！不懂规矩！还不快出去！”

“爸爸，我请毛伯伯题词呢！”继根说着，面对父亲指指毛泽东手里的纪念册，露出委屈、羞红的脸色。

毛泽东笑对鲜英：“你啊，真是严君。”说着，站起身来，拉了继根的手，走向书桌那儿去了。

两人走到书桌旁，毛泽东将纪念册翻开放在桌上，继根立刻端整文房三宝，磨好墨。毛泽东执管在手，蘸得黑浓，稍予思索，落笔一挥而就。

此时，鲜英早已跟了过来，他站在旁侧，捋着尺把长的银须，双目炯炯，心神贯注地看着，见署名毕，先是赞赏笔力雄浑刚劲、气势磅礴之书法，继则反复吟哦，体味含意深远的词义。

张澜等一时都围上来看，只见纪念册上赫然四个大字：“光明在望”。毛泽东笑对诸公道：“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的含有深意的话启迪着、鼓舞着大家的心。

“谢谢毛伯伯！谢谢毛伯伯！”继根粲然一笑，十分小心地双手捧着墨迹未干的纪念册飞也似地去了。

时间在飞驰，不觉已午后3时。周恩来过来催促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告辞各位道：“已经约定一些朋友等会在桂园见面，我们要暂别了。”

不能留客，于是张澜、鲜英等众人送客出来，直至大门口。毛泽东与诸君一一执手道别时，重复了刚才席上勉励大家的一句话：“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9月10日，张澜分函国共两党领袖蒋介石、毛泽东，对国共两党团结商谈问题提出建议。同日晚，周恩来、王若飞设宴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等，报告近10天来国共谈判情况。

由于国民党对和平谈判全无诚意，所以，自己提不出方案，然而它对中共所提11项建议，却又不是婉辞“距离甚远”，就是峻拒“根本无从讨论”，因此，9月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

炎培，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了意见。张澜和沈钧儒、黄炎培等恳切表示当尽力斡旋，以期化戾气为祥和。

谈话至此，周恩来忽双眉蹙然，沉重道：“这里我不得不向诸位报告一个不愉快的消息。”

“什么事？”张澜等同声问道。

“最近山西阎锡山集中 13 个师的兵力，估计约有 38000 余人，突然进攻上党地区。”周恩来话毕，身子朝椅背上靠去时，摇摇头，轻声叹息了一下。

“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容许他们这么干！”张澜怒道。

沈钧儒、黄炎培一旁也愤慨不已！

张澜沉思片刻，忽道：“我想改日请你们双方谈判代表到特园来谈谈，借此我倒要质问质问他们这件事！”

“这甚好，这甚好。”周恩来赞同道。

9 月 14 日下午，张澜亲自出面，并同张申府一起，请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张群、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到特园。

“今天，我请诸位来，首先是想知道一些有关和谈近况，能否烦请代表们下告一二？”张澜谦恳道。

于是，张群、周恩来将近况简要地叙说了一下。述毕。周恩来明白解释道：“我们已就原来方案（即 11 项建议）又作了让步。”

“我看中共方面很公道，很公道。”张澜神态严正地面对张群和邵力子道。

张群这位“华阳相国”（张群四川华阳人，国民党上层圈中如此称呼他）、蒋介石“怀刀”，老谋深算，坐在那里只是微笑、点头，不作声；国民党君子人物邵力子因无可辩，也只能君子则慎于言，亦不作声。

“我们是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周恩来谦和大度，一语封没百口。

“人家委屈求全一至于此！又有何说？甚望两位在蒋先生面前务必力谏之！”张澜很动感情。

张群、邵力子仍是微笑点头未出声。

忽然，张澜话题一转，直言直道，正色责问：“阎锡山为啥不给蒋先生留一点面子？重庆在谈，山西在打，这不贻笑于天下吗？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

张群对这位乡里前辈素所折服，一向敬重，见其疾言厉色，自己态度愈加恭顺，温让道：“表老，这件事是阎锡山的个人行动，我们事先都未有所闻。”他语调平缓，声气斯文尔雅，话却是假。

邵力子圆脸上还是挂着笑容，他推一推眼镜，质直说道：“我们确实不甚了了。”

张群有意说谎，邵力子怕是无意识地骗了人。

张澜见张群推脱、邵力子懵懂，心里甚恼，但不便也没有必要寒砭人，只得抱着曲全和平的祈愿，劝责道：“补牢未晚，切不可再！今后务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张群、邵力子只好仍旧拿微笑、点头作答。

（四）三访

9月15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在四路德安里与张群、邵力子就光复区省份的划分，双方军队驻地等问题继续进行谈判。毛泽东拨冗三访张澜到特园。

张澜、鲜英欣喜地将毛泽东再次迎引入张澜卧室，密谈长达3小时之久。

3人才坐定，张澜双眉一皱，迫不及待地问道：“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泽东见张澜那种忧国忧民的急切神情，不由更肃然起敬，答道：“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

张澜眉头开展了些。

“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

张澜点头而笑。

“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

张澜欣喜道：“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了，斗到今天了，蒋氏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们目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这年2月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告知中共关于召开党派会议的意见时，蒋横眉道：‘各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不容易啊！”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接着问道：“那么何时召开呢？”

“未定具体日期，但我们当力争早日召开。”

“那末联合政府呢？”

“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他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毛泽东抽了口烟，说道：“上述这些您也已有所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

张澜殊感欣慰，眉尖松开了，说道：“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

“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了。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

张澜点头表示同意。

“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让出了南方8个解放区。”毛泽东接着告诉了张澜这个内情。

“这是为什么？”张澜为之可惜。

“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宋太祖是困不着觉的。他们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作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作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

“目前的症结所在是：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毛泽东继续道。

“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

“是啊。”

张澜松开的眉尖又拧拢了。

“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43个师，国民党他们是263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

120个师，我们说很好，准备继续让步，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到24个师，甚至20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但我看蒋氏本意是要在‘统一军令’的借口下，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今天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张澜双眉更紧蹙了。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政令统一’的口味，被认为与‘政令统一’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政令统一’非取消解放区不可。”毛泽东猛抽几口烟，又长长地吁吐了出来。

张澜静听着毛泽东的详尽的叙述，目光深沉凝重。叙述甫毕，张澜推心置腹，郑重道：“润之先生，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国人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之于民之重要。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神态肃穆而激动！

鲜英夫人送来了点心。用毕，谈话又继续进行下去。

毛泽东说道：“表老，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他们正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运兵，名为接收，实则准备内战。”

“哦？”张澜惊怒道，“此事先前虽有所闻，尚未能全信，今日看来，确然无疑了！”

“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的武化团体（抗战时期，共产党被规定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政会，因共产党有军队，故毛主席作此戏语）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如若果真时局发展到这不可逆转之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广大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有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藉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他从毛泽东那睿智而深邃、敏锐而坚定的目光中体味出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来。他心里忽然默默念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沉默片刻后，张澜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表老，我今天主要就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8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是还会另有打算的。”毛泽东沉思片刻，忽一昂首，举起厚实的大手，竖出两个指头，亲切而又诚恳道：“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日前，我跟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

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也就成了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者，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张澜一口应诺。

毛泽东紧紧地握住了张澜的手。四目默然相向，豪情壮气在双方感应、交融，溢满斗室。

毛泽东缓缓松开张澜的手，拿起搁在烟缸边上仍燃着的大半截香烟，抽了几口，眉头一紧，目光深沉，密嘱道：“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张澜郑重地点了几下头。

张澜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与蒲殿俊、罗纶等人一起英勇地领导四川保路运动，自此名震蜀中。辛亥革命后，他历任川北宣慰使、嘉陵道道尹和四川省省长，为政清廉刚正。他除从事进步政治活动外，在川办学先后达数十年之久，曾担任过成都大学校长，“蜀中弟子半门生”，人人景仰之。因此，川人尊称他为“川北圣人”也由此，他在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享有崇高威望。西南军政界头面人物中，不论是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还是云南的龙云，无一不佩服他，无一不以夫子为木铎，无一不惟表老一言以定进退的。毛泽东对此很了解，所以今天向张澜伸出了这两个指头来。

后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民盟总部也随之东下，而张澜为完成毛泽东托付的重任，留在四川不走，他往来成都、重庆间，日夕为之奔劳不懈。

张澜将1938年冬办起来的一座民主堡垒：南充建华中学，发展成了中共的革命据点。这建华中学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开拓教育界的统一战线阵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约会张澜建议举办的一所富有革命朝气和民主气息的学校。当年张澜按照周恩来意见，派刚从延安归来的自己的学生、原成都大学团支部书记共产党员贾子群等筹建学校。毛泽东与张澜谈话后，周恩来即与张澜当面约定仍由张澜担任校长（张澜原是名誉校长，后来，也担任过校长）贾子群为副校长（贾子群原是校长）。接着，党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干部和进步教师到校，将学校办成为一个革命的据点。

张澜还帮助贾子群等组织川北民主联军。以后负责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就是党派入建华中学和川北粮食局（局长奚致和是川北民盟负责人之一）的共产党员干部。张澜并以保家乡为名，向邓锡侯要来120支枪，交永安乡民众自卫队（永安乡长和自卫队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游击队。

张澜又将毛泽东希望地方实力派与中共通力合作一节转达给潘文华，潘文华听后向他表示：“面对今后蒋共对峙局面，本集团坚持与川康刘（文辉）、邓（锡侯）团结外，定加强与共产党的联系，以抵制蒋介石的排斥与并吞。”并随即命令警卫营长秦绍成率一营部队驻省保护玉皇观秘密电台，以与张澜和各方面保持通讯联系。另外，潘文华又掩护我西阳地下党和游击队，使其得以保存和发展。后来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时，张澜派专人送信给潘文华，指示他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川。

张澜原先派张志和（中共老党员、民盟四川省主委、刘文辉保定军官学校同学、原刘辉24军师长）与刘文辉、邓锡侯联系，作为中共省一级领导张曙时、华岗、张友渔与刘文辉、邓锡侯之间的桥梁。自与毛泽东密谈后，也将毛主席拜托之事转达给了刘、邓两位并授意张志和加强这方面的联系。1949年初张澜在上海，邓锡侯因被蒋介石撤去四川省主席职，特来上海见张澜请

教今后如何行动。张澜劝说道：“丢掉省主席有啥，时局很快要变，你应回川，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军要紧！”邓锡侯很听话，立即返川。这年1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刘文辉，刘文辉因局势紧张，不便来上海面见张澜，特派参谋长杨家桢秘密赴沪拜谒张澜，请教大事。张澜将毛泽东与自己的密约又亲口告之。杨家桢如实转告刘文辉，刘文辉坚定了起义决心。5月上海解放后，张澜到了北京，时四川尚未解放，他很不放心，惟恐生变，又在白绸小条上写：“时机未至，不可轻动；时机已至，不能放过。”把这16字托杜重石带给杨家桢转与刘文辉。刘文辉接到此条，即与潘文华、邓锡侯密议，才汇合于川西起义，协助解放军全歼胡宗南几十万军队，彻底解放了大西南，当然这都是后话。

此刻，毛泽东密嘱毕，换上一支烟，吸着思考着，忽又提出一个建议来：“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是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关于此事，后来，在旧政协时期，张澜与周恩来当面作了正式秘密约定。

毛泽东站起身来，一边抽着烟，在小室里来回踱步。不一会，他回到座位旁，坐下继续说道：“表老，我们刚才谈的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

“是啊，是啊。这更为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毛泽东站起身向张澜伸出手去，张澜也立即站起，二人长时间紧紧地握手！

张澜忽然想起一件事，“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帐。”

毛泽东欣然道：“您看用什么方法方式为好？”

张澜想了一想，说道：“这样，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 and 推动。”

毛泽东笑道：“好，好，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谈不上，谈不上，我只为蒋氏此人从来不讲信义啊！”

紧握着的手徐徐松开了。毛泽东高兴道：“今日畅谈甚快！”于是笑向张澜、鲜英告辞。

不日，张澜致国共两党的公开信即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华西晚报》上发表了出来。公开信主要内容如下：“目前商谈之中心，不外政治与军事。政治必须彻底民主，此为国人一致之要求。惟国共双方存有若干特殊问题，不妨事先商讨。但所作之解决方案，必须不与国人之公意相违。如团结仅有空名，统一徒具形式，则于根绝内事一点，窃恐贡献无多，吾人虽不获事前参预，事后必须保留批评之自由。此应请公等留意者一……经过此世界大战，举世疮痍，人心思治。吾国对于国防，虽不可忽，但遭受外力侵略之危机，实已大大减轻，不作根本之计，而多养无用之兵，以今日调残之民力，实期期以为不可。如谓民主必待武力始能保障，则民主之为民主，岂不令人寒心？”

如谓统一必赖武力始能维持，则统一之为统一，岂不令人气短？此应请公等留意者二公开信一发表，问题摊开在全国人民面前。

国共谈判继续进行，谈判集中在解放区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两大焦点上，斗争十分激烈！

（五）送别

10月1日，在张澜主持下，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放后追认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

就在这天，张澜得悉蒋介石命杜聿明以武力解除了龙云在云南的权力。骤闻之下，不胜震惊。龙云是张澜秘密吸收入盟的盟员，对民盟和民主运动贡献殊多。张澜与他交谊笃厚，故十分担忧其安全。由此，张澜也就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安全，于是立刻派人去见周恩来，敦促毛泽东早日离渝。

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至第10天，即10月10日，国共双方《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正式签字，重庆谈判告一段落。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谈判，毛泽东定于翌日离渝飞返延安。

11日上午，毛泽东乘车来到九龙坡机场。天高气爽，金风送凉，万里长空一碧，由于他到达得较早，一大群中外记者将他团团围住。其中几个国民党记者居心叵测，出了一揽子难题。毛泽东神态自若，恢宏大度，时而严正，时而诙谐，挥洒随意，应付裕如。他们未能得逞，最后只得灰溜溜地站过一旁，或钻进入丛堆里去了。而大群中外记者仍争相提问，围着不肯散。

此时，毛泽东偶尔一抬头，忽望见张澜和鲜英正从那边快步赶了过来，于是立刻排开人群，含笑趋前与张澜握手：“有劳相送，甚不敢当！”“应该的，应该的！”张澜眉开愁云：“您总算平安归去了！”

“多谢关心！”毛泽东报以感激的眼神。

张澜欣然而又依依道：“二天（四川方言，意即日后）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哟！”

毛泽东连声笑答：“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延安，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您！”

张澜点头粲然而笑。

毛泽东紧紧地握着张澜的手，好久才松开。

接着又含笑与鲜英握别：“再见了！我们的孟尝君。”

一句话引来大家一阵笑声。

毛泽东又与前来送行的各界知名人士和政府诸要员一一握别。

毛泽东返身步上舷梯，王若飞跟随在后，张治中因陪同飞返延安，也随即登机。

为和平与民主共同奋斗 ——毛泽东与冯玉祥

郑继栋

冯将军身为国民党元老，官居上将，又系蒋介石之盟兄，彼此共事多年，可谓心照不宣。但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把中国变成他蒋氏个人之天下，所以冯将军与蒋介石的关系便成了貌合神离，从思想上、感情上日渐分裂。冯将军以国家民族为重，从抗战大局出发，逐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理解、同情直到支持。因此，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也逐渐地倾向了中国共产党，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是有其一定历史根源的。早在40余年前，周恩来即称颂冯将军：“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而成抗战的中流砥柱。”邓小平同志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100周年时指出：“冯玉祥将军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对冯将军的历史评价。

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将军广泛地接触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大计，团结一致抗日。特别在重庆时，他经常派赵力钧同志请周恩来来到他的住处，聆听革命道理和探讨团结抗日的主张。所以周恩来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也促使他坚持进步的信心。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冯将军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周茂藩、赵力钧等同志，送去参加新四军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些同志从延安回来后，为党做了一些革命工作。更为突出的是：冯将军曾受周恩来的委托，担当了政治风险，排除了千难万阻，营救了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主席，还营救了不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在他革命历史篇章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1年11月14日，冯将军60寿辰时，重庆《新华日报》刊登各方来的贺电、贺词和寿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延安也发来贺电。周恩来同志著文并亲笔题：“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总结了冯将军前半生的历史功绩，并指出了今后的努力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无不希望成立一个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共同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这一主张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断然拒绝，致使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毛主席在延安曾先后为《新华日报》社写了两篇社论，揭露了国民党欺骗国人，排斥异己，准备发动内战的阴谋。由于中共采取了决不被国民党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革命立场，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一副和平的姿态，三次电邀毛主席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当时，党中央已预料到蒋介石演的是一场和平假戏，但鉴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在浴血抗战8年中所蒙受的严重灾难，元气大伤，百业待兴。为了迅速医治在抗战中带来的创伤，为了争取祖国的统一和人民的幸福，还是决定由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三位同志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主席乘坐专机由延安飞抵重庆。冯将军因事不能去机场迎接，特派夫人李德全代表他去欢迎毛主席。重庆爱国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在中苏文化协会特为毛主席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

孙夫人宋庆龄、著名学者郭沫若以及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等。会场上气氛活跃，热情洋溢。毛主席频频挥手向与会者致意。

冯将军首先在会上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正是实现了孙总理所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同时又显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接着他又说：“我们在这激动人心、欢欣鼓舞的时刻，一定要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严防有人要从中破坏！”他的话引起了到会人员的极大共鸣，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欢迎会后，冯将军决定为毛主席洗尘，准备邀请来家便宴。当即吩咐上清寺康庄冯委员办事处的人员，写好请帖派人送往桂园毛主席住所。并命冯将军乡间住所歇台子抗倭楼的厨师老张到办事处来亲自做菜。又对副官说：“明天有五六个人吃饭，叫老张搞好一点，丰盛一些，多弄几个湖南口味的菜。”

次日，天气晴朗，惠风和畅，冯将军和夫人一早就到了康庄办事处。下车后，冯将军先到厨房了解、询问宴会准备的情况。当他发现宴席上没备烟酒，感到有些歉然。当即派人买来了名贵烟酒，以示敬意。冯将军向来有一个老规矩：不管宴会大小，招待的客人是谁，是从来不备烟酒的。这一次破格招待毛主席，的确是他平生第一次。不多时，将军又像考虑到什么问题似的，马上叫来手枪营营长葛效先，并立即下达紧急指示：“我今天下午请客，你们站岗放哨要特别加强守卫，严密警戒，不得有半点疏忽！”营长连连答应：是是。因为上清寺康庄的毗邻就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巢穴，冯将军为毛主席的安全，可谓用心良苦。

那天整个康庄办事处都沸腾起来了。当大家得知冯将军下午请的客人是毛主席时，莫不怀着一种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期待着贵宾的光临！

下午4时，一辆黑色小轿车，后随一辆军用吉普车开近了康庄。吉普车上坐满了国民党宪兵。这些宪兵名义上是担任警卫的，实际上也可能是监视的。冯将军和夫人知道客人来了，几步就跨下了台阶，满面笑容地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应邀前来作陪的张治中先生等客人。

毛主席身穿哗叽中山装，黑皮鞋。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走出了汽车。冯将军和夫人上前与毛主席等客人一一握手，并互相问好。随后主人恭恭敬敬地陪同客人迈上了台阶，进入客厅。宾主分别就座后，就亲切地交谈起来。毛主席首先转达了朱总司令对冯将军的问候。冯将军接着说：“毛先生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富强，不顾个人的辛劳与安危，飞抵重庆，奔走和平，实为玉祥所敬佩！”接着毛主席又详细解释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毛主席说：“宣言中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冯将军对毛主席的一席话，非常赞赏。并连声称道：“很好，很对。这就要看蒋介石的态度了。如果他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从人民利益出发，就该回心转意采纳施行，那就是全国人民之大幸啊！”

不久饭菜准备停当，冯将军首先把毛主席、周副主席让到首位，毛主席迟疑地没有就座，冯将军又大声他说：“你们二位远道而来，首位当然要你们来坐。”因为周副主席是冯将军的熟客，也就不再推辞了。

宾主分别就座后，冯将军亲自执酒并为客人们斟满了酒杯，接着说：“毛先生为祖国和平远道而来，这第一杯先敬毛先生！”毛主席谦虚地笑着，挡

住了冯将军的敬酒，然后说：“还是让我们大家同饮吧！”冯将军和夫人向毛主席、周副主席、张治中先生等客人碰杯，大家共同一饮而尽。频繁的碰杯，亲切的交谈，使宴席上热烈的气氛更加活跃。毛主席又介绍了延安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深受主人的赞扬。毛主席又说：“焕章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所闻名。尤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你为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还望焕章先生为实现祖国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不负国人所望。”当时冯将军受到了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并说：“我愿为中国实现和平与民主奋斗到底！”周副主席也接着说：“焕章先生始终献身于祖国的正义事业，为人所不敢为，说人所不敢说，这就是先生伟大成功之处。”大家边吃边谈，从中国过去谈到现在，又从现在谈到将来，席间情绪，欢快异常。

谈到冯将军平时请客，负责席间招待工作的都是办事处的勤务人员。而今天情形却不同，主动为客人端饭送菜，拿烟递酒的，都是冯将军身边的高级参谋和副官，都是冯将军的贴心人，如周茂藩（又名李养初）、赵力钧和我本人。这种异乎寻常的，精心的安排，不外乎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尊敬和热爱，更重要的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宴会时，还有一个小插曲，至今回味起来仍感兴趣盎然。有些工作人员因不能到席间去而感到遗憾。他们都争先恐后地从门缝中以先睹毛主席的丰采为荣。其中最瞩目的，是冯将军的秘书王倬如同志（解放后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大家对毛主席的爱戴，由此可见。

毛主席饭吃得最快，首先吃完。我为毛主席拿来了毛巾擦手，他握住了我的手问我多大岁了？我恭敬地回答，21岁了！毛主席的态度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当时使我深受感动，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

饭后，稍事休息，因为毛主席还有会议，准备回去，这才结束了这次令人难忘的宴会。

冯将军和夫人送别了毛主席等客人以后，夫人李德全兴奋地对我说：“继栋，你看毛先生的精神多么好，举止言谈多么谦虚可敬；特别是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透出了坚定，刚毅、自信，对前途充满了乐观主义的信心，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在黑暗笼罩着独裁统治下的重庆，冯将军为毛主席设宴会晤，成为当时重庆的头条重要新闻。虽然国民党右派及特务们对冯将军大肆攻击造谣和诽谤，反而使冯将军更加坚定了信念和立场。在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美帝援蒋，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中，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奔走呼吁，直至他生命最后的一息！

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努力 ——毛泽东与李济深

岚叟 李丁

暮春时节，巍峨的太行山泛出点点春绿。蜿蜒曲折的胭脂河欢快地奔腾着向东流去。

距河北省阜平县城南 30 里处，层层叠叠的山峦中，座落着城南庄。这是晋察冀边区政府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1948 年 4 月 11 日，黄昏时分，一队快马疾驰而来，向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央机关即刻就到。

城南庄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前来迎接的聂荣臻等同志见面了。久别重逢，一片欢快气氛。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从城南庄向全国发出第一个文告《五一劳动节口号》。

多达 23 条的《五一劳动节口号》把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以及自己的政治主张公告天下。它犹如 4 月的春雷，激荡在国内外。

5 月 5 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和民盟中央、民进中央、致公党、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和在港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痛斥蒋介石“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认为“五一号召”“适合于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通电海内外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呼吁公开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

5 月 1 日，城南庄的夜晚万籁俱寂。村东的一个院落里，灯火悠悠。

毛泽东伏案疾书。他正以个人名义，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信中写道：“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初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各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为宜，统祈赐示。”

7 月底，毛泽东收到了李济深等人的回信，对他 5 月 1 日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表示赞同。

毛泽东于 8 月 1 日给李济深等回电：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鄙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力，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齐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毛泽东在电报中也就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者、参加者的范围，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征求他们的意见。

不久，周恩来亲自拟定了一份名单，决定邀请李济深等 77 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来参加筹备新政协。

1949 年 1 月，李济深等一行 30 人，从香港乘轮船赴大连，尔后到达沈阳，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

2 月 1 日，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李济深等 56 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提出对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说：“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亲如家人 ——毛泽东与陈叔通

冯和法

跟随共产党

陈叔通先生（1876——1966）在古稀之年跟随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大家尊称他为“叔者”。他生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主任委员。他本是清朝的最后一科的进士，并点了翰林，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岁月，经历了一条曲折道路。他拒绝了各个时期反动派对他“高官厚禄”的邀请，先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国兴业银行任职，过着平淡的生活。但也一贯的爱国爱民之心越老越炽，特别是“九一八”事件后，他忧心如焚，初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可挽狂澜于既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参加聚餐会、座谈会，同中共党员张执一、李正文等同志接触，受到他们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周恩来同志到沪后，在工商界聚餐会上讲话，和叔老交谈，使叔老进一步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从此，他精神振奋，积极投身于解放事业，有事就向地下党同志如许涤新等人联系。到了北京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周总理、李维汉部长、许涤新同志等不论是工作关系或私人交谊，越来越密切。他自称“秉性耿直，有言就说”，愿意成为党的净友。中央领导同志尊老敬贤，把他看作长者，非常重视他的经验和意见，充分体现了鱼水关系和净友之情。

高歌言志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上海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叔老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解放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已引起敌人的监视。党为了叔老的安全，更主要的是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会议，地下党同志通知他，请他立即赴香港，转在解放区。叔老后来对人说，他当时毫不思索，当即欣然同意，连家里的人都没有商量。他的亲友好意地劝他，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他已逾古稀之年，长期在沪，未出远门，现在长途跋涉，是否适合，请他三思。他毅然地回答：“救中国的只有共产党，我坚定不移地跟共产党走，没有什么个人安危可以考虑的。”他在离开上海往解放区的时候，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言志的诗：“迟暮长征两鬓皤，未除元恶肯投戈，书疆玉气成狐鼠，夹道军声乱鸭鹅。姑息终贻他日患，纵谈遥忆故人多。正如夜尽方迎曙，回首中原发浩歌。”不久，在开国大典的欢庆时刻，叔老更是出自衷心的喜悦。高歌言志：“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亲如家人

叔老到了解放区，在石家庄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叔老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是那样平易近人，热情待人，和一般干部没有不同。见到他，就如家人一样，尊称他为叔老，问暖嘘寒，对他长途跋涉非常关怀，而且在谈话中大家都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主席对他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叔老激动他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中央领导同志对许多重要的大事，都亲切地向他征求意见。叔老深深感到，中央领导同志每次都是真心实意地同他商量，但他也曾谦虚过。毛主席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叔老对此感动万分，当即表示说：“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去做。”后来，他曾把这种心情向李维汉同志表达，李部长真诚地对他说：“叔老，我们是一家人嘛！”

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请叔老参加讨论各项重大问题。叔老说：“自己秉性耿直，欲言即言。”他对重要问题，经常在思考，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就直率地向毛主席、周总理陈述。例如，在讨论新政协是否提早在石家庄召开时，他主张待北平解放，确定首都后，在北京召开为好。又如新中国是否要另立年号时，他主张用公历，如此等等，都是和党中央的决策相符的。也有些别的问题，如墓葬，有人主张平地浅葬，他则同意改用火葬。叔老明智远见，深得党中央同志的赞赏。

党的诤友

毛主席除了会议时征求叔老意见外，还不时请叔老到自己家里叙谈。叔老对人说过，他看到过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到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他和蔼可亲，在他面前感到同家里人谈话一样。毛主席同他握手，使他感到一股热流通上心头。他每次约定时间去拜访毛主席时，毛主席多次在门口等候；他出门时，毛主席总是亲自为他打开车门，照顾上车，然后关上车门，待车走远了，他还看到毛主席在招手。毛主席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多次是赞扬的。也有几次，毛主席听了叔老的话、沉吟不语，叔老就想自己是否说错了，但他知道毛主席喜欢他直言无讳。所以，他心里有话总是向毛主席申述。他知道毛主席不但不会见怪，还可得到他的教益。例如，在大跃进时期，叔老看到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就曾向毛主席反映，并说，“是稳步前进好呢，还是急躁冒进好？”又如，他对毛主席说，现在革命已经成功，在党的领导下，“矫枉必须过正”是否可以考虑？在1957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这个问题。李维汉部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当时说的话：“‘矫在必须过正’是否永远都是金科玉律，值得怀疑，希望领导上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的损失大？”在反右扩大化时，叔老又说：“不能因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在讨论第一个宪法时，叔老说：“我们应以法治国，宪法以外还应有各种单行法规，”在三牢困难时期，叔老忧心忡忡，就向毛主席倾吐自己的心情。毛主席耐心地分析形势，指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叔老听后，回家写了一个条幅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一时传颂

甚广。

推心置腹

叔老不仅同毛主席商讨国家大事，而且还经常谈诗论画。叔老赞美毛主席的诗词书法部表现了伟大的气魄，非常钦仰。他也和毛主席观摩一些文物，作为茶余饭后的闲谈。毛主席喜欢砚台，叔老有一方端砚，很想送给毛主席。他先请毛主席鉴定，认定是一方较好端砚。叔老认为毛主席同他谈的话，对我们工商联工作有帮助的，就向我们传达。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大会，我正在起草一个大会文件，有些问题无法解决，请我会秘书长向叔老请示。过了一天，叔老很高兴地对我说：“毛主席有新的教导，即可见报，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长时期来，工商界尊重的有二位老人，一位就是叔老，另一位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任之）主委。毛主席有时给他们两位共同的信，信封上如果写“陈叔老、黄任老”，那在信中开头就写“任之、叔通”，反之，也是如此。叔老对此很感动，认为毛主席日理万机，对于称呼的前后排列这样小事，还是考虑得这样周到。

肝胆照人情谊深 ——毛泽东与黄炎培

丁毅

黄炎培，1878年生于上海川沙县的一位穷秀才家。本世纪初年曾在上海南洋公学学习，返乡后兴办学校，因从事反清活动而被捕判处死刑，以后逃出并亡命日本。从日本归来后继续在家乡兴办教育，同时投身辛亥革命，继赴德留学的蔡元培先生担任同盟会上海地区负责人。民国之后，黄赴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诸国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他的职业教育的主张，在陈嘉庚等海外华侨的支持下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其间，黄炎培两次拒绝北洋政府发布的由他担任教育总长的任命和一些私下的许诺，拒不做官，在兴办各类职业学校的同时还参与成立暨南大学等，为此他又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通缉。抗战爆发后，黄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由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和社会贤达组成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负责抗战募捐。黄炎培与共产党人开始了广泛的接触。周恩来抗战期间在重庆首次向公众讲演“亮相”，是应黄炎培之邀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的“星期讲座”上。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民主力量日益壮大。1940年，由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教育派”、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救国会派”、以张君勱为代表的国社党、以章伯钧为代表的第三党、以左舜生、李璜为代表的青年党，联合组织起由上述的三党三派的包括张澜、罗隆基等无党派人士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日的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黄炎培等又组织起中国民主建国会，黄任主任委员。1950年，几十年中拒不做官、届时已73岁的黄炎培在周恩来赴家恳谈下终于“出山”，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成为当时中国政务院的四个副总理之一。1955年转任人大副委员长。1965年黄炎培逝世。黄炎培一生著述颇多，并发表多部诗集。为表彰他在教育上的贡献，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45年中国的抗战胜利在即，国民参政会在讨论“五五”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公布于1936年5月5日而得此名。当时会内会外，一阵阵冷风吹起，有人在那里搞动作，想甩开共产党，召开单方面的国民大会。对正在召开的本届参政会，共产党方面表示不参加。在这样的形势下，黄炎培极为忧虑，他在参政会中表示：“这份宪草有值得极度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气氛中产生。”国民党元老褚辅成等继而发言，赞同黄的意见。之后，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7人致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又求见蒋介石，力促恢复国共谈判。三周后得到延安肯定答复并邀七公去延安。于是，黄炎培接受了邀请，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全国团结的气氛，促进两党谈判而赴延安。临行黄炎培发表谈话：“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若问我们的使命，只是良心的使命。若问我们的身份，倒是一分子主人翁的身份。”

（一）“杖策延安如昨梦”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党中央、毛泽东主席之邀，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

延安访问。飞机于上午 9 时 35 分起飞，下午 1 时 30 分平安到达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祖涵、吴玉章、邓颖超、秦邦宪、张闻天、刘伯承、陆定一、林彪、徐特立、李富春、杨尚昆、谢觉哉等 30 来人，一一握手致意。当毛主席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 20 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主席笑着说：1920 年 5 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 100 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之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盛赞毛主席好记性。黄炎培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他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

毛主席和黄炎培就是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交往的。

到了延安，黄炎培觉得样样都很新鲜。晚上他在雪一样白的窗月下，在床上朦胧中吟成七律一首：

延安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日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鄜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这是一首感时纪事的诗，诗人借宋范仲淹的故事，抒发了初到延安的感受。

第二天下午，他们一行 6 人，应约到杨家岭访问毛泽东主席。

杨家岭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离延水稍远，风景很好。在高高矮矮的山坡上一排排窑洞，就是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住所。当中有一所规模较宏伟的大会堂，靠山面阳。他们从大会堂的右边走上山坡，绕到后面，便是毛主席接待客人的会客室，似乎就是大会堂的后身上层。会客室正方形，光线充足，中间是一张长桌，四周各式椅子约可容 20 人。四壁挂着几幅画。而当中有一幅画是沈钧儒次子沈叔羊画的，画着一把酒壶，上写“茅台”二字，壶边几只杯子。画上有黄炎培题的一首七绝：

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黄炎培说，这画是 1943 年当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叔羊为他父亲“画以娱之”。在请黄题词时，黄忽然想起传说长征中共产党人在茅台酒池里洗脚。针对这个谣传，题出了这首七绝以讽喻。料不到，这幅画竟挂在中共领袖的客厅里！当黄炎培在此时此地看到这幅画时，一股知遇之心的暖流流遍了他周身，使他完全敞开了心扉，在三天中和毛主席促膝长谈达 10 几个小时，造成了他自认为一生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

他在延安的 5 天当中，会晤了许多老朋友，历史学家范文澜还对他执弟子礼。当然，他们一行访问延安，主要是为国共团结谈判问题。但在黄炎培，却是一次对他的晚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留学”。而毛泽东同志和他作为两位政治家和诗人推心置腹的促膝长谈，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7 月 4 日下午。毛主席在百忙中专诚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作客，

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谈了整顿三风的运动，说从多年的革命实践中，觉悟到过去的种种错误，就错在中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毒害；他们还探讨了教育学说上的看法。毛主席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他说：“我生 60 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主席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主席的话，至今仍是不易的至理名言。

当时，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 5 天访问，对黄炎培来说，真是满载而归。7 月 5 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机场送行，大家依依握别，12 时 50 分飞离延安返回重庆。在延安短短的 95 个小时的访问，大大澄清了黄炎培的许多模糊思想，打开了眼界，使他从朦胧中看到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一个新的起跑点上前进了。他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很短时间中，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就在那个年代，国民党造了多少谣言，天天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把边区描绘成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用来欺骗老百姓。而黄炎培这样一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却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那么自由、温暖和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鼎鼎大名的将领又多那么温文尔雅。这要多大的勇气！是多么难能可贵！而他的讲话和文章，在大后方造成多么大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了。

《延安归来》一书，初版两万册，几天内就被抢购一光，成为大后方轰动一时的畅销书。而且，这是第一本拒绝把原稿送交国民党审查机关审查而自行出版，从而点燃一个轰轰烈烈的“拒检运动”，迫使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宣布撤销对新闻和图书杂志的检查制度。

黄炎培从和毛主席、中共中央领导人建立的深情厚谊中获得了力量。

（二）“天安国庆逢佳节”

黄炎培是 1949 年 2 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

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于当年3月25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三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同志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和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黄炎培既不是资本家，也从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位一生清贫的教育家。但他毕生从事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主席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主席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勉励，信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路，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年10月1日，黄炎培随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主席。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以周恩来总理动员他任职的经过。这一方面说明他坚定地

遵从党的安排，同时，也说明他对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亨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

黄炎培是一位富有强烈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当他一旦寻找到了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自觉地接受毛主席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历史使命，尽忠职守，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他是以自己的进步，去推动一个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进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党的帮助之下，经过自我搏斗，在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经常向党向毛主席和盘托出。他的正确意见，是对党的诚挚净言；不正确的观点，也能及时地得到党和毛主席的帮助，经过认真的自我剖析，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

如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动触动到了他们，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这些信件。毛主席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毛主席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主席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同志，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12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1月4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主席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主席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切和帮助，黄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经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儿？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他也坦率而恳切他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最后，他还就考察所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党提出诤诤净言，

是十分可贵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纠正了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2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黄炎培敏感地意识到这将对民族工商业者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他立刻和民建会的领导人一起认真学习并组织动员工商界中的民建会员，带头参加运动，清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这个运动对工商界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耽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主席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在当天（3月15日）的日记上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黄炎培很信服接受，并不折不扣地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作了传达。并在当年7月，召开了民建会总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加以贯彻执行。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新的章程，调整了领导机构，黄炎培被选为民建总会的主任委员。

建国以来，黄炎培和民建会同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并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开展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当年的九月初，民建会北京市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将出席讲话，他先认真地亲自写出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主席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1）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2）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主席对于所以作这样的修改，还在信中诚恳他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主席对黄炎培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从现在来看，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黄炎培反复读了毛主席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白呈现在眼前了。

（三）“《东方红》已遍环瀛”

毛主席的信和修改稿，黄炎培读了极其感佩振奋，一方面他反复阅读和思索，使他感到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曙光之中。当晚他就给毛主席写信说：“讲稿承亲赐斧削，对资产阶级一面照顾到多数不能接受，而一方面拿来鼓励少数前进分子，这样才符合新民主主义精神，不仅改正了讲稿，同时改正了我的思想，敬谨接受之下，不尽地感谢！”

当年9月10日，黄炎培根据毛主席修改过的讲稿和指示精神，在民建会北京市分会在中山公园举行的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和传达，立刻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引起了普遍的良好反响。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好好干还是有出路的，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就这样，毛主席的指示和黄炎培的报告，给“三反”“五反”以后的工商界带来了信心和新的生机，也给民族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

此后，黄炎培在党中央领导人指导之下积极宣传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还领导民建会的同志作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写信告诉毛主席。1953年10月29日，毛主席邀集黄炎培和民建、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毛主席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黄炎培意识到这是党和人民交付给他的神圣的历史使命。使命是非常光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例哪，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黄炎培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为了解除民族工商业者的疑

虑，他在对上海工商界的一次讲话中，借用“无痛分娩法”这个术语，比喻工商业者进入社会主义的过程没有什么痛苦。这个比喻当然是不尽恰当的。当他把这份讲稿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立刻回信说：“‘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黄炎培立刻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改正。

黄炎培为了能以模范的行为来带动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向党向毛主席随时请示汇报。建国后的10几年中，他除了随时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当面求教而外，和毛主席书信往来达60多件，本文中摘录的，只是编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刻苦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做到了与日俱进。如他在1953年盛夏在北戴河休假期间，虽已76岁高龄，竟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认真精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他对这部1000多页的巨著，边读、边作笔记、边思考，一共摘录了369条。还参阅了《马克思传》，最后写出了几万字的读《资本论》心得，印成了一本50多页的小册子，作为他的学习报告。1954年12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说：民建会一定要负责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三种任务：（1）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结合企业的改造，进行个人改造；（2）密切联系民族资产阶级，了解、研究、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推动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3）协助政府宣传、推行国家的政策法规，并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毛主席曾多次写信给黄炎培，对他反映的情况表示感谢；对他的建议予以肯定，对他努力学习力求进步给予热情的鼓励，对他积极主动的工作，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把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向高潮。其时，黄炎培正因病住院动手术，但他念念不忘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事。当他读到了党中央的上述决议时兴奋地立刻在病榻上写信给毛主席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完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地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毛主席立刻回信嘉勉他说：“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

黄炎培心领神会，他立刻在民建会中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推动民族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教育。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改造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继农业合作化高潮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出现了高潮，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黄炎培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大会。继北京之后，在当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胜利完成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和世界社会

主义运动历史上最辉煌的胜利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路线的光辉胜利！

9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被邀请列席大会，并应邀在主席台上就坐，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兴奋。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毛主席还在大会上提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听了情不自禁地即席作七绝四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来祝贺党的“八大”。其第四首曰：

天安国庆逢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

拄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党的“八大”，对黄炎培是又一次最好的生动教育。随后，民主建国会举行了一届二中全会，黄炎培在会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会后，黄炎培给毛主席写了信，报告了民建的近况。毛主席立刻回信表彰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信末，毛主席又附笔：“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主席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淘沙·北戴河》，另一首是《水调歌头·游泳》。现在，敬录毛主席《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结句，作为本文的结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努力 ——毛泽东与台盟人士

徐萌山

我于1952年8月任台盟总部秘书长直到1957年底转为台盟中央评议委员，特别是1958—1978年间，我曾代表台盟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多次见到毛主席。

1958年5月5日，毛主席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我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个会。休息时毛主席示意叫我过去，他同我握手后说：“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我说：“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当时在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叫徐萌山，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毛主席笑了说：“呵，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当时毛主席的幽默语使我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主席说：“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我当时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好的，谢谢”。1959年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特地让新华社记者专门为毛主席与我合影，后来新华社对外发表了毛主席接见台盟负责人徐萌山的照片稿，我从心里感到温暖，这不仅是对我而是体现了对台湾同胞的关怀。1958年8月23日，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支援中东人民抗击美帝侵略，毛主席亲自指挥了“八二三”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接着毛主席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我也被邀参加了会议。主席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台湾是套在美帝脖子上的绞索。”即后来成为著名的“绞索政策”。毛主席又亲自起草，以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同胞书》，提出了“和为贵”的号召，并规定了单日打，双日不打的巧妙计策，使得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能得逞。在这个会上，我亲身体会到毛主席对各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坦诚相待，推心置腹和民主精神，如在会上张奚若教授提出周总理的对美声明稿中“立即”二字能否改得缓和些，当时毛主席说：“可以研究。”然后问“立即”的英文怎样讲。总理说：“quickly.”毛主席接着用英文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可以改。”因此在“声明”上做了修改。

毛主席还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高瞻远瞩的方针政策，并亲自具体地部署工作，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了极大的努力。

重庆谈判的重大成果 ——毛泽东广泛接触各界人士

石西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正式举行了投降的签字仪式，中国军民经历8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

国民党反动派首先是想垄断全部对日本的受降，居然下令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准接受日军投降；相反却要那些为虎作伥，罪恶累累的汉奸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与此同时，为了抢夺人民胜利的果实，大批国民党部队，杀气腾腾地开始入侵解放区。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磨刀霍霍，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样一个严重关头，于1945年8月28日应邀由延安飞往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共商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43天谈判，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页。

8月28日一早，我分外忙碌。外地有几个民间报纸的特派记者，他们要采访毛泽东主席来渝的消息，等着我去帮助安排，我与重庆市的各报进步记者也要进行有关宣传业务上的联系。我安排好了这些事，就坐上一辆吉普车去迎接刚从苏联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一同去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28日那天的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中午1时许，机场上已开始聚集了许多欢迎的人群，大家的脸上都显得有些喜气洋洋，民主老人沈钧儒先生更显得活泼开朗，像个青年小伙子一样。下午3时许飞机降落，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人物、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各界知名人士、中外新闻记者等一下子拥向机旁，毛泽东同志手拿着考克帽步出机舱，向欢迎者频频招手，接着是下机后的握手寒暄摄影，整个机场出现了激动人心的场面。28日早晨，《新华日报》就刊登了预告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消息，当天下午5时又印发了毛泽东主席到渝的号外，这使得整个山城沸腾了起来。“毛泽东来了！”成为街头群众议论的中心。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是抗日战争已经过去，新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的重大转折时期。在这个重要历史关头，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讲话，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号召全党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警告党内同志不要像陈独秀那样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我们党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清醒的强调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能够驾驭一切变化复杂的形势，演出一幕幕雄壮的革命历史剧来。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的前三天，8月25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国内斗争的策略，发出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为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采取的六项紧急措施。毛泽东同志来渝商谈团结建国大计，就是为了制止内战，促使国民党政府接受这个和平

建国的方针，促进紧急措施的实现。毛泽东同志到达重庆的本身，就使国民党反动派连日制造的许多挑动内战制造分裂等等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谰言，如同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化为乌有了。

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日子里，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广泛地传达到人民的心坎里。全国人民听到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会上所作的“和为贵”的激动人心的讲话，而且通过国共谈判，更加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和平反对内战，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让步行动，如撤出8个解放区、在整编军队上也只要求占国民党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等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毛泽东主席以自己冒险犯难亲历重庆的所作所为，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真诚主张国内和平的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后来挑起内战，很快丧尽人心，这个民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就是在重庆谈判中开始建立起来的。这是毛主席去重庆所获得的最大政治成果。

为和平与为民主是必然相联系的。正如反内战与反独裁是必然联系一样。毛泽东主席前往重庆谈判，最后产生一个《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个《纪要》的出现和《纪要》本身都说明：这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一次重大胜利。通过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只有承认了，党派平等合法，也写在协定之上。中共中央所提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成为共同的方针终于被肯定下来，有关政治民主的如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等问题，在国共两党会谈纪要中都有所肯定。这就是后来政治协商会议得以召开的基础。

至于谈到团结，毛主席在重庆逗留的43天，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广泛地接触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当政的国民党几乎所有的党政军负责人，到各民主党派主要代表人物，以及新闻界、实业界、戏剧界、科学文化界、教育界的代表人物，不是亲自登门拜访，就是予以亲切热情接待或约谈，此外与驻重庆的外国使节、国际救济团体、各国新闻记者也都有多次接触。当时上清寺的桂园和特园就是这许多交往的重要活动场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后的第三天就在特园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先生等见面叙谈，随后这里也成为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的场所。这相比邻的两座房子里，曾经聚集过许多风流人物，议论过关系国家命运的种种大事，是很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接触的人是非常广泛的。通过这样广泛的直接接触，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十分显著起来，而且也使毛泽东同志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人民领袖根据亲身的体会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结论，看清楚民心的向背，这无疑对此后的政治与军事两条战线斗争的进行和战略策略的制定起着巨大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也标志着毛泽东同志重庆之行的重大成果。

使我长期感到受益的是毛泽东同志那种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他在言谈中所表现出的高水平的政治斗争给人以深刻的教育。比如毛泽东同志亲自登门拜访过陈立夫这样的顽固分子，这在当时就引起某些进步人士的惊异。他们奇怪为什么毛泽东先生要去访问CC头目陈立夫这号反共头子。其实毛泽东同志想的恰恰相反，越反动的头子他越要去拜访，越要去做工作。毛泽东同志这样做，自然主要不在于以一次谈话来改变那些花岗岩头脑的反共分子的

观点，而表示着中国共产党对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共同协议基础上团结的诚意，以及对争取广大中间分子，分化顽固右倾分子将起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毛泽东同志来到重庆，自然使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安全担心，对国民党愿意实现和平民主缺乏信心，因此也很为国共谈判的前途担忧。也还有许多中间分子不相信国共能谈判解决问题。因此社会上对国共谈判充满担心与怀疑，这也是很自然的。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高的政治家风格，即以他的鲜明坚定的态度和语言来回答这方面的疑虑和问题，表示和平谈判一定成功，或则说和平的希望很大，国共这次谈判一定可以解决等等。当路透社记者问：“假如谈判破裂时……？”毛泽东同志回答是：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段非常生动的对话。这是沈钧儒先生与毛主席的谈话。沈老是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倒行逆施，生怕中国共产党上当受骗，一再忧心忡忡地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当心骗局，流露出对毛泽东同志安全的关切和对和谈缺乏信心。可是毛泽东同志却非常耐心地用乐观的口气风趣地向他说，这次国共会谈是一定要成功的。比如我们办一件事，开始没有把握是自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有一半章程（即指一半成功的希望），那不是非常有希望了吗？国共谈判犹如两人谈恋爱，先不说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是一心一意的，这不是开头就有一半成功的希望了吗？等等。以上我回忆的当然不是原话，只是谈话的大意。从这些细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水平。

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的这种种行动，不仅是号召中国共产党而且是要激励各党派以及所有有识之士来向国民党反动势力争取和平民主，是鼓舞大家努力去促使实现，去斗争。如果一个领导者对所奉行的使命表示犹豫，这怎么行呢？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讲的有些话，侧重点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有若干不同，这就是最值得学习的斗争艺术。而且以毛泽东同志的身份在重庆谈判时一再说和平谈判一定成功，只能使中国共产党为挽救国家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和民主的诚意，大大显示于天下。

我记得 1946 年 1 月 12 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同志向会议作了有关国共会谈经过的报告。可是周恩来同志介绍了 9 年来国共谈判的历史经过之后说：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周恩来同志接着详细说明了四点经验教训，尽管周恩来同志谈到的那些具体事例与做法，作为历史已经是过去的事，可是，他所讲的四点经验教训：即第一点要相互承认，不要相互敌视；第二点要相互商量，不要独断；第三要相互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相互竞赛，不要相互抵消。这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周恩来同志深情地说，以上四点是从 9 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却是一种由衷之言。周恩来同志所概括的这一段话，与毛泽东同志有理、有利、有节地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完整地表明这确实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统一战线政策的精华所在，也是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经过自身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跟着共产党过“三关” ——毛泽东接见农工民主党干部

管仲伟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想起了久久不能忘怀的一段经历。那是1949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农工党中央召开的第五次全国干部大会。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政治决议》明确提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教育全党;以政协的共同纲领为农工党的行动纲领。

有一天,正是会议休会,不少同志上街去了。我正在宿舍看书,忽然,农工党中央的一位同志来告诉大家,今天下午有重要活动。

下午,一辆大客车,把我们从住地辛寺胡同接走。在车上,农工中央的同志用压抑不住的兴奋的语调告诉大家:“我们去中南海,毛主席接见大家。”

这意外的喜讯,在车厢里腾起一片欢呼,兴奋之余,我们不禁为那些上街的同志感到惋惜。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汽车驶入新华门以后,在一排平房前停下。

这是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几排长条桌,前面放着几把藤椅,桌上放着几包“海燕”牌香烟。

我们激动地等待着。毛主席来了,他脸上挂着微笑,轻轻地鼓着掌。我们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使劲地鼓掌。

毛主席坐了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口里吐出大团大团的烟雾。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主席:一头浓发,宽阔的蕴满智慧的额头和慈祥的容貌。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和秘书长黄琪翔同志先后介绍了这次“五干”会议的情况。毛主席专注地听着,不住地轻轻点头。毛主席讲话了,他先朝大家扫视了一遍,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们知道杨六郎镇守三关口的故事吧?我现在也坐在关口上,我在看你们过关呐。

主席风趣幽默的语调,引起了一阵轻微的笑声。

“我说的三关,可不是杨六郎的那三关噢。”哪三关呢?大家凝神聆听。

“第一关就是战争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你们大家都过得很好,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这一关,就不是那么好过了,大家的出身或多或少同封建土地都有些联系,我希望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搞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

毛主席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抽出一支烟,点燃了。

他语调恳切地说:“只要大家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的多年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讲到这里,毛主席的手掌使劲一劈,使我们感觉到他话的分量。

我听着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如沐春风,心中荡漾起一股暖意。

回到住地,大家激动的心情仍然难以平复。特别是那些上了街没有听到主席讲话的同志,是那么懊丧。他们不厌其烦地听着我们的讲述,甚至连一

个细节都不愿放过。

那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好。

现在回忆起毛主席所说的“三关”，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它既总结了历史，明确了任务，又指明了方向，使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毛主席肯定我们战争关过得不错，体现了党对民主党派的高度评价。在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战争中，农工党经历了艰苦曲折和不断前进的历程，从靠拢党，与党合作到走上接受党的领导的光明大道，正因为这样，才使农工党和其它民主党派一样，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毛主席所说的最难过的一关——土改关，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也比较顺利地度过了。

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关时，由于党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民主党派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毛主席这里所说的这“三关”是顺利地过去了，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很长，特别是当前国际风云变幻动荡不安，两种制度和两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斗争，“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关”需要过，还要经受不断的考验。我相信，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共产党忠诚合作，积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管有多少“关”，在前进道路上不管有多大风浪，我们总是能够过去的。

论情论理，友情深厚 ——毛泽东礼待民主人士

李银桥

毛泽东待人接物很有原则，很有人情味。他有一套自己的规矩。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示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他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接了当。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了手势：“坐嘛，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不往起站，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步出门坎，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对党外人士，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曾说过：“你们不把我当领袖不行，总是把我当领袖我也受不了。”

有位“蜚声国内外的学者”，“一生经历漫长而坎坷”。这位先生是毛泽东的湖南同乡。同许多知名的民主人士一样，建国之初他也常来见毛泽东。他随毛泽东沿南海散步，走在毛泽东稍后半步，腰身是向前躬着，所以头伸在毛泽东的身前，竖着大拇指，仰望毛泽东脸色说：“毛主席呀，您真伟大哪，真伟大……”

毛泽东皱起眉头拂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嘛。”这位老先生面露赧颜。

可是，议政的时候，这位老先生偏又敢于坚持意见，与毛泽东顶牛了。毛泽东是“吾人惟有主义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狠狠批了老先生一通。老先生不认错，毛泽东在主义之争上决不相让，历来是非赢不可。张澜曾为这位老先生说情。最近看报纸，说周恩来也曾为这位老先生出力过，想托人劝老先生做检查过关。其实，毛泽东也没有将老先生怎么样，就是不再听他的“主义”罢了。因为“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谊深厚，交往甚频。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

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很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1955年，何香凝画了一只老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了毛泽东。这是一只立虎，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像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像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是给他数着呢！”毛泽东说。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我说：“跟向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微笑说：“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着，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了。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丁。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

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毛泽东对外衣的补丁还是“讲究”的。补丁尽量选用同衣服本色相同或相近的布，补丁的形状也要尽量整齐规矩。他这样提要求：“找块好布，帮我配合适了。外衣要给外人看，太刺眼了对人不礼貌。”

进北平后，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他要见张澜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城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我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以后又穿这件衣服见沈钧儒、见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

可我心里总有些难过，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后来，毛泽东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才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为他做了一身新制服。

毛泽东在万岁声中走进北平城。记得进城那天，毛泽东一脚车上、一脚车下，对周恩来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

大军过江，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会议，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毛泽东日理万机，忙而下乱。5月2日约柳亚子同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

记得那天游人很多，入园门时，有人认出了毛泽东。我只听到一片惊讶激动的议论声：“毛主席！”“毛主席！”“是毛主席！”人群中响起鼓掌声，但是不曾喊万岁。

游船准备靠岸时，我们看见湖东岸已经聚集许多人，建议转向东南角靠岸，让毛泽东从南便门上车回去。毛泽东摇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不要怕群众嘛。”

游船向东岸靠近，岸上的人群起了波动。当群众看清船上的毛泽东时，欢呼声骤然爆发了：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上了岸，立刻被欢腾的人群包围，无数手臂伸出来争抢着同毛泽东握手。这时，毛泽东并不愿意突出自己，他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在身边，肩并肩、甚至照顾柳亚子在前半步。上车也是照顾柳亚子上车，然后自己再上。

车上，毛泽东兴高采烈，作着简单手势说：“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群众游园。柳亚子先生高兴，我也非常高兴。”

“道大为公天可则”

——毛泽东与程潜

欧钟

程潜先生由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转变为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祖国的繁荣和统一鞠躬尽瘁，是与毛泽东同志同他的交往分不开的。

程潜原籍湖南醴陵，字颂云，1905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求学时，即加入了同盟会。民国成立后，他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先后担任了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和湖南护法军总司令。1924年1月，他曾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后并参加了北伐战争。他在蒋介石政权统治下，虽历任军政要职，但因对蒋介石的独夫行径深表不满，以致一直不为蒋介石所信任；同时，自1945年开始，毛泽东曾不断亲自做他的思想转化工作，从而使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1949年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后，长沙很快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当时主持湖南军政事务的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不顾国民党顽固派白崇禧的压力，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准备和平起义。

还在1949年春，程潜就机密地派人给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毛泽东看到备忘录后，很高兴，随即给程潜写了一封回信，大意是：为了整个湖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湖南问题走向和平解放的途径，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如何行动，总以人民利益为重，请你自行权宜，相机处理。你对过去的革命是有贡献的，湖南人民对你非常尊崇，我们对你也完全信赖。如万一长沙起义成问题，希将所部军队转移湘西一带，策应解放大军南下。至于细节问题，我们已告知林司令员，请就近密切联系。湖南问题，一切仰仗主持，请不必有任何顾虑。程潜接到毛泽东的密信后，反复细看。当时，他对送信的同志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在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宝盒子没有揭盖，顾虑很多。现在你送来了这封重要的信件，这真是湖南人民的喜信。有了这个指示，不仅我个人的去处用不着顾虑，而且整个湖南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后，中共又派人向程潜转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和平解放的意见，希望他早日登高一呼，配合解放大军向南挺进的行动，并请他劝陈明仁当机立断，不要有任何顾虑与怀疑。程潜以郑重的态度说：“我本人已下了最大的决心，坚决遵照毛主席给我的指示去作。你们可以把我这个真诚的表示转上去。陈明仁当前的问题，何去何从，也看得很清楚。不过他的处境和部属的情况，相当复杂，同时，蒋介石、白崇禧又多方对他进行拉拢，所以在他那里进行工作，还须特别慎重，免得稍有差池，影响全局。我已分别交待有关人员严密布置，待机行动。问题尽管复杂，但我相信，凭我们的真诚努力，和平解放是可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的。”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毛主席、朱总司令立即致电嘉勉，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欢迎。

长沙解放后不久，中共中央来电指定程潜、仇鳌、李明灏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特邀代表。程潜复电毛泽东，请求增加陈明仁等为特邀代表。毛泽东旋即回电，表示同意。8月下旬，程潜等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其

时，仇鳌因故未到北京。毛泽东对程潜说，仇鳌未到，湖南地区可以补特邀代表1人，并嘱程潜推荐。程潜即推荐了程星龄。

程潜等人赴京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林伯渠秘书长等到车站迎接。当晚毛主席举行便宴，为程潜洗尘。翌日，程潜又拜访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到程潜住地——北京饭店回访程潜，并与程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邀程潜、陈明仁等游天坛。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单独召见了程星龄，就如何安排程潜的政治地位征求意见。毛泽东说：“想同你商量一下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彪当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先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毛泽东同志讲话如此谦逊，使程星龄非常感动。当即答道：“程潜先生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他的工作，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一定会欣然从命，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毛泽东说：“不，还是请你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毛泽东又对程星龄说：“颂公在军政界工作时间很久，旧部很多，这些旧部，需要安插而又可以安插的，尽可能地要给予安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设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小米5万斤（币制改革后，折成人币5000元），由他自己开支，不受任何限制。还说：颂公是老年人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他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职务，可以在长沙住，也可以在北京住，只要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当程星龄将毛泽东主席这些考虑说给程潜听后，程潜非常感动地说：不仅是这些，毛主席还把属于军事机密的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都送给我看了，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啊！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毛主席对我是怎样地推心置腹啊！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70岁生日。程潜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和尊崇，怀着激情写了12首诗奉贺。现将其中《毛泽东主席七十大寿祝诗》一首录出：

灵椿长寿不言寿，至德安仁亦利仁。
道大为公天可则，物穷其极理皆真。
鸕雏振翼鸱生妒，海若回潮水共亲。
远届八荒齐拜手，堂堂赤制有传薪。

“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毛泽东与张治中

余湛邦

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
张治中论毛泽东：“1945年以前，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在国民党那么多起义将领中，毛泽东独把张治中引以为“友”，这并非两人过去相交甚早，也并非张治中与毛泽东神交多深，恰恰相反，用张治中本人的话说：“1945年以前，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

张治中是安徽巢县人，与毛泽东并不是同乡。张是1890年生人，比毛泽东还大3岁。两人只有一点相同：这就是同是典型农家子弟出身。张家是巢县西乡一个叫做洪家疃的村子里的大户。但到了张治中祖父辈时，张家已败落成以务农为业的普通农家。祖父张帮栋俨然一典型的农村老者，刚直性格，常说直道话。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种田，很少离开村子。这一点，与毛泽东的祖父、父亲极似。

张治中靠个人努力，进军校，入黄埔，走上军旅之途。1924年北伐前夕，他已在蒋介石手下升任黄埔第三期入伍生总队长。1925年东征胜利后，又调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副官长。

这时候，毛泽东也同在广州。不过，他并未与张治中有过晤面，因为他当时正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风急浪涌的大革命时期，两位政治家同处一地而又失之交臂，诚是一大可惜。这以后，两人相识并进而相交，却是20年后的事了。

“和平将军”。蒋介石曾怀疑他“必通共匪”，释疑后又委以重任，在毛泽东的家乡任省主席。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

从大革命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虽已分为两个阵营，但20年间，共产党人对张治中的了解却从未中断过。

首先，中共对张治中的“和平将军”的美誉表示肯定。张治中由于胆识过人，又严于律己，他在国民党集团内的地位不断攀升。但是，他却是国民党多如牛毛的将军中，唯一的一位握有重兵，却从未与共产党人直接对抗厮杀的将军。

抗日战争时，张治中将军毅然请缨，先后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两次率军与日寇在上海血战。第一次是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第二次是1936年“八一三淞沪之役”。在上海人民和全国界的声援和支持下，创造了著名的上海保卫战的胜利，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可惜，后来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下，不得不放弃了上海。当蒋介石要张治中率军去与红军对垒时，张立即交出了军权，表示宁愿去军校当教官。

对此，蒋介石等人曾很是怀疑，认为张治中同情红军，“必通共匪”。但是，在戴笠等人的庞大情报网全力搜索后，却没有这方面的一丝半点线索，蒋介石只好作罢。后来蒋介石见张治中身居要职，却从不揽权谋私、拉帮结派，才逐渐放下心来，并相继委任张治中以要职、如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等，直至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了解，也许还有另外一面。上海淞沪保卫战后，张治中转任湖南省主席。而湖南是毛泽东的家乡，他自然十分关心那里的一切政务。

湖南还是中共的发源地之一，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何键等的反共政策下，这里的中共方面所受到的打击迫害特别严重，使中共对之极为愤慨。

张治中到任后，开诚布公，与各界坦诚相处，力求一切事都有公平合理的解决。任内一年又两个月期间，居然使当地各派势力相当融洽相安无事。

一次，毛泽东故乡旁的浏阳县逮捕了一位中共干部，该县县长竟捏造刑事罪犯的罪名，将这位干部枪决。张治中知道这事后，马上派人查明事实，给予那个县长撤职严办的惩处。

张治中把办案过程——通报了中共湖南组织。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后，湖南籍的老革命家徐特立还提起这件小事，对张治中大加赞许。徐特立说：“张治中是坦白的。”

这是指当时张治中对中共人士的通报与中共中央后来对案情调查后的实情是一致的。

虽然没有在此期间留下毛泽东对此的评语，但相信他从自己十分尊敬的“徐特老”前辈处，已经了解到许多情况。毛泽东是在以后的重庆谈判时才与张治中相识并一见如故的，但，“和平将军”，湖南执政，这些不能不说已奠定下相当的基础。

重庆谈判的伏笔。日本人投降后，张治中闷在家里。一到延安，初识毛泽东。张治中对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与美国特使赫尔利用专机将毛泽东接到重庆。

毛泽东知道和理解张治中，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而张治中提及毛泽东，则比此早了3年。

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可是1941年元月皖南事件的发生，使两党关系又开始破裂。两党商谈虽未断，但久无成果。

张治中是国民党内主和派的代表。此刻，他忧心如焚，多方劝慰，力主合作。也许是他的诚心所至，竟使蒋介石酝酿起亲晤毛泽东的念头。

1943年夏季的一天，蒋介石紧急约张治中到其官邸。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想请毛泽东到重庆来，我们当面谈一切问题，你看好不好？”张治中听后很是兴奋，由蒋介石自己先提出这种会晤，这还是第一次。他忙答道：“很好！很好！我完全同意。”

当即，蒋就亲笔写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交给张治中。这时，专程来重庆参加国共和谈的林彪将军准备回延安去。张治中就在家里为他饯行，并于当

晚把信交他带回。

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事情来得太突兀，中共方面对蒋的邀请未有任何表示。碍于礼节，张治中也没向仍在重庆的周恩来查询。这一有点“惊人”的初衷，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亡了。但是，论者认为，这却为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伏下重要一笔。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豁然开朗。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人们都在狂欢地庆祝胜利，而张治中却一个人闷在家里沉思。

他想：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当时国共两党商谈已陷于停顿，国家随时有再次陷入内战漩涡的危险。

为防止危机的出现，张治中遂抓住胜利的契机积极活动，力求使和谈早日恢复。当时与张治中有同样想法的还有吴鼎昌。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会商国是。中共中央经过郑重考虑，慨然电复应约。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确定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全党第一个方针，第一个斗争目标。

8月27日，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特使赫尔利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这是张治中初到延安，也是他初次与毛泽东见面。

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可以说，两位政治家此后漫长的诚挚相交于此即已开始。

翌后，张治中、赫尔利陪同毛泽东等人即从延安飞返重庆。举国欢腾。举世瞩目。

毛泽东身入虎穴。周恩来为之大伤脑筋。桂园、林园、德安里三号，重庆谈判的三轴心。张治中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负责送回去。”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如同身入虎穴，令中共和解放区人士忧虑不安。陪同他前来的周恩来更是为他的安全问题大伤脑筋。

在重庆，中共方面有两处宅院，一是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一是曾家岩50号中共机关所在地。红岩村坡陡级多，会客不便；曾家岩又太狭小，显得起居很拘束。周恩来只好去找张治中商量。

没料想，张治中当即把自己的官邸——上清寺桂园腾出来给毛泽东，他一家则全搬到复兴关中训团的一所平房去住。桂园是一处极理想的地方，这里距曾家岩、红岩均不远，而对面就是蒋介石的官邸，于内于外都很方便。

毛泽东白天就在桂园办公、会客和休息，晚上则回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尽管有些安排，张治中仍不放心。当时重庆散兵游勇多，袍哥帮会也多，而毛泽东身边仅有一个警卫员，在桂园办公或外出都不安全。张治中与周恩来商量，拟增加警卫力量，但一般警卫又无济于事，后决定请宪兵担负警卫。张治中立即找到宪兵司令张镇落实了这个问题。

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工作和休息的最佳环境，张治中对自己的家人也反复交待：不要去桂园打扰。对在郊外南开中学的女儿素我、素央、素初，他让她们这期间连周末也不要进城了；对在城内上学的小儿一纯和小女素

久，则让他们住在桂园后面的平房里。张治中还安排张家的服务人员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让外人有任何插手机会。

重庆谈判历时 43 天，桂园、林园、德安里三号（蒋介石官邸）成了引人注目的三轴心。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各界人士，一切都方便易行，使周恩来等放心不少。但是，重庆谈判经过时间之长，过程之曲折复杂，气氛之极度紧张，都是国内外会谈中少有的。在谈判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就是张治中了。每遇谈判陷入僵局、遇到障碍或濒于破裂时，张治中在斗室之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首兴叹，以至形容消瘦，寝食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和谈基本达成协议。此时外间谣言纷传，说是“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也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

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

周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一点签订协定好不好？”

张治中问：“预定哪一天回去？”

周恩来说：“预定 10 月 1 日。但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

张治中当即表示：“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回去。但 10 月 1 日不行，我的活动已都安排日程，要 10 月 10 日后才行。”

有了张治中这番明确的表态，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大减。这件事对周的帮助之大，张治中是始料不及的。1949 年中共执政后，有次周恩来与留在北平的张治中叙旧，又提起这次谈话。周恩来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后，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毛泽东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张治中二到延安。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毛泽东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0 月 8 日，张治中在军委会大礼堂举行欢宴晚会，邀请参议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但请柬上并没有声明原因。

重庆党、政、军各方人士 500 余人前来赴会，盛况空前。正当大家在心下猜测晚会的主旨时，张治中将军宣布：“今晚之会，主要的是为了欢迎和欢送毛泽东先生。”全场此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在晚会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除了和平的方法以外，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错的。”

毛泽东的这个简短讲话，却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没有理由不对国内和平充满乐观的想法。

10 月 10 日，中共和国民党签订了后来被人称作的《双十协定》。签订协定的仪式就是在张家桂园的客厅里举行的。

第二天清晨，张治中即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亲送毛泽东上机，一起飞返延安。这次是张第二次到延安。

从重庆飞来的专机上走下时，张治中惊讶了。只见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写道：“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和关切。那

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以后，他还常常和朋友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举行盛大晚会欢迎张治中，宾主尽欢。

第二天，毛泽东又亲自送张治中去飞机场。在车上，毛泽东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调查过，大家都说你在政治部和青年团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要钱，干部都愿意接受你的领导。我还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何以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消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以后，张在回忆录中说：“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毛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他指毛泽东上述话说：“这些地方，都充分说明了他的细心和恳挚，给我以不可磨灭的印象。”

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的七日行。“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蒋介石又想到和的一手。中共拒绝张再到延安。

《双十协定》签订后，首先是整军问题。美国杜鲁门总统专门派出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参与军队的整编统编。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小组，经多次协商签订整军基本方案。

为了贯彻停止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执行，马、周、张3人坐了专机到各地做了一次历时7天的检查，先后到了北平、张家口、集宁、归绥、太原、济南、新乡、徐州、武汉，最后在回重庆时去了延安。这是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

这次到延安和离延安，毛泽东都亲自接送。三人抵达延安的当晚，中共中央特别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大家表情上都充分流露出对和平的热情。

会上，趁着酒兴，张治中将军说了一段话：“将来你们写历史，可别忘了写‘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引起全场的鼓掌欢笑。

听了张治中这番由衷的话，毛泽东说：“张将军将来也许还要回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

张治中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不再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

对张的这段话，毛泽东微笑着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延安，开会就到南京。”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话里藏话，既风趣幽默，又机敏过人。果然，三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大旗落地时，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没有以南京为“都城”，而是把“北平”改名“北京”，把首都定在这里。可以说，毛泽东的话都应验了。

张治中回忆说，三到延安时，有位中共朋友和我说：“你的话说得很好，我们可以写历史了，就是说我们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张治中笑着说：“我从来就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会失败！”

当时，毛泽东提到张治中还可能四到延安，后来确也出现过这种可能，可事实上却没有实现。

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又想到了和的一手。他把张治中叫来，希望他再去延安，谈判“和平”的问题，并向延安发出了信息，但这次却为中共所拒绝。因为当时战事已不可逆转。

张治中真的没有“四到延安”。

和谈破裂，留居北平。毛泽东说：“从大年初一做起。”与彭德怀合作主管西北政务。毛泽东送的大白菜，人见皆称奇。

1949年，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在北平举行。张治中又是国民党首席代表。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大势下来到中共所在地北平，张治中心中真不是滋味。

没料想，毛泽东却依然热情地接待了他的老友。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宴会上，毛一见到张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

毛泽东的话，亲切而自然，诚恳真心。这使忐忑不安的张治中等简直有如释重负之感。张心下企盼和谈也有好结果。

可是，事与愿违。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出尔反尔，北平和谈破裂了。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取国民党总统府所在地南京。张治中在外间谣言蜂起的情况下，慨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决定留居北平。张的举动深得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许。周恩来还通过千辛万苦把远在南方的张的家眷全都安全接来北平，使张治中感动不已。

毛泽东对留居北平的张治中更是关怀备至。他常邀张过去座谈、聚会，并把张介绍经初会的朋友：“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些话令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

这期间，新中国政协正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毛泽东当着朱德等许多中共领导人的面，多次提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协和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推辞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

毛泽东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等于已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当时，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张治中因曾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即写成数千言的书面意见呈毛泽东，除介绍一般新疆情况外，并就今后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多项重要意见。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当下就推荐张到西北去“与彭德怀将军合作共事”。毛泽东幽默地对张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

张治中将军与彭德怀合作得很不错。后来彭奉命率军去了朝鲜战场，张又与后继者习仲勋合作很好，为西北地区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虽然在西北兼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但张治中主要却在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里任职，主要活动在北京。这样，就要在北京解决一处长住寓所。毛泽东、周恩来立即交待主管部门妥为解决。经过仔细选择，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里原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官邸，宫殿式的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仅餐厅就能摆几十桌。张治中总算安顿下来了。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生活起居可谓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有次张治中病倒

了，毛泽东特派江青持亲笔函到张家慰问。张治中有腿神经痛宿疾，周恩来、邓颖超不时馈赠药品。

有一回，毛泽东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的四棵特大大白菜，便派人送了一棵到张家。这棵大白菜重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菜抽苔开花，花高足有二三尺，人见皆称奇。

毛泽东就国旗图案征询张治中的意见。“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全国人大首次会议开幕，毛泽东不愿讲话，他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筹建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的名号问题。这时是1949年6月。

会后，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在座。毛泽东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诸各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8月，盛夏时节。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就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地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全国征集图案2000多幅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主持与各界人士作最后的定选。

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闲谈一番后，张问毛泽东：

“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毛泽东问。

“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张治中有些激动了。

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张治中表示同意。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见，他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有道理，后来就以比较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

1949年10月建国后，政协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政协会议才不再执行人大职权。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就直接去找毛泽东。

张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但是，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精辟有力，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幽默地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给彭真转交刘少奇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项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张治中、毛泽东分乘两架飞机。毛说：“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王任重在武汉豆皮店“老通成”请客。陈再道司令员跑到张治中面前：“主席等你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与毛泽东的交往日渐密切，1958年则达于顶峰。这年毛泽东邀请张治中随行视察大江南北，给张极高的礼遇。

在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请张治中全家到住处吃饭、谈话、看电影。分手时张对毛说：“过两天我要回北京去了，主席有何吩咐？”毛说：“不忙，我还有话和你说，稍等一等。”

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十多天过去了，毫无消息，张治中感到纳闷，又不好问。直到9月上旬，毛泽东才请张治中去说：“我想到外地视察去，你可愿意同行？”张喜出望外地答：“那太好了，能够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张治中回到住处，把事情告诉我：“这回你要好好准备。我每天紧跟在毛主席身边，你利用速记把他讲的话每句都记下，并留意环境和采访群众，到晚上我们把材料凑在一起，就可以成为一篇宝贵的日记。”

9月10日上午8时，毛泽东、张治中分坐两机由北京飞武汉，11时40分到达。是日晴空万里，气候特佳。一下飞机，张治中就关怀地问毛泽东：

“您昨晚恐怕又没睡觉吧？”毛主席回答：“昨晚开了五个会，今天清晨又接见新疆参观团，没有睡。”张说：“那您好好地先睡一觉吧。”毛主席说：“不，天气热，我们马上到长江去。”说着就登车。张和曾希圣、王任重同车随行。他们在船上吃中饭，中饭很简单：一碟炒青菜，一碟肉片黄瓜，一碟炒小鸡，一碗冬瓜汤。张、曾、王和毛主席夫妇共5人用餐。饭后，毛主席忙着要下江游泳，他笑着问张和曾：“你们可下水？”张、曾同声抱歉地说：“不能奉陪了。”毛说：“好吧，你们都当‘观潮派’吧！”

由马鞍山去南京火车上，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迎接。刚坐定，毛泽东就笑问江书记：“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大家觉得很奇怪。原来，张治中在抗战期间任湖南省主席，江当时是青年，写信给张，说我是共产党人，要抗日打游击，没钱，请你资助。张一想：此人真有胆识，而且对我如此信任，就批给他3000元。这一经过是毛从张治中谈话中听到的。

当时在座的，还有罗瑞卿、曾希圣等。毛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大家说不知道。毛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到了杭州，浙江党政领导人来见。毛为张——介绍：第一位是书记江华，毛说：“他不姓江，原名黄春浦，江华是干革命时取的。”介绍书记霍士廉时说：“是霍去病的霍，霍去病在汉代名声功劳最大，不幸27岁上就死了。霍书记大概是霍去病的后裔吧？”介绍到副省长吴宪时说：“此人口气真大，口衔天宪！”大家听了都笑了。

毛主席习惯在夜里工作，我是早听说过的，到这次一起出来，愈加证实这种情况。原来，他老人家日里活动频繁，到深夜12时才开始审阅文件、开会、研究问题。

9月21日，由南京坐火车经上海去杭州。在南京经过一整天的紧张活动，张治中在11时就睡了。睡梦正酣，叶子龙同志来说：“主席有请。”张忙披衣到主席座车上去。毛问张，“你大概是夜梦初醒吧？”张说：“刚睡不久。”一看手表，快凌晨1时了。原来，毛主席利用经上海之便，要视察上钢一厂。

第二天到杭州前，张治中对毛主席说：“您经年累月没有很好休息，这次到杭州多休息几个星期吧。”毛说：“看情况吧。我只要睡3天就可以恢复过来，最多5天。”最后还笑着说：“这几天怎样活动，你自己安排，我们暂时‘分道扬镳’吧。”可是事后，张治中问叶子龙、徐光禄同志，才知道他老人家还是每天睡四五小时，只有两天睡到六个小时，每天审阅的文件，并不比在北京时少。

在武汉时，有一天，王任重请毛主席、张治中到著名豆皮店“老通成”吃小吃。刚一进门，服务员、厨师、干部都拥上来招呼。毛主席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坐下，服务员送上脸巾，毛主席接过时说：“谢谢。”饭后上车时又举手向大家说：“谢谢大家的服务。”

到芜湖，适逢雨天。毛主席不要服务员送饭送菜，步行下山到饭厅和大家共餐，还请来两位工勤同志一道吃，边吃边谈，了解一些情况。饭厅中间小桌上摆了一个大饭桶，每人面前放了一个空碗。服务员跑过来要为主席盛饭，主席不肯，自己端着碗到饭桶去盛，盛了大半碗。张治中接着也自己盛，却盛了个满碗，鼓得高高的。毛主席对大家说：“你们看他盛的。”曾希圣

说：“真像个窝窝头。”毛主席要来了—小碟盐腌生辣椒，尝了尝说：“很好，大家来尝尝。”张说：“我怕辣，不敢吃。”主席说：“我见了辣椒就想吃。”

9月12日在武汉，刚好武汉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毛主席接见党代表后，坐车到大操场和大家照相。张治中对同车的曾希圣说：“这是党代表大会，我不是党员，不必参加了吧？”曾希圣也说：“我也不准备参加。”可是汽车停下来后，看到毛主席站在那里等候。陈再道司令员和叶子龙跑到张、曾面前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张、曾赶快走到主席面前，张说：“我不要照了吧？”主席说：“为什么？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张治中—想，觉得也对，他当时不但参加了，照相了，而且还作了书面发言。陈司令员补上—句：“你是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呀！”张就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

毛主席真好学。9月10日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主席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路上，毛主席还沿线借书，到了合肥，毛主席就向省上借来《安徽省志》、朱熹注的《楚辞》，还向张治中介绍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

毛主席谈笑风生，既幽默又风趣，在大家谈问题时偶然插入三五句，就使得气氛活跃，满座生春。

在武汉时，有—天，武钢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李—清和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山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李书记汇报完毕，时间已经不早，天气又很闷热，毛对林说“你谈的是长江的事，我们到长江去谈吧”。马上转到船上，谈完了毛主席就下江游泳，跟着到“老通成”吃晚饭，—进店门毛就对王任重说：“你们可不要告诉人说我到‘老通成’来吃豆皮，不然别的馆子会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偏心了！”当服务员端馒头来时，毛主席又说了—个陕北的笑话：“—位名法学家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他后来到陕北来工作，也入了党，陕北不产大米，我们让他吃小米和馒头，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进了党连饭都没得吃了’！”引得大家大笑。

毛泽东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张治中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南方视察日记约4万字。毛泽东最后说：“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

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妻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视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你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9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我们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这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视察途中的20天，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4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尽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你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圆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

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杆。”毛说：“我不能坐滑杆。”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杆。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杆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杆！”——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杆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不能坐滑杆？他没意识到坐滑杆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浹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杆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也有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统战部告知民主人士：要正确对待红卫兵。张治中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毛泽东问：“你又不是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嘛！”

毛派人给张家送来东北最好的人参。

“文革”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他心中常惊疑不定。后来，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民主人士开会，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革”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听到毛完全知道这些事，自然就放心多了。

可是，他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家里不到两小时，红卫兵就撞开门来，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地不知搜寻什么。张治中忍无可忍，他质问领头的红卫兵：“凭什么来抄家？”红卫兵气势汹汹地反问他：“你是什么人？敢来阻拦？”张治中也没好气地回答：“我是什么人，你们去问毛主席好了。”咄咄逼人的红卫兵本欲大打出手，可一听此话，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只好说：“你等着瞧。”随后就撤走了。这之后，张家上下整天提心吊胆的，恐怕哪天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又要上门滋事。但是，奇怪的是，一连好久也不见动静。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总理知道民主人士被抄家的事后，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让工作人员也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各位民主人士家门口，阻拦红卫兵惹事。以后，周总理报告了毛泽东，又派人把张治中等民主人士接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对“文革”中的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1966年国庆节，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了毛泽东，俩人已经相当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毛泽东问张：“红卫兵到你家去没有？”张治中答：“去了。”毛泽东惊讶道：“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去干嘛！”张治中听了毛的这番话，心里很是高兴，毛泽东是清醒的。回到家里，他把这次谈话津津乐道地讲给大家听。

但是，事与愿违。“文革”狂飚正以极大破坏性的惯性向前猛刮，许多

张治中熟悉和敬重的中共元老、重臣、元帅、将军、都相继被打倒或逼死，更有无数与他共事多年的知名民主人士被批斗、下放。张治中开始对毛泽东不那么崇敬了。

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

此时，他已是久病在身，体力不支，但他仍坚持由警卫人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

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

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在那种时候，那样的场合，敢于提出这样的批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毛泽东听后没有言语，随后就走了。这也许是两位老朋友的首次“话不投机”吧。

1969年，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0岁。他病重期间，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毛并没有因为一时的“话不投机”而忘怀这位多年的老朋友。

“这个人很有骨气” ——毛泽东与续范亭

基欣

续范亭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爱国将军，诗人。1935年12月26日，因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遭拒绝，在南京中山陵堂，写下五首绝命诗，剖腹自杀，遇救幸免一死。此后，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长期斗争中，续范亭和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夏，续范亭病势深重，在中共中央电报催劝下，来到延安治疗，1947年不幸病逝，延安6年，续范亭直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他与共产党的一些著名领袖过往十分密切，这些经历在续范亭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诗文词联中留下记载，是统战史上瑰丽的一页。

诚挚的情谊

1941年4月上旬，由于胃病、肺病等多种疾病复发，续范亭满怀惜别之情，告别晋西北人民，被同志们用担架抬上船，渡过黄河，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续范亭的身体在早年战争中曾受到严重损失，南京中山陵剖腹后留下残疾，所患的肺病、胃病一直没有彻底治好，时常发作，但他一直忍受着这些疾病的折磨，坚持战斗和工作。当担架抬着他到达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特地在附近的山坡上迎接他。他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特意让他住在与自己邻近的窑洞里，他们不时地见面、交谈。

还在1939年续范亭参加完秋林会议后，曾通过延安交际处单独拜会毛泽东，那次的会见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教育。他这次来到延安后，生活上受到优待，毛泽东亲自过问他的病情，并将他安排进位于延安城东15里的柳树店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治疗，并让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以及该院内科主任黄树则等为他诊断，他曾在一首诗末自注说：“余二十年前身体已失健康，多随时调剂幸未致死，今日转送延安如归者家。”续范亭享受到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照顾，及医生们的精心治疗，心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感动。

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对边区的双重封锁，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困难，毛泽东听说他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马上把续范亭的秘书找来，让他开出英文原名，亲自发电报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设法购买。药买来后，毛泽东立即派人给他送去。1946年初，国际友人带来几箱配尼西林，毛泽东马上派人分送一部分给续范亭。续范亭在柳树店养病之时，毛泽东还把冀中人民送给他的雁绒，特地转给他缝被御寒。

有一次，毛主席专程到中国医科大学来看望续老（当时他住在学校后山窑洞里），一进校门就被同志们请进了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续老对毛主席非常景仰，他虽然病情很沉重，知道毛主席在这里讲话，马上带病从山上走下来听。毛主席看见他走进来的时候，中止了讲话，走下讲台，和他握手，亲切地探问他的病情。在招呼他入座后，才继续上台讲下去。以后，续老从柳树店移居杨家岭党中央驻地附近，同毛主席住处相距不远。毛主席经常去看

望他，使他有办法多次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后又移居枣园，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看望他，在延安休养期间保存下来的，毛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就有 10 多封。

1944 年春天，他在毛主席身边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是“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毛主席邀请他和另外几位同志吃饭。毛主席亲切地探问续老的病情和治疗情况，还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167 方法。饭后，毛主席请大家喝茶叙话。他在席间得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是毛主席的诞辰，1943 年正是 50 整寿，但没让延安举行什么活动。续老怀着衷心的崇敬，即席赋诗祝贺毛主席的健康：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这天夜里，白天和毛主席谈话的情景，久久萦绕在他的脑际。他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写了一首《五百字诗》，在长序中详细记述这次难以忘怀的会见，抒写无比欢欣的感触：

“毛主席身体健康，器宇雄厚，脚踏实地，眼光向下。至于毛主席的智慧，究竟在哪里？我看他的智慧就是群众的智慧，同时群众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此其所以为大智慧。古人说‘大智慧亦寿考’，不祝亦必寿考也。三十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再不会走冤枉路了。”

他把毛泽东看作自己最好的老师和最知己的朋友，他在《赠毛主席》诗中写道：

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
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

毛泽东对续范亭在政治上也非常关怀和信任，每逢时局有了重要变化，就及时写信或当面告诉他。在毛泽东的关怀下，续范亭主动地参加了中共中央的整风运动，带头学习文件，写心得，谈体会，并为我党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鞠躬尽瘁，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的 6 年时间里，他以不断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坚持不懈地精研革命理论，进一步突破固有的阶级观念的局限，彻底抛却了以前精神上的负担，在思想上有了惊人的飞跃，逐渐使自己从一个党的同路人转化成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战士。

续范亭不仅是一个军事家、政治家，而且是一个特殊的诗人。他在早年战争时期，不只用军人的刀剑和枪炮杀伤敌人，同时又用他那犀利的笔锋痛击反动势力，他的诗义正词严，大胆泼辣，力透纸背。给人以无限的勇敢和希望。在延安，续范亭与著名的“五老”即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来往很是密切，他们经常互相探望，互相赠诗，互相勉励，共同研讨抗战政策，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续范亭还参加了“怀安”诗社，在《解放日报》上经常发表诗作。此外，续范亭还与朱德、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人来往也颇多，在他的诗集《延水集》里，就收有《赠朱总司令》、《赠周副主席》、《赠叶剑英将军》等。续范亭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其他革命老人相互之间诚挚的革命友谊，以及在诗坛上酬赠唱和的韵事，至今仍常常为

人们所津津乐道。

“老来立马红旗下”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断掀起反共高潮。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向陕甘宁边区疯狂进攻。7月上旬，胡宗南下令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进攻，续范亭闻听后，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他强撑着病体，穿好军服，让警卫员备马，并给朱总司令写信，要求“上前线拼一下，请给我命令。”

医生苦劝他卧床休息，不要工作，但他却挣扎着振笔直书，以《警告中国抗战营垒内的奸细分子》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呼吁国民党内爱国同胞，迅速制止内战，挽救危亡，并警告内战挑拨者悬崖勒马。文章还没有写完，他就因为气喘、气愤而被送进医院。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时，阎锡山大放阙词，恶毒攻击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看到阎的谈话后，提出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薄一波、韩钧等写文章予以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贺龙把中央的意见告诉续范亭后，他欣然接受。由于他不能坐起，由秘书记，他口述，很快写出来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

阎锡山这个人，续范亭比谁都清楚，他依靠辛亥革命爬上台后，又用背叛与摧残革命的手段独吞了革命的果实。他依附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做靠山，保住了对山西的统治，“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拿起一等侯”。北洋军阀倒台后，他运用随机应变的手段，乘机扩大势力，扩充地盘，一度统辖了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四省和平、津两个特别市，成为掌握华北六省、市军政大权及经济资源的一个大暴发户。后来在蒋阎冯中原大战惨败后，他又托庇于日本关东军，与旧部联络。“九·一八”事变后，阎重回山西，继续控制山西。续范亭在这封信中，痛心疾首地揭露了阎锡山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滔天罪行，行文感人肺腑，他写道：“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十分同情并拥护共产党的办法，因为他们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我所以反对你，是因为你背叛了三民主义，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结日寇，背叛国家，压迫山西的人民。”

他在文中还说：“我这一封信虽然批评你、骂你，但是很公正、很确实的。三国时诸葛亮骂死王朗，我今天并不是想把你骂死，我也不是诸葛亮，当然骂不死你，因为你比王朗的程度高得多，王朗还讲些廉耻，挨了骂以后就羞愧而死，你是个自私自利不顾一切、阴柔奸诈顽钝无耻成了精的老怪物，当然把你骂不死的。……”这些话义正词严，淋漓尽致，力透纸背，像钢刀一样直劈阎锡山。

信写后，续范亭派人送毛泽东指正，毛泽东一口气阅毕，然后给他回信说，读了文章“振奋人心”，而且称赞这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并让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

毛泽东的回信，给予续范亭极大的鼓舞，使他感到自己虽然身染重病，不能上前方消灭敌人，但在医院里还是可以做一点工作，能够为革命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这使他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慰。他这篇呕心沥血的杰作，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特别是在山西，不论是解放区，还是

敌占区，人们争相传阅。

写完这篇文章，他因神经受到刺激，身心疲劳过度，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在床上整整躺了两个月。这期间，他不听医生劝告，连续写了《三年不言之言》，《国难严重中纪念国庆》、《秦桧归来》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洋溢着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充满了血泪之语，读了令人非常感动。

1947年8月，续范亭的下肢开始水肿，逐渐遍及全身，气喘胸闷，咳痰不爽，舌根渐硬，饮食已不能正常进行。一天，住在他附近的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诸位老人都来看望他，极力劝慰他，续范亭自知将一病不起，紧握住谢老的手说：

“大局我看清了，我很乐观，望转告中央各位首长多珍重！”

谢老说：“你放心养病，现在前方情况很好，人民解放的日子快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前线，都极健康！”

不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纷纷来信慰问他，晋绥边区党政军负责人都来他的疗养地看望他。续范亭一再问：“毛主席过河了没有？”“毛主席要注意身体，他太辛苦了。”

在病危时期，续范亭的心念转向举世瞩目的陕北战场，转向他衷心崇敬的党中央。自从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他就真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自觉地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整风运动时，他曾诚挚地要求加入共产党，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他并不是一般的党外进步人士，他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在党外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切，续范亭是理解的。每当他病情恶化时，有人提醒他预留遗嘱，他说：“邹韬奋先生早为我写好了。”邹韬奋在临终前写道：“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残酷无情的病魔就要夺去续范亭的生命，却没法夺去他皈依共产主义的生平宏愿。1947年9月12日，他的夫人许玉侷含泪向中央奉上续范亭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遗嘱：

敬爱的毛主席和中共中央：

范亭自辛亥以来，即摸索为民族和人民解放的真理，奋勇前行，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道路。七七抗战之后，即欣然接受领导，参加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建设工作，想从此更好为人民服务，以偿平生夙愿。孰料范亭方奋力以赴之时，竟以身染重病，去延休养。在延数年，蒙党百般爱护，尤觉欣幸者，得以时常聆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教导。范亭奋斗一生，始于今日目睹解放区广大人民的真正翻身，真正看见了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每自不禁感奋，热泪夺眶而出。屡欲请求入党，作一名革命军的马前卒，以终余年，但以久病床褥，迄未提出。现范亭已病入膏肓，恨不能亲睹卖国贼蒋介石之行将受审，美帝国主义之滚蛋，与全中国人民之彻底解放，是为憾耳。范亭数年来愧无贡献，然追求真理之志未尝一日或懈也。在此弥留之际，我以毕生至诚敬谨请求入党，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的一生历史，是否合格，如承追认入党，实平生之大愿也。专此谨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续范亭

1947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行署、中央分局、军区司令部并转范亭同志家属，接受续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致哀悼：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中共中央晋绥分局、

晋绥军区司令部并请转范亭同志家属：

接电惊悉范亭同志病故噩耗，至深哀悼。范亭同志于早年参加同盟会，即献身民族民主的革命事业，百折不挠，在抗日民族战争期间，领导山西新军为坚持山西抗战与山西民主化而奋斗，功在国家。范亭同志在弥留之际，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革命忠忱，实令人感奋。本党决定接受范亭同志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以此引为本党的光荣。望我晋绥边区党政军民各方同志一致努力，继承范亭同志遗志，与晋绥人民团结前进，发展与巩固晋绥解放区。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并望范亭同志家属节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十三日

悼念续范亭同志的逝世，毛主席写了挽词：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
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
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葭县神泉堡。有一天，解放军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来到这里，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又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

“续范亭同志在晋西北逝世了，知道吗？”

苏井观回答说：“续先生临终前还写过一首《斥蒋贼》的诗：‘人民公审蒋中正，项上忽生千万头。好教每人杀一个，淋漓痛快报公仇。’昏迷中醒来后还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临终前没有看到蒋介石被人民审判，十分遗憾。”

毛泽东听后，语气沉重，赞叹地说：“这个人很有骨气，太可惜了。”

“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 ——毛泽东与傅作义

关理

傅作义将军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毛泽东生前十分关怀傅先生，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初，毛主席曾派人到柳林镇会见傅作义，商谈抗日问题。秋天，傅作义派人到延安谒见毛主席，请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帮助开展抗日工作，不久毛主席即派几十名干部学生到傅部。傅作义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就我个人的抗日经历来说，也直接间接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鼓励。”

1949年初，傅作义响应毛主席和平解放北平的号召，通过谈判实现了北平和平。毛主席在给傅先生的亲笔信中说：“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以后傅先生又促成了绥远起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党和毛主席的奖勉。

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来到西柏坡。当晚毛主席便亲自来住处看他们。一见面，毛主席亲切地双手握着傅先生的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对傅先生率领部队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给予很高评价，慰勉有加。毛主席告诉傅先生，对于傅部的起义人员，准备都送到绥远去，通过他们现身说法帮助在绥远的人提高认识。至于绥远问题，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说，等待他们起义。然后给傅、邓编两个军。毛主席还谆谆告诫傅、邓二将军说：“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是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主席的这些亲切教诲，使傅先生感到极大的鼓励，疑团顿释。返回北平时，傅先生满面春风，极为兴奋。不久，发表《北平和平通电》，得到毛主席回电慰勉。

1949年3月，党中央迁到北平，毛主席在香山又一次接见了傅先生，教诲关切殊多。3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西苑检阅人民解放军，邀请傅先生参加了仪式。绥远和平协定商妥后，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东屋接见傅先生，进一步商妥绥远问题的解决。毛主席对傅先生极为信任，嘱托他亲赴绥远解决问题。当傅先生到绥远后，蒋介石还梦想拉他到南方去。在此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傅先生在重庆及兰州的家属才得以几经转折回到人民首都北京。

全国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给予傅将军极大荣誉。并在政治、工作、生活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1949年3月，有一次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请傅作义和邓宝珊谈话，问他们开国后打算干点什么。邓将军说：“宜生从小就立志为民众做事，他主政绥远时，在河套地区大兴水利，大办农垦，老百姓很欢迎。”傅说：“搞水利可以直接为人民办事。”毛主席便说：“那你的意思想到水利部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主席任命傅作义为政务院水利部部长，共当了23年。毛主席曾嘉许他对水利这一行钻进去了。1955年，毛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亲自授予傅将军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尼克松访问我国。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介绍傅先生道：“这位就是傅作义将军，他为中国人民立了大功。”

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傅作义将军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毛主席经常请傅先生到住处谈话、吃饭，或看电影。阴历五月初五是傅将军的生日。1951年这天，毛主席特意请华北的几个人来吃饭。进餐时，毛主席谈笑风生，使傅作义更感觉得温暖和亲切。饭后回来，傅先生对人说：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傅先生对党也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经常直言不讳地把有关国家大事的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他反驳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周总理对傅先生的关怀十分周到细致。1957年4月傅先生出差到太原，心脏病突然发作，总理闻知即派心脏病专家前往抢救脱险。还有一次，总理出国访问途经昆明，得知傅先生患病住院，立即给邓大姐打电话，请她到医院看望。傅先生患严重心脏病后，仍坚持到机场迎送外宾。总理知道后，即特别指示外交部，免去傅先生去机场参加外事活动。傅先生自从患心脏病后，事实上无法维持正常工作，总理又指示，水电部的其它领导同志要定期到傅先生的寓所汇报工作，征求意见。1973年8月，傅先生病情日益恶化，总理指示卫生部成立医疗小组，专门为他治病。1974年傅先生的病确诊为癌症后，总理当时也因手术十分虚弱，却毫不顾己，亲到傅先生住所安慰。4月18日，傅先生病危处于弥留之际，总理抱病又一次去看望。傅先生在昏迷中听到总理来了，用了很大的力气睁开眼睛。总理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毛主席叫我来看看你啦，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这时傅先生已不能说话，听到这诚挚的话语，他的嘴唇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花。傅作义将军逝世后，周总理带着病主持傅将军的追悼会，表示了无限的哀思和怀念。

“追随幸有缘” ——毛泽东与陶峙岳

欧阳耀祥

陶峙岳将军，湖南宁乡人，一生戎马生涯；他谦虚诚恳，待人彬彬有礼。他原是湖南省政协主席，198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常给我谈起他的过去和现在。特别是，一谈起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相处和共事的经历时，眼睛就闪耀出喜悦的光芒，情绪激动，话语滔滔不绝……

青年时代的陶峙岳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为，非常愤慨。1911年，他参加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为救国图兴，驰骋北伐疆场，曾因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第四十军三师少将师长。血气方刚的陶将军立志要为拯救民族，振兴中华干一番事业。但在国民党尔虞我诈的环境里，他曾一度陷入内战反共的迷津，彷徨踌躇，悲叹一腔热血，没有报国之地可洒。1945年冬，张治中将军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北行营主任，委陶峙岳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那时新疆监狱里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国共重庆谈判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求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蒋介石被迫不得不同意这一合理要求。张治中将军入疆时，周恩来同志委托张将关押在新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送回延安。张治中将军曾三上延安，与共产党颇有交情。陶峙岳受张的影响不小。1946年5月的一天，张治中将军郑重其事地对陶峙岳说，要派能干可靠的人员护送这批共产党人回延安。陶峙岳当即找来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商量，拟订了关于安全、生活、交通、医务等各方面的护送计划，并派刘亚哲处长亲自护送。当时胡宗南的军队正扼守去延安的要道。刘亚哲带着武装队伍护送共产党人及家属130多人，分坐10辆大卡车，由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向延安进发。途中几经与胡宗南进行巧妙的周旋后，终于平安到达陕北。陶峙岳将军说，这是他第一次奉张治中将军之命派人给共产党人办事，也是他与共产党人接触、相互了解的良好开端。

1949年春，陶峙岳将军任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是年秋，解放军直逼兰州，和平解放新疆问题迫在眉睫。在张治中将军的启发下，陶峙岳召开了各种会议，教育部属以大局和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重，统一了骨干思想。9月18日，张治中指示起义的电报，由邓力群同志送到迪化时，陶峙岳将军非常高兴地向邓力群同志介绍了新疆军事方面的情况，邓力群同志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其后，毛主席在北京收到陶峙岳准备起义的两份电报后，随即转给张治中将军，并给张治中将军写了一封信。9月22日，张将军接到毛主席的信和陶峙岳的电报后，又发电嘉勉并嘱陶将军立即派员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洽宣布起义事宜。22日，陶峙岳派第八补给区司令曾震五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9月25日，陶峙岳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归入人民行列。新疆省政府的包尔汉、屈武等于26日也发出起义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于9月28日复电：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9月25及26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1949年9月28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刊上公布后，全军将士及全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为了落实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10月份，陶将军为安定军心，发布了《告全疆将士书》，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宣传这次和平起义的意义，并对全疆将士提出严守岗位，遵守纪律；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三点”要求，及时处理了骚乱事件。陶将军每当谈及这次起义的情况，必里感到无比兴奋。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陶峙岳将军于10月5日亲赴酒泉。7日，会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当陶将军谈及工作情况时，彭德怀副总司令非常诚恳地对陶将军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当时王震将军也在场，他犹如老朋友一样与陶峙岳将军亲切交谈，并向陶将军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畅谈了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

陶老说，这次他在酒泉3天，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了解了解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观察了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他深受感动。特别令他惊异而感激的是，在他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陶老的家属寄寓重庆，已指示入川部队找到他们，并妥善采取了保护措施。

在酒泉停留期间，陶峙岳将军与彭总、王震将军彻夜交谈，谈部队整编和改造问题，派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当王震将军指挥部队进疆时，塞外军民载歌载舞欢迎。陶老还挥笔写了《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1949年12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在共产党的关怀下，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在部队里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对官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部队充满生机。他和王震同志相处共事20来年。王震同志待人诚恳，说话非常坦率，是非分明，公私有别。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诚恳帮助，热情关心陶将军并鼓励和放手让陶将军工作。陶老深深感到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真诚无私，亲密无间，互相支持。这一切都使他终生铭记。1970年陶峙岳将军住在长沙时，王震同志每次来湖南，都要去看望陶峙岳将军。

使陶者难以忘怀的还有和毛主席的交往。1950年2月间，陶老赴北京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机宜，受到热情的接待，使他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陶老，与他亲切握手交谈，态度极其诚恳，平易近人。这使他想起了1930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时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主席成为鲜明的对照。

他向毛主席简要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得认真，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对新疆的问题，毛主席向他讲了三条指示：（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部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陶老激动地说：出乎我意料之外，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竟然留我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口味的菜肴，令人感到亲切。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和毛主席一直谈到深夜，而毛主席毫无倦怠之容。我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及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我的家庭情况等细节。陶老还告诉我，这次接见使他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非常关心他的进步问题，希望他过好三关。毛主席诚恳地对他说，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陶老说：“对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当时并不完全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关，究竟如何解释，我又不便询问。但有一个信念，无论什么事情，跟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不难度过。现在回想起来，三关都过去了，但这三关的确也是不太容易过的。以后，每到北京开会，毛主席总是春风满面走过来握住陶老的手，称他‘陶将军’。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经常和陶将军交谈，征求意见。周总理、贺龙同志还在陶峙岳将军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石河子农场的建设。陶老觉得，共产党人真诚待人，肝胆相照，自己为人民的事业更应荣辱与共，否则能对得起人吗？1949年，党和政府任命陶峙岳将军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授予上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陶将军有三子二女。其次子解放前因在商船上工作，往返于上海、台湾之间，遂滞留在台湾，长女在解放前夕，被挟持赴台，以致音书隔绝。如今他们也是儿孙满堂了。现在每当与大陆儿孙共乐的时候，陶老怎能不思念远在台湾的子女呢？这分裂之苦，离别之痛，陶老常萦挂在心。但他相信，党的“一国两制”政策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洗雪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耻辱。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两个国家的问题，尚且能够圆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内部的事务，理应更好办。况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两党都有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共同语言。他相信，国共两党一定会实现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迫切希望台湾回归祖国，并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台湾的故旧和家人见上一面。

陶老深情地告诉我：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时开始逐步加深的。首先，是在酒泉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发现他们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生活俭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他们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令人无限敬佩。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推心置腹的谈话，诚挚动人。与王震同志的长期相处，他是上级，又是诤友。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在思想上帮助我，使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合情合理，光明正确的。1950年，王震同志和我谈过组织问题，我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年，我和王震赴石河子，途中王震同志又问我对党的看法。我当时答复‘是所愿也，不敢请也。’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我亲身经历了战争和生产战线上艰苦的战斗历程，亲眼看到戈壁滩成为绿洲，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方面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全国各条战线也都是成绩辉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

钦佩不已。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不知何时才能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因此，我从实践中确认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无限光荣的。这是我数十年曲折、迷误和辗转反侧中，在革命先行者们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的结合下认定的真理。1965年，我排除自卑心理，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由于十年动乱，这事情自然就被搁下来了。1982年5月，我再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同年9月28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老从内心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陶老长期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他感到万分激动，好像自己又年轻了许多。

一生革命总同路 ——毛泽东与邓宝珊

王真

邓宝珊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李维汉等同志在回忆他的文章中深情写道：“邓宝珊先生从1921年我党成立后到他逝世，一直和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朋友。”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友谊十分深厚。

1939年，邓宝珊趁去西安开会之便，首次路过延安，毛泽东第一次与他相见，并作彻夜长谈，对他后半生所选择的方向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邓宝珊到重庆开会。蒋介石惟恐他再到延安，电令他绕道宁夏赴渝。邓宝珊说：“不指定路线还罢，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6月17日，邓先生到达延安。即日，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招待邓先生，陪席的有朱德、续范亭等党内外人士数十人。宴会前，邓宝珊一见毛泽东就高兴地说：“毛先生发胖了！”毛泽东风趣地回答：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扩大生产、丰衣足食所致。这次是邓宝珊第三次到延安，被留住了20多天。

留住期间，一次毛泽东又亲自为他设宴，大家围坐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在谈话中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法西斯快将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幽默地说，胡宗南不过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对他进一步坚定团结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他崇敬地说：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是民族之福。还相约，打败日寇后，在北平为毛泽东祝寿。

这年秋天，邓宝珊经渝返回延安。因长期身心兼劳，到延安后，突然患病。毛泽东非常关心，亲自多次慰问叙谈，还请通中医的李鼎铭先生为他治疗，旬日而愈。

由于这种友谊，邓宝珊在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期间，蒋介石、胡宗南一再企图把他统辖的国民党军队推向反共第一线。面对重重压力，邓先生始终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日，拒不参与反共阴谋。同边区与八路军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直到抗战胜利。对此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致邓宝珊的信中作了高度的评价：“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会忘记。8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当年，续范亭同志在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住处曾赠了一首诗给邓宝珊先生，诗曰：“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这是对邓宝珊同共产党合作生涯的恰当评价。

榆林时期，邓宝珊对毛泽东非常钦佩，他们之间，经常有函电往来，单是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就有10几封。邓宝珊的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跟毛泽东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谈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非常幽默，引人入胜。他和毛泽东彼此关心。他

知道毛泽东爱吸烟，每次都要送些好的纸烟。而邓宝珊 1939 年患牙痛，毛泽东特地派牙医师梁智到榆为他治愈。

1949 年，邓宝珊协助傅作义在和平解放北平，促成绥远起义中有功，毛泽东曾在西柏坡接见傅、邓二将军，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时，又特邀傅、邓二将军参加检阅。1955 年，又由贺老总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给以崇高荣誉。

解放后，邓宝珊先生一直保持着同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友谊，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北平解放不久，一次毛泽东对傅作义、邓宝珊说：你们带兵多年，有许多老部下，将来绥远问题解决以后，给你们各编一支部队，由你们推荐人带领。你们不参加民主党派，那你们两人就自己组织一个党吧。傅、邓二将军说：我们是军人，不懂党务，不会办党，搞不来。但毛泽东替他们想得那么周到，使他们都很感动。

开国大典后，邓宝珊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任命书发表后的一天，毛泽东约他去谈话，告诉他，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负责。建议他去之前，先发个电报，有个联系。邓先生对毛泽东的关怀非常感激，他说：我没有想到的，主席却为我想到了。因为延安时期，邓宝珊和彭德怀等同志曾有过关于两次榆林之战的疙瘩。第二天，邓先生把电稿发出。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彭德怀、习仲勋同志的复电，对邓先生表示祝贺和欢迎，词意恳切，邓宝珊很受感动，原来的一些担心，也就释然了。

以后，每年邓先生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1959 年夏，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毛泽东说，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格有意见。邓宝珊说，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毛泽东说，既然如此，当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以后见到什么还是不客气地提意见。当时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直到甘肃省的工作，毛泽东以老朋友相待，和他长谈到深夜，他也从中获得深刻教益。

肝胆相照 ——毛泽东与邵力子

孙琴安

在本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邵力子是一位十分活跃而又非常特殊的文人。他于 1882 年生于浙江绍兴，自幼习诵诗文，早年参加同盟会，与于右任相友善。曾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又曾与于右任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等，还曾担任过上海大学代理校长，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著有《邵力子文集》等。他主要擅长于政论和杂文，诗词非其所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不仅与蒋介石有过密切的交往，被蒋介石委任过各种要职，而且与毛泽东也有过不少接触，私人交情也很好，也被毛泽东委任过各种要职。

早年的交往

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原都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由于各种原因，这三人在 1993 年时，都要退出共产党。当时上海的年青党员对他们三个都很不满意，在背后议论他们，都说他们投机革命，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叛变。

1923 年 8 月 5 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身为中央委员的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代表中央出席会议并作指导。在谈到邵力子等要想退党一事时，毛泽东又代表中央建议说：“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当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

随后，党组织又决定派茅盾去向邵力子、陈望道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了，陈望道却不愿意。

1923 年 11 月，国民党发出了改组宣言，孙中山决心依靠共产党来改组国民党，并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年 12 月 25 日，陈独秀以中央名义向全党发布了第 13 号“通告”，指示全党同志要积极投入“复活国民党”的工作。当时的上海环龙路 44 号是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毛泽东那时参加宣传部的工作，与邵力子，于右任在这里共过事。

1924 年初，随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改组后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建立起来了，这是管理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的党务机构。当时的组织部长是胡汉民，毛泽东任秘书；工人农民部长为于右任，邵力子任秘书。

1926 年 1 月，邵力子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同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同年 8 月，他与谭平山从上海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 7 次代表大会。临行前，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曾为他们开欢送会，瞿秋白在会上向邵力子建议：“这次到莫斯科去，还是做个纯粹的国民党代表好。”

于是，按照这一指示，邵力子便正式退出了共产党，全以国民党的身份开展工作。

毛泽东暗拉邵力子

1933年4月，邵力子被蒋介石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原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专任陕西绥靖公署主任。

由于蒋介石当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置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于不顾，只想剿灭共产党。在他的淫威下，邵力子又不好违背，只得打出“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对于抵御日寇的事在报上一概不闻不问。

1936年毛泽东居住的延安正在陕西省境内，用国民党政府的眼光来看，也正属邵力子的管辖范围之内。毛泽东阅读当地的报纸，全部与抗日无关，眼看“九·一八”事变快五周年了，陕西省政府也无什么大反应。回想邵力子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曾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产生广泛影响，何以现在一变如此？想到这儿，也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于9月8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已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已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

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邵力子收到此信不久——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了。由于邵力子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延安的中共首要人物共过事，了解他们，因此，他赞成毛泽东、共产党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立，“西安事变”的结束，都曾起过有益的作用。

“准予发表”《毛泽东自传》

蒋介石是深知邵力子底细的人。“西安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宣传部长，并在会上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建议。

邵力子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没过多久——早春的一个傍晚，忽然收到了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来信，以及随信附来的《鲁迅全集》的全部底稿，要求中宣部审定出版。邵力子与鲁迅是同乡，他常对夫人傅学文说：“绍兴出了个

鲁迅，是我们民族的光荣，也是故乡人民的骄傲。”可是，现在接到书稿，却是又高兴，又怕被CC特务知道，出来刁难、阻挠或破坏。这天下班回家后，就与傅学文商量起来，最后决定采取快速手段，在一天之内给以审定通过，就这样，《鲁迅全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通过出版了。

春天刚过，此事刚了，就在夏天开始的时候，邵力子的学生孙寒冰又送来了一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请示是否可以刊登。

这又把邵力子难住了。他知道，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蒋介石肯定要恼火的，CC特务也会加以攻击。但是，他毕竟是中共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有过交往，共过事，去年又曾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责备他“窃谓《觉悟》时代之邵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因此感到，当前国共合作，如果把《毛泽东自传》刊登出来，对于帮助人民了解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很有好处的。他和傅学文商量下来，决定刊登。于是，他就冒着风险，大笔一挥，批上了“准予发表”四个苍劲有力的毛笔字。

有了邵力子的批准，孙寒冰马上在《文摘》上将《毛泽东自传》刊登了出来，一时轰动了全国，有识之士无不钦佩邵力子的超人勇气和魄力。

也就在这一年的6月，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谋求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来信，要求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邵力子阅信后，感到这是实现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前提之一，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多方予以支持。所以，从1937年至1947年间，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新华社、《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宣传文化机构，与邵力子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在重庆的谈判桌上

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日本帝国主义缴械投降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受蒋介石邀请，从延安坐飞机来重庆谈判。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以及张澜、郭沫若等各界要人都到机场欢迎。邵力子与毛泽东已近20年未见面了，这次重逢，彼此都十分高兴，握手之后，就在机场合影了一张照片。时光是无情的，64岁的邵力子头发已经花白了，而52岁的毛泽东也失去了青年时代的英俊，显然发胖了，与矮小的邵力子对照之下，他显得更加高大魁梧。

在重庆期间，邵力子在各种不同场合同毛泽东进行了频繁接触。

邵力子曾经说：“经过长期战乱，民生凋敝，国力衰弱，百废待兴，人心思治，全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团结一致，建设国家，岂能再启战端！”本着这一愿望，因此他虽为国民党的代表之一，但遇到国共双方看法不一致时，他就力排众议，侃侃而谈，折冲樽俎，既能基本上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又能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千方百计地求同存异，使之达成协议。10月10日，终于在重庆桂园张治中的客厅，举行了国共两党的《双十协定》的签订仪式。

《双十协定》又名《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在《双十协定》上签字的有：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当天因事未到，是后来补签的。邵力子等在签字时，毛泽东正在桂园楼上。当邵力子等人签字仪式完毕后，毛泽东便走下楼来，与在场的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一一握手。邵力子感慨地对毛泽东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实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苦奔波。”

第二天——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准备乘机飞回延安。邵力子和傅学

文，以及文化界、戏剧界和中外记者 70 多人，都到机场送行。

由于邵力子在这次国共和谈的过程中为中国的和平作出了贡献，因此，他获得了“和平老人”的荣誉称号。

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派社会贤达的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左、中、右三种政治势力。邵力子当时虽然是国民党的代表，但他却始终如一地坚持为和平与民主而努力。他在会上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情况时说：“毛泽东到重庆来是最有诚意的表现，在会谈中政府方面没有提出具体方案，这或者要受到良心的责备，与朋友们的责备，我们没有在会上争取主动。”

遗憾的是，结果国、共发生内战。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节节败退。1949 年 1 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

国民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再次与共产党进行谈判。1 月 22 日，在孙科主持的行政院会议上作出决定，准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 5 人为代表，等候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并推派邵力子为国共和谈的国党方面的首席代表，结果被邵力子辞谢了。

2 月 13 日，李宗仁在上海组成了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 4 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由龙华机场乘机飞往北平。秘书张丰胄随行。而邵力子是作为私人资格前往。

当时毛泽东还没有进北平、在石家庄平山县西柏坡。于是，邵力子等再由北平乘专机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与他们同行。

到了石家庄，毛泽东、周恩来立刻接见了邵力子等人，并进行了谈话。当时毛泽东还给李宗仁写了封信，由邵力子等人交给李宗仁。

2 月 27 日，邵力子等由北平飞回南京。当时邵力子听说浙江省主席陈仪被免职，并被汤恩伯扣留上海，知道事情不妙，就未回上海。

3 月 24 日，何应钦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由于当时的战事形势，在首次政务会上，又组织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并要邵力子任首席代表。邵力子知道和谈希望不大，坚辞不受，结果只好由张治中担任这次谈判的首席代表。

4 月 1 日，邵力子等飞抵北平。

4 月 9 日，邵力子应毛泽东邀见，与毛泽东进行了个别谈话。

此后，邵力子就留在北平，夫人傅学文接了邵力子的信后，于 4 月 17 日坐了“和谈”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北平。

6 月中旬，邵力子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主席团成员之一。10 月 1 日，邵力子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奉毛泽东之命巡视水利

1950 年深秋的一天，毛泽东邀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中南海的颐年堂住处。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车后，前来扶邵力子下车时，毛泽东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他神采奕奕地迎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啊！”

邵力子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那让我们就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说着，3人来到客厅门口。主人示意客人先进，客人谦让着，毛泽东朗声一笑，说：“客不进，只有主先行了。”边说边领先走进。

主客入座后，邵力子发现书桌上文房四宝还没收拾，写好的字幅上墨迹也没干透。于是就问道：“主席正在写字？”

“是啊。”毛泽东神秘地笑了一下。

毛泽东看看邵力子，邵力子望了望毛泽东表情，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又接着说：“我刚才做了个谜，想请你这位清朝举人给解一下。”毛泽东说着站起来，拿起宣纸递给他。只见上边有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治淮”。毛泽东对邵力子说：“邵先生，我这可是个续字谜啊！”说完拿起一支烟，用火柴慢慢点燃，又悠然地吸了一口。见邵力子一副既认真又纳闷的样子，便朗声大笑起来：“邵先生，我这续字谜只有两个字。”说着用手指着放满文房四宝的书桌。

邵力子顿悟，也笑了起来，说道：“方案！”

“对啊！”毛泽东笑着说：“今天我请二位来，就是为治理淮河的方案，听听你们的意见。”毛泽东又风趣地对邵力子说：“先生当年做过西京王。记得我们红军一到陕北就听到老百姓美传先生是大禹治水。先生重视黄河水利，先生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还有龙门闸、风陵渡的工程很浩大嘛。陕西的老百姓至今仍在流传先生当年治水的故事。”

邵力子答道：“主席太过奖了。当时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我那时任国民党政府陕西省主席，怎能与今天共产党和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相提并论。无足挂齿矣！”

毛泽东又说：“先生在那时的作为，今天看来也确实是难能可贵啊！今天请先生来，一是想听听先生的意见，二是如先生能离京去实地考察，那是最好不过。这就是我那续谜的谜底。”

“行，行，可以去考察。”

毛泽东又转过脸对傅作义说：“将军是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虽将军带兵打仗几十年，但将军博学水利工程，对我国的水利情况是了解的。请将军拟定一个全面的兴修水利方案。要想改变我国的贫困面貌，看来首先要大兴水利建设。能把几千年来水患化害为利，那可是造福于民啊！”

“对，对！”傅作义也连连点头答应。

1951年5月，邵力子遵照毛泽东的意思，以“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的身份，率领各民主党派及中央有关各部委负责人共32人，分赴皖北、河南、苏北三省工地和南京、上海、海宁等地视察。为了支持邵力子的工作，毛泽东还特意亲笔题写了“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几个大字，后被标成锦旗，邵力子走到哪里，它就飘到哪里，一直跟着邵力子的后面。

当邵力子来到淮河岸边的时候，眼前，依然是疏落的荒村，歪歪斜斜的泥搭茅屋，解放的欢欣并不能冲洗淮河两岸乡亲们脸上的萎色，穿着褴褛衣服的老人和孩子们，在阳光下曝晒着嶙峋瘦骨，妇女们黑色的眼珠中，也缺少那本来应有的闪亮的神采，劳动热情高涨的千千万万民工们，吃的依然是野菜粗粮和稀汤……望着这一切，邵力子的心也像淮河的水翻滚了起来，他深感人民的生活依然困苦，肩负的建国任务还很繁重啊！同时，他也感到，毛泽东所提的根治淮河的建设任务，还是相当及时的。

在安徽的治淮工地上，他恭恭敬敬地把毛泽东亲笔所题的锦旗献给了那

些勇敢的治淮英雄们，然后，他又广泛接触群众，慰问民工，听取意见，勉励大家，并尽力帮助解决困难。就这样，这位 70 多岁的老人，奉毛泽东之命行程 6783 公里，历时 52 天，踏遍了淮河两岸的山山水水、大小城乡。

邵力子回到北京以后，曾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来了电话，说：“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6 年 10 月，为国共合作而努力，北京准备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亲任主任，邵力子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0 月 31 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毛泽东后来也撰写了《纪念孙中山》一文，盛赞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由于邵力子在筹备这次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活动进行得十分隆重热烈，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毛泽东对这次活动和 11 月 12 日的纪念大会都很满意，并与周恩来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保护邵力子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几乎是与批“马尔萨斯人口论”问题交织进行的。当时邵力子有不少朋友和过去曾一同工作过的人都因讲了几句话，提了几条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他当时想不通，心里很沉闷。曾直言不讳地说：“发言的人不少还是好心出发的，不能谈了一些意见，就说右派进攻。”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虽政治运动不断，邵力子始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邵力子眼看南汉袁、老舍等老朋友均遭批斗，忧心忡忡。同年 8 月 30 日，周恩来下达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点名需加保护的就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等。

次年 12 月 28 日，邵力子溘然长逝，终年 86 岁。

落叶归根，藉图良晤 ——毛泽东与卫立煌

赵荣声

（一）延安初见

1938年4月17日天一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军队由延水关出发，经过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10几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在今天是极普通的车队，毫不足奇；但是在40多年以前，在这个很偏僻的陕北乡村中则为少见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村落中窑洞里的居民被吸引出来看热闹。这10几辆大卡车满载着总指挥部里的几大处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

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的小汽车，第一辆小汽车中坐的是卫立煌、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籍，和司机并排坐在前排的是戴着金丝眼镜、白手套，佩挂着左轮手枪的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小汽车中坐的是一个参谋、第九军军部参谋长杜凤翥，一个秘书赵荣声，以及一个随从副官张学诚，和司机并排坐的是一个佩带盒子枪的卫士排长。

到了延安城受到热烈的欢迎，其盛况出人意料。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即发现新贴出的用红绿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越近延安城越多。车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走近一看，许多机关都派人来了，各学校差不多都出来了。汽车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此起彼伏，非常热烈。我对于延安的情况是知道一些的：1937年4月，我第一次到延安，对于延安有一个很深的印象；第二次是10天以前，跟新成立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一起，在延安逗留3日，这一次可以说是第3次到延安了。延安有多少人口，多少机关，我心中大致有个数目。现在，我在车窗中看见这么多的人，看来延安是倾城而出，礼遇之隆重恐怕是延安城中空前未有的，可以看到延安人士盼望国共合作的热忱，可以看到延安人士对于和八路军并肩作战的友军的热情。我想卫立煌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热烈欢迎的场面，我自己也觉得深受感动。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前面两辆汽车停歇下来，卫立煌等人走下车来，由来迎的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人迎接上去。其余10余辆大卡车没有停留，一辆接一辆地直向南开。滕代远参谋长等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走到城中一个接待处。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半步，表示欢迎，和每个客人亲切握手。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表示敬佩，觉得自己有机会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毛泽东也夸奖卫氏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谈锋极健，首先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继而谈到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决不能忽视。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话题一转，政治家又变成军事家，毛泽东对于日军的动向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根据我们的判断，最近日军要进占徐州……卫立煌和郭寄峤等人听了极其钦佩。

毛泽东接着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总司令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经要到5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卫立煌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客人除了卫立煌，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一个秘书，一共5人。主人方面除了毛泽东，作陪的还有滕代远参谋长、肖劲光主任，一桌共坐8个人。筵席非常丰盛。延安方面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自奉极其清苦，有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飧客。毛泽东酒量大，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卫、郭等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感到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半个月以前在西安，林伯渠嘱咐我随战地工作团北行经过延安的时候，去见一见滕参谋长。后来战地工作团离开西安前往延水关，果真经过延安，在延安停留了3天，我乘全团参观抗大听刘少奇报告的机会，自己秘密去见滕参谋长，把我怎么进入卫立煌司令部及在那里所见所闻，向滕参谋长作了详细的汇报。滕参谋长又带我去一个设在抗大范围内的窑洞——中央军委统战部，向当时正在这个窑洞里值班的刘向三同志汇报。没隔多久，今天我又随卫立煌由延水关到延安，和滕参谋长就不陌生了。我到达延安没有多大一会儿就偷偷地把预先写好的一个材料——新的情况——交给了他，并且在客厅外面的过道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滕参谋长闻悉卫立煌已经背熟了到抗大演讲的稿子，就临时更改了接待卫立煌的日程，下午请他去参观抗大。这样，饭后没有多事休息，拍了几张毛、卫两人的照片和8个人的照片，两部黑色小汽车就驶往抗大了。

……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很大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7月7日发表的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思想有很好的疗效。特别是看到抗战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才能进入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根本的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在战争中须经过内线与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根据地由小块逐渐变成大块等段落，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

（二）海外归来

1949年初，卫立煌为躲避蒋介石对他的迫害，秘密前往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卫立煌闻讯兴奋异常，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弛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
江

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就携带夫人和子女一起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言：“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孩子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遣派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鱼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了干涉。1月18日，人民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帮报纸跟在美国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道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谩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这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又恐怕他的夫人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眼前。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恩来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要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广州。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

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他们刚到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来电，那电报是：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其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1955年4月5日，卫立煌一行来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又会见卫立煌。次年9月的《人民画报》上，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

（三）两件引以为荣的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

毛泽东写道：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文件中这么被提出，可以不朽矣。文中这句话是毛泽东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共产党和谩骂共产党两类不同的人时，把卫立煌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提了出来，并不偶然。这不啻是对于卫立煌这时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愿意进行自我改造，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其原先的立场，走到人民这方面来表示欢迎。

卫立煌另外还有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话，是当着卫立煌的面提出来的。

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16日讯，讲的是周恩来总理16日晚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情形。其中有这么几句对话：

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总理作了介绍。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日报》编辑还在这一条欢迎酒会的新闻上面，加了一条“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标题。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事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期望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毛泽东与陈明仁

钟德灿

1949年8月4日，原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将军，与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将军在湖南长沙通电起义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誉他们的义举：“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主席曾亲自草拟电文给程潜和陈明仁，邀请他们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陈明仁于9月3日动身赴北平。当时，因长沙到武汉的火车不通，汽车也不能直达，加之国民党常派飞机狂轰滥炸，路上不甚安全，因此第四野战军特派第十二兵团的警卫部队专程护送，绕道平江、通城，坐了两天两夜的汽车，才到达河南境内，然后，从郑州坐火车绕道徐州，到达北平。

当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亲自到车站迎接陈明仁将军，将他安排住在六国饭店。9月12日，朱德总司令在北平交际处设宴欢迎陈明仁，出席作陪的有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等2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这一天，吃的是西餐，但朱老总兴致勃勃地扎起衣袖，亲自下厨炒了一个四川菜招待陈明仁，并亲切而又风趣地对他讲道：“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在我们部队里一些湖南老乡说‘不辣不革命’，而我们四川人不光是吃辣，还要加花椒面，叫做麻辣，你尝尝味道怎样？”老总的豪爽风趣和那道麻辣的佳肴，吃得陈明仁全身热乎乎的。

9月19日，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邀请程潜和陈明仁同游天坛公园。刘伯承、陈毅、粟裕、李明灏、李明扬和张元济等也陪同出游。游到祈年殿前，毛主席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出来：“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

“这……”陈明仁这位久经沙场的虎将，一时竟感到手足无措，踌躇不前。

“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了罗！”陈毅同志一边说，一边将陈明仁推到毛主席眼前，陈明仁恭恭敬敬地站在毛主席右手边，和毛主席照了个双人半身照。

照完相后毛主席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请你这次开会之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一番，写些书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友故旧，促进他们及早觉醒，及早归来。”

“是，我一定照办。”陈明仁爽快地答道。

“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的，都送一张。”毛主席还告诉他：“后天二十一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还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都全了。”

陈明仁听到这里，非常感动，主动向毛主席检讨说，起义前自己认识不足，蒋介石和李宗仁派黄杰、邓文仪到长沙时，有人劝我把他们扣起来，我不仅没扣，还把已扣起来的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毛健钧也放走了，错过了

机会。

“没错没错，不要扣，革命不分先后，不要勉强人家嘛，今后，凡是愿意过来的，我们派飞机接，凡是愿意走的，我们派飞机送，你那种搞法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怕人家讲闲话。”

9月21日，陈明仁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始终精神焕发，他在大会发言中，首先便说：“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又先后两次接见陈明仁，每次谈话的时间都很长，第一次毛主席亲切地对陈明仁说：“你顺利地过了战争关，过来了就是好的。”并问他：“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从政？还是从军？从政，就打算给你拨一笔特别费，由你全权开支。”

“报告主席，我是一个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不过，我那个部队还是国民党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吧！”

“那好，你还是去带兵吧。我们拟把你的一兵团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你有什么条件吗？”

“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我一点条件也没有。”

“哎呀，人家有条件的，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

但是，第二次陈明仁去见毛主席时，却又多次提起条件来了：他要求打仗，要求让他参加作战立功。

毛主席笑着对他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

后来，毛主席果不食言，10月5日发给华中局林彪并告湖南省委的电报中，除了指示要给他补充一批人枪外，还专门讲到“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因此，后来陈明仁的第二十一兵团参加了广西的剿匪战斗，并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1日，陈明仁与程潜等许多起义将领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一同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观礼，使陈明仁感到非常激动。

京华的观感，毛泽东两次亲切的接见和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陈明仁久久难忘，他后来多次对下属陈藏仲等谈及：“我过去在蒋介石手下多年，很少听过这么诚挚亲切的话语！”

陈明仁将军起义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还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常务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行政五级。他和他的一家都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

“大同学”单独会见“小同学” ——毛泽东与程星龄

钟德灿

程星龄，湖南醴陵人，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早年曾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与毛泽东系先后同学，后考入北京大学。因参加国民党左派，积极投身于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斗争，差点与李大钊一起被军阀杀害。后来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训处宣传科长、重庆党政委员会设计委员、天水行辕参事。由于他敬重毛泽东，积极拥护联共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程潜的支持下，曾亲赴解放区，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左权、宋任穷等将军热烈欢迎。1942年出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秘书长，曾多次向省主席刘建绪介绍解放区的见闻，盛赞毛泽东领导八路军坚持抗日的精神，使刘在福建启用和保护过一些共产党员，他也结交了一些中共党员朋友。1945年7月，“羊枣”案发，他被蒋介石列为“异党分子”，拘禁在重庆、台湾。后经程潜、刘斐等多方设法，方被保释，出任台湾训练团讲师。1948年8月，他应好友、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统战组长余志宏的邀请，从台湾到长沙做他族兄程潜将军的策动工作。他不怕白崇禧的威胁和高压，也不畏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派他的亲侄儿毛钟新亲到长沙组织杀手、企图将其绑架和暗杀的危险，亲自代程潜起草了给毛泽东的“起义备忘录”，曾亲自赴香港带回毛泽东对陈明仁的谈话，对促进程潜、陈两将军长沙起义与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程星龄备受毛泽东和党与人民的重视和信任，曾历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协主席等职。1987年10月22日病逝于长沙，终年88岁。

（一）毛泽东对程星龄开玩笑说： “不云”怎能“润之”

1949年8月4日，程星龄协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长沙起义后，8月下旬，毛泽东即专电邀请程潜、陈明仁等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作为特邀代表，程星龄随程潜于9月7日晚抵达北平，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和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聂荣臻、黄克诚、张治中、邵力子等100多名党政军领导和各民主党派与各界著名人士到火车站热烈欢迎，这是极为少有的隆重迎接。据说，毛泽东亲到火车站迎接，除这次外，仅还有一次是迎接宋庆龄。

毛泽东迎接程潜一行后，即在中南海举行晚宴，为他们洗尘。后来，程潜到中南海拜访毛泽东，毛泽东又设宴招待程潜等人。席间，毛泽东说他还未去过天坛，邀程潜、程星龄等前往游览，并嘱秘书约集陈毅、粟裕、罗瑞卿和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于当日下午同游天坛。

9月23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起义有关人员。在圈定名单时，毛泽东说：这次邀请的虽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义将领，但不要忘了我一师的那个小同学——程星龄，他在促进程潜、陈明仁起义中

是有重要贡献的啊！

全国政协开会的前一天，程潜到中南海拜访了毛泽东，回到北京饭店住处后，他高兴地对程星龄说：“星龄呀！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同学要单独见见你这个小同学哩。”

程星龄一下没反应过来，不知是怎么回事，不解地对程潜说：“颂公，看您高兴得与我开起玩笑来了。什么好消息，哪个大同学要单独见我这个小同学啊！”

程潜到北平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如此热烈的接待，是他起义前没想到的。他之所以能够起义成功，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他这个族弟程星龄的出谋划策。程潜对程星龄胜过亲弟弟般的器重，曾委他作为与中共联系的全权代表。当他这次拜访毛泽东时，也简要地向毛泽东谈了点程星龄的情况。实际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就从中共湖南省地下党和香港乔冠华与章士钊等处，得知了程星龄的许多情况。所以，毛泽东在游览天坛和宴请起义主要有功人士时，都没有忘了程星龄。

程星龄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在即将举行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会单独接见他，并亲切地称之为“小同学”，因此，程潜的话，使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程潜见程星龄难解其意，开怀地笑道：“星龄呀！毛主席说你是他一师的同学。他比你大，你比他小，你是他的小同学。他要单独见你叙旧，一会就有车来接你。毛主席都没忘记你这个小同学，你就忘了毛主席这个大同学？”

程星龄这才恍然大悟，连声说道：“岂敢！岂敢！我和毛泽东在一师是先后同学。他是第八班四级的，时年 25 岁；我是 15 班一级的，当时才 17 岁。他是高班，我是低班。他当时在一师已是声名卓著，被杨昌济等老师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我还只是幼学。”

程星龄边说边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纸张发黄、稍有破损的民国六年十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翻给程潜看：“这第 10 页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就是毛泽东。我的名字是在这 26 页上。”程星龄边看边说：“出于对毛泽东、杨昌济、徐特立等的敬仰之情，我一直将这本《同学录》珍藏着。这次带来想给毛主席看看，但又怕没机会，更忌高攀之嫌。想不到毛主席主动来认我这个小同学，还要单独见我。颂公，你说我这《同学录》带去好，还是不带去呢？”

“带去，带去。保存几十年了，也不容易，也可表达对主席敬仰之情呢！”

程星龄在程潜的鼓励下，带着《同学录》来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里的菊香书屋院内。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程星龄随人走进菊香书屋时，边走边看，只见院内的十字路口处摆了两盆棕树，两盆无花果，会客室也只有几张沙发和茶几，没有字画、古玩和盆花之类陈设。办公室内也只见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图表，办公桌一侧有两张沙发，一个大茶几上面摆着几部电话机。

程星龄曾担任过国民党要职，经常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家里，还到过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办公室和家里，哪家不富丽堂皇，豪华奢侈。而新中国的创始人，党的主席毛泽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竟如此简单朴素，不禁使他大吃一惊。当时给他印象之深，数十年后谈起，还记忆犹新。

毛泽东主席见到程星龄来，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迎上前去，满面笑容地紧紧握住程星龄的手说：“小同学，请坐，你今天就在我这里吃中饭，我们好好谈谈。”

程星龄的双手，被毛泽东那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住时，不禁感到一股暖流遍布全身。他非常激动地说：“主席，在一师时，您就是我敬仰的导师。所以，我一直将我们湖南第一师范民国六年的《同学录》珍藏至今啊！”

“啊！你还保存有我们民国六年的《同学录》？带来没有，给我看看。”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

“主席，我带来了，请您看吧。”程星龄取出《同学录》，双手呈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翻看，一边讲述他对哪些人还有印象，哪些人印象还非常深刻。当翻到周世钊的名字时，他说：“星龄你在长沙与惇元（周世钊别号）有来往吧，最近我还收到由他领衔，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与老师联名给我发来的贺电贺信哩。我和他不仅是同班同学，还盖过一床被子哩。”

程星龄说：“惇元兄在我们母校一师任教，现为代理校长。因我从台湾回长沙后，主要是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做颂公和子良（陈明仁，字子良）的起义工作，交往不多，但知道他道德文章都堪称师表，深得众望。”

“啊，此兄骏骨未凋，甚有生气。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去。一师由他任校长，是深得人心的啊！”毛泽东说完继续翻阅《同学录》，当翻到26页，看到程星龄的名字时，毛泽东边指边开玩笑说：“星龄呀！你的名字在这里。你的族兄颂公字颂云，你的别号却是‘不云’，我的叫‘润之’。你‘不云’，天上没云就不能下雨。不下雨，我怎能‘润之’呀！就滋润不了土地嘛。”

程星龄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如此与他开玩笑，不免一愣。但他也是非常机敏之人，反映很快。他笑着对毛泽东说：“主席，您比我早生于韶山仙境，我晚生于醴陵山乡。您先我入一师数年，已借得洞庭云雨，滋润着一师和三湘大地。我这没云水的人，也靠了您的滋润，才有今日啊！不过主席，我这别号，从一师后再也没用了，所以，连我家里人都不知道。而主席‘润之’的别号，如今已是天下人都知道啊！”

“那我不叫你‘不云’，还是叫你星龄好了。你也不要恭维我了，恭维奉承我的多了，我就可能会晕头转向，搞不好不是降甘霖而是下冰雹，那就坏了。”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一说，不禁想起了起义前在南京和香港两次见到章士钊，章士钊极力向程潜和他推崇毛泽东的情景。第一次是在南京。1949年3月代总统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主要目的是想争取程潜与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妄图与中共划江而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专门宴请程潜和程星龄，促程与南京政府协作。正在此时，章士钊从上海来到了南京。因章与程潜既是密友，也是诗友，相互甚为敬重，无话不谈，经程星龄周密安排，章同程潜做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在密谈前程星龄还将程潜的思想顾虑给章士钊说了。特别谈了蒋介石派到程潜身边时刻进行监视和游说的军统大特务、长沙绥靖公署高参杨继荣和绥靖公署参谋长刘嘉树等人鼓动程潜一定要与中共打到底，决不能背叛党国的情况，要章士钊好好地做做程潜的思想工作。

章士钊与程潜密谈时，根据程星龄提供的情况，首先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程潜，然后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以促

进程潜的起义决心。程星龄清楚地记得，当时章士钊对程潜说：“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满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章不是国民党员）已搞了20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章士钊还以他的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顺乎自然地说，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称“毛泽东英明果断，襟怀宏伟”，“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的伟大人物。空前是肯定，绝后不应说。”并谈了毛泽东对程潜的殷切期望。

第二次是1949年6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士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

程星龄简要地向毛泽东谈了上述情况后说：“主席，行严（章士钊字）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成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小的作用！”

毛泽东听后说：“促成颂公和子良的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行严有功，但你的功劳也不小啊！行严说我是什么‘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杰出领袖’，就有些言过其实了。没有夺取政权时，行严的赞誉，可以获得人心。现在夺得政权了，说好话，恭维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危险的事。要注意李自成的教训。”

所见所闻使程星龄亲身体会到章士钊对毛泽东的颂扬，更是言之不谬。但他还是感到毛泽东的住所和办公室里的陈设太简陋了些。便忍不住对毛泽东说：“主席，败不馁，胜不骄，永远保持创业时期艰苦朴素的本色，是使国家民族兴旺发达的根本。但我这小同学感到您这办公室里，连幅字画、连盆鲜花都没有，就有些与这一‘菊香书屋’之名不符了。”

毛泽东一听，哈哈大笑道：“我刚到这里时，盆花多得很，简直是一个百花争艳的小花园。你说这样行吗？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图自己享受，与李自成、国民党不同的也就在此。所以我说，过去我管不着，现在我住在这里，就不要摆这么多的花了。到我这里来的人很多，以后还会有工人、农民代表来，他们来了，要看看我，看看我住的地方。如果我这里摆了那么多漂亮的花，那他们也会上行下效，向我看齐，养成这种风气就不好了。当领导的一定要带好头，不然，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敬老尊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共产党人更应发扬光大

毛泽东约程星龄单独会谈，一是为了叙旧，一是为了商量程潜的工作安排。当时毛泽东正考虑程潜的工作安排，感到程潜系国民党元老，资深望著，还是先找程星龄商量商量好。于是，毛泽东看完《同学录》并谈笑完后，故作正经地对程星龄说：“今天我请你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就是对颂公怎样安排为好。我原先打算请颂公当西南招抚使，后来感到不那么恰当。现在形势发展得很快，更不需要这么一个机构了。中央决定分设几个大区，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属四野作战地区。我们有个党的问题，还有个部队的问题，拟以林彪当主席。颂公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活动时，我们还是学生，林彪比我的年纪更轻。我想请颂公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一下，再同颂公婉商。”

程星龄一听，又是大吃一惊。所惊的是对程潜如此尊敬，开口就尊称“颂公”。不像过去蒋介石，虽然程潜在辛亥革命时，任武汉前线重要指挥官，讨袁护国、护法时，任湖南总司令，蒋介石也还是个学生，就是在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时，程潜就任军政部长，蒋介石还是他的属下，但蒋从来就不尊敬程潜。吃惊的更是，毛泽东对一个刚起义的人员，就安排如此高位，还要请他先考虑婉商。他情不自禁地说：“主席，您现在是开国元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要再‘颂公’‘颂公’的尊称了。再说程潜这次来京，承蒙主席这么优待，他的感激心情，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关于工作的安排，主席怎么安排，他都会欣然从命，更何况安排如此高位！这一点，我很清楚，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摆了一下他的大手说：“不，还是要请你先考虑好了，去同颂公商量一下，明日回我的信。”

程星龄禁不住说道：“主席，您对颂公太敬重了，对我也太客气了，使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毛泽东很认真地说：“颂公是老前辈，我们做晚辈的当然应该尊敬。敬老尊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共产党人更应将它发扬光大！”

程星龄不禁想起毛泽东邀请程潜和他以及张元济、陈叔通等一同游览天坛的情景。毛泽东不仅没有一点“天子”威仪，而且处处尊敬他们，一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合影时，总是要拉他们站在前面。程星龄是晚辈，总往后面躲，或站得远一点，但陈毅、粟裕和罗瑞卿等领导只是把他拉进去。陈毅还对程星龄开玩笑说：“你躲啥子嘛，蒋介石、毛人凤、白崇禧，这些要抓你杀你的人都不怕，怎么还怕和我们一起照个像！”当时，程星龄既激动又谦逊地说：“我既是晚辈，又没什么贡献，怎好和长辈与你们这些开国元勋一起合影！”毛泽东看了程星龄一眼，笑着说：“你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了这样多年，又协助颂公和子良起义，也是有功的。一起照张像，留个纪念吧！”

就是陈毅、粟裕和罗瑞卿这样拉，毛泽东这样说，但每当合影时，程星龄总是让在程潜或陈明仁后面。行进中，记者要拍照时，他则躲在人后。只有1951年赴京，陪同毛泽东游览十三陵时，毛泽东非要他和程潜、王季范4人一起单独合影留念，他才只好站在毛泽东旁边，照了一张比较清晰漂亮的照片。

张元济是清末戊戌科状元，曾参加戊戌变法，主持商务印务馆，是我国出版界老前辈。陈叔通则为清朝翰林，历经几朝几代。两人都极为毛泽东所尊重，都是特邀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那次游览天坛，直到回音壁古柏树下休息时，程星龄看到毛泽东将张元济请到身边坐下，亲切地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皇帝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做官时是否来这里。张元济笑着对毛泽东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毛泽东听后，爽朗大笑，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

流了不少血，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接着毛泽东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他读了《科学大全》这本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在案头，写作时经常翻阅。

程星龄还见毛泽东尊称陈叔通“叔老”，与陈叔通交谈时，称赞陈叔通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毛泽东说：“叔者，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真是难得！”陈叔通说：“我没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毛泽东还亲自为陈叔通打开汽车门，照顾上车，然后才自己上车。

程星龄激动地说：“主席，您既是亿万人民的领袖，也是敬老尊贤的楷模！我回去给颂公转达，我相信他是会感激不尽的。”

程星龄回到北京饭店，对程潜讲了毛泽东对他的安排考虑，程潜也激动地说：“我这多年与共产党为敌之人，刚投向人民，就受到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如此殷切关怀，怎能还有什么意见，只觉自愧！”他还抬起头来，望望窗外，无比感慨地对程星龄说：“星龄，我同蒋介石共事一二十年，蒋的机密从未让我与闻过。这次一到北平，毛主席就把解放军向西南大进军的军事计划给我看，并征询我的意见。这是极其重大的军事机密啊！从这也可看出，毛泽东确如行严所讲的襟怀宏伟，一代伟人，对我们这些起义的老人是既尊敬，又推心置腹啊！”

程星龄还对笔者谈过许多毛泽东敬老尊贤的故事。他说，毛泽东主席故人情深，很重旧情，第一次单独接见他这个“小同学”时，就详细地询问过尚在湖南的原一师的老师和同学的情况。当程谈到王季范老师时，毛泽东主席激动地说：“这是我九哥。没有他，就没有我。他当时不仅在经济上帮助我，学业上教诲我，对我从事的活动也尽力支持。我常常惹出一些‘祸’来，也多是出面才使我转‘危’为‘安’。特别是那次为驱赶校长张干的事，更给他惹出不少麻烦。他和停元兄在你们促成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起义后，都给我来过电报。九哥还给我提出了‘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的很好的治国建议。”

1951年，毛泽东主席约我和颂公、王季老一起，同游十三陵。他对王季老非常尊重，不仅请他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而且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经常不是请他到中南海家里叙谈，就是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他。有一次，王季老对毛泽东说，像我们这种对革命没贡献的人，住在这样高级的饭店，实在感到惭愧和不安。毛泽东却说：“九哥，不说你对我有大恩大德，就是你过去搞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为国家民族培育出多少人材！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就算是有贡献的么！更何况九哥你唯一故儿子，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毛泽东主席讲王季老唯一的儿子，叫王德恒，即王海容的父亲。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回湖南桃源搞地下工作时被特务杀害。当王季老给我谈起这些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敬重时，激动得花白的胡子都抖动起来了。王季老后来任政务院参事，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1月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献了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毛泽东不仅对有学识的老人，对老师同学敬重关怀，对其他只要做了一点好事的老人，也给以关照。程星龄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省文教委员会主任、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毛泽东曾多次给他亲笔写信。其中就有两次来信谈到要关心照顾老人的问题。一次是衡山县有一位姓王的老人，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照顾生活。毛泽东将王的原信转给程，并给程写信说：此人是我辛亥革命时当新兵的副目，1924年在广州东山时还见过一面，此后就没

有见过面了。在我的印象中，此人是比较老实的。现在来信给我，要求照顾生活。此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如你们对辛亥革命人员订有照顾办法，请按统一的办法办理。如无统一办法，请根据他的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照顾。毛泽东还在“副目”二字后面加上括号，注明“即现在的副班长”。另一次，是一位在谭延闿督湘时，作过谭的幕僚，做过一些好事，晚年穷极潦倒，靠卖字为生的周姓老人，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生活上给予照顾。毛泽东把周姓老人的信亦转给程，并要程了解一下，如无其他问题，可给以适当的照顾。信中还谈到：“人都要老的，谁也逃不脱这一自然规律。人老后精神上就不易自我解脱，再加之生活困难，就更为痛苦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照顾老人，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苦。”

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生活困难，给毛泽东主席去信求助。毛泽东就给周世钊寄去500元，并写信道：“惇元兄，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予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1965年1月12日又给周世钊寄3000元，请他酌情送给生活困难的老穷师友。

毛泽东对程星龄说：“民革”是革命组织，你先参加“民革”好

1949年10月初的一天，毛泽东又单独约见程星龄。程星龄为毛泽东对程潜等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不胜感激，他说：“主席，您对颂公如此殷切的关怀和优渥的待遇，不仅会使颂公感激不尽，我也会终生难忘！”

毛泽东摆了摆手，吸了两口烟后说：“星龄呀！我还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谈对你的工作安排哩，怎么就‘终生难忘’！？”

程星龄更是激动地说：“主席，我的工作安排用不着征求意见，什么都可以。”

“星龄呀，怎么你们醴陵人都是如此呢？子良（即陈明仁）开始我征求他的意见时，他也是说什么意见都没有。我说，提出意见的，我还好办，什么意见都没有的，我更难办。后来，子良对我说，‘我是军人，还是想在军事上为国家尽点力量。’我说，那你仍旧去带部队吧！我们已决定把你的第一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仍由你当司令员。这个他满意了。星龄，你有什么意见，还是对我讲好了。”

程星龄犹豫了一下说：“主席，对工作的安排，我真没什么意见。但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呢？”

“啊！是这么个愿望。”毛泽东想了一下对程星龄说：“如果说够条件的话，你早就够了。你早年参加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起，从事反对军阀张作霖的斗争，是最早与我党合作共事的朋友之一。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同情我党，支持我党，早已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起到了我们许多党员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不过……”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抽了两口烟后继续说道：“子良提出继续带兵的愿望，我满足了他，但你这提出加入我党的要求，我认为暂缓为好。你最好还是先参加‘民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与你早年参加的国民党左派一样，是革命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进、九

三等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星龄，你参加民革，可能比参加共产党，能像过去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程星龄听毛泽东这样一讲，谦逊地说：“谢谢主席对我的过高评价，说不上‘是什么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但从这20多年的实践中，我感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是国家民主的希望所在，因此我同情支持共产党，作了一些爱国者应做的事情。”然后，程星龄又说：“主席提出要我暂缓参加共产党，先参加民革，我会认真考虑的，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早就定了，望主席在适当时候也不要忘记啊！”

毛泽东点点头说：“‘小同学’，我知道你们醴陵人大都有如此坚毅的个性，说了的就要办到，可谓‘不这目的誓不罢休’！子良是如此，你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子良常年带兵打仗，显得更为直爽，你则一直担任文职，甚为婉约。好吧！那就先如此，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民革是何香凝、李济深、谭平山等一些国民党内的进步元老于1948年1月成立的革命组织。它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独裁，与共产党紧密合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程星龄听从毛泽东的建议，于1950年参加了民革，历任民革中央第一届委员、第六届常委、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民革湖南省第一、五届常委，第六届主任委员，第七届顾问等职。

后来，程星龄得知，“九哥”王季范和周世钊向毛泽东提出要参加中国共产党时，毛泽东也婉言劝他们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说：现在全国解放不久，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在农村发展党员，采取慎重的态度，吸收党员比较少，你们最好先参加一个民主党派。民主同盟是知识分子的组织，你们参加民盟好了，并且对周世钊说，民主党派的工作也是党的工作。做好了民主党派的工作，也就算是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友好关系，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生命是：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以我说做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光荣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

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的这些谈话，程星龄非常敬佩，所以到他临终前都一直安于做民主党派工作。耄耋之年，仍为参政议政，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湖南经济建设奋斗不懈。1983年，被选为湖南省政协主席和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后，更是殚精竭虑，耗尽心力。他于1984年邀请海外湘籍人士发起成立了湖南经济建设促进会。1986年1月，还应邀访问香港，联络一些港澳著名实业家组建公司，引进海外资金，促进湖南经济的发展。

程星龄按毛泽东讲的参加民革并积极从事民主党派的工作，但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一直没有放弃，曾多次提出，且愈老愈切。也正如毛泽东1949年对他讲的：“我相信你的愿望终会实现的。”程星龄于1987年10月，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终身的夙愿。

“我绝不打内战” ——毛泽东与马占山

马玉文

父亲马占山，出身贫寒，在苦难的生活中奋斗，养成他倔强的性格。他戎马一生，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尽管一生中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但毕竟是英勇抗日，并敢于抗蒋介石之命。他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明确，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父亲在政治思想上有了鲜明的转变，对党和政府产生了真挚热爱的感情。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掀起，激发了父亲的爱国救亡热情，从这时他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点认识，思想上反对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并要求蒋介石答应他重返抗日前线。但是，他的请求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答复，父亲忧心重重，隐居家中。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国的抗日热潮，也使我父亲重新走上了抗日疆场。那时，父亲和我同住天津，他目睹日寇在天津的血腥暴行愤慨异常。7月底，父亲带了副官张凤岐搭乘最后一趟火车逃出天津，又一次到南京要求蒋介石让他重赴抗日疆场。蒋介石不得已才委任父亲为东北挺进军司令。翌年5月，我父亲率部进驻陕西省哈拉寨，蒋介石命令挺进军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在东北挺进军司令部内的军械处长邹大鹏、特务营长邰中复和秘书长（兼机要秘书）粟又文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候，我父亲对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言行有了极大的注意。如对八路军挺进敌后，积极打击日寇（平型关大捷等等），有所耳闻，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壮举深为钦佩。

1938年以后，我父亲在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黄油干子和大青山两次战役中遭到严重损失，部队急待整编和补充，即电请蒋介石，要求赴重庆汇报。后得到了蒋的允许，我父亲带领杜海山（交际科长）、张凤岐（副官）等人去重庆。从哈拉寨到重庆要经过榆林、延安等地，这时我父亲幸运地第一次到达抗日圣地延安。在延安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他看到社会秩序井井有条，更使他兴奋的是，处处沸腾着抗日的热潮。这时，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在重庆，经过几番周折，父亲从国民党政府取得了一点点给养。在那里，他所看到的是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花天酒地和社会上的兵荒马乱，这与延安的抗日情景大不相同。父亲在重庆看不到一点抗日到底的希望，心中十分苦闷。为此，他曾两次去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中共副主席周恩来，每次会谈都有一个多小时，走时周副主席都送到门口。父亲为一次令人难忘的会见而兴高采烈。一天，东北救亡总会会长王卓然请我父亲吃饭，席上有周恩来和邓颖超同餐（当时我爱人陶英麟也在席陪客）。父亲听了周恩来对抗日必胜的精辟分析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一扫苦闷抑郁的心情，充满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后来父亲每提起这次会见时，就说：“和周恩来见面给了我抗日必胜的信心，从那时起我思想上开始倾向共产党了！”

父亲离开重庆后，他又取道西安途经延安，返回哈拉寨。这次到延安，父亲说是他一生中一次最有意义的政治生活。他带领杜海山、张凤岐等人，从西安到离延安约30公里地时，忽然看见许多山鸡，父亲的情绪很好，想到

打猎，便取出一支由挺进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张瑞三送的双筒猎枪，用它打山鸡。打中了一只山鸡，不幸猎枪爆炸，父亲的左手被炸断四个指头，因流血过多，失去知觉。杜、张等立即给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打电话求援。当即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交际处长金城亲自搭救护车赶来，将父亲送医院治疗。经抢救止住了手指流血。由于流血过多，有生命危险，中共中央还派一名叫王康博的医生来抢救，并亲自动手术。交际处长金城和我父亲说，中央领导请他暂留延安医治。我父亲听到这个邀请，满心喜悦，就留下杜海山和张凤歧两人，其他随行人员都返回哈拉寨。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父亲的健康很快就恢复。在延安治病期间，我父亲住在特设的招待所里，离毛主席住的窑洞不远。父亲非常幸运地多次见到毛主席。每次会见都在毛主席的住处，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晚间。谈话时，多是毛主席和父亲两人，有时一直谈到深夜。毛主席详细地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国际的形势和抗战必胜的前途。毛主席希望父亲对中共地下党员多给帮助和掩护，多做些抗日救国的统战工作。父亲坚决地表示，我是枪口对外，绝不打内战。这些谈话给我父亲以极大的启发，对共产党有了深厚的感情。

父亲病愈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还为他召开了欢迎晚会。毛主席在会上对我父亲的抗日行动予以很高评价，这对我父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事情。他看到中共方面的诚挚、宽厚、有力。会上，父亲也讲了话，介绍了东北抗战的经过，把抗战必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宣布把东三省划为9个省区，并成立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为了欺骗人民，将东北耆老宿将都安排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我父亲也被安排进东北行营委员会，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委员。他名义上是副司令，实际上并无实权，调动一兵一卒都不可能。国民党统治面临崩溃前夕，父亲曾要求去黑龙江省扫墓，借这个机会想去故乡寻找民主联军。他太天真了，国民党怎会让他去黑龙江省？当时在东北主持政局的陈诚不让他前往，父亲就以治病为名从沈阳飞回北平。

在北平，他找到万福麟、张作相等人到南京去请愿，要求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蒋介石根本不听。这样，我父亲回北平后说，蒋要打内战，我决不再回沈阳，也决不做打内战的罪人。从此，父亲就在北平居住下来。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天津，不久解放。当时，蒋介石还想叫别人为他卖命，曾派飞机到北平要把东北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和我父亲等人接去南京，我父亲和张作相拒绝南逃，决心留在北平，等待解放。

解放军包围北平时，傅作义的思想极为苦闷、彷徨。父亲曾和他商谈多次，希望他早日和中共谈判，把北平问题和平解决。我父亲有一个好朋友叫蔡运升，曾带了一位大学教授王之相到我家。父亲和这位王教授见面后，情投意合，无话不谈。并谈到如果傅作义能通过和平谈判，可保护北平120万人的生命财产，也可保护北平的文化古迹。王教授还说傅能和平谈判，中共是欢迎的。我父亲听到这样的话十分高兴，就带病去见傅，对傅做思想启发工作。并将王教授的话转达给傅，曾经多次给傅进行和平谈判鼓气。这时，我的侄女马志清（她在北大学习，参加地下活动）多次把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告诉祖父。父亲就马上把消息转告傅作义，劝他不能再等待，更不要做历史的罪人。后来，傅作义在各种力量的促使下终于思想稳定要和平解放时，父亲建议让邓宝珊作为和中共谈判的代表。1949年1月8日，王之相教授到

我家和邓宝珊见了面。王、邓谈得很融洽，1月14日邓宝珊受傅的委任和中共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心情愉快地对我们说：“我能为北平和平解放出一点力，为人民做点事，算一生没有白活！”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一天，我家突然来了几个解放军，问我父亲“你怎么没有走？”我父亲立即回答：“我为什么要走？我是抗日的，我没有打过共产党，请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马占山没有跑。”

北平解放不久，我父亲就患病在床，虽然不能起床，但十分关心政局。当傅作义、程潜、张治中等人来家探望时，他们告诉父亲有关政协召开会议及开国大典的盛况，他听后竟感动得老泪纵横，感奋不已。

解放后，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我父亲深受教育，思想、观点从根本上有了转变。他认为解放不到一年，北京情况已大有改观。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2年来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物价开始稳定，他从心里钦佩和热爱中国共产党。有一次，我对躺在病榻上的父亲说，我家住的胡同也修了水泥路面。他又感慨万分地说：“过去谁管你这条小胡同，只有共产党为人民做事！”有一次报纸登载，解放军战士挖北海中的淤泥进行疏通，我给他读完报后，他沉入深思，的确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党，逢人就说中国共产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军队。

1950年6月间，有一天晚上我们接到毛主席派人打来的电话，邀请父亲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当时父亲已患癌症，不能出席。隔了几天我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电话，询问父亲病情，并说如能参加会议即派车来接。但是由于病已严重，无法起床参加，这成为我父亲的终身遗憾。同年11月，父亲病情恶化，精神仍清醒，他自知即将离世，让我爱人陶英麟代笔留下了感人的遗嘱。遗嘱中除了家事外，还叮咛子孙要跟着共产党走。他在遗嘱中说：“……我亲眼看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立起来。我虽与世长辞，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为人，不可稍懈，此嘱。”

我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言，“诚心诚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解放36年来能积极为人民服务，积极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与父亲对我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亲密无间，肝胆相照 ——毛泽东与知名作家

苏连硕

毛泽东同不少作家、诗人保持着密切联系。1942年春天，毛泽东曾多次会见艾青，探讨文艺问题。当艾青把自己的意见讲出后，毛泽东讲了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艾青听了很受启发，据此反复修改而成《我对目前文艺工作的意见》一文。毛泽东与柳亚子、郭沫若、臧克家等，或当面切磋交流，或书信往来，亲密无间，肝胆相照，畅谈诗文。

1957年，《诗刊》主编臧克家将毛泽东的18首诗词发表，毛泽东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对诗歌的发展方向提出明确意见。他同柳亚子、郭沫若等以诗词唱和，既抒发了伟大革命家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远大抱负，又表现了领袖与作家、诗人的亲密友谊。

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当时，由周恩来介绍，毛泽东在下榻处与张恨水见了面，毛泽东表扬他主编的《新民报》副刊在抗战中的贡献，还称赞其小说“比以往的言情小说进了一大步”。临别，赠张恨水一块呢料、一袋小米和一包红枣，握着作家的手深情地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这块我们自制的精毛呢和延安的小米、红枣，就送给你吧！”张恨水回到距重庆30多公里的南温泉，高兴地同家人叙述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并烧了一锅红枣小米粥，全家品尝；他用粗毛呢做了一件中山装，只待集会、接客时才舍得穿。

是年初冬，有人拿毛泽东词《沁园春·雪》给张恨水，希望他和一阕共同在《新民报》上发表。张恨水觉得该词大气磅礴，非同凡响，未能冒昧应和，遂于1945年11月14日在《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上刊登，署名“毛润芝”。过了一天，这阕大气恢宏的词在《重庆日报》上发表，轰动了整个山城。

毛泽东同冯雪峰也有过密切交往，早在三十年代，便无话不谈。当毛泽东听冯雪峰说，他们曾出题目请鲁迅作文章时，便以疑问的口吻道：“你们给鲁迅先生出题目？不出题目是不是更好？”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反复阅读了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对其中《奴隶与奴隶主义》备加赞赏，说它抨击了帝国主义、封建法西斯奴化人民思想的罪恶。

挚友和诗友 ——毛泽东与郭沫若

齐得平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毛泽东同志的手稿中，有一些论及郭沫若同志的篇章，并附有郭沫若的诗文手迹，这些墨宝，对研究郭沫若生平有重大价值。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同志怀着满腔爱国激情，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他的工作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他所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及大量诗文，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1942年郭沫若的剧作《屈原》在重庆上演，对当时“大后方”的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黄任之（炎培）当时写诗赞曰：“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荳茅那许辩薰莸。”“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曾羞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沈钧儒《观屈原和任之韵》诗云：“春来何意忽惊秋，负剑长歔誓灭仇。湘水不流香草绝，遂令终古有薰莸。”“雷雨翻空作吼音，楚些原不是悲吟，祇凭一片荳荪意，结集人间亿万心。”柳亚子有《赠沫若新著屈原》诗云：“怀沙孤坟郁难平，千载犹传屈子名。猛忆嘉陵江上客，一编珍重慰幽情。”这些诗句，是郭沫若这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历史剧《屈原》的演出，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广大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的信中称赞“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笔者按：这封信曾在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过，但信中称赞郭沫若的这句话却被删除了。1982年5月23日重登时又恢复）1942年2月，郭沫若写成剧本《虎符》，这是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之后，那时候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面目已经暴露。郭沫若那个剧本是有暗射用意的。剧本受到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检查，在重庆只演出过一次。1944年1月9日，毛泽东请董必武同志转交郭沫若同志的电报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的著名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于1645年陷于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写信给郭沫若，信中说：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

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毛泽东同志的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把《甲申三百年祭》当作整风文件，是党中央对郭沫若的最大信任。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款款写来，平易而亲切，谦逊而真挚，既抒发了深沉的怀念之情，又表示了殷切的期望之意。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祖国，就一直渴望能够奔赴延安，同毛泽东同志以及延安的同志们见面。但是，当时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这个愿望无法实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不顾个人安危，飞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郭沫若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多次同毛泽东同志见面。他看到毛泽东同志没有手表，就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送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已经修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同志生前一直戴着。这件事也体现了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友谊。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志《沁园春·雪》发表的情况。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重庆桂园寓所宴请柳亚子、王昆仑等人。柳亚子赠送一首七律，同时向毛泽东同志“索句”，毛泽东同志于10月7日复柳亚子，并赠《沁园春·雪》词一首。不久，柳亚子做了一首和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都想欣赏一下“毛润之的咏雪”原作。《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的编者吴祖光特请人搜集到毛泽东同志的原句，以《毛词·沁园春》为题，于11月14日，在该报副刊显著位置上发表，并加“按语”云：

毛润之先生能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特，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据，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作人道也。

此事立即轰动重庆。两周之后，重庆《大公报》又将柳的“和词”与《毛词·沁园春》集中在一起，以醒目地位刊出。

《沁园春·雪》传抄稿在重庆两度刊载后，短时间内，仅重庆一地就有10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人心所向，舆论沸腾，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国民党中宣部头目“召见”了《新民报》的主持人。骂该报向共产党“投降”。不久，在蒋介石授意下，掀起了疯狂的“扫荡战”。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唱和”为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人“妄图称霸”，辱骂人民军队不过是“黄巢”之辈的“草莽”；并狂妄叫嚣要什么“完璧归赵”。《益世报》、《文化先锋》等则与之遥相呼应。但是，身居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进步文化人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当时在重庆的郭沫若同志，十分愤怒，投身到反“扫荡”斗争的第一线。他在柳亚子发表“和词”匝月之时，先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和词”，随后，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反击那班“皮相轻飘”的国民党当局的御用“鹦鹉”。郭沫若这两首诗是这样的：

(一)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

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

遍野哀鸣，排空鸣鹏，海关仇深日样高。

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
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
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
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
堪笑甚，学狙公茅赋，四暮三朝。

(二)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
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
恭宽信敏，无器民滔。
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
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
传声鸚鵡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
道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
磋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
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1945年10月上旬，毛泽东同志应徐迟的请求，题写了“诗言志”的左边，写了这第二首词，驳斥易君左的一篇反动旧词。是年冬，郭沫若将毛泽东同志的词《沁园春·雪》和他的这两道和韵之作，一起抄赠翦伯赞。

全国解放后，郭沫若常与毛泽东同志论诗和词。有时，毛泽东同志还请郭沫若为他润色诗稿。

1959年，毛泽东同志作七律《到韶山》、《登庐山》两首。9月7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月9日和10日两次写信给胡乔木，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日的信说：“主席诗《登庐山》第二句‘欲上逶迤’4字，读起来似有踟躇不进之感。拟易为‘坦道蜿蜒’，不识何如。”10日的信说：“主席诗‘热风吹雨洒南天’句，我也仔细反复吟味了多遍，觉得和上句‘冷眼向洋观世界’不大谐协。如改为‘热情挥雨洒山川’以表示大跃进，似较鲜明，不识如何。古有成语，曰‘挥汗成雨’”。胡乔木将两信转呈毛泽东同志。9月13日，毛泽东同志又写信给胡乔木，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毛泽东同志根据郭沫若等的意见，将《七律·登庐山》中的两句做了修改。

1961年10月25日，郭沫若作七律《看 孙悟空三打白骨 233 精 》。毛泽东同志看到后，于11月17日写了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笔者按：诗文略，见《毛主席诗词》）。1962年1月6日，郭沫若在广州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和诗，当天依韵和诗《现赞 三打白骨精 》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迷雾聚成堆。
九千万里明真帝，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警惕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亿次来！

毛泽东同志看了郭沫若的这首和诗后，于1月12日高兴地写道：“和诗

好，不要千刀当刚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毛泽东同志同时还将他的近作《咏梅》送给郭沫若看。

1962年筹备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同意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他30年前“在马背上哼成的”六首词。《人民文学》编辑部请郭沫若写些诠释性的文字，以帮助青年读者。郭沫若欣然同意，于5月1日写成一篇《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发表在同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上。5月9日郭沫若收到《人民文学》编辑部送阅的小样，立即写信送请毛泽东同志“加以删正”。

郭沫若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诗人人爱读，处处弦诵，然而在事实上却未见得人人都懂，首首都懂。郭沫若举自己对《娄山关》的理解为例，说：今年3月初在广州的一次诗歌座谈会上，曾经为这首词请教过广州诗歌工作者，他们的见解就很不一致。这首词上阕写的是清早，下阕写的是晚上。我曾问过广州的同志们：这词所写的是一天的事，还是不是一天的事？他们的回答便有分歧，有的说是一天的事，有的说不是一天的事。可见，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并不一定真正首首都读懂。

文中还写道：“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诗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的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

然而，郭沫若在广州诗歌座谈会上所说的话，竟是错了。这是毛泽东同志看了《喜读毛主席“词六首”》后告诉郭沫若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娄山关》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还作了如下的说明：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

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2、3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那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场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说明，对我们研究他的《娄山关》这首词是很重要的。

1962年4月下旬，郭沫若在写《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之前，为了把“词六首”写作时的情况弄清楚，曾几次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郭沫若在文章中写道：“尽管这六首词中有几首我已能够暗诵，对于各首写作的时期和环境，平时并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了解上也只能得其皮毛。为了自己的更好的了解，我费了几天功夫，并且还靠着好几位同志的帮助，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算把这六首词写作时的情况弄出了一个初步的眉目。”毛泽东同志看郭沫若这篇文章时，将文中“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帮助”改为“其中是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们的很大的帮助”。这是郭沫若和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勉励。

郭沫若是很重视我们档案馆的工作的。早在24年前，即1960年1月26日，郭沫若曾手书题赠档案馆：

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
犹龙柱下窥藏史，呼风舆前听诵诗。
图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
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

现在，我们上面所述及的毛泽东同志和郭沫若的诗文墨迹，都已被视同“坟典”珍藏“柱下”。它们将作为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而流芳百代，香溢兰台！

“此身多幸沐春风” ——毛泽东与周谷城

华仁

一个是开天辟地的伟人。一个是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同是上一个世纪末诞生的人。同是闭关自守的东方城池——湖南湘江之畔的乡亲。一个偶然的机缘，使那位历史学家结识了那位伟人，并由此而影响了前者的一生。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这位历史学家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名誉主席、史学界耆宿周谷城。

毛泽东和周谷城曾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同事，常在一起促膝长谈。一次，毛泽东开玩笑说：您看《资本论》不怕引起麻烦吗？

周谷城是湖南益阳人。1898年生。他自称：“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结识了毛泽东……”那是1921年春。周谷城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英文，毛泽东也正好在这所学校里任国文教师兼小学部主事。因为同住在学校里，又同是教师，且均对对方有好感，毛泽东与周谷城便时常交往走动，过从甚密。常常是晚饭后毛泽东来到周谷城处，两人促膝长谈，每每至深夜方止。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三卷，很感兴趣。他开玩笑地说：“您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时时从自己那里拿一些共产主义的丛书小册子来给周看。

北伐战争前夕，周谷城同学友徐鸣鸿来到广州。他们下榻在越秀酒家。毛泽东当时正在广州负责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曾两次到旅馆，同周谷城谈话，并挽留周谷城在他主持的农讲所任教。由于周谷城当时还未辞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职务，只好婉言辞谢了这位同乡的盛情。

不久，北伐军打到湖南，毛泽东也回到长沙。这期间，在他影响下，周谷城参加了湖南农民协会，并担任顾问。同时，还在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在船山学社（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授课，并积极发起组织湖南教育工作者协会。

1927年春，周谷城来到武汉。毛泽东知悉后，亲自来到周谷城借宿的临近著名黄鹤楼旁的廉价小旅馆“一技栖”。一进门，毛泽东便关切地问：“你为什么住这样一个旅馆？”周谷城说：“便宜，每天只要一角钱。”毛泽东邀请他去自己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周谷城很爽快地答应了。不久，毛泽东见到周谷城的第一篇政论《农村社会新论》，很是欣赏，立即鼓励他在汉口的报纸上连续刊登出来。

在全国农民协会从事宣传工作期间，周谷城同在毛泽东领导下负实际责任的秘书长夏明翰合作融洽。不久，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周谷城则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

18年后再见，两人都流了泪。周谷城关心毛泽东的胃病。毛回答说：“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

周谷城没有料到，与毛泽东汉口一别竟成“阔别”。再晤面时，已是18

年之后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正在大后方山城重庆的周谷城喜出望外，他又有缘与毛泽东重新晤面了。

这天，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举行茶话会欢迎毛泽东。周谷城闻讯早就赶到会场，在门前等候着。不一会儿，毛泽东身着蓝布衣服，头戴白色邮帽，手拿一根手杖稳步走来。周谷城马上迎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多年不见，音容邈渺。但毛泽东仍一下就认出了老友，随即用带有陕西音的湖南话大声问：“你是周谷城先生吗？”

“是的。”周谷城赶紧回答。

这时，毛泽东打了个手势，眼里含着泪说：“18年了。”

周谷城也不由自主地流出眼泪。毛泽东眷恋友情竟至如斯，这令周谷城感怀不已。

周谷城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病好了吗？”

毛泽东爽朗地一笑：“我这个人啊，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当‘土匪’，病就没有了。”说完又仰头大笑。

周围的人也为这风趣的话引笑了。周谷城后来回忆说：那天是他一生中少有的高兴的日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召见周谷城时，对众人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新中国刚建立，有一次毛泽东到上海视察，召周谷城相见，当时上海市许建国副市长等也在座。

落座后，毛泽东向许建国等人说：“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听了这话，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说的“怕死”，是指大革命失败后，他“躲”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其实，这段经历并不能说明“怕死”。

早年的周谷城，是一位热血青年。他曾亲身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参加了北京学生集会，火烧赵家楼，还曾骑着毛驴，带着留声机到京郊宣传“五四”精神。

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以至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时期，周谷城依然没有为“淫威”所屈。1948年，蒋介石集团镇压“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民主运动时，周谷城就与翦伯赞等挺身而出，起草发表了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宣言。当即，国民党逮捕了周谷城等人。直到一年后，陈毅率部解放上海，周谷城才获得了人身自由。

由此可见，周谷城始终是一位正义感极强的正直之人。

“文革”期间，周谷城在牛棚里听到最高指示：

“周谷城《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文革”中，周谷城被“批斗”、“炮轰”，关进“牛棚”，但他照旧治学不止。

当时，他写过一首词叙说自己心境：“天高气爽楼安泰，龙凤朝阳，人生秋光，谈笑风生翰墨香。古今纵论兼中外，不讲排场，但饷同行，万品争妍发众芳。”这首清新明快的诗词，表现了周谷城在万马齐暗的日子里，不理睬“四人帮”那一套，照样“谈笑风生翰墨香”的从容态度，和置周密文网于不顾，傲然藐视丑类的凛然气概。

一次，他从“牛棚”里被拖出去听“最高指示”，但录音中的毛泽东的话却是：“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周谷城以为这下可以完成《世界通史》的未竟之篇了，但事与愿违，张春桥、姚文元却百般阻挠，终于没能续写下去。

“文革”结束后，周谷城曾谈起此事。他说：当时正值壮年时却无法写，如今想写了，眼力又不济，很是惋惜。

几十年来，周谷城频繁地被毛泽东召见，领袖和学者常海阔天空、彻夜长谈。一次周谷城在游泳池边风趣地对毛泽东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解放后，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一直很好，用周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

周谷城家居上海，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每次去上海，均要约见周谷城。而周每每去北京，也常被请到中南海去谈天。领袖和学者，海阔天空，促膝长谈。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能这样频繁的人，在上海是很少见的。

一次在上海，已是半夜时分，突然周谷城接到一个电话，叫他马上去东湖宾馆。市公安局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是毛泽东约了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三人去聊天。三人到齐后便乘毛泽东的专机，当夜飞到杭州，与下榻那里的毛泽东一起聊了一个通宵。

又有一次，周谷城在北京开会，毛泽东知道了，立即打电话叫周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篷底下，见到周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清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说：“试试看。”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则从淹至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但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

在深水中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仍在浅水里，便招呼他：“来呀！”

周谷城此时说了一句打趣的话，他说：“我这个人哪，既不能深入浅出，又不能由浅入深。”不想，这句趣话在后来的“文革”中竟成了周谷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此为后话。

毛泽东当时无话，只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

须臾，游罢泳上岸来，毛泽东拿出一本线装的《汉书》，翻至《赵充国传》说：“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初，赞成他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不信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

张慢慢地有人赞成了，最后，相信的十之八九，不信的、反对的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人家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

当时，周谷城正在报刊上同人辩论学术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话，无非是予以他鼓励罢了，要他为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毛泽东给周谷城复信。鼓励在百家争鸣时处于孤立地位的周谷城。周谷城对毛泽东说：“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对学术界的百家争鸣是积极支持和赞许的，这方面周谷城回忆时感到“印象特别深”。

有次，毛泽东与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到上海，吃晚饭时把周谷城也叫了去。

周谷城风尘仆仆刚一进屋，毛泽东即拿了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拉到另一间小房间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得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原来，毛泽东所指的是最近围绕周谷城所发生的学术方面的事。周谷城因不满于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曾在《新建设》上发表过一篇《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文章刚发表，就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有关杂志曾转告周谷城：“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周并不以为然。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周颇感压力。现在，毛泽东也知道这件事了。

听了毛泽东的话，周谷城感慨说：“我很孤立，火箭炮冲起来，我也有些受不了。”

毛泽东说：“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意见虽有人赞成，”周谷城说：“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有什么了不起，辩论就是嘛。”并说，有人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写文章，说周谷城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果然，过后不多久毛泽东就给周寄来了几本刊物，里面折了角的地方，均引用了周谷城的意见，表示赞许。

后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谷城的文章，题目仍是《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见到文章后，用长途电话急召周谷城从上海来到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对周说：“问题移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说：“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用夹英语的话语风趣地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周谷城立即接着“倡议”说：“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肯定。他说：“懂不懂，当然也有感觉的问题。但入了门，学了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后来，毛泽东还专门“指示”周谷城：“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

还说：“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新的或旧的，过去的或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以后，北京出版

方面决定出版《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把目录寄给周谷城，周觉自己不能决定，于是去信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回信说：

谷城兄：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的复信，令周谷城大为感动。他没有料到日理万机的领袖，竟对小小的学术界争鸣问题考虑得如此周详。

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学术问题上，周谷城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70年代，周谷城独树一帜，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等学术观点时，引起轩然大波。“四人帮”之流说什么“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全国上下，口号标语铺天盖地。周谷城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是对的，但硬归结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则不对了，那是机械论。这正如说人是动物，千真万确；说动物就是人，则荒谬绝顶一样。”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里，周谷城敢于站出来批驳“丑类”，敢于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应该说正是“人间正道”、“天地正气”。

当然，周谷城也往往有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时候，但这些只是学术问题上的争执，并不关乎“大道理”等宏旨。

谁都知道，中国史学界将中国封建制开始年代定在公元前480年的春秋战国之交。分期的主要代表是郭沫若。毛泽东对此说大加推崇，多次在讲话中引用此说。有次他还说：

“中国封建有3000年。从周武王克商的那一年算起，也就是公元前11世纪以后开始‘封建亲戚’的时候起，到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约3000年。”

周谷城不同意此说。他不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特别长”。他把中国封建制的最早分期推到东汉后半期，这样，封建时代从此到1840年一共只有1600年左右。

他说：“中国奴隶制时代约2400年，比1600年的封建时代长，这样比例就相称了。因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有一定的比例：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

如果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时代的下限移到公元2世纪下半期（东汉末年），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否则，奴隶制变得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就成了一种反常现象。

周谷城不顾与老友毛泽东相左的“风险”，一直在“孤独”的阵营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尽管这微弱的声音当时简直就听不到。

80年代，周谷城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彭冲同志的直接催促下，即将重新出版发行。重版时周谷城依然坚持己见，丝毫不改。他说：“在这种时候，

我更要把那个主张搬出来，不怕人家反对。”

周谷城的禀性和情操，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看周谷城的诗。周谷城说写诗无非是附庸风雅发牢骚而已，毛泽东则说：“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来到上海与上海各界共庆佳节。当时在锦江饭店参加聚会的有周谷城、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中华等人。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无拘无束，自由闲谈。毛泽东与大家均感兴致颇高。

是晚11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睡下，忽接《解放日报》记者电话，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报上发表，以欢迎毛主席。周坚决推谢，说写不出，记者强求说：“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周谷城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因推辞不了，周谷城提笔写了一首，题目是《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衷心》。词曰：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黼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海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词在报上发表后，毛泽东见到了，立即电话召周谷城前去。周来到毛泽东的下榻处，毛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即是：

“词一首，看到了，怕不止一首吧！”

“只有一首，”周谷城回答：“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你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周谷城说。

毛泽东说：“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周谷城说。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毛泽东说。

话至此，周谷城将话题转了转：“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便发挥说，“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罗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罗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对周谷城这段并无一定来由的话，毛泽东没有诧异，反而微笑浮在脸上，觉得蛮风趣。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周谷城说：“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是呀！老是干巴巴，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要丢丑。”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周谷城与毛泽东的谈话，完全沉浸在一种相得益彰、物我皆忘的亲切轻松气氛中，至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一同进晚餐，餐罢周起身告辞回家，毛泽东又一直送到汽车旁。回忆这段

往事，周谷城仍觉得历历景物，如在眼前。

毛泽东问周谷城：“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周谷城如实作了回答。毛泽东立即将这些人请进了中南海。

周谷城常常感慨地忆道：“毛泽东为人厚道，尽管他对某人有意见，但总是加上一句，这位同志怎么怎么的，从不抹煞人家的成绩和优点。

其实，毛泽东何止“厚道”，他对于自己喜爱的朋友，均是百般保护，宠爱有加。

一次，周谷城到北京开会。不知怎么毛泽东知道了，把他叫到中南海。

毛泽东问：“北京教育学术界有什么人和你谈得来？”

周谷城具实回答：“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

毛泽东立即要身旁的人将上述人都约来一叙。

10点正，客人们都到齐了。

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我请老朋友周谷城先生吃饭，请你们作陪。”

毛泽东这番意外的“盛情”，只是在鼓励周谷城等大胆参加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的发展。当时，周谷城在争论中又是处于“少数派”地位，毛泽东是用这种方式表示对老友的关心和支持。

周谷城在耄耋之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仍抑制不住激动。他说：从这些小事实上，“足以证明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和尊重。”

1965年，周谷城被召到上海西郊的一个旧式别墅里。毛泽东正下榻此处。周一进门，毛泽东即起而笑着说：“又碰到了。”

“又碰到了”这几个字，是毛泽东每次见到老友周谷城时的第一句常用话。话虽平淡无奇，但却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亲切和自然。

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好之后，随即转入畅谈。畅谈的话题范围自然有些“天马行空”的味道。

毛泽东谈到哲学史的写作。他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接着说：“他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

毛泽东忽然话题一转说：“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后来又谈到旧体诗，说起晚唐大诗人李商隐。这时，同样欣赏李商隐的周谷城说着说着便有些忘乎所以起来，随口即将李商隐的一首七律诗用湖南腔调哼了出来：

海上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

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

周谷城把诗的五六两句哼吟了几遍，最后两句居然一时竟哼不出来。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友已经忘记，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替周谷城念了出来：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应该说，这首著名的讽喻帝王的诗篇在毛泽东面前哼吟是不太妥当的。然而周谷城竟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然而然地接了下去。

周谷城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念出时，我又跟着他的后面哼。一时心情舒畅，超出寻常。”

可惜，好景不长。周谷城万万没有料想到，这竟是他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这一次后，除了从“牛棚”里被人揪出来听过毛泽东那次“要他继续写下去”的讲话录音外，就再没有机会听到毛泽东的声音了。

“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友谊

柳无非

毛主席是统一战线的创始者，是统战工作的楷模。他老人家善于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对他们进行鼓励、支持，并给予亲切的关怀。毛主席对我父亲柳亚子便是这样。

我父亲和毛主席初次相识是1926年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席上，那时毛主席方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共产党方面出席的除毛主席外，还有恽代英和侯绍裘等同志。当时蒋介石提议取缔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及蒋介石所提修改办法。父亲对此极为气愤，托辞祖母病重，不等会议结束就离开广州。那时他就心向共产党。

父亲的一生中，一直忠实信奉和坚决执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父亲曾与恽代英、侯绍裘等同志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反对西山会议派。“四·一二”事变后，大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父亲失去了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一度也被迫亡命日本，但他仍关注着共产党人的斗争。当他听到毛主席在湖南组织了秋收起义，并进军井冈山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十分兴奋，于1929年写下了“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的诗句，高度赞扬毛主席提出的农民革命以及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取得的重大胜利，同时称颂、怀念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分裂，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于19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时重庆的民主人士喜出望外。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传来，山城沸腾，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那时，我父亲已在重庆，毛主席的到来使他万分高兴。8月30日我父亲到曾家岩拜访毛主席，当即写了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弥天大勇诚能格”。毛主席不避艰险，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这种大智大勇的气魄，使我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几天后，毛主席邀我父亲到红岩办事处，两人促膝谈心，畅谈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时局的看法。我父亲崇敬毛主席，也得到毛主席的器重。父亲回家后，写了两首诗，其中几句是：“最难鲍叔能知管，尚用夷吾定霸齐。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

那年9月6日，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王若飞同志于百忙中到沙坪坝南开学校津甫村看望我父亲。毛主席以他的旧作《沁园春·雪》相赠，父亲和了一首词送毛主席，当时在重庆各报发表。这是毛主席的诗词首次与广大读者见面，读者们即使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是读了他的词，好像看到气魄非凡的伟大革命家就在眼前。那时郭沫若同志写了《沁园春》步毛主席原韵，陈毅将军也写了《沁园春》咏雪词，王若飞的舅父黄齐生也有《沁园春》词，好些诗人都纷纷写《沁园春》，可谓盛极一时。

10月初，我母亲因患盲肠炎，住进重庆市立医院动手术，父亲心绪不宁。毛主席尽管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但得知我母亲住院的消息后，特意写信给我父亲，询问我母亲手术后的情况，表示慰问，并把对时局的看法告诉我父亲。记得信中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话，使我父亲深受鼓舞。我父亲对毛主席的关怀万分感激，又写了两首诗，其中有两句是“驰

笈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10月7日，毛主席又写信给我父亲，对我父亲的诗评价很高。信里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还说：“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千万读者中多了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毛主席对我父亲这样赞赏，而自己却这样谦虚，使人更加钦佩不已。

在“握手渝州”的那段日子里，毛主席的多次谈话和通信，使我父亲看清了当时的形势和斗争方向，他在赠毛主席的诗中，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与君一席肺肝语，胜我十年萤雪功”。从此，父亲更积极投身到共产党所领导的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中，于1945年撰写了《致美国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函》。文中说，“试问今日中国之执政者，为民主乎抑为反民主乎？中原之血亦未干，昆明之惨案又起。”最后期望美国“远追华盛顿总统立国之继续，迭承罗斯福总统援华之盛意，勿与人民为敌，勿与民主为仇。速撤驻华之兵，远离袒蒋之吏，勿以军械与空运制造中国之分裂，勿以租借法案与政治借款鸩毒中国之群氓，则贵我两国之邦交庶或永垂不朽欤！”充分表示了父亲决心和共产党并肩战斗的鲜明立场。

1946年初父亲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参加了在玉佛寺举行的于再烈士追悼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毛主席得知这消息后，于1月28日写信给我父亲说，“阅报知先生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使我父亲受到极大的鼓励。

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周副主席非常关心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派人设法把他们辗转送到北京。1949年2月28日，我父亲和叶圣陶、陈叔通、马寅初等诸老同船从香港出发赴京。他们能够同毛主席等领导人相见，非常高兴，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从石家庄到北平时，我父亲跟沈钧儒、陈叔通、马叙伦等老人到机场迎接。当天晚上，毛主席在颐和园益寿堂招待民主党派人士，场面非常热烈。父亲回家告诉我们时，心情十分激动。

后来，父亲住在颐和园益寿堂，毛主席写诗给我父亲，还到颐和园去看望他。我父亲也把自己的诗向毛主席请教，然后他们一同到园内散步，走过长廊，又坐船游昆明湖。那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毛主席日理万机，还特地去看望我父亲，这是对民主人士的关心和爱护。这种深情厚谊，非常使人感动。

“索句渝州叶正黄” ——毛译东与柳亚子的“诗交”

尹凌

毛主席一生中与柳亚子先生有过三次聚会。第一次是1926年5月，毛主席在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第二次是1945年8月到10月，毛主席在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期间；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毛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对这三次聚会作了生动的描绘。

（一）

柳亚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爱国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1941年因反对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而被开除党籍，亡命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从香港回到桂林。1944年秋天，国民党军湘桂大溃退，柳亚子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于9月12日由桂林搭乘最后一班飞机来到重庆。柳亚子同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十分要好，时相过从。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经常写诗、填词，歌颂共产党，痛斥国民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伎俩，三次电邀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柳亚子同毛主席相交有年，他深知蒋介石从来不讲信义，“贪天奸幸侈功成”，“横流举世吾滋惧”，很替毛主席的安全担心。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来到重庆，30日在曾家岩桂园住地会见了柳亚子，旧友重逢，格外高兴。柳亚子对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弥天大勇，深入虎穴，无限敬佩，当即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毛润之老友》，刊登在9月2日的《新华日报》上。

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曾和柳亚子多次会见，并书信往还，互相唱酬。当时，柳亚子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重庆谈判的前途，有些不恰当的估计。毛主席10月4日写信给他，慰问柳夫人郑佩宜的病；同时提出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两句名言。情意殷殷地期望柳亚子遇事要“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柳亚子收到这封信后，于10月6日“以诗代柬”，“感赋二首”呈毛主席。

曲折延绵溪复溪，光明前路未长迷。
周王防口流于彘，秦帝钧天醉岂泥？
下士君能资集益，见贤我自愧思齐。
驰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

障海东流挥日中，吾曹妙手岂空空？
独夫民贼终为虏，团结和平合奏功。
周土蕨薇怀义士，殷嘘禾黍笑狂童。

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

毛主席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柳亚子的关怀，和柳亚子对毛主席的崇敬，充分表现了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党外朋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斗友情。

（二）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曾经把1936年2月在陕北初见大雪之作《沁园春·雪》抄赠给柳亚子，柳亚子步韵奉和，这在中国现代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沁园春·雪》是毛主席1945年10月7日抄赠给柳亚子的。10月22日柳亚子和了一首。毛主席为什么要把这首旧作抄赠给柳亚子？多年来文化学术界的同志，对经过情况不甚了解，大都是从“索句渝州叶正黄”演绎引伸，解释为柳亚子请毛主席“写诗”，或向毛主席“索句”。最近我们从柳亚子的一本纪念册上，查到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沁园春·雪》与柳亚子亲笔书写的和词与跋，情况就比较清楚了。柳亚子在和词的跋中说：

余识润之，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席上，时润之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也，及一九四五年重晤渝州，握手怅然，不胜陵谷沧桑之感，余索润之写长征诗见惠，乃得其初到陕北看大雪《沁园春》一阕。

具体经过是：柳亚子是我国近代的著名诗人、南社盟主，他的好友林庚白生前准备选编一本《民国诗选》，可惜没有完成就作古了。柳亚子为了纪念亡友，继承遗愿，完成其未竟事业。但有感于林庚白的原书着手较早，取材有不少的局限性，打算扩大选诗的范围，收录毛主席的《七律·长征》。9月6日毛主席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专程到沙坪坝南开中学津南村看望柳亚子，柳亚子请毛主席校正一下《长征》诗，毛主席不但订正了传抄过程中的错字，而且于10月7日还抄了《沁园春·雪》给他。柳亚子非常高兴，推崇备至。“展读之余，叹为中国有词以来第一作手，虽苏、辛犹未能抗手。”因此和了一首，“附润之骥尾”。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作于1936年2月7日东征途中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今高杰村）一个地方干部的家里。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蒋介石顽固推行“安内攘外”的反动国策，对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正义行动，百般阻挠，毛主席有感于北国的大好河山，敌骑纵横，对由谁来主宰国家民族的命运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既不是那些长眠在唐陵、汉塚里的英雄豪杰，也不是那些口含天宪的民贼独夫，“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民族处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战关头，毛主席把《沁园春·雪》抄赠给柳亚子，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有其特殊的含义了。

柳亚子对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艺术上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不但是宋代的苏东坡、辛弃疾不能比拟，清代的纳兰容若也望尘莫及。“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特别是在政治上，柳亚子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正同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一起秘密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公

开拥护我党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柳亚子从国民党民主派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只要中国各党各派、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因此，他在和词的结尾，用“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来抒发他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把握时机，并肩战斗，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的壮志豪情。

柳亚子的和词同毛主席的原词在重庆《新华日报》、《新民报》上披露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猖狂吠吠，大肆围剿。诬蔑毛主席有“帝王思想”，攻击柳亚子是“奉和圣制”，是“封建余孽的抬头”。在短短的时间里，仅《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即《扫荡报》）和《益世报》等反动报刊，就刊载过“骂人之作”20余首（篇），鸦鸣蝉噪，喧嚣一时。在革命阵营内部有些同志对柳亚子的“上天下地”之说，也产生了种种误解，略有微词。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挑战，当时住在重庆的郭沫若、聂绀弩同志，发表文章、和词，加以反击。住在晋冀鲁解放区的陈毅同志，和住在延安的黄齐生老先生都依韵步和，慰问柳亚老。毛主席对柳亚子的诗作是素极推崇，在重庆期间写给柳亚子的一封信中称颂柳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全国解放后柳亚子定居北京，最初住在北长街八十九号，毛主席眷念旧情，亲笔为柳亚子的寓所题写了“上天下地之庐”的匾额，意指当年柳亚子要上天下地去寻找光明的愿望，现在终于实现了。

（三）

毛主席在渝期间，柳亚子商同尹瘦石，以他炽热的爱国诗词同尹瘦石生动的历史画卷合在一起，举行一次展出，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完全支持。特地为《新华日报》编印的“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特刊”题写刊头。

在筹办联展期间，柳亚子于1945年10月2日在红岩村再次会见毛主席，提出由尹瘦石为毛主席画像，毛主席欣然同意。10月5日下午尹瘦石专程去红岩村为毛主席挥毫。第二天柳亚子在画像上亲笔题诗：

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
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驂随我敢吁。
岳峙渊渟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
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驩虞万众呼。

柳亚子以格律谨严和纵横豪放的诗才，与脱尽町畦和独具一格的书法，充分表达了他对毛主席衷心爱戴，骥附驂随的心情。

“柳诗尹画联合展览会”是10月25日在重庆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展出的。柳亚子特意把他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七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夜后赋示同座诸子》写成大幅中堂，挂在大厅正中。把他的《赠毛润之老友》和《沁园春》和词写成条幅，并列两旁。把他最新的一本其中包括写有毛主席《沁园春·雪》原词与和词的诗稿，陈列在大厅正中的桌子上，供人欣赏。他在书写大幅中堂的时候，有意把“低首擎天一柱来”，改为“低首延都一柱来”，与《赠毛润之老友》中的“重逢握手喜渝州”，相映成趣。

这次展出轰动山城，周恩来、王若飞同志都曾亲往观看。这时，毛主席已经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没有来得及看到。

(四)

毛主席抄赠给柳亚子的《沁园春·雪》一共写了两份，最初是写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没有签名，也没有盖章。后来写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写了上下款：“亚子先生教正”，落款“毛泽东”；并钤了两方印章：一为朱文“润之”，一为白文“毛泽东印”。

这两方印章的来历是：毛主席最先把《沁园春·雪》抄赠给柳亚子，柳亚子请毛主席盖章，毛主席说：“没有。”柳亚子慨然许诺说：“我送你一枚吧！”柳亚子本人不擅金石，回来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连夜为毛主席刻了两方，后来盖在毛主席题写在柳亚子纪念册上的《沁园春》咏雪词上，这张手迹，在解放前的茫茫黑夜里，历尽艰辛终于保存下来，十分可贵。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期间，柳亚子为了表示他对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崇敬和爱戴，与自己决心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奋斗到底，还请曹立庵另外刻了两方印章。一方是“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方是“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这两方印章，本来是柳亚子当时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运用历史典故来抒情言志的一种方式。第一方阶“兄事”、“弟畜”，出于《史记·季布传》：“长事袁丝，弟畜灌夫。”意思是说季布的弟弟季心好打不平，因杀人逃到吴国，躲在吴丞相袁丝家里，季心像待兄长一样尊敬袁丝，又像待弟辈一样爱护西汉名将灌夫等人。第二方中的“大儿”、“小儿”，语出《后汉书·祢衡传》，东汉建安初年，在京城许都（今河南许昌）聚集了全国许多“贤士大夫”，但祢衡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他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是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孺子”、“男子”的意思，是对杰出人物的尊敬。柳亚子深恐有人不知道这两段话的含意和原委，特意要曹立庵在印章上刻了边款，以明确的文字，表述了印文的含义。边款说：

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北海鹵德，远在祢上，正平德祖，亦生死肝胆交，绝无不敬意，斯语表示热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朔，并缀跋如左。一九四五年，亚子。

这两方印章一直保存在柳亚子家。1963年，为纪念柳亚子，周总理指示征集有关文物，柳亚子的家属把这两方印章献给国家，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十年浩劫期间，果真有了那么一批“昧者”，不查柳亚子印文真谛，运动一开始就对他进行错误批判。林彪、江青的同伙康生，妄图用这两方印章来攻击周恩来同志，蓄意制造一个“反动图章案”。根本不顾专家的鉴定和解释，故意把“大儿”、“小儿”歪曲为“大儿子”、“小儿子”，认为这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康生于1966年7月，一连发了三个“批示”，扬言要“彻底清查”。还派戚本禹到馆监督，将两颗印章砸得粉碎，连拓片也全部销毁。并借此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掀起揪斗领导干部的黑风恶浪，把馆长，一位长征老干部迫害成终身残废。

今天在我们怀念毛主席的时候，回忆毛主席同柳亚子1945年在重庆的战

斗友谊，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毛主席和我们党与党外朋友珍贵友谊的宝贵传统。

中国以宁，蔗境弥甘 ——毛泽东与齐白石

晓轮

1949年1月，北京解放了。历尽旧时代沧桑的86岁高龄的画家齐白石，从此步入了新时代的幸福坦途，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因为有一件事情要办，毛泽东主席曾亲笔写信给他，字里行间充满了人民领袖对老画家的尊敬谦和之情，信中还邀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齐白石看了信，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爱戴，齐白石精心镌刻了朱、白两纹寿山石名章，赶在开国大典前夕，呈献毛泽东主席。

隔年夏天，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城西跨车胡同看望白石老人，第二天又把他接到中南海叙谈数小时之久，品茶赏花，共进晚餐。毛主席还告诉老人，国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老人回到家里，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天真地把每个细节都告诉家人：因为都是湘潭人，口音一致，每句话都听得真真切切。毛主席给他夹很烂的菜，敬他几杯葡萄酒。临别时朱总司令还特地亲自送他上车。为了感谢毛主席的款待，齐白石把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石砚，以及从自己珍藏的精品中选出最好的作品——一幅立轴《鹰》和一幅对联“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分别题款后送给毛主席。而毛主席收到礼物后，也以礼回谢。

1952年，齐白石和几位画家联合绘制《普天同庆》大画一幅，呈献毛主席。毛主席收到画后，亲笔写信给齐白石，表示感谢。信的原文是：“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有一天，白石老人在荣宝斋作画，很多人围着他，问他见到毛主席没有。他回答：“见过，早上起床洗过脸，天天见到毛主席。”大家听后感到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家有毛主席的像嘛！”大家才恍然大悟。

1953年，白石老人双喜临门，荣获“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又逢90大寿。毛主席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茶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纯羊毫书画笔、一苗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祝老人家福寿康宁。白石老人激动地说：“毛主席太看得起我了，送这么重的礼物。古人讲蔗境弥甘，我如今可享这份清福了。”这一年，他还应曼顾同志嘱，书写了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一词。

1954年9月，全国一届人大在北京开幕，白石老人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毛主席的开幕词。20日，他郑重地投下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票。回到家里，他说：“《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和这次大会比？立宪立宪，搞了几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为‘中国以宁’了。”一边说着，一边写下毛主席在开幕词中所告诫每个人的八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齐白石愉快地欢度晚年，他的唯一愿望是要活到120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但是，毕竟人的意志扭不过自然规律。1957

年，95岁高龄的白石老人重病绕身，毛主席劝他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还派田家英去探望多次。白石老人对田家英倾吐自己对领袖的衷心感谢之忱，希望在健康好转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合拍一张像。弥留之际，老人留下遗言：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主席。

“我的好多知识是跟您学的”

——毛泽东与符定一

赵志超

在近、现代史上，湖南湘潭有两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一个叫黎锦熙，号劭西；一个叫符定一，字字澄。他们均是毛泽东主席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他们与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很接近，受到毛泽东的敬重。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曾写信给先生符定一。信曰：

字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所提到的“尊著《联绵字典》”，就是指的文字学家符定一30余年苦心孤诣的劳动结晶。据《辞海》载：“《联绵字典》，辞书。三十六卷。近人符定一撰。定一字字澄（澂），湖南衡山人（现应为湘潭人）。此书多收双声、迭韵和迭音的词，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一一引书证明。但收词并非都是联绵词，论字体完全墨守《说文》，是其缺点。”符定一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他对文字学这门冷僻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30年如一日，备尝艰辛，终于1940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其稿本多达87册，计400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高，真可谓“著作等身”。

符定一又号悔庵，是今湘潭县晓南乡新铺村下新屋人（原属衡山，解放后划归湘潭），1877年生，比毛泽东长16岁。符定一幼年时，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皆因他腹疾而辍学。父亲又送他至叔父私塾读书。他叔父是一个颇具旧学的秀才，遂授以《十三经》、《文选》，定一均能背诵。数年后他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1908年回湖南执教，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校长、衡阳中学校长等职。汤萝铭督湘时，他以其“顾学通儒”的身份选任湖南教育会副会长，后任筹安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不久又当选为国会议员，赴北京定居。1926年后在北京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等。抗日战争时期符定一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字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

1912年，符定一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时，年方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实业、法政、商业等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之后，便来到了省立高等中学报考，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符定一考取。从此，毛泽东开始接受符先生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这一年，学校举行作文竞赛，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辨的推理，获得比赛的第一名。符定一没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沉静的青年后生，竟能夺魁，便要“面试”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喊来，叫毛做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一看，果然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决心认真栽培。符定一见毛泽东喜欢读课外

书籍，便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这是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代、一共 166 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毛泽东对这部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产生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及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研究学问的念头。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读了许多西方社会和自然科学名著及中外史地书籍。

1915 年后，符定一居于北京，暂时和毛泽东分手了。1918 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罗学瓚、张昆弟等人来到了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这两位感情诚挚的忘年之交又相聚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他除了与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当时形势。毛泽东尤其表现出要改造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22 年，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枪杀了湖南劳工会首领黄爱、庞人铨，激起了工人群众反抗的怒火。同年 10 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 6000 多泥木工人大罢工，并率领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被选任总干事。他还率领湖南 11 个工团的代表与赵恒惕辩论 3 天，取得了工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但是，毛泽东却因此触怒了赵恒惕，受到赵的多次通缉。符定一这期间虽远在北京，却一直在记挂着自己的学生。他常利用回乡的机会打听毛泽东的情况。1925 年，毛泽东回家养病后经过长沙去广州，不料遭到赵恒惕军警的追捕。此时，符定一正好回到长沙省亲，闻知此事，便凭借自己宿儒的身份和他的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毛出险，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离开湖南去广东，他才放心。

1943 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京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 年，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 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京，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 6 月，毛泽东邀请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蒞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人民群众跟毛主席、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9 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托其后返北京的女儿符德芳捎上一些礼物给先生，并附信一封。信

曰：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晒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关怀和尊敬。

1947 年，符定一在北京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北京各大学教授计 80 余人联名向国民党表示抗议。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

释。1948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由北京城内化装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开始看到这位曾经要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学生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为现实，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符定一在此向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作客。他对先生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后来，毛泽东要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话：“还要才、德、望啰。”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中央文史馆馆长。他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他先后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1958年5月，符定一病逝于北京，享年81岁，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与谈家桢

寄汉

50年代初期，在苏联遗传学界，李森科公然反对正统遗传学，批判遗传学是伪科学，对当时许多优秀的遗传学家加以迫害。在那一段时间，我国遗传学界也出现极左的倾向，照搬苏联的一套，片面宣扬米丘林遗传学，对正统的遗传学贴上反动的标签，甚至迫使个别遗传学研究人员离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也打算放弃遗传学研究。毛泽东看到了这个问题。1956年，毛泽东总结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抄苏联的错误做法，也注意到了遗传学界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那一套所造成的严重恶果。针对这些情况，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而挽救了遗传学，使新中国遗传学和一大批遗传学工作者获得解放。

此外，毛泽东先后四次直接接见谈家桢先生，做思想工作，解除他的顾虑。

谈家桢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是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那天晚上，谈家桢走进接见厅，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同来的同志亲切交谈。谈家桢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微笑着同他握手。当听到别的同志介绍他的名字后，毛泽东不住地摇着谈家桢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接着毛泽东问谈家桢对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谈家桢当即汇报了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鼓励他说：“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毛泽东的这一席话，对谈家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解除了他思想上的负担，也大大推进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于是谈家桢先生在复旦大学重新开了遗传学课。

1958年初，春节将临的一个傍晚，谈家桢接到通知，与周谷城、赵超构一起到杭州去。他猜想，可能是毛泽东叫他们去。等上了飞机，这猜想便得到了证实。飞机座舱里的陈设，同见到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完全相同。毛泽东是派他的专机专程来接他们的。当时，他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他们于晚上10时以后，乘汽车到达毛泽东在杭州下榻的住所，毛泽东已经站在门前等候。毛泽东对谈家桢说：“谈先生，老朋友啰！”并亲切地把他们迎进室内，那里陈设十分简朴，一张方桌，四把椅子。毛泽东和他们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毛泽东十分关心遗传学的发展，再次关切地问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谈话进行到深夜，毛泽东邀他们共进晚餐。这时，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他们边吃边谈，吃毕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的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两点钟，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已经两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到他们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到门口，等他们

上了车才回去。

第二天早上 8 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他们一同吃午饭。这天，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身边，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了我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1961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谈家桢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一见谈先生就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谈先生说：没有什么顾虑了。当时上海市委一位负责教科工作的领导同志向毛泽东汇报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并且讲了当时的打算。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

十年内乱期间，谈家桢遭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的迫害。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解放几个知识分子，其中就有谈家桢。

1974 年冬，毛泽东已经重病在身，却还记挂着谈家桢先生。他特意嘱托王震同志在路过上海时带去口信，关切地询问谈家桢的研究工作。

难忘的怀念 ——毛泽东与徐悲鸿

廖静文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有一封毛主席写给我的信：“静文同志，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之为盼！顺致敬意。毛泽东，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读着这封信，我不禁回想起50年代初的往事，虽然漫长的30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

1953年9月26日，悲鸿因过度劳累而在会场突发脑溢血症，送医院医治无效不幸早逝。这沉重的打击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的心情极为痛苦。当我含泪检视悲鸿的遗物，我决心将悲鸿的全部作品和全部收藏捐献给国家时，见到了悲鸿所画的一幅准备送给毛主席的奔马。画面是一幅用墨泼绘的骏马，它高高地昂起头，如疾风闪电似地向前飞奔。在画面的右侧，悲鸿用苍劲的字，题写了：“百载沉痾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表现了悲鸿所感受的人民获得解放之后那种无比欢欣鼓舞的心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帝国主义欺凌的时代已从此结束，举目展望国家的前途，悲鸿感到无限光明。这幅作品抒写了悲鸿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敬爱。于是，我托人将这幅画送给了毛主席，以完成悲鸿的遗愿。毛主席在12月13日给我写了上面所述的那封回信，并请田家英同志送给我。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上午，当时我已去到北京大学学习，正在上课的时候，忽然校长室派人到教室里找我。当我迎着凛冽的寒风向校长办公室奔跑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自从突然失去悲鸿以后，我的神经上难以治愈的创伤，使我就象一只惊弓之鸟，时刻害怕再有什么灾难落在我的头上。当我忧心忡忡地跑进校长办公室时，田家英同志立刻站起来，将毛主席亲笔书写的信交给我，并且对我说，毛主席交给他这封信后，当他走出毛主席的屋子时，毛主席又把他叫了回去，细心地嘱咐说：“要告诉廖静文同志，一定要她把徐先生遗下的幼小儿女好好抚养成人。”读着毛主席关怀我的信，听着田家英同志述说的充满感情的话，我的泪水止不住从双颊滚滚流下，以至低声啜泣起来。虽然，当时我确有不少困难，既要学习，又要抚育两个年龄太小的孩子，但是，我没有向主席提出要求什么照顾，只是请田家英同志转达我对毛主席的感激，同时，请他告诉毛主席放心，我一定会把悲鸿遗下的儿女好好地抚育成人，教育他们继承父亲的遗志。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毛主席日理万机，多么繁忙啊，但却如此细致地关怀着我和孩子们，这说明毛主席对悲鸿是多么尊重。我认为这不仅是对悲鸿个人的尊重，而是对我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尊重。

我也难于忘记，在1948年冬天，解放大军正对北平展开包围时，悲鸿的老友田汉同志忽然秘密地从解放区来到我们家里，带来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对悲鸿的嘱托。田汉同志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袍，戴一个大口罩，脖子上围一条很大的毛线围巾，帽子压得低低的，几乎把前额都遮住了，我们差一点认不出他。我记得那是一个停电的夜晚，在摇曳的烛光下，田汉同志满怀欢喜地告诉我们：“我来北平之前，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悲

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指挥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戎马倥偬之际，还悬念着北平的文化界，悬念着悲鸿，我们万分感动。这些亲切动人的话就像乌云里漏出来的美丽的阳光，引起我们异常的喜悦和激动。摇曳的烛光不停地在我们脸上跳来跳去，仿佛在追逐我们的喜悦似的。当时，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毛主席，但我们觉得他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们仿佛听见了他那温和的带有浓重湖南乡音的话语。

外面，狂啸的北风凄厉地从我们的屋顶上呜呜吹过，把窗户摇得“咯吱咯吱”发响，远处传来警车尖厉的呼叫……

1949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北平的解放，悲鸿才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亲切地互相交谈。虽然，悲鸿的年龄比毛主席小两岁，但毛主席还是尊称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很关怀很谦逊地询问悲鸿的工作和健康。

悲鸿生前曾多次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每次都亲笔回信，而且都是用墨笔书写在白色宣纸的素笺上，整齐而潇洒。从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毛主席的谦虚和对知识分子的关怀与重视，它们闪耀着美丽的思想火花。

在那些流逝了的严峻的岁月里，每当我展视这些墨迹犹鲜的书信时，对毛主席的崇敬和对往事温馨的回忆，便油然而生，使我久久地陷入沉思默想中。这时，仿佛有一阵清新的风缓缓地从我心上吹过，拂去我的忧伤和抑郁，激起我对党更加真挚的热爱和深情……。

在红岩村画像 ——毛泽东与尹瘦石

华音

1945年8月，毛泽东带着光明、带着希望从延安飞到重庆。国共两党开始了关系着中国命运和前途的谈判。谈判艰难而漫长，历时43天……与此同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也在为配合毛泽东的到来、促进和平民主而积极进行宣传活活动。

此时，尹瘦石正在为举行一次画展而辛勤创作。这次展览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希望柳亚子先生参加，两人共办一个书法、绘画的联展。柳亚子听了他的想法，十分高兴。于是，他们各自从诗、画中精选出一批代表作。柳亚子忙于书写，尹瘦石则酝酿着继续补充新作。

一天，尹瘦石又来与柳亚子商量联展的具体工作。他谈到，想画出一批当代英雄的群像。他的构想，正与柳亚子不谋而合。柳亚子突然说：“今天，毛先生约我去谈话，你何不同往？应该为他画一张像……”

尹瘦石精神为之一振：“啊，这太好了！我非常想见毛先生一面，如果能为他画像，更是三生有幸！只是怕他太忙，恐怕无暇为我作‘模特儿’……”柳亚子一拍胸脯：“包在我身上了。我们是老朋友、老交情。到时候，你不必说，由我提出来好了！”意想不到的盛事，突然到来了。

一会儿，毛泽东派的汽车来接柳亚子赴会。尹瘦石连回去换换衣服也来不及，就匆匆陪同前往。汽车开进化龙桥，在一幢黛青色的建筑前面停下了。这里就是将在中国历史上名垂千古的红岩村。由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迎接，柳亚子和尹瘦石步入客厅。

客人落座。须臾，楼梯上传来沉稳的脚步声，健步走下来毛泽东。此时周恩来正在忙碌，陪同毛泽东的是王若飞。尹瘦石举目看去，毛泽东年约50余岁，体态伟岸壮硕，上身穿黑色中山装，下着灰色长裤，布鞋。面庞方中带圆，隆准、高颧、广额；眉毛很淡，但一双眼睛深沉有神；蓄长发，中分，好像很久未剪，不修边幅；下巴上一颗显眼的小疣，略略偏右。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举止庄重而和气，微微笑着招呼柳亚子：“亚子兄，我在此恭候大驾光临呢！”

柳亚子挺身迎道：“我今天还为你带来一位新朋友……”即对尹瘦石说：“这是毛先生……”毛泽东向尹瘦石伸出手来：“欢迎，欢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尹瘦石握住毛泽东厚实有力的巨手，忙说：“毛先生，久仰，久仰！”

柳亚子为他介绍：“这是青年画家尹瘦石先生……”毛泽东把握紧的手摇了几摇，说：“喔，艺术家！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艺术人才是极为重要的！延安有一所鲁艺，在抗日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不过，那里的艺术家都是窑洞里培养出来的‘土包子’噢尹瘦石忙说：“我也是‘土包子’，没有留过洋的……”

毛泽东大笑：“我们是彼此彼此了。我只读到师范，没有进过大学。恩来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我也没有去。我是觉得对中国的问题还未充分了解，首先需要好好研究一下，就一头钻进线装书里研究历代兴亡史了。不过，我

对于美术却研究甚少。记得小时候，最不耐烦的是图画，在纸上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弧线就交卷。先生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这是李太白的诗意：‘半壁见海日’！”说完，先自朗声大笑。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潇洒豁达，使尹瘦石消除了原来的拘谨心理，彼此之间立即缩小了距离。

柳亚子说：“尹先生是我多年知交，虽年纪轻轻，却极富才华。端木蕻良说他‘龙蟠螭曲谁家笔’，‘勾勒直寻吴道子’！”

毛泽东笑道：“好嘛！中国绘画，源远流长，后继有人，将来，‘土包子’一定能胜过‘洋包子’。中华民族随着政治的独立崛起，一定会迎来文艺的复兴！”一席话，使尹瘦石如见雾破天晴，豁然开朗。

柳亚子遂将谈话引入正题：“我和尹先生正在筹备一个诗画联展，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毛泽东问：“‘东风’者何？”柳亚子答：“独缺润之兄一幅画像。今天我请尹先生来，就是想为你写真，你要为他作‘模特’噢！”

听到这里，尹瘦石心中不免有些紧张，不知道这一位身系天下安危的政治家有没有余暇，肯不肯配合？毛泽东不假思索，竟满口答应：“可以，可以。”又回头望望王若飞：“你安排一下时间，哪一天好啊？”

这给王若飞出了个难题：谈判期间，时间紧得很，这画像之举又节外生枝！他马上查了一下预订的工作日程，说：“那么，只有5号下午了。”毛泽东说：“一言为定。”

王若飞取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了几个字：“5号下午送尹先生到红岩嘴。”递给尹瘦石：“届时请先生持此到张公馆，有车子送你过来。”尹瘦石起身告辞。毛泽东即请柳亚子上楼进行约定的谈话。

10月5日到了。下午2时许，尹瘦石如约携带了笔、墨、纸、砚，持王若飞名片，到了上清寺桂园张治中公馆。随周恩来登上等候在门前的汽车，同行者还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友渔。

当是下午3时许，红岩村。周恩来陪尹瘦石进了客厅，请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陪画家在此稍候，就去忙他那百事缠身的工作了。这间客厅就是尹瘦石上次和毛泽东相见的地方。客厅极为简朴，仅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而已。尹瘦石在这里等待为毛泽东画像。由于作画心切，短短的等待时间显得很长。毛泽东还没有下楼。尹瘦石猜想：也许毛先生手头的工作还没有处理完毕，也许在画像前还要梳洗一番、准备一下？

在猜测和等待中，毛泽东突然出现了！毛泽东根本未作任何“化妆”，依然是上次见面时的装束，只是因为天气微寒而多穿了一件黑色大衣。依然是未加修剪的长发。甚至唇边长出的短髭也听之任之，没有刮去。这样最好，画家在心里说，这是一个真实的、“天然去雕饰”的毛泽东。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噢，你来了？”毛泽东步下楼梯，亲切地和他打招呼。一回生，两回熟，仿佛已是老朋友了。

尹瘦石站起身，还未及说话，毛泽东又问他：“你看怎么画？我听你的，我坐在哪里？”

尹瘦石心中的一些精神准备和隐约的顾虑都被冲散了。毛泽东对他没有任何要求，更没有“限制”或“指令”。他把桌子移开，留出挥毫的余地。在距离桌子两三米远的地方摆一张藤椅，目测了一下角度，然后说：“毛先

生就坐在藤椅上吧。我作画的时候，先生尽可以随便讲话，吸烟，完全放松，但请不要动作太大，也不要走动。”

毛泽东在藤椅上坐下，微微颌首，表示“照办”。……

时间是珍贵的。尹瘦石立即进入了亢奋的创作激情，吮笔抚纸，据案写生。手中这支画笔，仿佛有千钧重量。40分钟过去了。画家仔细地审视着刚刚完成的作品，看看是否还需要加工或修改。

当他觉得已经充分地体现了所要表现的一切，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放下画笔，说：“毛先生，好了！”

“噢？”毛泽东从沉思中被惊醒了，从容走向画案，仔细观看画中毛泽东，又回头笑问钱之光：“你看，画得像不像啊？”

钱之光一直在画案旁边凝神观看写生过程，连声说：“像！像！”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尹瘦石大功告成，可惜的是，画家由于过于急切，竟然遗忘了一件日后令他追悔莫及的事：当时怎么没有请毛先生在画像上签个名呢？……

“你想当相声博士啊！”
——毛泽东听我说相声

侯宝林

我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 15 封信和陈云同志的《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时，深深感到我们党的领导同志，十分关怀文艺工作，关怀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和思想。同时，我不由得回忆起我给毛泽东同志说相声的情景来。

记得第一次给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说相声是在北京刚解放不久的 1949 年上半年某一天。参加演出的都是有点名气的演员，如京剧界的梅兰芳先生和吴素秋等同志都在那天同台演出。负责组织节目的同志把我和郭启儒同志合说的相声，放在最后压轴。毛泽东同志听得那样入神，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在眼前一般。

还有一次演出，剧场座位都是木排椅，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坐在剧场中间特意安放的两把藤椅上。前边的节目演完了，毛泽东同志拿起雨衣挽在左臂上，一边鼓掌，一边站起来准备要走，一看：“呕欠，还有节目！”就把雨衣放在旁边，又坐下来听。一直听完这个段子，为我们的演出鼓掌，我们又加演了一个小段儿，演出结束后，他才离开剧场。

解放后不久，我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我懂得了文艺要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这时正值人民解放军进军江南，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在日理万机中观看我们的演出，是对我们文艺工作的重视，是对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关怀。我们的相声，在旧社会是被当时的统治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在新社会大大提高了地位，我受到的教育和鼓舞是很大很深刻的。

毛泽东同志爱听相声。他听我说的相声，有 150 多段，其中 50 多段是新创作的段子，100 段左右是传统作品。为了介绍我们过去的演出形式，我和几个老演员在一起特意挖掘出《字象》这个传统三人相声段子。这个段子早年相声撂地演出时，演员在地上用白沙撒字。现在拿到舞台上演出就不行了。我跑了好多地方，才找到了一块汉白玉石头，现砸现磨，筛成粉末，装在缝制的三个小布口袋里，到毛泽东同志居住的地方演出。他很欣赏这个段子。毛泽东同志只要发现传统相声中民主性的精华，就非常高兴。

《关公战秦琼》也是毛泽东同志最喜欢的相声节目之一。一般的相声节目，他很少听两遍，只有这个节目，他在一次演出后，又让我们重演一遍。陈毅同志也听过好幾次。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反对瞎指挥。这个节目揭露旧社会里反动官僚什么也不懂，却依靠权势发号施令的丑态，是十分淋漓尽致的。即使在今天演出，仍有教育意义，仍有较强烈的剧场效果。《关公战秦琼》原是过去的艺人根据民间笑话改编而成的，我们在演出中又不断进行了整理，加强了作品的思想性。

我给毛泽东同志说相声，当时有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我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仰，很愿意拿我们的相声艺术，使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能休息一下，能笑一笑。另一种心情是毛泽东同志听我们说相声，也是为了了解这一个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的情况，鼓励我们对它进行革新，使它成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发挥出更大的战斗作用。在建国初期，我和几位相声演员发起成立了

相声改进小组，在促进相声艺术改革和推动相声演员进行自我改造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以为这是与毛泽东同志关心、重视相声艺术，给了我们思想上的启发分不开的。

1956年间，我曾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相声的结构》、《相声的语言》等几篇文章。那年，召开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在接见文艺界代表的时候，看到我时对我说：“哟，写了很多东西，你想当相声博士啊！”毛泽东同志十分风趣的语言，长期鞭策我对相声艺术进行理论上的探索。这是对我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在旧社会只读过3个月小学的曲艺演员的多大的关心和鼓励啊！

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接近喜剧的艺术形式，相声演员也应该是喜剧演员，但却不是喜剧人物。相声演员既要博得观众的好评，使观众满意，但绝不能哗众取宠。演员在舞台上要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是这样。现在我们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同志的15封信，学习陈云同志的《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就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做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一不要特殊，二不要自大，无论做艺，还是做人，都要谦虚谨慎，严肃认真。

殷切的教诲 ——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

赵超构

我第一次看到毛泽东主席，是在1944年5月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时候。当时，我是以重庆《新民报》记者身份参加这个记者团的。

毛泽东那天接见中外记者团全体人员的情况，我在《延安一月》中有详细的描写。毛泽东那天的讲话，由于当时条件，未能在重庆报纸上公开发表。记得谈话的范围相当广泛。从国际谈到国内。毛泽东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分析世界反法西斯的形势，作了许多英明的论断，后来都被一一证实了。他还讲到，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然后就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各党派关系上的民主作了解释，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就进一步帮助我们反从反动派的谣言中解脱出来。对于我来说，也是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还在重庆郊外的八路军办事处单独接见我一次。接见从上午9时直至晚饭以后。

毛泽东的慈祥和蔼的态度和生动的谈话，能够使一个最拘谨的人解除顾虑，把自己的心里话倾倒出来。那天的话题很广，谈得也很多。我知道毛主席很忙，曾多次告辞，但是他总是要我继续谈下去。

毛泽东来重庆，是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的。重庆有许多人替主席的安全担心。我把这个意见向他谈了。他笑着说，蒋介石这个人，大家是清楚的。但是这一次来重庆，也是经过研究分析的，有准备的。看到毛泽东这种从容不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我当时极度感动。

毛泽东提到我写的《延安一月》，指出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这实际上是一种含蓄的批评，但当时我还以为这是个好名词，因而沾沾自喜。

那天，毛泽东给我讲解了国共谈判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如美蒋的阴谋，以及解放区周围的情势等。有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如果没有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枪炮，大片的沦陷区是会由人民收复的，因为“八路军就在城门口”。

那天更多的时间，是在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重庆新闻界的情况。我同重庆的上层人物是很少接触的，对于中下层的所谓“公教人员”则来往较多。他细心地问了这些人的生活、思想、情绪，以及他们对蒋介石的看法，对国共谈判的看法。我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说了。最后，他沉吟了一会儿说，死跟蒋介石的人只是少数，有的人不满现状，但对美蒋还有幻想，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过来的。

那一天过得很快。傍晚时分，周恩来副主席匆匆忙忙地回来共进晚餐，立即陪同毛泽东坐汽车进城。大概这一夜又要进行重要的谈判。在暮色苍茫中，我亲眼看到周恩来是那样郑重地走在前头，拉开车门，细心地招呼毛泽东上车。就在这些细小的动作中，也洋溢着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恭敬、热爱的感情。直至今日，我一闭上眼睛，就能在脑子里重现这一幕动人的情景。

在重庆谈判期间 ——我三次见到毛泽东

侯外庐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飞抵山城，进行了43天和平谈判。毛主席在渝期间，我有幸三次见到他。

第一次，是9月1日在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并生效而举行的盛大酒会上。这个为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签订而召开的大会，由于有毛主席参加，实际上开成了一个欢迎毛主席的盛会。为了开好这个会，中苏文协作了充分准备；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事先还特地规定，所有知情人都必须守口如瓶，谁也不得向外界披露。

9月1日下午的这个酒会，出席者有宋庆龄、冯玉祥、沈钧儒、覃理鸣、郭沫若、史良等知名人士，有中苏文协的正副会长孙科、邵力子、陈立夫，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有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陈诚等，来宾达500多人。中苏文化协会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挤得满满的。

这天，天上下着细雨，过往行人都被文协若市的门庭吸引住了，不约而同地冒着雨停脚仁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百口同声谈论着毛主席，大家猜想他会来出席酒会，都想一睹风采。

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陪同下来了，门外欢声四起，这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

毛主席进入会场，各界名人争先恐后围上去和他握手。在所有的与会者中间，我最难忘的是冯玉祥将军和覃理鸣先生的激动的神情。我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亲眼看见冯将军拉住毛主席的手说：“来来来，为总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实践干杯！”干杯之后，背过身去，用手帕拭泪。我也亲眼看见覃理鸣先生握住毛主席的手，激动得只是流泪，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在冯、覃二位的脸上，我看到这两位民国元老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争取国家光明前途所抱的希望，和对蒋介石集团的失望。

毛主席与会总共1小时左右，在会场内外众多的政治家和老百姓中间，真正是万众瞩目的领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会场上，陈诚和陈立夫连理都没有人理，面孔尴尬极了。

我第二次见毛主席，是参加毛主席召集的小民革部分常委座谈会，地点在张治中公馆“桂园”。出席者有中共的王若飞、徐冰，小民革方面的王昆仑、许宝驹、曹孟君、谭惕吾等人和我。

那一次，毛主席与蒋介石谈判后来到张公馆，精神很好，毫无倦意。谈话从我们对主席安全的耽心开始，后来集中谈的一个主题是和谈究竟有无成功可能。我记得，毛主席饶有风趣地打了个譬喻说：“我看，国共两党结婚不成问题。”我说：“老头子和青年恐怕难成姻缘。”主席说：“不行的话可以刮胡子嘛！”这一天，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一定要做好统战工作。

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覃理鸣先生宴请毛主席时约我作陪。那是一个小型家宴，地点就在覃先生的府邸，除宾主之外，作陪的有周恩来、叶剑英、翦伯赞和我。从中一路到覃先生的府邸，有一段很长的下山的阶梯，主席和叶剑英走在前，周恩来、翦伯赞和我走在几步之后，一起从中一路下坡步行到覃家。席间，覃老先生说话较多，他介绍了不少有关蒋介石的情况，多有

请主席警惕之意，也谈了不少阎锡山的情况，对阎锡山略露美言之意（对此，我不了解覃先生的背景，不敢妄加评论）。毛主席谈话不多，只涉及和谈的主题，对阎锡山只字未作表态。

和谈期间，毛主席在一切场合的谈话都是围绕和平的主题。我记得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给大家的印象极深，他说：“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它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他那种断然截然的口吻，使大家非常信服中共对和平的决心。

和平谈判实际上是边打边进行的。整个9月份，从粤南、冀北到察哈尔、绥远，国民党不断地对解放区发动进攻。蒋介石丝毫和平的诚意也没有。

针对这种情况，那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题为《友道今释》，发表在9月30日《新华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从语法、文字学和训诂三个角度，说明“友道”对于和平、民主、团结、合作的重要性。

首先，我用清代唐铸万的哲学名言“裂一未可得半”来说明朋友之道要有一与半的相辅相成，说明“友道”一词的哲学含义。

其次，从文字等的角度来解释“友”字和“朋”字。“友”字金文作“𠄎”像两只手，可见携手同盟之谓友。朋友之“朋”，甲骨文作“𠄎”像持系贝。古者五贝为一系，二系为一朋。“朋”字所表示的是二系的平等比例，所以古语有“朋比”二字的连用。“朋”字既初出于贝币，而后引伸为朋友之义，顾名思义，应包含两层含义，即交易往来的经济关系是前导，尔后才有君子之交的利害关系。墨子有所谓“兼相爱，交相利”之说，友爱连称表明了精神关系，友利连称则表明物质关系。可见朋友之道是涉及功利的。只有在利害关系上互相尊重，自利而又利他人，才有友道实际存在的可能。平等的道理就是朋比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在近代社会，“民主”、“平等”都是从商品等价交换关系中发展推行而来的政治概念。

总之，我用文字学说明“友道”的实际含义是利义两字兼顾的。

最后，我分析孔子说“以友辅仁”的道理。孔子“友直、友谅，友多闻”为“三益”。也就是说，孔子重视直言不讳的、相互信任的和能帮助自己开阔视听的真朋友，而鄙薄那些柔佞谄媚的假朋友。《论语》中有所谓“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说。清代嘉庆学者焦循作过一番训诂，他解释“攻”，是攻玉攻错之攻；解释“已”是停止的意思。焦循有独到的见解。他把这句话翻译成：与持不同立场的异端之见者互相切磋，互相观察，有害之处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焦循把执中之人（折衷派）和执一之人（专断独行，唯我独尊的人）称作异端，而把能够包容异己的人称作为“圣人”。我认为焦循的说明是有道理的。并借用这个道理说明只有成人成己、彼此批评、比赛、竞赛、观摩，友道才能得全。

我记得，周健同志把这份报纸带到“小民革”，并且向大家朗读了这篇文章。文人用训诂、考据之法抨击顽固派，朋友们都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历经沧桑见太平 ——毛泽东与张元济

张树年

先父张元济生于1867年（清同治六年），至1959年因病逝世，整整生活了92年，经历了前清、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三个统治时期，直到全国解放后，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感到欢欣鼓舞。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文史馆馆长、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曾先后两次晋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并多次书信往返，使他深深感到统战政策的温暖，受到很大的鼓舞，同时他积极热心于党的统战工作。

（一）

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而复告诉先父，中共中央请他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和新中国开国典礼。9月6日先父离沪去京，同年前往的还有赵朴初、茅以升、盛丕华、黄延芳、袁雪芬等。因先父年事已高，经中央批准，由我陪同前往。会上，各民族、各党派和各界代表欢聚一堂。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和陈云副总理等先后会见了先父，毛主席还两次约见先父，我都有幸陪同。

第一次是共游天坛。同游的有刘伯承、陈毅、粟裕、程潜、陈明仁等。在祈年门前同毛主席见面后，从祈年殿至圜丘坛游览一周。一路上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最后在回音壁外的古柏林中围坐饮茶。毛主席询问先父当年参加戊戌变法的情景，问他在北京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先父笑答：“此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京官岂能来此？”毛主席爽朗地大笑起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进步的政治改革，改革也要流血，它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读书人闭门搞改革断无成功希望的。我们进行革命，主要依靠发动群众。随后谈及商务印书馆，毛主席盛赞“商务”出了不少好书，他读《科学大全》就学到不少新知识。特别是“商务”出的大型丛书对中国文化界贡献尤大。毛主席还说他在延安时，案头上总是放着“商务”出的两本厚厚的《辞源》，写作过程中常常还得翻阅它。

在喝茶时，天坛公园一位管理员对先父讲，北平所有公园名胜，除孔庙外已全部开放了，他希望能让孔庙也开放。先父鼓励他对毛主席讲。他大胆向毛主席提出了上述建议。毛主席说，“好啊，你写一封信把这件事详细讲一讲，寄中南海毛泽东收。”

当天晚上，先父辗转床头，久久难以成眠。他对我说：“今天我异常激动。我已活到耄耋之年了，曾经见过光绪，见过袁世凯，也见过孙中山，还见过蒋介石，今天又有幸见到了毛主席。光绪想把国家治理好，但他太懦弱，而且上有慈禧，下无得力助手，缺乏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因而维新只能是一种梦想。孙中山虽有伟大的理想和愿望，但未能实现。今天我见到了毛主席，他有学问，有气魄，我看中国的富强指日可待。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太平盛世，中国的外患内战一直不停，看来至今和平有望了。”我从来没有

见过父亲这样激动过。

第二次会见是在中南海怡年堂毛主席的住所，与毛主席同进晚餐，在座的有周善培先生、陈毅和粟裕。饭后谈话内容很广泛，从工农业建设到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毛主席不断提问，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先父建议，为使下情上达，报纸应多刊具有真实地名、地址的读者来信，广开言路。毛主席表示赞同，并说可先辟一专栏做个榜样。先父还建议筑铁路。毛主席说：筑铁路离不开钢，因此要先办钢铁厂。其次，先父认为内战多年，人民生活艰难，为使国家安定，一定要发展农业。毛主席耐心地听着，频频点头称许。周善培老先生主张读经，毛主席默然不语。先父讲普遍读经未必需要，可在大学里辟一专科，研究四书五经。

政协会议闭幕那天，先父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微笑着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当握着我的手时，毛主席还叫了一声“树年兄”。他作为人民领袖和国家主席，这样和蔼待人，使我非常感动。

政协会议闭幕，毛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先父送给他一部《林文忠公集》。当时内地如云南、四川等处尚未解放，这些地区长期种植鸦片，流毒全国。先父送《林文忠公集》，意在请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后，严禁鸦片。

（二）

先父在京开会期间，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返沪后继续为此事奔忙，不料因操劳过度，1949年冬，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忽患脑血栓形成症，以致左半身瘫痪。此后，他总是躺在病榻上写信、阅读、写作。毛主席和他书信往来，前后共5次。

1951年8月29日，先父给毛主席写了一信，提出西藏解放后，应重视民族语言、文学和学校教育，并提出四项具体建议：（1）在首都北京设西藏语文专门学校，由藏族同胞选送聪颖子弟入学，给予优厚待遇。在邻近各省也可酌情设立分校。（2）在首都及邻近各省大学中特设西藏语文专业，培养一批懂藏文的学生，以备异日派入西藏参加军政各项工作。（3）编辑藏文常识书籍，用极浅近的文字配以图片及汉文解释，送入西藏，以使中央政府的政策能顺利贯彻。（4）在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与他们集会联络，“使其有宾至如归之乐”。

先父还满怀豪情，写了《西藏解放歌》长诗，在序文中，他希望“从此上下一心，实行自治，修明庶政，巩固边防，完成民族大团结之伟业”。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党、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

（三）

先父生前非常关心祖国统一。1957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我说：“我忽发奇想，要写封信给蒋介石。”当时我很惊愕。他缓缓地说：“蒋介石和我都是浙江人，我想请他效法另一个浙江人。五代时的钱镠（武肃），他的祖父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控制了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十三州之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王朝后，先后消灭了南方的几个王国，收复燕云等州，公元963年又出兵两湖，统一是势所必然。钱镠深明大义，出兵策应北宋。公元978年他纳两浙十三州之地归附北宋，适应了历史的要

求。”他把这些想法告诉了在京的陈叔通先生。几天后，叔老来了一信，说毛主席对先父的想法很赞成，并请先父写好后，交上海有关部门转递。6月15日我为先父磨好墨，预备好了信纸信封，先父颤颤巍巍地写下了一封200多字的致蒋中正的信。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大鉴：

庐山把晤，快领教言。光阴迅速，忽忽已二十余年矣。此二十余年中，公所施为受国人之嬉笑怒骂者，可谓无所不至，然弟终不愿以常人待公。今者据有台澎，指挥四方，此固足以自豪。虽然，弟窃有更进于此者，令愿为公言之。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来，我浙江有一不可磨灭之人物。伊何人欤？则钱武肃。是钱之事迹，度公亦必耳熟能详。当北宋之世，武肃据有全浙八都，军威著于一时，能默察时势，首先效顺，而炎宗统治之局，因以底定。当今之世，足以继钱武肃而起者，舍公而外，无第二人。窃于公有厚望焉。此致敬礼！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

信由我交上海市府管易文同志。两三个月后，中央派一位同志来看望先父，说信由广播电台对台宣读。信稿曾由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同志手抄保藏，“文化大革命”中被查出，顾老先生因此被狠狠地斗了一通。

一纸诉状发出之后 ——毛泽东与李苦禅

王福存

事情发生在解放初期。

开国大典那隆隆礼炮声，使备受艰辛的国画大师李苦禅蓦然振奋起来。他正式被聘为新中国最高美术学府的教授。

沉浸在翻身解放欢乐之中的爱国画家李苦禅，此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过去为了求学，只身从山东农村来到北京，当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只得住在庙里，靠从舍粥棚里打粥度日，后来参加北大的勤工俭学会，发奋学习素描。考上北京国立艺专西画系后，靠夜里拉洋车攒钱交学费……，26岁拜齐白石为师学习国画，28岁就当了教授。那时社会黑暗，压制人才，外敌入侵，政府腐败，着实不愿效力，宁肯饿肚子，也坚决要辞职。如今，沧桑巨变，国家有望，被人民政府聘为教授，理当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效力……。

人逢喜事精神爽。李苦禅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兴冲冲地吟诵起：

人世悲欢皆虚幻，
七情六欲一念牵。
一旦悟通烦恼处，
心中净土连西天。
咄！咄！
不染无垢超三界，
白藕脱泥即苦禅。

然而，乐极生悲，祸从天降。李苦禅却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学院个别领导不知何故，让这个堂堂的教授每星期只上两节课，其余时间去陶瓷系工作室画茶壶、茶碗，最后干脆脱离教师队伍，去看大门，卖戏票。一家6口靠他每月12元的薪水度日。

1950年夏末，一位从延安回到北京的内弟，了解到李苦禅的委屈之后，给他出主意。

“大哥，有党和政府给咱做主，你不要怕，这是新社会，不像过去了，你可以写信告状，给毛主席写信！”

“主席能管这点儿小事？”

“怎么不管，党进城之后就是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

李苦禅高高兴兴地对妻子说，弟弟叫咱告状申冤，咱就泼个胆给毛主席写封信吧？妻子急忙劝他：算啦，咱们就不要打扰毛主席啦！“好汉做事好汉当，用不着你多操心。”他一把推开妻子，抢起酒瓶咕咚咕咚喝起来，大半瓶白酒进肚，身子便不由自主了。他冲到画案前，提笔就写。

“润之先生：余乃昔日勤工俭学之李英杰也，尝与君同工同读，今有不平之时，激愤陈词于下……”

写到此处，他又感不妥，自言自语道：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扯同学关系干什么？他抢起酒瓶喝了一大口。那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从笔端泫然而下，转眼写满了5张宣纸。他糊了个牛皮纸大信封将其装了进去，写上“毛主席亲

收”，送往邮局。

酒醒后，李苦禅十分懊悔，不知一气之下写了些什么，可信已经发出。是福是祸，只是听天由命。

1950年8月26日，徐悲鸿院长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信：

悲鸿先生：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言。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致教祺。

毛泽东

徐院长将这一好消息很快告诉了李苦禅。他那紧锁的愁眉一下子舒展开了。又高兴地吟起：“人生悲欢皆虚幻，……白藕脱泥即苦禅。”

不几天，一位文质彬彬、衣着朴素的干部，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陪同下，登门会见了李苦禅。

“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

当李苦禅得知眼前的这位干部就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时，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告别时，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我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李苦禅的教授职务很快得到了恢复，工资也由12块长到62块。从此，李苦禅报效祖国的愿望开始得以实现。

“我等着看你的新作” ——毛泽东与周瘦鹃

天晟

解放前周瘦鹃曾经闻名全国，被人看作是“鸳鸯蝴蝶派”作家之一。但他赞成抗日，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家对他所做的团结工作，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签了名。周瘦鹃曾说：“文化界开展联合战线，鲁迅先生竟把区区贱名也列在宣言书中，这是我一生莫大的光荣，永远不会忘怀。”后来周瘦鹃瞩目时艰，痛心疾首，隐居苏州小园里，大种梅花。他以当年孤山上妻梅子鹤的林和靖自喻，曾有“我家亦有巢居阁，堪比逋仙一角山”之句。从此潜心园艺，写作很少，在文坛上几乎销声匿迹。

解放后，在党的关怀帮助下，他从“巢居阁”走了出来，打开园门，面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有词曰：“红旗竞赛一重重，心志能无鼓动？”“济时也使成人，那许巢有隐遁。”周瘦鹃当了江苏省的人民代表，又成为全国政协的委员。他写道：“难忘的1959年4月，我在出席第三届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时，荣幸地拜见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得聆警欬，快慰平生！并且在那180多位老年委员团聚的茶话会上，又听到周总理亲切动人的讲话。他说毛主席关怀各位老人，下次开会时，可以带着老伴同来，好照顾得更周到一些；如果没有老伴而有必要的话，就是带一个儿子或女儿也好。像这样设想周全无微不至的关怀，真使我感动得什么似的。”1962年4月，他偕同盼望了两年多希望跟他进京的老伴和5岁的小女儿，一同到了北京。4月15日下午2时30分，毛泽东个别会见周瘦鹃。他进入中南海，握住毛泽东的手，第一句就说：“主席，您看我这样一个旧知识分子，还能为社会主义做些什么？”毛泽东笑着引他到沙发上坐下，亲自给他点了烟，听他谈这些年思想改造的情况。然后说：“你搞盆景很出色，但别忘了你是个作家。要写些新东西。我等着看你的新作。”周瘦鹃欢天喜地回到住处，忙不迭的把这次会见的情景告诉了家人。大家的眼睛立时湿润了，闪出了快乐的泪花，感谢的泪花。

毛泽东这次会见以后，周瘦鹃的写作积极性也高涨了。他写作诗歌和散文，有的还在海外发表，写他的体会，向人们介绍新中国。出版社还将他的散文集中起来，出了《花前琐记》、《续记》、《小记》等几本书。党热情团结他，关怀他，他愉快地生活着，前进着，唱出了“年来百事都如意，长对河清展笑颜”的歌声。

周瘦鹃爱梅爱盆景，经几十年的精心培育，他的小花园小有名气，吸引了不少游人前来参观。其中还有周恩来、朱德、陈毅、叶剑英等领导同志。1963年，一个腊梅花盛开的冬日傍晚，周瘦鹃一家人正忙碌着准备过年，周恩来突然光临，周瘦鹃全家人高兴得真不知如何是好。周恩来一进门，就亲切地和他们全家一一握手。他紧紧握着周瘦鹃的手说：“周瘦老，我在上海开会，特地来苏州半天。由于时间仓促，在车上吃了饭，参观了虎丘等处，再来看望你，实现了我8年来的愿望。”听了这温暖的话，周瘦鹃感激万分地说：“想不到您在百忙中还来看望我们，谢谢您的关怀，并请总理多多指教。”周恩来在周瘦鹃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观赏了庭园里陈放着的盆景，

不时询问盆景的名称、习性、生长情况。周恩来说：“周瘦老，你的园艺技巧全国闻名，要好好管理，精益求精，为人民群众和国际友人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很大的荣誉啊！”周恩来还亲切地问起周瘦鹃的文艺创作：“你的散文也是百花园里的一朵花。近来有什么新的作品问世？你一边搞写作，一边搞园艺。希望你能写出好作品来，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坛作出努力。”周恩来还亲切地抱起周瘦鹃的小女儿，逗着她，给她吃用绿竹叶玻璃纸包着的糖果。周瘦鹃感动得老泪盈眶。后来周瘦鹃拿出签名册，周恩来给周瘦鹃家留下一行清秀刚健的题词：

1963年1月31日，访周老于苏州爱莲堂。

周恩来走后，周瘦鹃兴奋感激不已，为表达他们全家及苏州人民对总理的热爱依恋，赋诗一首：

吴市群黎笑开颜，
欣逢人日有人来；
奈向高蠓难留住，
行色匆匆带月回。

大家都是为中国 ——毛泽东与冒广生

舒湮

冒广生先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光绪甲午举人。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任农工商部郎中（司长）以不趋附权贵著称，而才华文采为人所倾服。民国初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冒老还是著名的国学专家和诗人，抗战前任中山大学教授，一生著作丰盛。对于这样一位历经三代的著名老知识分子，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同志十分关怀。

解放初，冒老先生在上海居住，曾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的陈毅在一次会上听江庸（民国时期任过司法总长）说冒老在上海，会后即约同江庸去看望冒老。陈毅同志见到冒老后，首先说：“毛主席对你们老先生是很重视的啊。”当时冒老无收入，生活较为困难。谈及于此，冒老说解放前程颂云（程潜）送钱给他，他没有要。陈毅同志说：“现在是人民的钱，你应该要呀！”此外还谈了些诗词方面的事，冒老非常兴奋。以后相从过往甚密。在陈毅同志荐举下，上海市文管会送来聘书，聘请冒老为特约顾问，月薪320元。于是冒老从1950年到1959年87岁去世这段时间，得以安乐地度过晚年，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1957年，冒先生来到北京，曾写信告诉陈毅同志。陈总得信后即让秘书去联系，并带了一封亲笔信。4月到7月，冒老与陈毅有过几次交往。陈总邀冒者参观故宫，又约程颂云和谢元量等老友聚谈。冒老目睹首都气象，十分感奋，在《黄任之赠红桑集》诗中曾写道：“香山载酒话前时，握手宣南重祝诗。正是新邦红五月，天安门上树红旗。”陈毅同志还建议冒老为《人民日报》写稿。文章发表后，又由记者采访，写了《八五老人一席谈》记下冒老对新旧中国经历中的体会和感受。

其后，周总理从陈毅同志处得知冒老来京，又派人告知冒老暂时别走。1957年仲夏的一天，下午3点，周总理轻车简从来到冒先生住处。看见冒老，总理笑盈盈地说：“我听陈毅同志说鹤老（冒广生字）来了，早就想来探望的。政协正在开会，脱不了身。昨天刚刚闭幕，今天才有空，抱歉，抱歉！”时值仲夏，气候燥热，见家人开动电扇，总理随即安详而体贴地说：“老人家怕受不了风寒，还是关上的好。”

冒广生（鹤亭）先生与周恩来总理有“世交”关系，冒先生曾凭借总理叔父周嵩尧（岫芝）先生的关系，在北洋政府时代任淮安关监督。由这，总理开始理起话头，“岫芝叔父和鹤老是多年同事，晚年不再当官，信佛，穷困潦倒。解放后，我接他上北京住，前几年才去世，鹤老来迟一步，可惜缘慳一面了。”

冒老不禁蹙眉喟感，回忆故交往事，自然谈起故交的著作《晚移香诗存》。

“我早年学旧体诗，也可能受家叔的影响。鹤老的诗词，我也拜读过。您在淮安时，好像还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总理对事的体察入微和惊人的记忆力，令冒老佩服。

总理沉吟了片刻，又说：“我想起一件事，舍弟和令媛还有过婚约。我告诉他来拜会鹤老。”

“小女早年亡故，这事已经过去了。”

总理正色道：“亲戚关系正和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一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历史是不可能任意改变的嘛。我们共产党员也是人，不是六亲不认的。”

谈话中，周总理顺手取过茶几上冒老的折扇，欣赏着张大千的画，似乎喃喃自语：“张大千的画确实有功夫。”冒老乘机进言：张大千如果回来，会有问题吗？总理以肯定的语气表示欢迎，对溥心畲也如此，希望冒先生通过朋友的关系告诉他们，就讲：“周恩来说的。”

在谈话中，周总理还向冒先生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其中，周总理告诉冒老，我国正在有效地进行核试验，估计不出几年可以成功地爆发自己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事隔7年，我国于1964年10月成为世界第三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了。总理的直言，说明一位胸怀坦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外朋友的信任。

临别时，总理对冒老说，“今天太难得了。我有这样两小时的休息，能见到鹤老，我更高兴，毛主席委托我捎个口信，他看到你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想见面谈谈，希望鹤老多住几天。”

不久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主席派了两辆车来接冒先生去中南海。车到中南海，主席趋步亲迎，与冒先生握手致好。随后尽意叙谈。他们先谈了些时局方面的事。毛主席说：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后来又谈到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冒先生将所著《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等4大册稿本送给毛主席看。

冒先生告辞时，毛主席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先生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虬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主席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最后主席送冒先生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怕冒先生碰到车顶。

饮水不忘掘井人 ——毛泽东与许志行

许定之

我怀着特别激动的心情，展开毛主席给我爸爸写的4封亲笔信的照片副本。我想，如果爸爸还健在，他一定又会向我们讲他最难忘的经历：他是怎样认识毛主席的。

我爸爸许志行，浙江海宁人，原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写作教研部主任。爸爸年轻时，高小还没毕业，家里就把他送到商店里学生意。第一次送到嘉兴一爿酱园店里，他因不愿做小奴式的学徒，经常向老板提出反抗，遭到老板的忌恨，做了两年光景，终于被赶了出来。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离家很远的湖南长沙一爿出售五金玻璃的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爸爸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更加不愿意做奴隶式的学徒，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他进店只有3天，就不顾一切，偷偷地从店里逃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他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情形十分狼狈。

在汉口旅馆里，他碰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这时是湖南学界的总代表，参加湖南人民驱逐摧残新文化的封建军阀张敬尧运动，要上北京去请愿，路过汉口，耽搁在这个旅馆里。毛主席看见这个年纪轻轻、形状狼狈的小伙子，十分同情地过来招呼他，问他一切。因为彼此语言都不大听得懂，就用笔谈。爸爸把他不愿做学徒，一心想继续读书的心愿，以及从商店里逃出来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非常同情，并称赞他的志向。毛主席十分恳切地劝慰我爸爸不要难过，他表示愿意帮助我爸爸回到浙江老家。爸爸说，我是不能回家的了，最好帮助介绍一个自力更生的工作。毛主席说，年纪轻轻，不好流落在外，他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没有熟人可以帮助介绍工作。毛主席要我爸爸暂时忍耐，回家安心等一些时间，等他到北京办完事，回到湖南之后，他一定设法帮助我爸爸出来继续求学。爸爸听了毛主席的话，觉得他很是恳切，不应该违背他的好意，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他。在毛主席的帮助之下，我爸爸回到了家里。

爸爸回到家里之后，受到家里严厉的责罚，心里十分难过。但不多久，他就收到毛主席从北京写给他的一封信，毛主席在信里又很亲切地安慰和鼓励了我爸爸一番，还在北京买了些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寄给我爸爸阅读。

过了一年光景，那个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终于被全省人民赶走了，毛主席到北京请愿的目的已达到，也就回到长沙，做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主事，还自己筹款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是给一些小学失学后又想升中学的人补习功课的。毛主席就写信要我爸爸到长沙进这个补习班读书。爸爸接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又从家里偷偷地逃到长沙，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十分高兴，就安插我爸爸在补习班读书，一切费用，全由他负担。毛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也在这补习班上学，毛主席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六年级读书。他们两人对我爸爸一见如故，我爸爸和他们相处得好像亲兄弟似的，毛主席对我爸爸也像对待自己的弟弟一样。每周毛主席

给他们上一次公民课，讲的都是些革命的故事和道理。

这年正是 1921 年，毛主席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即 1922 年，我爸爸和毛主席的两个弟弟，都由毛主席介绍参加了 s·Y（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为 C·Y——共产主义青年团）。

爸爸在长沙读了一年多书，毕业后，本来很想投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只因湖南的省立师范，入学是完全免费的，所以只收本省人，不收外省来的学生，而升别的中学，爸爸又哪里来的费用？在这情况之下，毛主席就同我爸爸商量，表示他愿意帮助我爸爸回到浙江投考也是免费入学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爸爸感激地答应这样办。这年暑假，在毛主席帮助之下，爸爸回到浙江，考入了设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膳免费，而书籍和零用，则大部分都由毛主席接济。

爸爸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了 3 年半。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在暑假中到上海参加这个运动搞宣传工作，后来回到学校，又在学校闹革命，因此到这年的寒假，被学校暗暗地通知开除了学籍。

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时期，毛主席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做了国民党的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广州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当代理宣传部长。爸爸把被学校开除的事写信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回信邀他到广州去，于是爸爸就在 1926 年的春季到了广州。毛主席就要我爸爸在他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

这年 7 月，国民党出师北伐，10 月攻下武汉三镇之后，国民党的中央和政府迁到了武汉，爸爸跟随毛主席也到了武汉。这时毛主席已经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专门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只是每周一次到中央党部开中央常务会议，我爸爸则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

1927 年 7 月，武汉国民党也“清党”反共，大杀共产党员，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宣告失败。毛主席回到湖南农村，做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爸爸则南下回到上海等地，在书店、学校里做编辑和教师。从此，爸爸就与毛主席失去联系达 20 多年之久。

直到 1949 年全国大陆解放的前夕，毛主席到了北京，爸爸才设法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这时上海还未解放，我爸爸在上海的格致中学教书。毛主席接到信，就托新华社的同志带给我爸爸一封回信，但爸爸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有一天，那位新华社转信的同志，突然慌慌张张来对我爸爸说，毛主席托他转交的信，不知怎么竟遗失找不到了，恐被敌人得去发生意外危险，所以要我爸爸避开一段时间。爸爸听他话，避开了一个时期，并不见发生意外事件，就又写了一封信，把这情形告诉毛主席。这时上海已经解放，毛主席接到我爸爸的信后，不久就又复了一信，这次不再转托别人带，是直接从邮局挂号寄到爸爸所在学校的。这是 1949 年 10 月间的事。

此后，我爸爸和毛主席陆续又通了 3 封信，回信都是毛主席亲笔写的。

我望着毛主席亲笔信的照片副本，照片里，毛主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像是一颗颗火热的心，它给我们无限温暖和光明。64 年前，我爸爸只不过是个 19 岁的小青年，他在汉口那段最困苦的日子里，幸亏遇到了毛主席。尽管素不相识，毛主席却给了我爸爸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不仅拔我爸爸于贫困潦倒之中，而且还帮助我爸爸继续上学，甚至亲自介绍我爸爸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35 年前，我爸爸只是个中学教师，毛主席竟还记得他，先后写了 4 封亲笔回信，给了我爸爸莫大鼓舞，

也给了我全家最大光荣。我是个普通的干部，我一定牢牢记住爸爸生前对我的教育，饮水不忘掘井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四化建设，做一个时刻不忘革命利益，常常想着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者。

《大公报》的新生 ——毛泽东与王芸生

王芸夫

凡是在重庆住过的人，谁也忘不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整个山城震动了。在那个短暂却令人振奋的日子里，喜讯频传，接踵而来的又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蒋介石邀请毛主席来重庆谈判。经过8年动乱，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我们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目前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这个大好局面的将是历史的罪人。国共谈判是大势所趋，亦是众望所归。为此事父亲显出极大的兴奋，他在《日本投降了》这篇社论中就热烈赞颂毛主席来重庆商谈国是是“喜上加喜”。

毛泽东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在周恩来同志陪同下于8月28日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那些天，重庆城显出一派从未有过的，既兴奋活跃又庄严肃穆的气氛。人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翘首盼望谈判成功，因而神情十分紧张，父亲更是坐卧不宁，忙得不见人影。没过几天，传出了好消息：毛主席要来《大公报》馆赴宴。

9月20日报馆里一片喜气洋洋，职工们一齐动手，将院内外清扫得干干净净，“季鸾堂”被装扮得焕然一新，正楼前的花坪显得格外艳丽。见到大人如此忙碌，孩子们也跟着活跃起来。谁都想看看毛泽东主席。可惜不许孩子们进院子里去。我当时已是个半大姑娘，不好意思往里挤。正在念小学的弟弟磨了半天，也没让进去，他便爬上墙头向里张望。我最初还有些拘谨，待听到汽车响动时，便也不顾一切地爬上墙头。我正好望见两辆汽车开进报馆院内。

“毛先生！走在前面的是毛先生！”弟弟首先嚷了起来。我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果然见到已走下汽车的毛主席正在上台阶。原来毛主席是个大高个子，穿着朴素的中山装，面孔很慈祥。

父亲是主人，他迎上去与毛主席握手。跟在毛主席后面的是周恩来、董必武等共产党的领导人。只见他们笑呵呵地走进正门，步入了二楼的“季鸾堂”，我们就再看不见什么了。

整个下午，我和其他孩子都在议论着这件新闻，当然更惦记的是向父亲打听一点内幕。可是完全出人意料，十分健谈的父亲这天夜里一反常态，变得默默无语。我们和他谈话，他也好像心不在焉。看得出来，他的内心很不平静，正在苦苦地思索着什么。

第二天父亲终于告诉母亲，在席间，他对毛主席谈起“希望国共继续合作，不要另起炉灶”。毛主席笑笑回答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是人家的锅里不许我们造饭呀！”话讲得虽平易，但意思却很清楚，明明白白地揭出了蒋介石毫无统一诚意的事实，使父亲无以答对。

父亲的思想一直是在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的桎梏下，他仅从主观愿望出发，盼望国共合作，尽快重建破碎的国家。他以为只要蒋介石能坐下来和毛泽东进行谈判就是大团圆了。正如他在《毛泽东先生来了》这篇社评中所写的：“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剧，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走是一幕大团圆。以悲剧始，以喜剧终，这可说是中国文学

艺术的嗜好。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不拘于一格，但中国人有他的传统偏爱，我们宁愿如此。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 19 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8 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认真的演这幕大团圆的喜剧吧，要知道这是中国人民所嗜好的。”

这篇社评过于乐观了，毛主席的话确实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期间，父亲一方面对蒋政权感到极度失望，深知国民党已相当腐败，无法负起建设中国的重担。可他又有一些矛盾的想法：在西安事变的僵局面前，蒋介石不得不答应抗日，总算把个局面支撑到了今天，建设国家的门面恐怕还得由蒋介石来维持吧？父亲当时非常担忧内战再起，真心诚意的在为国家、为老百姓着想，结果却是在为蒋介石帮忙做说客，要求共产党服服贴贴任蒋介石宰割。这个道理他虽然从这天起就有所领悟，但却在摸索了很久之后才彻底明白过来。

不过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见到国民党拿不出谈判方案，且又无事生非的情景，父亲忽然感到是否会出事，他很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忧。他和章士钊先生不谋而合，产生了暗示毛主席赶快离开重庆的想法，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毛主席主动来找章先生讨教，章先生便说出了在心中已藏了数日的警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解放后，我的父亲一度有一桩言述的隐忧。原来是上海《大公报》的销售量开始下降，父亲感到了危机。报纸有些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父亲为《大公报》的命运担忧，可又不愿意再向周总理要钱。他想到的出路是将报社搬回北方，又苦干不知该向那一级请示。经过反复思考，父亲感到必须惊动毛主席了。他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交毛主席。信送出去仅仅一周时间，北京来了长途电话，要父亲立即进京会见毛主席。

父亲到京后，由彭真、胡乔木等领导人陪同，进中南海见毛主席。他们来到主席处，主席刚刚游完泳，精神特别爽朗，招呼大伙坐在藤椅上。毛主席认真而细致地听完父亲的汇报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

毛主席见父亲满脸笑容，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便接着风趣他说：“大公主，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意思是说原天津《大公报》已改名《进步日报》，现在又得恢复原名，我父亲便是收复了失地。

父亲回到上海时，是欣慰，是感慨？他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对毛主席的魄力由衷佩服，对共产党的作风深为折服。党办事真是雷厉风行，意见明确，作法果断，行动敏捷。父亲原以为十分复杂的迁移问题，苦恼了不少日子，可是一经提出，无一日耽搁就办完了，而且让人没有后顾之忧。不仅赴津人员和家属一次搬完，剩下的人员一律由上海市政府包下来，都给安排了适当的工作。这次北迁无疑是《大公报》的第二次新生。

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

民主党派人士的诗词被印成会议文件 ——毛泽东和《东风》副刊

黎丁

《东风》是《光明日报》的文艺副刊，和毛主席隔得很远很远，但由于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他们又是那么地贴近。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时候，读《东风》，既仔细，又认真，那怕是不被人留意的角落的一个小注，他老人家也注意到了。他不仅手书默诵发表在《东风》上的诗词，而且还加以唱和，并推荐给别人，推荐给会议。这，并不是作为一个领袖，一个导师出现的，而是以一个热心的读者和诗人的身份来沟通思想。这对我们一般编辑来说，感到何等亲切。

197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毛主席1965年72岁诞辰的时候写的叶剑英《远望》一诗的手迹：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成。
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诗末，毛主席还写上“十月十六日光明日报”。叶帅这首诗刊在那一天《东风》的右上角，诗后注明“一九六五年八月于大连棒棰岛”。叶帅不止一次给《东风》写诗，他去大连前，我们曾写信请他写信，如果我的记忆不误的话，他一回京，和我们经常联系的王守江同志就亲自把诗送来。原诗题叫《望远》，毛主席书写时改为《远望》。毛岸青、邵华《重读 远望 志更坚》一文中说：“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记忆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哪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推荐《东风》发表的诗词，不仅这一次。

1961年12月28日的《东风》，在左中下版面上刊登四首七绝：

赏菊

吴研因

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竞吐奇。
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
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
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

七绝二首

钱昌照

芦台农场

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
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当时一些人被天灾人祸所造成的困难吓倒了，丧失信心，而这几首诗则颇有鼓干劲的朝气蓬勃的精神。我们对这一意义认识不深，版面安排上并不突出，位于中栏偏下。可是毛主席看到报纸后，在刊载这四首诗的左旁，用铅笔写了十个大字：“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当时党中央正将召开扩大的（四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四首诗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与会同志。1962年1月7日，当我们看到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那份《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和刊登诗作的大会印件时，万分激动。吴研因属民进，钱昌照属民革，民主党派成员的诗词印成会议文件，让中共的领导干部学习、讨论，这魄力，这胸怀，这借他山之石以为用的举动，直到我写这篇小文时还深深地为之感动。我记得，当时，《东风》主编和我们几个编辑，看到借来的印件时，一面异常兴奋，一面又万分惭愧：我们眼界不高，把这几首诗处理得不够显眼。

毛主席不仅推荐《东风》上发表的诗词，而且予以唱和。1963年元旦的《东风》，头条是刘文西大幅木炭画《毛主席和牧羊人谈话》，还有丰子恺、张乐平的节日漫画；郭沫若、赵朴初、钱小山的词；韩北屏、天语、林遐的散文，配以套红的“恭贺新禧”篆刻印章，图文并茂，是我们认为是比较满意的献给读者的一份新年礼物。郭老的《满江红》词刊在右上角，我们按照他自己设计的方式排列，不用标点：

满江红

郭沫若

沧海横流 方显出 英雄本色
人六亿 加强团结 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
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 一唱遍寰中 东方白
太阳出 冰山滴
真金在 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 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
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 革命展红旗 乾坤赤

毛主席看到之后，即于1月9日作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末尾注明郭老原诗见1月1日《光明日报》。毛主席这一著名诗篇，已经收进《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中了。

对人民有好处的意见就照办 ——毛泽东与李鼎铭

惠金义

在昔日的采访中，我遇到了三位革命老人。他们是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的王来音、张仁杰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的警卫员张步声。这三位老人，先后给我讲述了毛主席怎样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李鼎铭的意见，以及李鼎铭先生怎样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事迹。这些事迹感人至深，现整理于后，以飨读者。

1941年11月6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农民、工人、干部、战士和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30分钟的重要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密切合作。他说：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有义务与党外人士合作，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大家开动脑筋，争献抗日救国大计，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议员中有一位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拐杖的老人，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李鼎铭先生原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曾在米脂创办小学，这个小学被当时复古的绅士封闭了，后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和小学校长，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农工，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毛主席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鼎铭先生的心。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事前有一些民主人士因对共产党能否采纳建议有怀疑，曾数度劝阻他不要提出。但他看到毛主席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参加大会、小会，找参议员谈话，仔细听取对政府的批评建议，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就大胆地提了出来。

“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果然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主席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延安隆冬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毛主席反复翻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先生刚发完言，毛主席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同时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

“精兵简政”议案终于在参议会上通过了，毛主席还为《解放日报》写

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去。精兵简政的实施，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渡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经毛主席提议，李鼎铭先生在这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不久，他由米脂搬家来延安时，将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来延安不久，毛主席就接见了。那一天刚到黄昏，毛主席就派车接他到杨家岭，亲热地把他迎进土窑洞里，问他搬家的情况。他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主席说，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也不留。毛主席哈哈大笑着说：“你真是开明人士。”当时人们把进步士绅称为“开明绅士”，毛主席叫他“开明人士”，这是对他的高度赞扬。

毛主席对李鼎铭先生非常关怀，李鼎铭每次来杨家岭，毛主席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给他讲国内外抗战的形势，他总是恭恭敬敬、聚精会神地听。毛主席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他，并指示有关部门对他在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先生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来参加革命工作。经毛主席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曲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回延安。他看见儿子安全回来，满面笑容，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李鼎铭先生很注意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还下功夫阅读《资本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熏陶下，他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更加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在几次讲演中激动他说出“中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我年虽六旬，已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等肺腑之言。

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李鼎铭先生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为团结抗日和边区建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边区实行减租减息以后，有极少数地主借故撤佃，威胁农民；有的还用种种办法欺骗政府，抵抗减租。为了保证佃权，陕甘宁边区于1943年12月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李鼎铭先生积极参与这一工作，并在条例公布后不久，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全边区各界人士予以积极赞助和拥护。他还经常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1942年7月，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来到延安。参观团中有不少人因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当李鼎铭接见时，要求他谈谈从政感想。李鼎铭先生说：“在工作中本人毫无任何困难的感觉。在政府中我为副主席，但同时我又是地方人士，我在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从共产党这次整顿‘三风’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在诚心实意地与党外人士合作，对此，我深信不疑。”士绅们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毛主席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他到杨家岭给毛主席看病，切脉后，他说，吃4副中药就好了。那时中西医矛盾尖锐，毛主席身边的医生不同意毛主席用中药。毛主席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中西医两法治病的主张，他是相信中医的，还是坚持把4副药吃了。吃完后，果然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以后，主席有病就请李鼎铭来诊治。有一次，主席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先生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给主席治疗。李鼎铭说，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毛主席欣然同意他在院落阳光下按摩。起初一天一次，后来隔一天一次，每次看病免不了要谈些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战胜疾病的方法，有时还要讨论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毛主席对李鼎铭说，现

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学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主席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毛主席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中医保健知识。

毛主席不仅自己相信中医，还介绍李鼎铭给周副主席、朱总司令、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他还经常谈到中医的好处，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西医向中医学习。在毛主席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李鼎铭先生曾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63年“同气相求” ——毛泽东与周世钊

周彦渝 吴美潮

63年，在人生的旅程中不过是稍纵即逝的短暂岁月。但两人要在63年的交往中，情意拳拳、肝胆相照，确实极为难得。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党员和几十年的领袖，周世钊则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是毛泽东与周世钊就有63年的长期交往而友谊始终不渝。

1961年，毛泽东为了抒发对湖南故乡和友人的怀念与祝愿，写了一篇七律《答友人》：

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友人就是当年湖南省第一师范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解放后任湖南省第一师范校长、省教育厅厅长，60年代初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的周世钊先生（1897—1976）。1961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引用了“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薛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两联以后写道：“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从青少年的同窗好友，到伟大领袖与一介儒生之间，友谊长存，始终不渝，可谓知心，知音，源远流长。

同窗五载，并肩前进

1913年，毛泽东与周世钊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同班学习。次年，第四师范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他俩仍在同班学习，而且情谊甚笃。一直到1918年毕业，长达5年半。

毛泽东与周世钊在第一师范期间，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激烈斗争的现实，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一师民主教育的实行，进步师长徐特立、杨昌济等教诲，深刻地影响着这一对友人。从小立志救国救民的毛泽东，充分利用一师的良好环境，如饥似渴地学习，刻苦顽强地锻炼，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并热心社会活动，在课余和假期从事学友会工作，兴办工人夜校，进行农村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品学兼优的周世钊，酷爱文学，热心从事社会活动，他既是工人夜校的管理员，又积极参加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

1917年，湖南第一师范学生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生会总务（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他们一直并肩战斗，亲密合作。

由于毛泽东好学不倦，善于钻研，他克己宽人，治学严谨，言行一致，作风谦逊和有伟大抱负；同时他富有反抗封建专制的精神和非凡的胆识与机智，有一种特殊的领导和创造才能，具备一种令人心悦诚服的吸引力量，先

生们以为他是“异才”，是“伟器”；同学们认为他是“智囊”，是“怪杰”。周世钊炽烈而顽强的好学精神，以及他为人温和敦厚，待人赤诚的品德，尤其是文学、诗词的造诣方面，一直为师友同学所称颂。

1917年7月，全校组织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12个班的学生共575人。毛泽东与周世钊都在第八班。选举结果，全校有34人当选。第一名是毛泽东，获49票；第二名是周世钊，获47票。超过40票的就只有毛、周两同学。

共事教育，亲密无间

周世钊在第一师范毕业后，蒙王季范的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教国文。毛泽东则在北京、上海筹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1919年4月，毛泽东突然到修业小学找周世钊，周问毛住于何处？毛说未定，周便邀请毛到修业小学居住，并告之该校高小部正缺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毛愿意教这几节课，对于工作并无妨碍。于是，毛泽东住入修业小学并教历史课。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壁。周世钊半夜醒来时，还从壁缝中见到毛泽东房里的灯光，原来毛泽东还在为《湘江评论》写稿呢。毛泽东教的历史课，每每结合当前的现实斗争，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很受同学欢迎。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创办了《湘江评论》，积极领导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周世钊参加了这些活动。40年后的1959年，周世钊重游“五四”旧地，感怀喜赋《浪淘沙·访修业学校》：“爱雨喜重游，重上东楼。卅年前事到心头。五四风云筹策地，胜迹长留。破碎叹金瓯，烟瘴谁收？独将大论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荡涤神州。”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和周世钊共同指导小学生合办《小学生》。1919年春天，周世钊帮助高小二年级的学生成立图书馆，指导他们购买了一些白话书刊。以后，由于毛泽东、周世钊等教师的鼓励，全班学生讨论决议，每周出一张壁报。不久，又受到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等的鼓舞，班上的学生觉得小学生也有话要说，经过几次商议，决定出刊一种叫做《小学生》的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学生们居然也谈起天下国家大事来了。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经常刊出。11月中旬的长沙《大公报》把《小学生》向社会作了介绍说：“全国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说话的能力，那社会就有点生机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学得说话，只有小学生还没有。昨天我看见一张修业小学出刊的《小学生》报，小学生也说起话来了，难怪他们的先生大加奖励。我希望他们声大而远传。”

蔡元培曾在周南女校讲述的一篇题为“美术的价值”。湖南省教育会《名人讲演集》中未记载此篇，但却被毛泽东记录下来，篇首有毛泽东写的“记者按”：“蔡先生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

在修业小学，毛泽东、周世钊的生活特别清苦，而他们的友谊更加纯挚笃诚了。冬寒季节，毛泽东的被子单薄，有时感到寒冷难受时，就卷着自己的被子到周世钊床上共睡，他们同床共睡，在第一师范时期已经有过，但远

没有这时亲密。他们在做完全相同的梦，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救中国。

“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

新民学会会友间通信较多，毛泽东搜集了会友间相互往还的书信，编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有一封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长达 2000 余字。信于 1920 年 3 月 14 日由北京寄往长沙。信中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父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干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洋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

1920 年 6 月 28 日，周世钊曾给毛泽东一信，劝其返湘。信中说：“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其理由如下：……”

这两位青年的友谊，体现了我国古书《易·乾卦》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

骏骨未凋，尚有生气

由于参加革命斗争，毛泽东于 1927 年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从事教书的职业。两人一别就是 23 年。周世钊常常挂念自己的友人，并赋有一诗，其中有一句为“九州明月系离肠”。当毛泽东在延安、重庆时，周世钊都冒着风险致函问候。

1949 年，长沙和平解放后，一些老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联名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由周世钊领衔。以后，毛泽东与周世钊先有电报来往，再有信件联系。1949 年 10 月 15 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信中说：“迭接电示，又得 9 月 28 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也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对故友称他“骏骨未凋”，感到无比鼓舞，总是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润之称我“骏骨未凋，尚有生气”。

以后两人的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

《过许昌》、《水调歌头》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一位亲戚由京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邀周世钊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0年9月28日恰是中秋佳节，周世钊和毛的亲戚在长沙登车。中秋之夜，月光如水，桂蕊飘香。周世钊对景感怀，口吟《七律·中秋北上》一首：“露重香浓桂正花，中秋奉命发长沙。歌盈江市人难静，梦醒湖乡月欲斜，三十年前亲矩范，数千里外向京华。鲋生垂老逢嘉庆，喜见车书共一家。”

29日清晨，车到许昌。毛的亲戚和周世钊下车，因为毛的亲戚要在许昌看爱人。周世钊到许昌市区闲逛了几个钟头，想寻曹操在许昌的遗迹，渺无可得。当时正是烟厂收购烟叶时，肩挑车送，络绎不绝，而郊区则遍地豆苗，已届黄落。周世钊口吟《五律·过许昌》一首：“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不久，周赠此诗给毛。

6年以后的1956年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周世钊。全信如下：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

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帐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 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失！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1956年12月5日

周世钊赠诗毛泽东《五律·过许昌》，毛泽东则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至少达6年之久，最后，答词《水调歌头·游泳》。正式发表时将词题《长江》改为《游泳》，而手稿仍为12月5日写的。

酬唱奉和，永远难忘

湖南省自古称为清澗之地，芙蓉之国，峰秀雁回之境，水碧沙明之乡，人才辈出，佳话频传。198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诞生9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与周世钊故乡的报纸——《湖南日报》，几乎用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刊载了他们间的一段交往及诗词的酬唱奉和。版面上有毛泽东于1955年10月4日致周世钊的信，并有手稿及注释。信中有《七律·和周世钊同志》的诗。全文如下。

致周世钊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
请向曹子谷先生致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
奉和一律，尚析指正。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
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谈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同时发表的还有周世钊写的《难忘的一天》，并附录了周陪同毛主席登
岳麓山到云麓宫即兴赋诗：

难忘的一天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
真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
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华。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于10月17日致函毛泽东，陈述心理，谁料只隔一周，毛泽东于25日就复函周世钊。信的第一段为：“赐书收到。10月17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字，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些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这封信给周世钊以极大的鼓舞，使他在工作上得到帮益。

肝胆相照，情意拳拳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两位友人的友谊经受着新的考验。是袖手旁观？还是火上加油？抑或直言谏劝？

1966年，周世钊看到运动的兴起，甚不理解。向毛泽东陈书，要求面见。毛泽东答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1967年，红卫兵“照顾”了周世钊的家。周去北京面见了毛泽东。1985年12月26日《湖南日报》发表了李津身的《毛主席与周世钊同志一席谈》

的文章，对他们的一席谈作了追忆。李文摘录如下。周说：“我刚从北京回来，见到毛主席，他老曾询及此事，我回答主席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言下仍有痛惜之感。接着又告诉我主席对他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只不得抄我的家……”周老告诉我，主席还对他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老当时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主席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周老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主席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我听周老绘声绘色地介绍情况后，感觉这一席谈话，不仅诚挚隽永，而且含义深远。事虽已隔多年，原话我难全记准确，可自信大意不差，记之可见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和“长期共存”之至意，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精神。

1972年8月周世钊再次坦率陈书于主席。全信论述了八个问题，近4000字，其中有这么几段照录于下：

林陈黑帮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背着主席，排挤异己，扩大黑帮。很多水平高、能力强、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他们假借各种名义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扣薪降职者有之，遣这回籍者有之，至今仍有很多人不得平反，不予复职，造成各方面工作上的困难，损失极大。亟应进一步贯彻您的指示，落实干部政策，并由中央组织检查组分赴各省市进行检查。

林陈为了破坏主席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界、教育界、科技人员、医务人员，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溢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一些年龄稍大，家庭出身稍差，而工作经验、教学经验都较好，文化水平专业水平都较高的人，常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令其退职退休，用一切办法排遣出去。

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陈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学校教师、工厂干部对管教青年学生、青年徒工也大大放松。下乡上山的青年学生，社队也不重视思想工作，差不多可以说，广大青年处于很少有人管教的状态。……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

窃以为理工科大学要特别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以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同时还应恢复科技大学，适当延长其学习年限，以期提高学生的造诣。文科大学中是否可指定几个有条件的设置历史研究所（或单独设立），招收大学毕业生中的文史学习比较有基础的入学，用适当长点的时间，研读古今文史名著，章学诚谓：六经皆史。……目前能胜任这种研究所的教师的老人已不多，再过几年将更难物色。因此能早为之所，便利较多。至于近代史和世界史当然也更为重要。

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同时文教领导部门应组织力量编写新的读物，凡革命斗争的故事、革命先进人物、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革命知识分子，好的村史、家史和一切好人好事，都应以生动浅显和笔端带感情的文字写出来。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农民革命的英杰，一切好的发明家、工程技术人员、艺术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药家、教育家也可以一分为二地写出具有教育作用的部分，……另外，还应编写一些有关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气象常识、史地常识等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常识读本，以提高读者的文化科学知识。

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

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这类报告或控诉的机关，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周世钊能在 1972 年 8 月的政治气候中提出如此八条，这种认识与胆略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只有交深才能言重。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莫过于进言。苏浚在《鸡鸣偶记》中给畏友下了个定义：“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而著名的《胡氏家训》则称：“畏友甚于严君。”

永留人间，长驻史册

1976 年，周世钊与毛泽东分别于 4 月 20 日和 9 月 9 日离开了人世。这两位友人人虽不是同年出生，毛泽东先周 4 年。却在同年逝世，从 1913 年起，两位相交了 63 年的友人的友谊永留人间，长驻史册。

在纪念毛泽东 90 诞辰的时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出版了。冯蕙在 1983 年 12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上写了《毛泽东书信选集介绍》的文章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的一些亲朋故旧纷纷写信给他。毛泽东担负着党和国家的繁重的领导职务，但是对于亲朋故旧的来信，他都亲自作复，在同旧友的通信中，给周世钊的最多，共选入了 10 封，从谈诗论词，酬唱奉和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探讨对受任新职的态度，既有对他从事教育工作的鼓励，也有对他接触实际的督促。这些书信，情意拳拳，不拘形迹，亲切感人。

在他们逝世后的 3 年时间里，相继出版了 3 本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即 1977 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青年时期的故事》；1978 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青少年时期锻炼身体的故事》；1979 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少年毛泽东的故事》，均为周世钊所著。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毛泽东和章士钊

章含之

(一)

我是在毛泽东主席引导下开始认真认识父亲的，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70寿辰那天，我随父亲到中南海参加毛的家宴。这次见到毛泽东，导致我后来整个生活的改变，这是我始所未料的。

毛泽东同父亲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甚至更早，因为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怀中先生是父亲早年在湖南长沙时的至交。经怀中先生介绍，父亲在1919年就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70寿辰时只设了两桌饭，除了毛泽东自己的亲属之外，只邀请了4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被邀者除父亲外还有程潜、叶恭绰和王季范。主席事前关照每位来客可携带一个子女，因此程潜先生带了他的大女儿，王季范先生带他孙女王海容，父亲带我去。饭前，毛泽东与4位同乡老人谈笑风生，论古说今。毛泽东还问了我们几个儿孙辈的情况。我告诉毛泽东我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主席很感兴趣，问了我的年龄后打趣地对我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问我：“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过去我随父亲去过一些毛泽东出席的大型宴会，父亲也曾介绍我同毛泽东握过手。但这一次我竟在只有10多个人的场合下面对面地同毛泽东讲话，自然十分拘谨，还有点紧张。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

这段对话我当时以为毛泽东是那天晚上高兴了说说而已的。没想到，一周之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突然接到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同志的电话，说主席在寿宴那天同我说妥的，我帮助主席学英语。毛泽东关照要我第二天星期日下午开始去他那里。父亲知道后很高兴。他同毛泽东数十年相知，他对我说主席是很随和的。他还要我带一套线装书《智囊》给毛。父亲藏书较多，毛泽东经常向他借书看。自从我经常去主席那里之后，我就成了他们之间的借书、还书交通员。毛泽东每次都先还清上次借的，然后再借一部，还开玩笑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就在那段我经常去毛泽东那里帮他学习英语的时间里，在闲谈中，毛泽东多次提到对父亲的评价。那时，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都要我和他以及护士长吴旭君同志3人一起晚餐。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泽东问我：“你对你那位老人家怎么看啊？”我不假思索他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对他既是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问道：“你什么时候加入党的？”我答：“1957年4月。”毛泽东风趣地笑着说：“啊呀！我党的老党员喽！”我很窘，忙说：“新党员还不够条件呢！”接着毛泽东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我父亲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硬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我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毛泽东又考问我说：“你说行老是剥削阶

级，你有什么根据？”我列举了鲁迅文章中对父亲的指责，我说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所以鲁迅骂他。后来同蒋介石关系也不错，1945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毛泽东听着我数说父亲的历史，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我，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我一下张口结舌，回答不上了。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多少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摇头。此时面对毛泽东这位伟人，我才忽然意识到除了鲁迅的文章，我对父亲的了解竟如一张白纸。我从未问过、寻过、读过父亲的生平。毛泽东没有让我太难堪，他对我说：“行老青年时代是个反清的激进革命派呢。我们谁都不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者。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于是，主席耐心地向我解释什么是《苏报》案。主席说父亲因《苏报》一案报纸遭清廷查封，父亲后来流亡日本。主席问我：“难道那时的行老不是革命派吗？”

（二）

毛泽东还对我讲起过父亲与他最初交往的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这次谈话竟引出了毛泽东向父亲“还债十年”的趣事：

1963年初，毛泽东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毛泽东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毛泽东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毛泽东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毛泽东却很认真他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泽东告诉我，1920年，他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他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对我说：“行老那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1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之后，毛泽东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2000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2000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毛泽东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了我的传话微笑着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那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帐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

自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必定派徐秘书送来 2000 元，一直到 1972 年送满累计 2 万元。1973 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问我送给父亲的钱送去没有。我说：“今年没有送。”毛泽东问为什么。我说：“主席忘了，当初说定 10 年分期偿还，还足 2 万。去年已是最后一笔，主席当年借的 2 万已还清了。”毛泽东笑了，并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那里能真的 10 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我说父亲不会肯收，他当初说那就只收 10 年。毛泽东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后开始还利息。50 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对我说：“这个钱一直送到行老不在为止。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要靠父亲的遗产。”

.....

毛泽东还曾告诉过我 1946 年他赴重庆谈判时与父亲的一席谈话。说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他和其他在重庆的党内领导同志广泛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时局的分析。毛泽东有一次找父亲叙谈，问父亲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毛泽东说，父亲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接着父亲向毛泽东谈了他对当时的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主席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泽东对我说，当时党内分析形势时，他很重视父亲的这一建议。父亲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在我思想渐趋成熟时，毛泽东的这些轻松愉快的谈话渐渐地融解着我心中与父亲关系的冰块。我也慢慢懂得了为什么毛泽东在解放后这样关怀照料父亲。

.....

(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我是“黑帮爪子、亲信”、“修正主义苗子”。

1966 年 8 月 29 日的夜里，厄运终于也降临到父亲的头上，而且命运的安排偏偏是在我偷跑回家的那个晚上。.....

北大红卫兵走了后，我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

半个小时左右过去了。父亲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我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我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我。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我不知父亲要干什么，我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父亲不动声色他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8 月 30 日）早晨，信送出了，父亲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了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当时我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8 月 31 日晚上，当我回家听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时，我激动得眼泪流个不停。母亲还告诉我，总理指示从第二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我家里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自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痛痛快快地吐了

一口气。

更没想到的是9月1日，父亲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

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周恩来指示三一医院接收父亲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后来我得知，毛泽东把父亲的信转给周恩来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不仅立即对父亲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乘毛泽东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 (2) 部长、副部长
- (3) 政副（政协副主席）
- (4) 国副（国务院副总理）
- (5)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 (6) 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宗仁

3个月后，父亲从三一医院回家，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打人的狂飚此时已平静了一些。父亲受到毛泽东的保护，可以在他的住所闭门读书写字，对天下事不闻不问，平安地过日子。然而，父亲回家后听到“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急剧地在往“深化”方向发展，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家过了一个寂静的元旦和春节后，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各地。父亲要我买回许多红卫兵小报，整日看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宣传品，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

……

1967年3月初，父亲对我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批江青一伙）要把中国毁掉。”他毅然决然地宣布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

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

送出给毛泽东的信之后，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生怕此信带来不测。想不到呈毛主席的信刚送出，父亲竟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少奇同志，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少奇同志做些检讨。无论我如何劝说，父亲不肯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当时实际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了。我猜想父亲的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后根本就没有到达刘少奇同志的手里而是被中南海中的造反派“缴获”了。

父亲给毛泽东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泽东在3月10日又一次亲笔写了回信，全信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
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我读着毛泽东复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父亲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不过他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坏人编造了少奇同志的“罪状”欺骗了主席。父亲给刘少奇同志的信自然是不会有答复的。

可惜父亲的一片真情实乃无能为力。1967年的3月，继毛泽东给父亲亲笔复信之后，又派人把当时中央整理的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送给父亲阅读。来人说这些文件尚未公布，系党内机密。因为行老关心刘少奇问题，毛泽东特别指示破例送给他看。父亲看过之后接连数日，情绪低沉。他对我说，对少奇同志的这些“罪状”，纯系蓄意置他于死地。父亲长叹说：“国家要遭难，我老了，我的意见也无用了，我只是为国家担心啊！”

（四）

父亲上书毛泽东主席，力图劝说毛泽东挽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努力无效之后，他知道他已无能为力制止这场灾难。此后他仍是关心着外面的形势，读各种各样小报，但不再写信给毛泽东提意见了。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了修改他晚年的最后一部作品——《柳文指要》。父亲酷爱柳宗元的文章，解放后他空闲时间多了，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已完成初稿。

父亲写柳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他也爱柳文，因此，要父亲将书稿送他先读。毛泽东不仅读，还逐字逐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并亲自改了若干处。本来这部书在1966年就预计可以发排了，因为在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已看完上、下两部并同意出版。为这部著作，父亲同毛泽东有过多处切磋。1965年7月，毛泽东读了书稿下部之后给父亲写了以下信件：

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注：指《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注：指康生，他一直反对出版父亲的《柳文指要》）

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批评。……（注：下半部分信中主要谈郭沫若同志同高二适先生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的争议，主席同意发表高文。此处略。）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由于康生从中作难，父亲的《柳文指要》几度修改。1965年8月再次将修改稿送毛泽东。毛泽东于1966年1月12日回信说：“……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在同一信中，毛泽东加了附注说：“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

信一件，均附上。又及。”原来，毛泽东知道康生反对出版柳文，特意在 1965 年底亲自写信给康生说了他同意出版该书的意见，并附上父亲的书稿。康生看了毛泽东去信不得不改变初衷，佯作同意出版。他在信中说读了全部《柳文指要》，“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但康生仍在信中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他学着毛泽东的笔调说：“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康生复信中，父亲知道了，毛泽东 7 月 18 日信中要求父亲将柳文上部也寄去是为把上、下两部送给康生去看。从康生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把柳文送给康生时附了信，对《柳文指要》作了肯定的评价，康生在给主席的上述复信中不得不表示赞同，他说：“……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连带信封一起转给父亲，信封原是康生写给毛泽东的，上书：“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亲笔在旁边写上“章行严先生阅”。这必是康生始所未料的。父亲看了康生的信完全明了这部他的心血之作迟迟不能付印是被学霸康生压下来了。

本来，到此一切问题算解决了，《柳文指要》终于可以问世了。但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摧毁一切旧文化的混乱年月里，当然《柳文》的出版是完全无望了。父亲十分伤心，他花费了近 10 年的时间在年近 90 的时候完成这一巨著，最后不得不把书稿闲置起来。

父亲是个锲而不舍的人。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约是 1970 年，本来毛泽东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他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他一反 1965 年 12 月给毛泽东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老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泽东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可惜这封信已找不到，我手头只有残存半截草稿，从草稿中可见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修改处墨迹极淡，显然是墨未研就下笔了。父亲在信的草稿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嘲讽他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暇，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这一节外生枝大约发生在我去湖北沙洋干校期间。如果我在北京，我一定要想法劝阻父亲不要用这种口气写这封信的。不过，幸而毛泽东深知父亲，并未怪罪于他。这封信不仅没有惹来杀身之祸，反倒促成了书的最终于 1971

年出版。

解除思想包袱的谈话 ——毛泽东与章乃器

林涤非

章乃器与毛主席在党与非党友谊往来上总算老朋友了。早在抗战前夕，1936年章乃器和沈钧儒等人发起救国会的组织，从事策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时，毛主席就曾函电赞扬以章乃器、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人的爱国行动。1946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历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时，又曾邀请章乃器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新中国成立前，章乃器来到北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后又参加开国大典，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财经组组长，同时又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等职。在此期间，章乃器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在各种会议场合和毛主席见面交谈，自不必说大都是公务关系，私人往来是比较少的。但有一次，章乃器忽然接到毛主席的通知，邀他到中南海去谈话。他真不知为了何事。直至来到毛主席家中会晤时，才知道主席是要为他解除多年来的思想包袱。那还是解放前1937年的事情。章乃器在那年9月1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客观上引发了不良的政治影响。因此，毛主席在同年11月12日发表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后来章乃器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转变，并在安徽担任财政厅厅长时，以实际行动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毛主席得知后，在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于上述一文后加了这样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这次毛主席特地邀章乃器来，就是向他解释并肯定他在安徽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特别赞扬他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帮助党建立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这不仅为章乃器解除了多年来的那个思想包袱，而且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使他觉得在安徽工作这个时期，能够得到毛主席这样恰如其分的评价，感到自豪；也使他从思想感情上更加靠拢党，接受党的领导。

人民领袖与爱国侨胞 ——毛泽东和陈嘉庚

庄明理

1937年，国内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海外广大华侨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战的爱国热潮。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南洋华侨踊跃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在滇缅公路运输抗战物资，为祖国的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这样，陈嘉庚先生却因“对战争状况，民众生活多不详知”，又“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而感到“义有未尽”，于是，他于1939年冬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团”。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热烈响应，派出代表组成慰劳团，共50余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嘉庚先生年近古稀，腰骨常疼痛，但为使慰劳团能尽南洋华侨代表之责，他不辞辛劳，毅然率团回国。

.....

慰劳团在重庆逗留期间，中共领导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和邓颖超曾到嘉庚先生寓所拜访，并在中共驻渝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嘉庚先生欣然应邀前往。在茶会上，嘉庚先生介绍了南洋华侨总会成立及其任务之后说，华侨热爱祖国，支援抗战。若发生内战，将为亲者痛，仇者快，华侨将会大失所望。万望两党以救亡为前提，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会后，嘉庚先后询问：“若往延安，交通是否方便，行程如何？”叶剑英同志一一奉告，并说，到西安后可到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一切方便。事隔两天，陈先生便接到毛泽东来电，邀他前往延安会晤。.....

嘉庚先生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并设晚宴招待。窑洞陈设的俭朴，领袖和同座谈话的平等融洽关系，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嘉庚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来到陈嘉庚先生的住所，与他交谈，或同午饭，或同晚餐。在交谈中，嘉庚先生一再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毛泽东向他讲述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并请嘉庚先生将此意转达蒋介石。毛泽东还表示将不负海外侨众的厚望，希望陈嘉庚先生回南洋后，向海外侨胞据实报告在延安的见闻。陈老一一答应。有一次，毛泽东和陈嘉庚先生共进晚餐后，又来到陪同陈先生来延安的国民党某科长的住处，同他交谈到很晚。对此，嘉庚先生感触尤深，认为毛泽东竟与一科长“长谈若是”，“足见其虚怀若谷”。他还对我们说，我对延安的印象，不是只凭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领袖们的介绍。我也同从集美、厦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民生，把在延安观察到的和国民党统治区相比较，就越来越觉得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峨嵋山的半个多月里，每每谈起延安之行，嘉庚先生总是很兴奋。他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老人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为庆贺他安全脱险，在

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大校友会、福建同乡会和闽台建设协进会等 10 个团体，举行了有 500 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我也参加了这项活动的组织工作。大会由邵力子先生主持，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到会了。毛泽东也送来了祝贺的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先生从大会的致电和报纸上得知大会盛况，以及公众对自己的崇高评价以后，在给庆祝大会的复电中说：“敌寇南侵，侨胞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庚避匿爪哇，未同诸侨分苦，实深抱愧。……”

当蒋介石磨刀霍霍，妄图挑起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时候，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嘉庚先生听说以后，担心毛泽东受害，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后来，嘉庚先生又针对当时国内外进步人士要求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呼声，给香港《华商报》题词：

还政于民，谋皮于虎。

蜀道崎岖，忧心如捣。

提醒人们对蒋介石不要抱幻想，可见他对蒋介石的为人看得入木三分。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和对毛泽东安全的焦虑。

1946 年 3 月底、4 月初，我从重庆经香港回到新加坡，向陈嘉庚先生介绍毛泽东赴渝同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以及蒋介石阴谋撕毁协定的情况。当时，看到在怡和轩陈嘉庚先生的会客大厅墙上悬挂了一张毛泽东画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泽东像啊！

……

1949 年 2 月间，我在槟榔屿接到陈嘉庚先生打来的电话，说他要回国去，邀我同行，我即于 4 月初至新加坡，方知原来是毛泽东于 1 月 20 日给陈嘉庚先生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

我们于 4 月底离开新加坡，途经香港，继续乘船北上，于 6 月 3 日驶抵达天津。6 月 4 日，当我们乘坐火车来到北平时，受到了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的热诚欢迎。7 日，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接我们到西山同毛泽东晤谈。会见时，朱德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也在座。延安一别，转眼 9 年过去了，故人重逢，彼此都感到分外亲切。当时，国民党大势已去，全中国解放在即，也许是因为时局的发展证实了自己延安之行后的预见，嘉庚先生显得很激动。相互问候饮食起居之后，嘉庚先生即对解放大军胜利过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表示祝贺，谈自己在北上途中得悉这些消息时的心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接着，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建何时能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当毛泽东答复已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同志前往时，嘉庚老人很高兴。在这次晤谈中，嘉庚先生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足见他对毛泽东的信赖。……

1950 年，陈老先生回国定居。他把全部财产献出来，用于建设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在建立集美解放纪念碑时，他写信请毛泽东为纪念碑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很快寄去了手迹。这块纪念碑，作为人民领袖同爱国侨胞亲密交往的又一见证，屹立在嘉庚先生长眠的大地上。……

亲切的关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我们在一起

李淑贤

我们这个极普通的公民之家，承受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爱护，这是我铭刻于心，永志不忘的。1963年11月26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的时候，曾谈到见过溥仪，“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了。”关于这件事，溥仪也多次和我谈过。那是1961年的下半年，溥仪在中南海毛主席的家里度过了最幸福的一天。那天，主席在家里做了几样家乡菜，邀请5位老人作客。除溥仪外，还有章士钊、程潜、仇鳌和王季范等。

到了开饭的时候，主席请大家进入饭厅，并盛情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主席很风趣，爱开玩笑，对溥仪说：“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作过你下面的老百姓呢！”又夹过一口苦瓜菜放在溥仪盘内：“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同桌就餐的“五老”，除溥仪外都是湖南人——主席的老乡，所以主席做了家乡菜请客。主席看着溥仪吃进这口菜，问道：“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溥仪连说：“好吃！好吃！”

主席和溥仪一边吃饭，一边闲聊。

“你还没有结婚吧？”主席问。

“还没有呢！”溥仪答。

“还可以再结婚嘛！”主席说，“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找一个合适的，因为这是后半生的事。要成立一个家。”

饭后，主席和“五老”一起照了像。溥仪把这张珍贵的照片摆在床头几上，我们见到它就想起主席的亲切关怀。

周恩来说理也十分关怀溥仪的婚姻问题。1960年1月26日，总理在政协礼堂接见溥仪和他的亲属时，就曾提到溥仪的婚姻问题。总理就特赦后溥仪的工作安排问题征求了溥仪本人的意见之后，微笑着对他说：“你还得结婚啊！”说完，总理把头转向一旁的载涛：“这件事，你七叔得给你张罗张罗吧！”这位爱新觉罗家庭的族长哈哈地笑了一阵，对总理说：“让他婚姻自由吧！”另一次总理接见溥仪和部分文史资料专员时也谈到这件事儿。总理很幽默地对溥仪说：“你是皇上，不能没有皇娘哟！”说完，总理和在场的人都大声笑了。

我更不能忘记的是1963年11月10日那一天，溥仪会见了巴西贵宾后在将吃午饭的时候，十分高兴地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对我说：“周总理今天下午要接见咱们了！”听了这个消息我激动万分，只盼挂钟的时针快些转到预定时间。

下午3点半，来了一辆小汽车把我们接到人民大会堂。当我们被引进福建厅的时间，看到杜聿明夫妇等几位专员及其夫人已经等在那里了。

4点整，敬爱的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满面春风，健步走进大厅。我看见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傅作义、张治中、徐冰、张执一、廖沫沙等同志。

总理一眼看见我们，立即走过来，亲切地同溥仪握手，关心地询问溥仪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并热情地说：“祝贺你啊，成立了温暖的家庭！”当总

理把那慈爱的目光落到我身上时，我感到总理是那样和善，一下子驱走了我的拘束。总理一边同我握手，一边指着我对溥仪说：“你要我们杭州的姑娘喽……。”总理的乐观情绪感染着在场的人，大家都笑了。我觉得挺不好意思，总理也爽朗地笑了。

接着，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和我们合影留念。

约6时半许，总理和大家在新疆厅共进晚餐。走出福建厅后，总理热情地招呼我和他一起走。与敬爱的周总理并排走在一起，我感到自己无限幸福。途中，总理关切地问起我的身体和家庭情况：

“你父亲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原在上海中国银行工作。”

“父母现在情况怎样？”

“父母都已不在了。母亲死的时候我还不懂事，父亲去世时我14岁。”

“噢！”总理同情地点了点头。

总理不但关心我的生活情况，而且仔细地询问我读了几年书，工作是否顺心，等等。当我讲到在朝阳区一家医院工作时，总理笑着说：“好啊！医务工作者。”并鼓励我说：“要注意学习专业知识，做好本职工作。”我领受着总理那似春风如雨露的教诲，激动的眼泪在我的眼眶内滚动……

就餐时，总理拉着我们和他坐在一起，陈毅副总理也坐在旁边。席间，总理勉励溥仪说：“你还年轻，好好学习吧！”他又注意到我由于拘谨很少夹菜，就对我说：“你来尝尝咱们南方菜嘛！”说着，夹起盘中的“狮子头”放进我盘中，一直看着我吃进去。

总理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他看到陈毅副总理一时很少说话，只顾大口喝酒，就和他开起玩笑了，说：“我叫你少喝点嘛！你还是这个样子喝呀！”和我们同桌就餐的还有杜聿明夫妇。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刚从美国回来，总理转告她说：“邓颖超同志让我代问你好！”我们总理待人多么真挚啊！

宴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

当晚我和溥仪都很兴奋，辗转不能入睡，特别是从小就失去了母爱娇抚的我，更有不尽的感慨……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还关心我们的生活小事。不仅关心溥仪的婚姻，我们建立了家庭之后，还关心我们的收入和安排。溥仪告诉我，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又谈到我们的生活情况。毛主席说：“对宣统要好好的团结，他和光绪皇帝都是我们的顶头上司。我做过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说到这儿，主席又转向在场的章士钊先生继续说：“我想拿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长铗归来兮食无鱼’，人家是皇帝嘛！”溥仪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感动，他对我说：“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吗？靠劳动吃饭，这就是幸福！”又说：“主席的钱我们不能收，盛情我们领了。这样你说好吗？”我同意溥仪的意见。不久群众出版社送来了《我的前半生》一书的5000元稿费。溥仪也是不想收的，许多同志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这笔款。

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另一次会见是在1964年的“五一”节前夕，总理为我们提供了和刘少奇主席会面的机会。当时，我和溥仪刚从南方各省参观访问归来，应邀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等12个全国性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庆祝“五一”招待会。

宴会进行中，敬爱的周总理在大厅里发现了我们，立刻把我们招呼到主桌席这边来。总理先把我们介绍给布隆迪王国国民议会议长塔德西里乌尤蒙西阁下。总理指着溥仪说：“这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先生。”又指着介绍说：“这是溥仪夫人。”议长阁下很礼貌地答道：“见到溥仪阁下和夫人非常荣幸！”我和溥仪也十分高兴地向议长阁下和总理祝了酒。

溥仪和刘少奇主席早就熟识，趁着这个机会让我和刘少奇主席见了面。他站在刘主席身旁对我说：“这是刘主席！”又转身对刘主席说：“这是我的爱人！”刘主席和蔼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结婚多长时间了，生活有没有困难等等，我一一作答，刘主席满意地点着头。这次会见，使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

从心里感谢共产党 ——毛泽东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金蕊秀

“毛主席来信了”

我是溥仪的三妹，姓爱新觉罗，在汉语中称为“金”。名韞颖，蕊秀是我的号，后来用开了变成名字。1923年与郭布罗润麒结婚，结婚后一同到日本东京。他住校，每周回来一次。我在家向家庭教师学日语，在此期间常和溥仪有信件来往。1945年后，我写的这些信件不知被什么人得到，编入一本书——《满宫残照记》，现在读起来，觉得幼稚可笑。

听我七叔载涛说，章士钊先生（人称章行老）看过《满宫残照记》后，认为我给溥仪写的信，写得很天真，很有意思，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开政协会，见到我七叔，才知道我就住在北京。那时我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10号，正在做街道工作，在街道上曾担任过卫生组长、居民组长和治保委员。

1954年有一天（月日记不清了），七叔载涛把我带到东四八条章行老家。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很想见你，你给溥仪写的信很有意思，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那本书《满宫残照记》，我把它呈给毛主席看了。”那天章行老还请我和七叔吃饭，在座的有章夫人，有朱启铃先生夫妇，有朱海北先生夫妇等。饭后，章行老说：“过些日子，你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

我写完自传后，请章行老帮助看一看，他看完后说：“写得太简单了，这纸也不行。”又说：“明儿我给你改一改，你就到我这里来抄写吧。”

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章行老改好了，让我去看，完了再抄。但他改的，有的地方我不同意。譬如说，“溥仪记性好，人名记得很清楚，很聪明。”这样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写。我说：“我心里没有那么想，不敢向毛主席说假话。”要求去掉。章行老像有点生气的样子说：“要是给别的人写东西，我就不改。你是个女同志，否则，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说：“您还是管吧。”好歹把老人说通了，按我的意思给改过来。说真的，至今我还坚持，溥仪的记性并不很好。记得30年代我在日本时，曾给溥仪写过信，告诉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块吃，有毒。”过后他又来信告诉我，“听人说，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这说明他的记性还是不好。所以我并不同意说溥仪聪明。

我的自传放在章行老家，经我们一老一少，改了写，写了又改，用了好些个半天，终于抄写好了。最后，自传是用旧时代的一种公文札子抄写的。札子的封面用花缎裱过，糊得很讲究。在札子里还贴着我两张过去的像片，一张是我的结婚像，另一张是旗装像。

过了很久，我又一次去东四八条章行老家，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信了。”他还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给我看，信上的意思是：信收到了，那件事（章行老说就是关于我的事）已交给别人处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四区政协委员。

1960年，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时，总理对我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给我，我交给下边的。”我当时想，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还为我这样的人操心，使我由衷地感谢。当然，这与章行老的热情帮助和推荐也有关。否则，中央领导怎会知道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呢？真可

惜，章行老替我修改的一大卷自传材料，“文革”期间也都烧掉了。

毛主席让我们去抚顺探亲

1956年开政协会，毛主席见到我七叔载涛时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带着家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去看望他们。”在彭真市长的关怀下，让七叔载涛带着我和五妹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亲。在去抚顺前，我七叔带着我到市政府拜访彭市长，彭市长还叮嘱我们：“那边天冷，要穿暖和了。”市政府给我和五妹各发了100元购置衣服。记得我当时买了件蓝色灯芯绒外衣，黑色灯芯绒裤子，还买了一身棉毛衫……。彭市长还说：“你们是去看亲戚，可以买点吃的带去。买点点心，政府可以给钱。”经与七叔商量，认为入口的东西不能带，“怕责任太重”，就没买。本来彭市长让我们自己去抚顺，但我们都认为，还是由政府派人带着才妥当。市长便派公安局的丁科长陪同我们去。丁科长这人真好，一路上照顾我们，给我们安排舒适住处，逛公园等等，体贴周到。

1956年3月9日，我们到了抚顺，住的是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当天，就去管理所，先见到的是所长，我七叔载涛向所长说：“毛主席派我看望溥仪、溥杰等。”所长介绍说：“溥仪、溥杰等学习得都很好。”然后把溥仪、溥杰、郭布罗润麒、万嘉熙、毓嶷、毓岳、毓塘等人找来和我们见面。看见他们每个人气色、身体都不错，精神状态也很好，我们都很高兴。谈话中，当他们听说彭市长让我们从北京带点吃的来，我们没敢带，他们很遗憾地说：“要带点吃的来，多好哇！”确实，离开北京多年，真想北京点心。回想30年代我在日本时，一谈到北京的小吃就眉飞色舞的情景，当时住在管理所的亲人们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这时我又后悔没听彭市长的话，给他们带点北京的点心。

在管理所我们还参观了宿舍、食堂、图书馆、运动场，各处都极其整齐、干净。在食堂里，我们还看到一大桶虾，证明他们吃的真不错。郭布罗润麒说，他是病号室的学习组长。他们还自己编戏自己演，郭布罗润麒扮演一个女角叫“葛娃”，以后，他在管理所的滑冰场上溜冰，有人就从背后指点着他说，“这就是那个葛娃。”说明他演得不错，给人印象深刻。郭布罗润麒还说，有个时期，他血压高，领导还让他单吃小灶。在管理所的人，如果生了病，所里有好大夫给治，即使在深夜生病，医生也起来给看。有的药当地没有，就派人到外地去买。他们列举种种事实，说明党不念旧恶，在政治上帮助，生活上优待。这种改造办法，使人心服口服。甚至有些日本战犯，虽然中军国主义毒很深，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工作，他们认识到侵略的罪恶，从心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有的人后来遣送回国，上了海船还高呼，“中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一系列的事实，都说明共产党伟大，管理所执行党的政策好。

我们由抚顺回来后，彭市长亲自到我七叔载涛家，听取汇报。我七叔把到抚顺的经过向市长作了汇报。我和五妹向市长报告，我们买了暖和的衣服，感谢市长。市长说：“别感谢我，这是政府给的。”

在这以前，我大儿子宗彝患盲肠炎住院动手术时，市长派人送100元救济，使我们全家人深为感动。

清朝王爷成了解放军的一员 ——毛泽东对我的关怀

载涛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主席毛泽东”。

这是1950年8月10日毛泽东签署的对我的任命状，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从接到委任状这一天起，我这个曾任过清朝宣统部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的王爷，一下子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得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心里很不平静：“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我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我更加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知道我载涛？”我不禁从内心深处赞叹：“毛主席伟大啊！知我者，毛泽东也！”想着想着，我这位末代王朝的亲贵大臣，竟激动得掉下眼泪，哭了起来。

我的哭，决不是悲，而是喜。我喜毛主席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我更喜新社会好，连自己这株枯木也能逢春，获得了新的生命，我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晚上，我坐下来，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我的无限感激之情。

后来，我又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我正在政协开会，突然接到家里打来一个电话：“北房东南角上塌了个大窟窿。你赶快回来设法修修吧！”我放下电话，回到会议桌旁，同志们关切地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我向会议主持人请假，回家张罗修房去了。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以后，毛泽东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我家了。

我接到这笔钱，感动得说不出话，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半天，我对章士钊先生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先生，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想：“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筹划国家大事，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家里的小事呢？毛主席真英明伟大啊！我载涛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尽力为人民干点事，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于万一。”我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和报效国家人民的心意。

女活佛回归祖国 ——毛泽东与多吉拉姆

林一

桑顶·多吉拉姆是西藏著名桑顶寺第十二世女活佛。1955年的春天，她参加“西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佛教是讲究福分的。这一次，女活佛感到莫大的幸福。她在怀仁堂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多大年龄了？”她红着脸回答：“14岁了。”毛泽东又问：“你的寺庙在哪个地方？”她抿了抿嘴，回答说：“在浪子卡，羊卓地方，叫桑顶寺。”这时，精神矍铄的朱总司令插话说：“是不是在羊卓雍湖边？”多吉拉姆惊奇地感到，领袖对遥远的西藏是多么熟悉呵……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还和她一起照像。她感到幸福、光荣，觉得佛祖的授意，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真正地为众生积德行善，才有吉祥和光明。参观回藏后，她当上了西藏宗教事务委员会常委兼江孜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席。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她在万人大会上登台讲话：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不久，西藏发生叛乱，手提英式步枪的卫教军挟持女活佛逃往国外，她不愿意。大管家要她向吉祥光明菩萨求个卦，问问是走还是留。占卜的喇嘛捣了鬼，占卜的结果是“走”。学经十余年的女活佛无力违背神佛的旨意。而共产党对她的影响，领袖对她的教诲，祖国对她的期望，却又是具有如此牵肠挂肚的吸引力。女活佛一时手足无措，在十个卫教军乌亮的枪口“护送”下，被迫踏上了通向异国的羊肠小道。

一路上，她看够了叛军的兽行，尝够了离乡去国的痛苦。她看到某些披着袈裟的佛门弟子，实际是心术不正的人。她内心产生了对那些人的憎恶，决心回归祖国。她终于与我国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处接上了头。一见到祖国的亲人，她悲喜交集，呜呜大哭。商代处负责同志亲切地说：“你的要求，我们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毛主席关怀着你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要求我们，帮助你们尽快地安全回归祖国！”共产党没有嫌弃她，一股暖流顿时涌进了她的周身。

1959年国庆前夕，多吉拉姆回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她被安排参加了隆重的建国10周年大庆，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女活佛，对祖国爱得更深。从此她勤奋学习，不断进步。后来她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热爱祖国的人，“福分”与她同在。

风仪师友，情深意长 ——毛泽东关怀黎氏兄弟

赵志超

湖南湘潭县晓霞山下，有一个书香世家，人称“长塘黎氏”，这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及其兄弟的故居。

黎锦熙昆仲 8 人，个个成材，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黎锦光，音乐家；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

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堪称少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

黎氏八兄弟从小受到父亲黎松安（晚清秀才，画家齐白石的好友）的熏陶，“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从小钻研学问，矢志治学、从艺。兄弟八人，早年均受维新思想和“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同情革命，有的参加了革命。在早年，他们与毛泽东同乡，与他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解放后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为我国的科学文化艺术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

黎氏 8 兄弟与毛泽东交往最密切的，首推老大黎锦熙。

黎锦熙（1890～1978），字劭西（也有写作邵西），号鹏庵。他比毛泽东仅大 3 岁多，却是毛泽东的一位比较敬重的老师。1913 年至 1915 年，他担任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的历史和国文教员，毛泽东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那时，二人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3 月 23 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四大书记离开西柏坡，登车进京。5 月间，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迁居中南海菊香书屋。

进入中南海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在卧室的办公桌上见到一封寄自北京师范大学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他幼年时的同学、北师大代校长汤藻贞教授的来信。毛泽东看完信十分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汤藻贞，向对方询问了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接着，又问道：

“北京现在还有哪些老相识？”

汤藻贞告诉毛泽东：“在北京的老相识还有：北京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数学系主任傅种荪，以及国画家齐白石，等等。”

毛泽东高兴地说：“太好了！”

汤藻贞忙说：“我让他们来看你吧！”

毛泽东连说：“不要，不要，我去看他们。”

随即，毛泽东驱车来到北京和平门北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汤藻贞、黄国璋、傅种荪等人。

汤藻贞与黎锦熙闻讯连忙从家中赶来迎接。毛泽东一见年近花甲的黎锦熙先生，便迅速迎上前去，喊道：

“黎教师，您好！”

“黎锦熙满面笑容，连连摇摇头，谦和地说：“不敢，不敢！”

师友们亲切叙旧，谈笑风生，气氛格外融洽。据说，毛泽东请黎锦熙出任教育部长，黎极力辞谢了。

汤藻贞要家里人弄点湖南特产——腊肉招待主席。毛泽东连忙说：“不麻烦你们了，今天我请客。”马上让工作人员叫来两桌酒席。

宾主入席，边吃边谈，亲切的话语，浓厚的乡音，把他们带到当年湘江之边那“风华正茂，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峥嵘岁月里……

1949年9月，60岁的黎锦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指派为北师大校务委员会主席。

此后，毛泽东曾几次接黎锦熙去中南海家中叙谈。一次，黎偕夫人黄鹤寿应邀到中南海赴宴，毛泽东特意开了一张纯家乡风味的菜单：虎皮扣肉、火焙子鱼、香干大蒜炒肉、冬笋腊肉、猪血豆腐汤……席间，毛泽东不停地向老师和师母敬酒敬菜，宾主谈笑风生，好不欢畅。还有一次，正值荷花盛开时节，毛泽东特意邀请黎锦熙先生到中南海同赏荷景，怡情悦目……

黎锦熙是语言家，又是文字改革家。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就简化汉字等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倡导文字改革。毛泽东深表赞成，立即复信吴玉章。信中特别提到要请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的黎锦熙等先生“一阅”：

玉章同志：

来信已悉。当付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马叙伦——引者注）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即黎锦熙——引者注）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此致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不久，毛泽东又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茅盾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任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黎锦熙焕发了精神，潜心进行学术研究，毕生致力于文字改革工作，为祖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1956年，黎锦晖参加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1891~1967），排行老二，字均荃，早年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而后组建明月歌舞社，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解放后长期在戏剧电影界工作。

在1956年的相会中，毛泽东还向黎锦晖提到：陈毅同志在井冈山、中央苏区时期，曾用黎锦晖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

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毛泽东这么一讲，两个人相对笑了起来。

老四黎锦纾（1896～1954），字季纯，早年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大革命前参加了进步青年组织的去欧洲的勤工俭学，和朱德、徐冰是同一个组。他们一同租住在柏林的一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将军未亡人的楼房里，包住房，包伙食。黎锦纾和朱德同志感情很深。后来，黎锦纾获得了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他在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与晏阳初先生等人致力于平民教育事业。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朱德总司令写信给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请他在南京找到黎锦纾，并予以保护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德多次向毛泽东主席推荐黎锦纾到中央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黎锦纾先生终因身患胃癌未能遂愿。他于1954年病逝，享年58岁。

老五黎锦炯（1900～1981），字殿庸，又名黎亮。1927年唐山交大毕业，是铁道桥梁专家，是滦河大铁桥总设计师，也是入党较早的高级知识分子。解放后，曾任铁道部设计局局长，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党内反动技术权威”和“走资派”，发放到宁夏某农场劳改。1970年，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事后，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说：黎锦炯是党内铁道桥梁技术权威，但不反动。对我国铁道桥梁工程，有杰出的贡献。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他从农场返回北京，继续担任了铁道部设计局局长。

（三）

1954年，黎锦熙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这年国庆节，他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和毛泽东相见，二人亲切谈话、叙旧。谈话中，毛泽东问到：“六先生还好吗？”

“六先生”就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良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篇，剧本5部。小说《尘影》曾受到鲁迅的称赞：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地听着，毛泽东接着说：“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事后，黎锦熙将毛主席的评价传达给六弟黎锦明，黎锦明十分感动，更加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先后创作了多部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和剧本。

老七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湖南大学土木科肄业。后毕业于上海音乐舞蹈专门学校。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曾任明月歌舞团乐队指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编辑、作曲、导演。他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曾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曲，其中不乏许多著名歌曲，如《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支玫瑰花》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

黎锦光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时的学生，二人有过一段

密切的交往。那是 1921 年 7 月，黎锦光随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就读补习班，同年 9 月，毛泽东就任一师国文教员，并任补习班班主任。他上的国文课，执教严谨，时常补充一些时论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欢迎。这个班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的弟弟，上课时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容易发觉。老师每当听见，便问：“谁在吹口哨？”唐生明的一伙人便装着寻找吹口哨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也一边吹一边跟着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有一天，毛泽东讲课时，唐生明仍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许吹！”唐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同学打听，但无人敢揭发。

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本去毛泽东老师房间。当时，他的名字叫黎锦颢，毛泽东早就了解到他是黎锦熙的七弟，谈话中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然后，毛泽东悄悄地向黎锦光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莫担心，告诉我。”于是，黎锦光才告诉毛泽东吹口哨者就是唐生明。

第二天，毛泽东上课时，唐生明故技重演。正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唐生明！”唐即张口结舌答应了一声：“到！”毛泽东厉声说：“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于是，引起哄堂大笑。毛泽东批评他：“以后不准再吹了！”唐答了声“是”，以后果然不敢再犯了。

黎锦光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叫黎锦扬，排行第八，生于 1915 年，字任余。是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抗战时期，他毕业于西南联大，后获公费出国留学，就读于美国耶鲁大学。现年近 80 岁，旅美半个多世纪，创作了 10 多部长篇小说，如《花鼓歌》、《天堂之门》、《中国外传》等。他的成名作《花鼓歌》在美国曾拍成电影，或改编成戏剧，颇有影响。

1976 年黎锦扬写信给大哥黎锦熙：久居海外，想回国观光，希望大哥锦熙向毛主席当面提出回国访问的要求。当时，周总理逝世不久，毛主席心情不好，黎锦熙没有向毛主席提出。直到毛主席去世 5 年后；黎锦扬才于 1981 年回到祖国观光。

黎氏八兄弟出身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却因为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潜心钻研学问，而各有建树，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文学艺术领域里作出了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的成就和贡献。这除了受他们的家庭熏陶外，还与他们同毛泽东有过交往以及毛泽东对他们亲切关怀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一生私交甚广，尤其尊敬老师，尊重民主人士。他与黎氏兄弟的交往及对他们的关怀，是令人称道和耐人寻味的。

“救国必先重二子” ——毛泽东与杨昌济

夏石斌

1920年1月20日上午8时许，在沙滩北京大学校园的小礼堂里响起一阵哀乐。胸佩白花，臂带黑纱的蔡元培校长在那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灵坛，庄严宣布追悼大会开始。继而一位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走上灵坛，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坛正中的照片三鞠躬后，庄重地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合会发布的《治丧辞》。这位青年就是新民学会会员、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他作为死者的学生和同事，他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敬慕和思念的死者——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1871—1920）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人。他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改革以图存”的志向。维新运动时，他正就读于岳麓书院，就毅然参加了维新团体“南学会”、“不缠足会”和“延年会”，并因在《湘报》上发表《论湖南遵省设立商务局首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而振名海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被迫退隐板仓，以乡塾为业。后于1903年出国留学，先后就学于日本、美国、德国。1913年春，他学成回国，决心“采用东洋各国成法，创兴学校，以任指导社会之责”，因而坚辞湘督谭延闿要他出任省教育司司长的邀请，先后在省立第四师范、省立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他最初在第四师范教伦理，这时毛泽东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到了第一师范任教，而毛泽东正好转入该校。这样杨昌济就与毛泽东及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昌济先生认为，救国首先在于人才，而人才则在于有人识拔和培养。因此他非常注意对学生的考察和培养。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经常谈及对某些学生的看法，倾注了他对学生关注爱护之情。在他1915年4月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毛泽东的文字：“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导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至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履历也。”在他的日记中，还常记载有学生的思想动态，并给予评论和引导。在他的高尚品德、渊博知识的吸引下，在他诲人不倦，平易近人的关怀中，一大批优秀青年集聚于门下。每逢星期日或节假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瓚等人总要到“板仓杨寓”看望杨昌济老师。或请他解答疑难，或共同探讨人生哲理，或纵论天下大势，或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形成了一个以杨昌济为核心的无形的思想学术群体。据萧三回忆：“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几个学生。”1915年秋，杨昌济全家搬到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学生们前来学习和讨论，杨昌济专门在家里辟了一间客房。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一谈就是几个小

时。1916年暑假，杨昌济还介绍毛泽东等人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他多次教诲学生，人贵在有志，“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而理想则是立志的内容，树立了根本的理想，才算真正“立志”。他说，“人者，有理想之动物也。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想。”杨昌济的这一思想对新民学会的早期会员影响很深。如毛泽东在1914年写的《讲堂录》中就这样写道：“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之所谓志”，认为“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来得真理，即终身未得志”。

1918年6月，杨昌济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往北京。这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国内出现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杨昌济十分关心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写信热情赞助学生们赴法勤工俭学。这时新民学会刚成立两月，会员们也先后从一师毕业，正渴望得到深造和发展机会。他们接到杨先生的来信后，学会专门讨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问题。8月中旬，毛泽东等20多位湖南青年到达北京。杨昌济多方设法帮助联系、筹措经费，使一批会员顺利赴法；毛泽东则留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1920年初，杨昌济病重住于北京德国医院，这时他还写信给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这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病逝于医院。这段重才爱国的切切之言竟成了他弥留之际的嘱托。他逝世后，在京的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合发表治丧启事，称赞他“操行纯洁，笃志嗜学”“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

在杨昌济影响下成立的新民学会，先后有会员70多人，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有用之才，诸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学瓚、罗章龙、李维汉、夏曦、谢觉哉等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活动家。当人们在缅怀这些革命家时，自然要铭记这位被他们称为“导师”的杨昌济先生。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毛泽东与蔡元培

高平叔

（一）

研究蔡元培与毛泽东的关系，应先从蔡元培同杨昌济的关系说起。

杨昌济，号怀中，湖南长沙板仓冲人。中秀才后，在乡间教书。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杨即开始和蔡联系。次年，杨往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后往英国，入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学成后，又去德国考察。

杨昌济在苏格兰时，其族孙杨笃生、同乡章士钊均在该处。此时，蔡元培亦在德国攻读。杨笃生是蔡试制炸弹共图革命时的战友，章士钊是蔡主持的爱国学社的学生；同时，蔡元培与杨昌济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同在西欧，交流较便。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两人交往颇多，友情日进。

辛亥革命后，杨昌济归国，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他特别赏识毛泽东，常说：“看到了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蔡和森。特别是毛泽东，他将来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毛泽东也说：“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哲学等课程，极力推介蔡元培的译著，并把蔡所译的《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原著）定为教科书。毛泽东回忆说：“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精读了这本蔡译《伦理学原理》，对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用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这本书所有的空白处，他写了150多条批注，有表示赞成的，如“旨哉言乎”、“此说与吾大合”等；有表示反对的，如“此节不甚当”、“不应以此立说”等；有表示怀疑的，如“如此有一疑问”等。他还根据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梁启超等人的学说，加以比较、综合，再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段。批注的墨迹，有两种以至三种的，有些是对以前所写批注重加批判或补充。为能充分发挥，有的批注长达800多字。原书不过12万字，而他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竟约达12000字。

仅举两条批注为例，可见一斑。

在该书106页第四章第一段上，原文为“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他写的批注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在该书183页第二节第十段上，原文为“人既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他写的批注是：“（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二)

1918年春，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任哲学、伦理学的教授，举家迁居首都。

同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一师。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及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他于8月间到达北京。他回忆说：北京“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杨昌济“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就是李大钊”，“给了我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

毛任职北大，是在蔡元培自己主持校务期间。按惯例，大致是，杨昌济向李大钊介绍，由李以图书馆主任职位向校长提出，再由蔡元培写派任的条子，通知校会计课照发月薪。

毛泽东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工作虽然琐碎，待遇虽然菲薄，但他充分利用这一极好的学习环境，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得以和李大钊朝夕相处。李因章士钊的推介，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图书馆主任，不久，加聘为教授，随后，又聘为校长室秘书。李搜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自己努力钻研，广泛向人传播。李很器重毛，认为毛是湖南青年的杰出领袖，而毛也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正如毛后来的回忆：“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利用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经常旁听北大各种课程，并参加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

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在成立会演说词中，提出两个目的：一是“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二是“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点不同之点”，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点之发展。”1919年2月19日，又举行改组大会，到会员毛泽东、徐恭典等26人，蔡元培亲临演说，并被选为会长。

该研究会每星期由导师讲授新闻学课程，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邵飘萍为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毛泽东回忆说：“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该研究会于1919年10月16日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听讲一年的证书。蔡元培在期满式致词，谓“本校之有新闻学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之第一次结束。”

毛泽东参加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是陈大齐、杨昌济、胡适等所发起。据罗章龙回忆，蔡元培实际是该研究会领导人。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淪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曾阅读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包括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

毛泽东还参加北太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蔡元培支持下，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这个讲演团。1919年3月23日，该团在蔡元培的校长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有团员39人。该团团员经常到闹市及郊区向工人、农民讲演，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及文化科学知识。

毛泽东还因李大钊的介绍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发起于1918年6月，成立于次年7月。会员除北大的李大钊、周炳琳、许德珩等人外，尚有

王光祈、周太玄、曾琦、宗白华等人。蔡元培对该会的工作，特别是它所倡导的工读互助团，深表赞赏，认为“它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他建议改名为“工学互助团”。在该团《募款启事》上，他具名领衔发起。

毛泽东还常去拜访一些名流学者。据萧三回忆，经杨昌济介绍，他曾随毛同去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毛还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毛泽东第一次北上，为的是组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因此，他在北京半年中，主要还是为这件事进行工作。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蔡元培、吴玉章、李煜瀛等人在法国时发动的。消息传到长沙，毛泽东即认为这是培养和提高湖南青年的大好途径。经他宣传鼓动，蔡和森、李维汉、张昆弟、曾以鲁、罗学瓚等数十人迅速参加。毛到北京后，经常代表湖南学生向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接洽有关留法的事。毛并且根据该教育会的要求，为湖南学生起草留法勤工俭学计划。这些学生所需准备的各项工作，如出国前须学会法文，筹划旅费，制备行装，申办出国护照等，他无不竭力相助。至于他自己，他告诉斯诺：“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19年3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送走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4月，他回到长沙。

(三)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随后，又领导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为了扩大驱张宣传，并利用北洋军阀各系内部矛盾，使其从军事上瓦解张敬尧，毛泽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开展控诉、请愿、组织平民通讯社，发布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新闻稿等等活动。

就在毛泽东再次到京的第30天，和他关系最深的杨昌济教师竟因久病不治，溘然长逝了。

蔡元培与毛泽东等为杨昌济病故发布启事，征集赙金，资助遗孤。摘录启事原文于下：

敬启者，湖南场怀中先生，以本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病歿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歿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 章士钊

…… 毛泽东

同启

范源濂 杨度黎

锦 熙 熊崇煦

这份 29 人具名的启事，是对杨昌济所有亲友而发的。蔡元培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 4 人联名另发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赠。收集到一定数额后，由杨昌济家属带回故乡。这年秋天，为了支援毛泽东在长沙举办文化书社等事业，杨开慧和她的母亲慨然献出这笔赠金，供毛作革命活动的经费。

毛泽东曾为杨昌济守灵并襄办丧事。在毛和其他亲友安排下，杨开慧一家于当年二月初扶柩南下。为使灵柩沿途能顺利通行，蔡元培特写一份手札给北大文牍课，要求速办杨的运柩护照。毛泽东头一次到北京，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第二次逗留北京，据他自己说：“读了许多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年 5 月初，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除进行驱张工作外，并和当时上海筹建共产党组织的人们联系。经过湖南人民多方面的斗争，军阀张敬尧终于仓皇逃走。毛泽东也于 7 月初返回长沙。

(四)

1920 年 10 月，湖南省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荪、以及杜威、罗素等人讲演。除由该教育会人员担任记录外，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另作记录，供该报自行迅速刊布。

蔡元培除按该教育会预定讲演七次外，还应周南女校、岳云中学等处之邀，增讲五次。其中，由毛泽东记录的有两篇。这两篇演说词，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抄录全文于后。

第一篇是预定的讲演，湖南省教育会亦有记录稿，文句与此稍有不同；而且，该会笔记者漏记了一大段。不过，长沙《大公报》刊载毛的记录稿时，排印有些误脱，断句多用圈点，故抄录时，重加标点，并酌予校勘（错字后面，加订正之字于〔〕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

对于学生的希望

我于贵省学生界情形不甚熟悉。我所知者为北京学生界情形，各地想也大同小异。今天到北京和诸君说话，便以我所知之情形，加以推想，贡献诸君。

五四运动以来，全国学生界空气为之一变。

许多新现象，新觉悟，都于五四以后发生，举其大者，共得四端。

(1) 自己尊重自己吾国办学二十年，犹是从前之科举思想，熬上几个年头，得到文凭一纸，实是从前学生的普通目的。自己的成绩好不好，毕业后中用不中用，一概不问。平时荒嬉既多，一临考试，或抄袭课本，或打听题目，或请划范围，目的只图敷衍，骗到一张证书而已，全不打算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和人类社会有何关系。五四以前之学生情形，恐怕有大多数是这样的。

五四以后不同了。原来五四运动也是社会的各方面酝酿出来的。政治太腐败，社会太龌龊，学生天良未泯，便不答应这种腐败的政治，龌龊的社会，蓄之已久，迸发一朝，于是乎有五四运动。从前的社会很看不起学生，自有此运动，社会便重视学生了。学生亦顿然了解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在人类社会占何种位置，因而觉得自身应该尊重，于现在及将来应如何打算，一变前此荒嬉暴弃的习惯，而发生一种向前进取、开拓自己运命的心。

(2) 化孤独为共同“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中国人的座右铭，也就是从前学生界的座右铭。从前的学生，于自己以外，大半是一概不管，纯守一种独善其身的主义。五四运动而后，自己与社会发生了交涉、同学彼此间也常须互助，知道单是自己好，单是自己有学问、有思想不行。如想做事真要成功，目的真要达到，非将学问、思想推及于自己以外的人不可。于是同志之连络，平民之讲演，社会各方面之诱掖指导，均为最切要的事。化孤独的生活为共同的生活，实是五四以后学生界的一个新觉悟。

(3) 对自己学问能力的【能力的】切实了解从前学生，对于自己的学问，有用无用，自己的能力，哪处是长，哪处是短，简直不甚了解，不及自觉。五四以后，自己经过了种种困难，于组织上，协同上，应付上，以自己的学问和能力，向新旧社会做了一变〔番〕之试验，顿然觉悟到自己学问不够，能力有限，于是一改从前滞钝昏沉的习惯，变为随时留心、遇事注意的习惯，家庭啦，社会啦，国家啦，世界啦，都变为充实自己学问发展自己能力的材料。这种新觉悟，也是五四以后才有。

(4) 计画〔划〕的运动从前的学生，大半是没有主义的，也没有什么运动。五四后，又经过种种失败，乃知集合多数人做事，是很不容易的。如何才能可以不至失败，如何才能可以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如何组织，如何计画，均非事先筹度不行。又知群众运动在某种时候虽属必要，但决不可轻动。不害〔合〕时机，不要组织，没有计画〔划〕的运动，必然做不成功。这种觉悟，也是到五四以后才有的。

凡非常举动，最要审度时宜。譬如用药，要当于病。五四运动初起，北京学生并未预计定要打曹、章、陆，其出此，只是临时的，偶然的。及一度惯〔使〕用，偶然成功。学生不察，又思再试，乃招前门遮路及天津流血之两个失败。后便越做越难。自己内部也发生了问题。反对党方面，亦得了好多防阻之术，或且有人从而利用，冀达暖昧目的。至此，学生界乃大觉悟，知道学生决不是万能，群众运动大不容易，世上的问题也不是这么容易解决。问题解决，还是要有计画〔划〕，有研究。吾见学生反对山东直接交涉，反对二十一条，反对军事协约等等，而于这些事项的内容，甚少明白了解者。吾以为学生宜养精蓄锐，要解决问题，先要研究问题。如北京大学现役《现代政治研究》一科，如山东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及其他临时发生之中外重要问题等，拿来研究辩论，求出正当解决途径，以之贡献社会。吾以为像这样的偶发事项，均不要轻易发起运动。要有沉静的预备、精密的打算，然后才有把握去达到我们要达到之目的。（湖南省教育会记录稿漏记了这一段——本文笔者注）

以上是吾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一种觉悟。以下，再说吾所希望于学生界之有第二种觉悟。于此又分五端：

(1) 自动的求学。在学校，不能单靠教科书和教习。课堂功课固然要紧，自动自习，随时注意，自己发见求学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更为要紧。

(2) 自己料理自己的行为。学生对于社会，应知系处于指导的地位，故自己的行为，必应好生料理。有些学生不喜教职员管理，自己却一意放纵，做出种种坏行。我意不要人家管理，能够自治，是好的；不要管理，自便放纵，是不好的。管理规则、教室规则等可以不要，但要能够自守秩序，总要办到不要规则而其收效仍如有规则时、或且过之才好。平民主义不是不守秩序。罗素是主张自由最力的人，也说自由与秩序并不相妨。我意最好由学生自定规则，自己遵守。

(3) 平等及劳动的观念。和〔我〕友某君曾说：‘学生倡言要与教职员平等，但其使令工役，横眼厉色，又伊然以主人自居，以奴隶待人’。我友之言，系指从前的学生。我意学生要与工役及其他知识低于自己的人讲求平等，然后遇教职员之以不平等待己者，可以不答应他。近人盛倡勤工俭学，主张一边读书，一边做工。我意校中工作，可以学生自为。成天读书，于卫生上也有妨碍。凡吃饭不做事专门暴珍天物的人，是吾们所最反对的。脱尔太主张从〔泛〕劳动主义，他自制衣履，自作农工，反对太严格的分工。吾愿学生于此加以注意。

(4) 注意美的享乐。近来学生多有为麻将、扑克或阅恶劣小说等不正当之消遣。此固原因于其人之不悦学，尤以社会及学校无正当之消遣为主要原因。甚有生趣索然，意兴无聊，因而自杀者。所以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托〔托〕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但切不要拘泥，只随人意兴

所到，适情便可。如音乐一项，笛子、胡琴都可。大家看看文学书，唱唱诗歌，也可以悦性怡情。惟单独没有兴会，总要有几个人以上共同享乐。学校中要常有此种娱乐的组织。有此种组织，感情可以调和，同学间不好的意见和争执，也要少些了。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有生趣。

(5) 社会服务。社会一般的知识程度不进，各种事业的设施，均感痛苦。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市〔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通知识及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吾见北京每一校有二、三百人者，有千人者，甚可乐观。国家办教育，人才与财力均难；平民学校不费特别的人才与财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又调查社会情形，甚为要紧。吾国没有统计，以致诸事无从根据计画〔划〕。要讲平民主义，要有真正的群众运动，宜从各种细小的调查做起。此次北方旱灾，受饥之民，至色千乡万，赈灾筹款，须求所以引起各方的同情，北京学生联合会乃思得一法，即调查各地灾状，用文字或照片描绘各种灾情，发表于世，乃能引起同情。吾出京时，正值学生分组出发，十人一组。即此一宗，可见调查之关系重要。

以上各端，是吾一时想及，陈述出来，希望学生诸君留意。最后，吾于湖南学生诸君，尚有一、二特要商酌之点，述之于次。

(1) 学生参与教务会议问题。吾在京时，即听见人说，湖南学生希望甚高，要求亦甚大，有欲参与学校教务会议之事。吾于学生自治，甚表赞同。惟参与教务会议，以为未可。其故，因学校教职员对于学校进行，应有一种办法，此办法若参入学生意见，则甚为纷扰。北大学生曾要求加入评议会，后告以难于办到的理由，学生亦遂中止要求。

(2) 废止考试问题。湖南学生有反对试验之事。吾亦觉得试验有好多坏处。吾友汤尔和先生曾有文详论此事，主张废考。北大、高师学生运动废考甚力。吾对北大办法，则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废止试验；要证书者，仍须试验。

吾意学生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一番。现在是青黄不接时代，很难得品学兼备的人才啊！吾在教育界当差二十多年了，吾从没有反对过学生。吾只希望学生能有各方面的了解和觉悟，事事为有意识的有计画〔划〕的进行，就好极了。

毛泽东所记的另一篇，是蔡元培在周南女校讲述的。湖南省教育会《名人讲演集》中未记载此篇，蔡元培自己亦未曾过目。这是绝无仅有的一篇，尤其珍贵。长沙《大公报》排印误漏处，酌加校勘，圈点亦改为现行标点符号。

美术的价值（在周南女校）

记者按：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给我的。

美术的起原很早，没开化的人，就有美术的萌芽，不过美术成为理论，比较要迟。在我们中国，评论美术的书，有《乐记》、《考工记》、《文心雕龙》、书评、画评等等，但都是些零碎的批评，不能建成有系统的美学。

西洋对于美术的评论，希腊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也是零碎的。到多马时代，有建筑学、雄辩学、诗歌等，比希腊时代，已算是进了一步。后来文艺复兴，有一些艺术家，著了一些书，比罗马时代又进步。十七世纪的时代，经过一些经验派心理学家以心理研究美学，已算有了一些头绪，但还不能成功一种美学。后来康德以有趣味为美，把美术应用到哲学上面，于是哲学的美学成立。

大凡懂了美学的理论、并得了美术的陶融的人，可以养成一种高尚活泼的人生观。若细为区分美术的价值，可得五项：

第一，复杂而又统一。譬如瓶花，这一花与那一花不同，这一叶与那一叶有别；一花一叶之中，这一个部位与那一个部位又各相殊，樊然并呈，算是很复杂了。一面总称为花，而且总归于瓶，则又

是统一的。人身的部位，如耳、目、口、鼻、手、足、腹、背等，纷然各别，但均统一于一有机体的‘人身’。

大凡美术，复杂做其内容，统一成其形式。复杂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繁富；统一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不致凌乱，而有一最终归宿之区。凡个性与群性，分子与团体，单体与普泛，都是具有这两种类的价值的。

第二，改造自然。从前希腊的类学家谓美术的价值是‘模仿自然’，后人始知其说非是。美术的价值不是模仿自然，乃是‘改造自然’。美术家于其美术品，有创作自由，如画师之描绘一山水，或描绘一城市，彼于自然物之有碍其画之美者，如孤露的树枝、过高的尖塔等，则可以去掉它，不令留于画内。美术因〔固〕不能全然离间〔开〕自然，然自然只是为人生所享乐。吾人所不认为美者，在美术上可以用吾人的理想去改造它。若是者，才有美术上的价值：完全服从自然，便没有美术上的价值了。

第三，感情的具体表现。创作者的感情，借美术可以完全表现。伯牙抚琴，可以通志。季扎〔札〕观乐，可以知风。音乐之哀者使人哀，怒者使人怒，激扬者使人起激扬之心，沉郁者使人发沉郁之感。音乐如此，图画、雕刻、戏剧皆然。创作者的感情怎样见之于美术，竟能勾引赏玩者的感情也使之怎样。人为的美如此，自然的类亦然。壮阔者使人感壮阔，幽雅者使人感【感】幽雅。吾人的生活，感情的生活居多，情有不舒，则意自不快。耽于美术，无论是创作它或者是赏玩它，都是可以勾引出来真正的感情的。

第四，提起研究科学的兴味。体〔美〕术与科学有密切的关系。留心美术的人，可以因其关连的地方去从事科学的研究。如花、草、枝、叶之美之于植物学，光线之美之于光学，矿物体结晶之美之于矿物学，人体之美之于生理学。

第五，代替宗教。美术与宗教同立于感情的基础之上。人生是不免于忧患的，心有所寄，则忧患消除。与其寄于幽渺的宗教，不如寄于当前的美术。查科学之起，和宗教相为关连，自科学的界域扩充，遂利〔和〕宗教脱离关系。美术起初亦与宗教相连，后来乃渐脱离了关系。吾人沉睡于美的世界之中，直感当前，所觉唯美，生老病死，顿屏去于意识之中，此与宗教之信仰 相比，更纯更洁，更为合理。

美术的价值，大体如此。时促不能多谈。承诸君欢邀，无任感谢。

（五）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地址及经费，创办一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他规定这所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单独自修、集体讨论为主。校内设有图书馆，收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进步书籍报刊，供学友阅读。蔡元培看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欢喜得了不得！”认为这所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热情地撰写了一篇《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发表于《新教育》杂志第5卷第1期，广为传播。在这篇长文里，详细说明了你自己对于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张，反复强调：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于，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六）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期间，毛泽东即与杨昌济的爱女开慧相识。毛两

次到北京，和随父同住首都的杨开慧又有进一步的接触与了解，产生了爱情。杨昌济病故，其家属扶柩返里后，杨开慧先后进长沙福湘女校及岳云男子中学，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反帝斗争。1920年冬，他们两人结成革命的伴侣。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杨随着毛辗转于长沙、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积极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农民运动，协助毛整理文稿，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机要工作与交通工作。她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她被派留在长沙东乡板仓冲，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1930年十月二十四日，杨开慧被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关入陆军监狱，蔡元培迅即进行营救。据萧永义记述：“开慧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她60岁的老母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他们在上海找到杨怀中先生的好友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立即联合了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何健，要求保释杨开慧同志。反动透顶的何健得电后，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法，决定立即枪杀开慧同志，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

（七）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由延安写了一信给蔡元培，摘录原文于下：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工农政策，行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敬颂道安。不具。

毛泽东

事实上，蔡元培自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月起，即积极营救革命志士，反对国民党屠杀青年。“九一八”以后，坚决主张抗日，“直接间接对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抗战爆发前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欣然认为是“国家民族的大幸”。

蔡元培对解放区的状况非常关心。1939年8月6日，他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

阅《西行漫记》，美国爱特伽·斯诺（Edgar Snow）著，吴景崧等十二人译。是书凡十二章：第一，探寻红色的中国；第二，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第三，在保安；第四，一个共产党员的略历；第五，长征；第六，西北的红星；第七，到前线去的路上；第八，在红军中（上）；第九，在红军中（下）；第十，战争与和平；第十一，回到保安去；第十二，回到白色区域。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十二章叙西安事变。阅《续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宁谟·韦尔斯著（Nym·Wales），胡仲持等八人译。是书分五章：第一，到苏区去；第二，苏区之夏；第三，妇女与革命；第四，中国苏维埃的过程；第五，中日战争。又有附录。是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二章之十一节，中国字变了，指拉丁化中文的利用。第四章之第四节，关于托派的二、三事。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中国共产党对蔡元培也非常推重。1940年2月5日，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毛亲临讲话，蔡元培等被推为名誉主席团。同月20日，也就是在蔡弥留前的14天，由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毛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重要报告，蔡元培等又被推为名誉主席团。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由延安发出一电，向蔡的家属致唁：“子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局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阳。”

1962年春，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领他去见毛泽东，毛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真是好人”，这就是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这一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和广大知识界对蔡元培的无限尊重与无尽的怀念。

一片赤诚爱国心 ——毛泽东与挚友李振翩教授

李晨

著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李振翩 1984 年 11 月 16 日在华盛顿郊区的一幢环境幽雅的寓所与世长辞了，终年 86 岁。

(一)

李振翩教授是著名的细菌学家、病毒学家。他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造福于人类的医学事业。他生长在湖南湘乡有教养的家庭。1925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长沙湘雅医学院，获博士学位。他善于思考、钻研、探索新的领域，论述红血球自家凝集，颇有独到见解。1929 年至 1931 年他在美国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事病毒疫苗研究工作。在“病毒之父”里弗斯指导之下刻苦实验，1930 年他与里弗斯合作发表了《李——里弗斯病毒培养方法》的论文，发明了制造病毒疫苗的方法。

1931 年李振翩回国，1932 年至 1949 年他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中国军医大学和中央大学医学院任病毒学教授。1949 年他重返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1951 年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病毒实验所任生物部主任。1955 年又回到国家卫生研究院直至 1968 年退休。在美国期间，他同一些美国的著名医学教授主攻小儿麻痹症病毒疫苗的研究，获得一项又一项的成功。小儿麻痹病毒在老鼠的脊骨带中生长成功了；他同哈伯尔博士合作，把小儿麻痹患者血清移入老鼠脊骨带的方法成功了；1955 年他同谢弗博士合作培养了没有病毒的小儿麻痹疫苗最后一种血缘，成为医学界公认的李——谢弗的培养成果(L.S.C)，这一成果为亚伯特·沙宾博士制成疫苗，应用于预防小儿麻痹起了极重要的作用，至今在全世界广为应用，这也是李振翩教授医学成就的丰功伟绩。李振翩教授退休后，虽然离开了实验室的生活，他仍致力研究中国传统医学，向美国医学界介绍中国的针麻、针灸以及中草药等知识，写了 8 篇有临床价值的论文和二本关于防治癌症和中医草药的书籍。70 年代他三次来华访问，为促进中美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

李振翩是毛泽东同志的挚友。早在伟大的五四运动革命浪潮中，李振翩和毛泽东同志相识、相交。在旧中国，李振翩目睹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他同富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张维、龙毓莹等先后办了《学生救国报》、《新湖南》杂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后来这个刊物改为有毛泽东同志参与主编的《湘江评论》，毛泽东同志在 1918 年至 1919 年由北京回到长沙考察和领导学生运动，号召湖南学生会、各界联合会、同乡会等组织发起“驱张（敬尧）运动”，并赴京请愿。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来往频繁，交往甚密。李振翩是进京“驱张请愿团”的代表之一，代表民意，慷慨陈词，要求当局撤办张敬

尧，经过反复的斗争，甚至险些被杀害，但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毛泽东同志去上海，李振翩继续在湘雅学习。当他们分手时，李振翩给毛泽东同志的信说：“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医学，将来重逢。”

他们分别几十年，但毛泽东同志一直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1945年李振翩在贵州，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时托张维给他捎信，惜没有收到。1956年毛泽东同志又问过湖南来北京开会的医学家魏曦：李振翩在哪里？魏告称，在美国。70年代初，中美两国突破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1972年10月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又托代表团成员林巧稚给李振翩捎话。当中国医学代表团出席华盛顿美国各界的欢迎酒会时，林巧稚同李振翩和他的夫人汤汉志见了面。林巧稚和汤汉志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老同学。林巧稚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和对他们的访华邀请。

仅隔半年多，1973年7月李振翩和夫人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朋友来到了北京，实现了他多年来热切向往返回祖国，看看新中国变化和发展的的心愿。8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里，亲切地接待了这位50多年前的挚友和他的夫人，他们用湖南家乡话交谈了一个半小时，畅叙过去的友情。毛主席讲到“中国应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李振翩说，“自己研究医学的目的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毛泽东同志还把自己菜园里种的苦瓜和青菜等新鲜蔬菜送到李振翩下榻的北京饭店，请他和夫人品尝家乡风味。这种深情厚谊使他们非常感动。

（三）

在革命战争年代，李振翩曾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了有益的贡献。我原名李振穆，是李振翩教授的堂弟。解放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我曾在云南、贵州、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下，贵州地下党的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不少党的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1941年“皖南事变”后，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了联系。1942年春，党组织派我和赖卫民同志去贵州重建党的组织，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社会关系，找到适当职业，取得合法身分，站稳脚跟，再开展工作。我当即给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大学任细菌系主任兼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长的堂兄李振翩写信，说明我在重庆失业，可否到安顺找个工作。他很快就回信说，欢迎我到安顺。我到安顺后，住在李振翩的家里，借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就把我安置在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日常工作是制作生理食盐水。作为所长的堂弟，大家对我都很关照，国民党也没对我找什么麻烦。我在这一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始了重新建立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此间，李振翩和他的夫人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知道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也知道我时常出去活动，但从来不问也不干预我的活动。1943年，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方便，我化名李振铭，考取了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搬迁到贵州遵义），离开了李振翩的家。

1946年夏，我转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工作。这时军医大学也迁到南京，李振翩自己有一所别致的寓所。我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看望过李振翩，那时，他才明白了我原是共产党，他不但毫不讳忌，而且表示高兴。他当时曾多次见过周恩来、董必武和李维汉等同志，交谈他同马歇尔将军的接触，试图为国共和谈出些力。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在美国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调停”幻想。1946年6月发生了“下关惨案”，接着国民党特务准备假冒“苏北难民”的名义袭击中共代表团。为保障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周恩来等同志决定代表团人员尽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暂时疏散出去。于是我就搬到李振翩的家里隐蔽了10几天。他那时已是中将军阶，在他家里自然安全无恙。这是他和他的夫人第二次掩护我。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组织上安排我撤回延安。

1973年李振翩回国访问。周总理会见他时，首先感谢他和他的夫人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一事，就是指的上述经过，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

(四)

李振翩教授为促进和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两国医学科学交流，以及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作出了宝贵贡献。改善中美两国关系是他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1971年他给老朋友毛泽东同志写信，期待同其会面。在信中说，“我在美国生活多年，作为一个中国血统的人，介绍我亲身了解的美国，可能对您有参考，自然，我也要向美国国务院说明我的见解。”1973年他同毛泽东同志会见时，毛主席还提到他来信的事。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总理会见时谈到中国科学家们需要同外界加强联系，要跟上世界的科技发展，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于是李振翩问：“我个人能做些什么吗？”周总理说，“这可以同你的堂弟李晨进一步讨论。”我建议他可考虑筹组一个学会之类的组织，组织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返美后，他积极筹办，于1974年创建了美中医学科学中心，同我中华医学会密切合作，邀请我国医学界人士赴美讲学或参加讨论会。为中美两国民间往来和医学科技交流作了大量工作。

1975年6月和1978年6月李振翩的两次来华访问，分别同周总理和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后来邓小平同志还专门寄去亲笔签名的合影照片作为留念。1978年他已是80岁高龄的老人，“还想为中美友好做点事情”。这种崇高的赤诚的爱国心促使他为增进中美医学科技交流和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奔波。在他历次访华过程中，都同国内医学界同仁，广泛深入探讨最新的医学科学发展，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多年积累的丰富知识和经验，把他著作的医书和其他大量的医学名著赠给中国医学界，同时也搜集中国医学方面的新成果，带给美国医学界，为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健康作出了贡献。

李振翩教授甚为关心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他坚定地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他渴望世界稳定，天下太平，人类幸福。1975年6月他来华时，周总理身患重病，从医院去北海公园同他会见。当他提出如何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周总理讲到，第一，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军队；第二，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第三，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李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这一严正立场。会见后他即约见当时美国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先生，他们共进午餐，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李振翩全面详细地阐述了上述问题。1978年6月他回国之前两个月，会见美国万斯国务卿、施莱辛格等高级人士，同他们讨论“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的办法和步骤”。来华后他曾预言，一二年内就可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果然，这次访问后不到一年，他的预言实现了。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设在两国首都的联络处改为大使馆。这是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伟大

成果中也包含着李教授一份宝贵的心血。

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后，李振翩为不断发展中美关系和加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工作着。他是全美华人协会创始人之一，他被选为第一届美京华协分会会长。他团结华人各界，发挥才智，辛勤劳动。他对访问美国的中国代表团热情款待，多方协助。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他像迎接亲人那样兴奋和激动。1984年他已身罹重病，但他不顾病痛，竭力支撑，仍为发展中美友好日夜操劳，亲自给中美两国领导人写信，陈述经过深思熟虑的建议，并经常约见驻美大使章文晋同志交谈，直至他去世前二三个月还同章文晋大使讨论国际上的许多重要问题。

三次登门为求学 ——毛泽东与夏默庵

陈首涛

1917年8月，正是稻谷吐金、山果溢彩的时候，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从长沙第一师范出发，经过宁乡，爬山越岭，风尘仆仆地来到安化山区，以游学方式进行社会调查。

安化县——梅城，始建于宋代，是一座古老的山城。沅水环抱，双塔对峙，风光十分秀丽。还有培英堂、孔圣庙、东华观等名胜古迹。这些都把虚心好学的毛泽东吸引住了，但更吸引他的是饱学之士夏默庵。

夏默庵是安化县羊角乡大岩村人。清代两湖学院毕业，学识渊博，经、史都好。曾以廪贡生，举孝廉方正，考授六品顶戴，补用知县，晚年任安化县教育会会长。1917年，他64岁，在安化县劝学所当所长。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书。

毛泽东在学校时，就向安化同学罗驭雄打听：“安化有些什么宿学？”同学们就向他介绍了夏默庵。因此，他到安化后，就慕名前往拜访。

夏默庵先生喜欢吟诗作对，自以为有学问，孤芳自赏，比较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这天门人通报：有个年轻的游学先生求见，他叫门人回复说不在家。毛泽东相继又来，夏又同样回避；但是，毛泽东并不计较，虚心求教，复又第三次登门。夏默庵心想：平日的游学先生一次不理，扬长而去，这位年轻的游学先生与众不同，我倒要探探他的学问深浅。于是开门相见，挥笔写一对子于书案上。毛泽东见了，心中一笑：原来是要考我啊！他略一思索，马上应声作对：

原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属对：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默庵先生见了，大吃一惊。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哩！他自感有愧，连声赞叹：“对得好，对得好。”马上客礼相待，请毛泽东吃饭，留毛泽东住宿，还拿出自己写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请毛泽东过目。两人谈得十分融洽，成了忘年之交。夏默庵先生还送了8元银洋给毛泽东做旅费，亲自送到大门口，依依握别。

